

毛泽东

离京巡视纪实

1949—1976

侯波 吕厚民 袁小荣◎编著
钱嗣杰等◎摄影

下卷

人民日报出版社

毛泽东

离京巡视纪实

1949—1976

侯波 吕厚民 袁小荣◎编著
钱嗣杰等◎摄影

下卷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 / 袁小荣编著.
—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115-2129-3

I. ①毛… II. ①袁… III. ①毛泽东 (1893 ~ 1976)
— 生平事迹 IV. ①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4072 号

书 名: 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
作 者: 袁小荣
摄 影: 侯 波 吕厚民 钱嗣杰等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银 河 程文静
封面设计: 金 刚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65369525
网 址: www.peopledaily.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952 千字
印 张: 92.25
印 次: 2014 年 1 月 第 1 版 2014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2129-3
定 价: 168.00 元 (全三卷)

目 录

(下卷)

第九章 逐步转向抓阶级斗争 / 995 /

○ 四十四 召开第二次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 996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毛泽东讲话，谈阶级、形势、两类矛盾、阶层等问题。

毛泽东批评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或者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大家都分析一下原因。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讲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话。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如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农民。要花几年工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这怎么行？

○ 四十五 到南方视察 1014

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一些省委负责人谈话，毛泽东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的高度重视，感到不满。

毛泽东说：“人口越报越多，土地越报越少，产量越报越低，灾情越报越大。”这种情况改变没有？要依靠农民，引导他们到生产上去想办法，不要引导到分配问题上去。分配要公平合理，也要照顾四属户五保户。“对修正主义有办法没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上层建筑。党、政、军，公社，民兵，都是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不能太多，抗战时期就规定根据地的脱产人员不能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几；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只有五个人：我、恩来、弼时、定一、乔木，只有我有一个秘书。现在省级机关人很多，减人要继续贯彻。

○ 四十六 主持起草“前十条” 1027

毛泽东批转了湖南、河北关于进行社教和整风整社的报告，并号召在农村开展社教运动。

毛泽东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又说，“国内的修正主义也不少，要反对我们自己内部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这些牛鬼蛇神。”毛泽东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团结起来，教育那些不懂或不大懂马克思主义的干部和群众，目前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大意义在此。

○ 四十七 赴中南、华东讨论“后十条” 1054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在农村社教运动中出乱子，搞过了头。尽管对此三令五申，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乱子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试点过程中普遍发生了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的问题。

在一线负责这项工作的彭真，从5月15日到6月15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一些省份视察，发现了不少问题。7月4日，他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份情况报告，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同时，各地陆续报来一些材料，反映农村社教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和问题，提出要划清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简称“后十条”。“后十条”经过多次修改，报送毛泽东批准。10月10日，毛泽东离京，分别向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的省委、一些地委和中南局的负责人征求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点面结合去做最有利。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意见。

○ 四十八 巡视中南、华东，了解“双十条”贯彻情况 1067

毛泽东离开北京，分别在邯郸、郑州、武汉、长沙、南昌、杭州召开山西、河北、陕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省委及一些地委负责人参加的四清工作座谈会。毛泽东在听了大家的议论后说：“现在各地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的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问题。”

毛泽东再次强调：“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着急，一定要搞彻底，不要滑过去。两年不行搞三年，三年不行搞四年。过去民主革命没有搞彻底，现在要补课。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滑过去，将来又要补课。”

○ 四十九 1964年夏天在北戴河 1093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毛泽东退居二线，连“后十条”的修改也不参与。毛泽东准备骑马沿黄河考察。与此同时，刘少奇就到华东、中南视察后回京讲话说：现在证明，这两个十条，包括第二个十条，普遍读一次有好处。但

是，地、富、反、坏分子，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他就利用这个第二个十条的许多政策规定来顶工作队，来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搞“四清”。群众还没有发动，怎么就拿第二个十条去搞呢？以后不要强调了。他批评第二个十条讲的“两个依靠”靠不住。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联，不要经过基层组织。

刘少奇的这次讲话，在各级干部中引起很大反响和震动。

○ 五十 视察“四清”运动 1108

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外地视察“四清”运动。在武汉，毛泽东调查“四清”运动情况，问王任重，大区会议的精神是什么？毛泽东说，15年了，我们的经济工作还没有总结起经验，主张中央有个领导小组，加上各大区书记，来实现计划经济的统一领导。在长沙，毛泽东对湖南的同志说，你们为什么对中央不批评？中央的人也是一分为二，有比较好的，有比较不好的，越到中央，越脱离实际，越没有知识。制度不合理，不违反是错误的，错误的东西要顶住。一切正确的东西是下面来的，工人、农民、技术干部、支部书记，我们请教了他们，才有一点知识。正确的东西就是从他们来的嘛。有人自以为什么都懂，其实什么都不懂。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主要从老百姓那里找知识。

第十章 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 / 1117 /

○ 五十一 重上井冈山 1118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了刘少奇的“四清”工作路线，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毛泽东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还不在于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注重点有了很大变化。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他在“二十三条”中写道：“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五十二 滞留南方 1148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同一天，毛泽东在北京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

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第二天，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他长时间滞留南方，观察形势，支持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批评《二月提纲》，主持制定《五一六通知》，支持北大七人的大字报，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第十一章 动荡年代 / 1223 /

○ 五十三 平息动荡的一次努力 1224

毛泽东原设想“文革”“一年开张，二年见眉目，三年结束”。但是，烈火一旦烧起来，许多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更不用说还有人要利用“文化大革命”达到自己的目的。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展开，社会上逐渐形成两大派，一派是以党、团员和干部、工人的大多数为主，他们拥护毛泽东“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要抓革命，促生产”。主张按“十六条”来开展“文化大革命”；另一派打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旗号，到处围攻冲击党政机关，乱批、乱斗，到处“夺权”，大搞打、砸、抢，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两派都抬出毛泽东的招牌，攻击对方反毛泽东思想，势不两立。

毛泽东也担心“文化大革命”会失去控制，无法按原来的设想，在两三年里结束。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两派斗争尖锐、矛盾特别突出的武汉。通过解决武汉问题，解决全国的问题。

○ 五十四 南下了解九大精神落实情况 1258

一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九大结束后，心情轻松地登上南下专列，他要到南方转一圈，看看九大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他经邯郸、郑州到武汉。在武汉，他看到到处张贴主席像，连吃饭、睡觉都要搞“早请示，晚汇报”，他立刻下令停止了到处泛滥的“忠”字化运动，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到经济形势方面来。他说，人是要吃饭穿衣的。湖北这个地方盛产粮食和棉花，你们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除了农业、水利问题，他过问焦枝铁路建设，江汉油田会战，鄂西山区三线建设。他积极解放干部，让把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他批评专案小组很危险。毛泽东说，有一种做法我不赞成，就是动不动就捉人，有的关在什么“牛棚”里，关在地下室里，报纸也不给他看，这就与世隔绝了。世界上干了些什么，他

们都不知道。这实际上是一种“推一推”的办法，不是“拉一拉”的办法，对于干了些坏事的人，推一推就过去了，拉一拉就过来了。在济南，他就正确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坚持文斗，不要武斗，工农业生产，落实政策等做了指示。

○ 五十五 战备疏散到武汉 1272

1969年国庆节刚过，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分析中苏关系的发展趋势，研究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措施。会上，林彪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提出了落实意见。

1969年10月20日，将在北京举行中苏边界谈判。毛泽东明确指示，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必须于谈判开始前紧急疏散。毛泽东先走一步，让林彪也尽快离开北京，周恩来也早点离开中南海，出城进山。

○ 五十六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突发事件 1285

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举行。

周恩来宣布开会后，毛泽东问主席台上的其他几个常委：“现在还是请哪一位讲呀？”这时，林彪拿出一份讲稿，在会上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主要是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条。”“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

他还着重地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 五十七 为解决林彪问题南下打招呼 1315

经过一年来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毛泽东从大量揭发出来的事实以及种种迹象中，对庐山会议那场风波背后的真相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年近八旬的毛泽东再次乘专列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市巡视。他决定去南方一些地区边调查、边“吹风”，把话说得比过去更明白，来统一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毛泽东先后抵达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浙江和上海的主要领导人谈话。他大谈中国共产党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谈庐山会议的问题。

与此同时，林彪一伙开始了行动。1971年8月8日，林彪下达武装政变手令。林立果带手令乘飞机到北京。派于新野飞上海、去杭州，布置在上海谋害毛泽东。

○ 五十八 赴南方休养 1378

1974年春天，毛泽东的视力逐步下降，听取医护人员的劝告，他决定到外地养病。毛泽东不让把病情告诉人，只有周恩来等少数几个人知道。文件只由秘书、工作人员为他读，批语由他口述，记录整理后读给他听，一字一句绝不马虎，有时他还要以微弱的视力再看一遍才放心。看书困难，他就观赏字画，请人读辞赋。他提出：把吕正操、杨成武等放出来，贺龙要恢复名誉。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在长沙，他每天休息很少，仍通宵达旦用“听文件”的方式工作。休息时，喜欢看湘剧、花鼓戏、京剧传统剧目。毛泽东对被江青定性为“毒草”的《园丁之歌》表态，“我看是出好戏”。江青指使王洪文飞长沙告刁状，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周恩来、王洪文飞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毛泽东打发王洪文参观韶山，与周恩来单独彻夜长谈，最后商定了四届人大人事安排。1975年春节前八天，毛泽东突然决定离开长沙，到达南昌。他在这里停留了三天，又到杭州。铁瑛向他反映：造反派在各地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干，本人不是党员，却当介绍人。毛泽东愕然。讲到造反派冲进省县以上干部会议抓人，又占据杭州饭店，他非常气愤，当即命令调动一个团，把造反派从杭州饭店赶出去。在杭州两个多月，医护人员一致主张他不能再看书和批阅文件了。毛泽东只同意先治右眼，留出左眼坚持阅读、工作。毛泽东指示，对在押的战争罪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他批准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均予以释放，并妥善安置。

1975年4月13日晚，毛泽东离开杭州返回北京。

从此以后，直至去世，毛泽东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

附 录 / 1418 /

○ 毛泽东离京巡视行程表 1418

○ 毛泽东离京巡视时间表 1434

○ 毛泽东离京巡视随行摄影记者 1436

后 记 / 1440 /

第九章

逐步转向抓阶级斗争



- 召开第二次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
- 到南方视察
- 主持起草“前十条”
- 赴中南、华东讨论“后十条”
- 巡视中南、华东，了解“双十条”贯彻情况
- 1964年夏天在北戴河
- 视察“四清”运动

四十四 召开第二次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

1962年7月25日毛泽东到北戴河。

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的前半段，到8月5日为止，主要是起草有关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商业、工矿企业生产和工人生活、干部交流等文件。这些文件加起来，大大小小的有20个之多，光是关于农村工作的就有15个。在这些文件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25日，毛泽东将一篇《论波兰农业合作化发展道路》的文章摘要批给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三同志。

26日下午4时至6时，书记处开会，各大区同志参加，安排会议的程序。“已报告主席、少奇，主席表示同意。”

28日，陈云致信邓小平并转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信中提出：由于心脏状况很差，体力也极衰弱，为避免再次爆发心绞痛和心肌梗死，请求不参加将在北戴河召开的各种会议。31日，毛泽东批示同意。

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住地95号楼的会客室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都参加了。会上议论的问题很广泛，从国际形势到莫斯科和平裁军会议，再到国内形势、东南沿海备战、党内出现一些右的苗头、精简工作、城市工作等等，差不多都涉及了。

谈到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提出一个问题：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

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国际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

这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商定好的“低调”方针发言，较多地强调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引起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毛泽东说，我们犯了错误，脱离了群众。要对这些党打招呼，向他们说明我们仍然坚持斯德哥尔摩会议上我们的主张，我们在那个会上的调子，就是我们现在的调子。

七千人大会以后，王稼祥等多次就对外关系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向中央陈述意见。他提出：“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说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还提出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后来，毛泽东把王稼祥等人的意见概括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支持少一点，称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在谈到党内开始出现右的苗头时，毛泽东说，出气的好处是思想活了。同时，



1962年，毛泽东在北戴河。（摄影/吕厚民）



1962年，毛泽东和李敏等在北戴河合影。（摄影/吕厚民）

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他问三北地区的负责人：你们稳住稳不住？你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①

31日，毛泽东对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问题的

的报告作了批示。

同日，毛泽东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修正草案修改稿作了批示：“印发各同志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领导的起草委员会斟酌修改。”^②

8月，毛泽东对中央关于正确对待单干问题的规定草稿作了修改：毛泽东作的最主要修改有：

党在农村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措施，使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已经或正在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地区发生了“单干风”，已经有一小部分生产队改变方向，分户单干了。

对于党内的思想问题，必须采取民主讨论分清是非的方法，以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的目的，但是必需容许少数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有充分发展〈表〉意见和保留意见的权利。

一小部分生产队陷于瓦解状态，这是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一个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235~1236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0 卷，第 123 页。

曲折，这种曲折是不可避免的。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几十年几百年内，也是还会有的。只要就全国来说，只占一小部分地区、社队和人数，也是并不可怕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占了极大的优势。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还将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可能要继续几十年到几百年。（加点字为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此外，毛泽东还有个别文字上的修改）^①

8月2日，毛泽东在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来信上批示：“印发各同志。安徽太湖县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同志给我的一封信。请大家研究。”^②

同日，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发言摘要的报道批示：“南斯拉夫的经济混乱情况，印发大家一阅。请大家讨论一下，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好，还是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好。”^③

同日，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南斯拉夫经济问题的一篇通讯稿批示：“南斯拉夫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好吗？请同志〔们〕讨论一下。”^④

毛泽东还将《一个美国农场主对苏联农业问题的看法》批发会议各同志。

晚上，毛泽东与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华北地区各省、市、区负责同志谈话，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参加。他先问目前的生产情况，又问到农村单干的情况。河北、山西、内蒙古、北京的负责人一一作了回答，说明山西、内蒙古和北京的单干情况并不严重，河北有少数生产队有这个问题。

毛泽东说：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

谈到有的大队核算单位没有下放，生产也搞得很好，毛泽东说，以大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125~12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127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129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131页。

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办得好，又增加生产，就不一定下放到小队。

谈到生产队的规模和管理问题时，毛泽东说，生产队以20户左右为宜，太大了不好。田间管理责任制要搞好。有的地方按地段包工到组、到户、到人，这是进步的管理办法，不能说不好。^①

3日，毛泽东同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

晚上9时，毛泽东召集会议讨论会议如何开法，刘少奇建议成立核心小组，中央常委一致赞成，名单经毛泽东批准。核心小组有常委、书记处，再加大区第一书记，中央各口负责同志，共22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陈伯达、罗瑞卿、谢富治、谷牧、陆定一、杨尚昆，加上各大区第一书记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宋任穷、李雪峰、刘澜涛。

4日下午，毛泽东同西南区的云南、贵州、四川几个省的同志座谈。几个省的同志向毛泽东谈到：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②

8月5日，毛泽东与华东、中南组座谈，参加座谈的有：华东的柯庆施、李葆华，中南的陶铸、王任重、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廖鲁言、王观澜也参加了座谈。

毛泽东说，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

毛泽东说：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呢？他又说：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對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兼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3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37页。8月5日的谈话里谈到8月4日的谈话情况，见第1237~1238页。

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

毛泽东说：“19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1959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看一看。”^①

讲到分田到户，毛泽东说，有的人主张60%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上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

毛泽东说，已经搞了单干的，不能勉强去扭，过了半年或一年看出两极分化了，有两方面的压力，一种是贫雇农要求解决生活问题，一种是富裕阶层劳动力强的他要搞单干。他说，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90%是集体的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

谈到形势问题，毛泽东说，我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1958年搞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工夫，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毛泽东说，我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讲到建成社会主义要50年、100年或更多的时间。讲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要人们懂得，有资产阶级存在，不要忘记还有阶级斗争。

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问题，毛泽东说，前几年我们搞平均主义和强劳动力之间有矛盾，他们不赞成。他又说，完全不要一点“平均主义”，比方说不要基本口粮，不要照顾，光搞按劳分配，光争取富裕阶层，把农村的五保户、困难户、军工烈属20%至30%的人丢开不管也是不行的。这些人在农村中是我们的依靠。

毛泽东说，我们工作上犯了错误，搞了“五风”，高征购，几个大办，看来我们的错误主要是瞎指挥、高征购。瞎指挥，这一类的事情是主观和客观上不相适应，是认识上的矛盾。因为大办，城市人口一下增加两千多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38页。

万人，高征购农民吃了亏，工人阶级也没得利。什么人得了利呢？国家为前途打算，为全体劳动人民打算，工人农民两方面都吃了点亏，国家积累了许多东西。我们现在有了相当大规模的、有了一千几百万吨生产能力的冶金工业，有了大规模的机械制造业，地质部从200人扩大到20万人以上，煤炭工业、石油工业进展很大，农业方面水利建设、排灌机械、拖拉机都有所增加。

毛泽东说，这几年有不少的浪费，比方搞水利，有的地方搞成了盐碱地，这是大浪费，是破坏。在工业方面也有许多瞎指挥，把工人多招了两千多万，现在又得遣散两千万，这是一种大瞎指挥。当时控制不住，现在控制住了，农民、工人都是暂时吃了一点亏。

最后，毛泽东提出几个问题，要大家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小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①

8月6日下午4时，由毛泽东主持，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邓小平讲了会议程序。先开工作会议，为中央全会准备文件。从7日起，开始讨论。毛泽东讲话，谈了阶级、形势、两类矛盾、阶层等问题。

关于阶级问题，他说，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共产党也就是叫作“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是个基本问题。我同六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为之吃惊。

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说，国内形势，就是谈一谈究竟这两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过去几年，我们有许多工作搞得不好。有些工作还是搞好了，比如我们的建设工作，还是有成绩的。这主要是讲工业方面的建设，农业方面的水利。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37~1239页。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68~569页。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下卷，第202页。

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因为主观客观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么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哪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怎么样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那种看法。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非是这两类。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这个残余还要存在。哪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马克思主义是不赞成没有矛盾的，不赞成“无冲突论”的。

接着，他讲到现实存在的一些矛盾。首先是单干问题。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不是从个别地方来说。个别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已经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现在暂时不要动，不要去强迫纠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我们的中心，这一次文件上表现了。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

其次是阶层问题，他说，资产阶级分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分阶层。比如现在闹单干的，是那个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比较贫的阶层，有比较富的阶层，还有中间阶层。地主富农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无产阶级如果不做工作，集体化就不能巩固。因为小资产阶级有富裕阶层存在，闹单干的

可能性就长期存在，这是单干的社会基础。

接着毛泽东又谈到积累同消费的矛盾、集中同分散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敌我矛盾。^①

7日下午2点，毛泽东接见了正在我国访问的一批拉丁美洲国家的朋友。

8日，毛泽东接见了厄瓜多尔前众议长阿劳霍。

8月9日至20日，中心小组共召开八次会议。每次中心小组会一结束，参加会议的中央局第一书记就在小组会上分头传达，组织讨论。毛泽东通过这种办法，来指导和推动中央工作会议的进行。

9日11时至14时，中心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各组汇报情况。15时30分至18时继续中心小组会议。在这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不少插话。

谢富治讲了敌我矛盾问题；罗瑞卿讲了部队对单干的看法；陈伯达讲了合作化的历史；康生讲了苏联集体化的历史。毛泽东随时插话。他对这两天各组讨论的情况，认为是不抓大量的普遍的问题，只抓具体问题，因此没有展开。注意观点和分析不够，有些沉闷。他提出，现在需要务虚，认真讨论一下。阶级分析要认真注意，遇到困难和波折时，这方面容易被忽视。

李井泉说，单干以后，两极分化很厉害，只要两年就很明显。毛泽东说，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他还说，集体化的巩固，必须经过几个回合。我们的集体化已经经过了考验，将来还会继续经受考验的。

在谈到对形势的看法时，毛泽东说，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他说，应当有分析、有比较，不能是一片黑暗。过去讲一片光明，现在又说是一片黑暗。一片光明，现在没人讲了。从196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说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239~1241页。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69~570页。

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他尖锐地提出说，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他强调说，这几年的一些做法，打击集体，有利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还提出，关于矛盾问题，要再加上一条，即正确与错误的矛盾。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从1953年算起，不过才十年。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中间犯过错误，如“共产风”、瞎指挥、“大办”、高征购等，本来想搞得快些，结果反而慢了。引黄灌溉是瞎指挥，没有经验，不知道还会盐碱化。这些都属于认识上的错误。所以我说要加上一条正确与错误的矛盾。这些都属于认识上的错误，不是方向路线问题。毛泽东还指出，现在城市工人生活太苦了，要提高一些。

毛泽东针对他8月6日的讲话说，我在大会只出了个题目，还没有讲完，有的只露了一点意思，过两天可能顺理成章。

毛泽东批评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或者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大家都分析一下原因。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讲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话。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如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农民。要花几年工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这怎么行？

毛泽东说，196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我在周游“列国”时，在光明、黑暗的问题上只是露了一点，提了个题目。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这次会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包括许多农民，其中大部分是贫农和下中农，有一部分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农，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识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或者是资产阶级子弟。另外，还有封建官僚反动阶级出身的。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有些同志马

克思主义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

毛泽东说，只要有阶级、阶级斗争，一万年也要搞，哪有有阶级不进行阶级斗争的？

毛泽东说，有人说搞单干四年就可以恢复，否则要八年。而且八年只能解决粮食，经济作物还不行。或者主张小部分集体，留40%，让60%去单干，然后慢慢影响和吸引他们。实际上恐怕太慢了不行，太慢就要两极分化。

世界上搞农业只有三种方式，一是封建的，一是资本主义大农庄，一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是大农庄，不是小农经济，不是单干。我们的集体化，实际上是个农业工厂。不过我们叫生产队，不叫工厂。^①

10日，毛泽东在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馆党委8月5日关于阿尔及利亚情况和使馆的看法给外交部的报告上批示：“此件值得一阅。中央对国内很多情况不清楚。许多领导机关封锁消息，不作论证性的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实行独立王国。而国外使馆消息，却如此认真而迅速。请同志们想一想，是否可以把这个十几年的老毛病改一改呢？如果再不改，那就只有执行纪律的一条路了。”^②

8月10日下午2时至6时，继续中心小组会议。

11日下午，中心小组会议，决定各小组明天继续开会。在听取了各组汇报以后，刘少奇、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发言，其间毛泽东有一些插话。

大家汇报说，根据主席指示，集中讨论了原则问题，很有兴趣，热情很高。毛泽东满意地说：“会议抓主要问题、本质问题很需要。最近，陕西一个公社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有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是‘一叶知秋’。我说不不对，也可以一叶知冬，冬过了还有春嘛！总之，不要尽讲黑暗。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42~1243页。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下卷，第203页。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08~509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74、1077、109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135页。

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①

邓小平发言说，主席这次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及时。不只是讲国内问题和单干问题，内容是很广泛的，包括整个国际国内的一个历史时期，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或叫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问题。这个历史时期还有阶级、阶层，还有阶级斗争。邓小平还讲到，无论在国际斗争方面，还是在国内问题上，都要看我们的旗帜鲜明不鲜明。左派旗帜不鲜明，歪风就厉害。

刘少奇说，主席提出的这些问题，在长时期内，一直到消灭阶级都是管用的。我们这个国家阶级存在的时期还是很长的，因此，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关于形势问题，他说，1月会议我们做过一个估计，当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5月会议又有一个估计。现在看，5月会议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第一是认为夏收减产已成定局。现在看没有减产还增了产。（毛泽东插话说：“夏收还没有定局。今年整个讲是增产了。山东增产了八亿斤，全国都增产。”）第二是那时估计单干在全国已占20%。现在看全国最多也不过10%。因此5月会议上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是指全国讲的，有些地方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毛泽东插话说：“那时河南、安徽外逃的人减少了，社会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

5月会议下了决心，减轻征购任务。当时对困难估计有三种设想：一是估计够了；二是估计不够；三是估计过头。当时认为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点，即使出现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会有思想准备。但是有些丧失信心。

刘少奇说到这里，毛泽东又插了一段话，说：“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有人估计，恢复需要五年到八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五年八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地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实上已经起了作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243页。

用。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

刘少奇谈到在经济上、在党内都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时，毛泽东说：“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在工业方面都要产生，党内也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

刘少奇谈到农业是关系我国命运的问题，非搞社会主义大农业不可。只能这样想，不能有其他想法。毛泽东又插话说：“这是指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样想，你有什么办法？我经过河北、山东，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长沙、武汉，走了一圈。在武汉，把柯庆施叫去，大家谈到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张百分之四十搞集体，百分之六十有领导地下放搞包产到户，否则生产就要破坏。”这一次，毛泽东点名批评了田家英。

邓子恢在会上作了检讨。毛泽东对他提出严厉批评，又说他是属于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并且提到所谓砍20万个合作社的历史旧账。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又加了一个：照抄外国与自力更生的矛盾。

会上毛泽东点了邓子恢、田家英的名。会后，毛泽东再次表示：陈云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的，没有对外宣传。^①

12日，毛泽东在中央组织部7月份综合报告上批示：

“印发各同志。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们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现在部长安子文同志在经过批评之后，觉悟了，这就好了。希望毛病不要重犯。”^②

同一天，毛泽东还对邓子恢关于农村工作政策作了批示：

此件是一九六一年夏季庐山会议时印发文件之一，现在重印发给各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部在那时还是正确执行中央路线的（第二部分的十条措施，其中包括如何正确对待单干问题），对形势的看法（第一部分的十条分析）也很正确。过了一年（其实只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44~124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第122页。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下卷，第20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136页。

有十个月，即一九六一年八月到一九六二年五月底为止），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就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意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了的合作社，下令砍掉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我们欢迎子恢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核心小组会议上所作的声明。他说，他在最近几天，已经觉得自己的单干主张是不正确的了，这是值得欢迎的。但他没有联系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五年他自己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他那时，在城市，则主张依靠资产阶级，而不是依靠无产阶级），则是不够的，所以我在那会议上给他指出了这一点。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①

13日，毛泽东对陶铸在中南组发言要点上作了批示。

下午2时至6时，中心小组会议，罗瑞卿、彭真等作了发言，邓子恢再次作检讨。其间毛泽东有一些插话。

罗瑞卿发言，在谈到杜勒斯认为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的时候，毛泽东插话，提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走向反面的。”

罗瑞卿谈到钱让能在信中说，不按他的办法搞包产到户，农业就不能恢复。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江西没有按他的办法，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个省都有。北京十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1957年。有的地方就没有恢复的问题。”

罗瑞卿还谈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于把形势讲得很坏有意见。毛泽东说：“军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讲的是一片黑暗。华东局在上海开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137~138页。

会，有的省委书记，如山东的周兴，都是讲一片黑暗。但同一个周兴，只过了两个月，我到了山东找他和裴孟飞谈话，他就眉飞色舞，说形势很好，估计今年山东小麦可增产八亿到十亿斤。”

邓子恢再次作检讨。当他谈到，看了一些反映困难的材料，又听到黑龙江、四川等粮食基地垮了的时候，毛泽东说：“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30万人只留下二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是怎样估计的？当时中央估计，我们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因为过去不巩固，方针、战略、战术不对头。后来一总结就清楚了，有了经验了。”

邓子恢谈到，他这一次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讲了四次话，赞成包产到户。毛泽东接过来讲：“这与你主张贫农团不是自相矛盾吗？贫农是搞集体的嘛，难道贫农团要搞单干？田家英在湖南韶山作调查，只调查了一个公社的一个队，在湘乡、宁乡也只调查了一个队，连一个公社也没有调查。大概这气候适宜于你，你敢讲了。你6月讲了，只有两个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两年再说也好嘛。”

会上，军队一位负责同志发言也批评说：农业恢复的时间越说越长，工业指标也越讲越少，我们一辈子没有希望了，还有什么搞头。还有的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说：现在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不是个恢复问题，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都不是个恢复问题。^①

8月15日，核心小组会议，李富春、谭震林和康生发言。其间毛泽东有一些插话。会议决定9月1日召开中央全会（在北京）。

李富春发言，首先肯定毛泽东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很深刻、很及时。接着说，要抓生产，工农业生产要抓十年。毛泽东插话：“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

李富春接着说：5月会议提出争取快、准备慢，问题是有些同志把重点放在准备慢上了。毛主席插话说：“争取快、准备慢”，哪一方面也适用。快了，头一句灵；慢了，后一句灵。

谭震林发言，批评包产到户，批评对困难的估计多了。他不赞成说农业的恢复要五年。他说，实际上，“五风”纠正了，搞了“十二条”、“六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45~1247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75~1076页。

十条”，恢复就会很快，只要两年就达到1957年3700亿斤的水平。毛泽东插话说，我不相信恢复会那么慢。又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还是搞社会主义。主要是今明两年，1964年扫尾。”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跟后来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到1964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全面好转了。

康生在发言中，主要讲阶级斗争的规律问题。他说，过去的13年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每当我们党内搞出缺点、错误和困难的时候，党内党外总要起风波。^①

这一天，毛泽东对公安部关于当前反革命活动情况和我们的对策报告草稿作了批示。

16日，毛泽东对中央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和胡开明建议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报告作了批示。

17日，毛泽东对李先念关于等价交换问题的口头汇报提纲作了批示。

下午2时至5时，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心小组会议，会议转入讨论商业、物价、粮食等问题。李先念、周恩来发言，其间毛泽东有一些插话。

李先念讲到阶级斗争问题时，毛泽东说：“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势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

李先念讲到粮食问题，说征购任务减少了，夏收的产量原来估计低了，现在看比去年好一些。去年进口粮食540万吨，今年进口470万吨，减少了70万吨。毛泽东说：“减少了70万吨，就是14亿斤。你看，进口减少了嘛，逐年减少嘛。现在人还没有减到两千万，减到两千万，进口还可以再减。”他问周恩来：“今年进口粮食减少70万吨，明年能减少多少？”周恩来比较谨慎，说账还没有算，可先减少70万吨，再看一看。

李先念又说：“自由市场的物价下降一倍。猪肉价格下降了一半，粮食差不多下降了四倍。”毛泽东说：“只一个夏收就下降了，秋后还要下降。这是供求关系法则嘛。猪多了不卖干什么？”李先念带有检讨的口吻说：“我们做财贸工作的看问题多，看困难多。”毛泽东说：“讲形势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47页。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72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76页。

让谭震林讲，讲困难让你讲，这可能有职业病。”

当时商业工作中遇到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同时存在两个市场（国家计划收购市场和自由市场）、两种价格（国家计划收购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李先念提出一个问题：粮、棉、油是否进入自由市场？毛泽东和刘少奇对这个问题一致做了肯定的回答。毛泽东说：“恐怕不加入不好。”“自由市场既然有，又起交流作用，还不如让它公开出来，起粮食交流作用。有许多三类物资，我们不搞，又不允许上自由市场，结果邯郸把几百万斤三类物资都损坏了。”刘少奇说：“自由市场事实上是存在的。你不让搞，它有黑市。不让它存在是不行的。”^①

18日，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工作报告作了批示。

中央军委1962年8月10日关于军委5月至7月的工作情况给党中央、毛泽东写报告说，这三个月军事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一）采取紧急措施，准备粉碎美蒋匪帮对我东南沿海的可能进犯；（二）在中印边境西段，同印度的蚕食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三）提前进行1962年度的征兵工作。在5月下旬至6月中旬的紧急备战中，部队士气高昂，各参战部队都做到了“一声令下，立即出动”。以上工作现在均已大体告一段落。

毛泽东批示：“发各同志。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总之，党、政、军、民，都是很好的，是天下无敌的。看不出这一个本质，就是机会主义者。”^②

8月20日，各小组讨论粮食问题。

下午3时至6时，毛泽东主持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各大区汇报讨论商业问题的意见。

刘少奇就会议传达问题讲了话。他说：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究竟怎样传达？是传达广一些好，还是传达窄一些好？传达广一些，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是容易联系到反右。这是个复杂的问题，闹不好在实际上可能发生反右，容易划分不清，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应该规定个传达范围。毛泽东当即表示：我赞成，要写一个决定。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48~124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156页。

毛泽东在会上也讲了话。他说：“问题讲清楚，不伤人。如邓老，你看我，我看你，究竟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由历史作结论。苏联搞了40多年，合作化也没有搞好，粮食也没有过关。”又说，“我们要和风细雨地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地联系实际，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要说理，要讲道理，像这次会议一样。”

毛泽东说：“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经过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明确地宣布，他的学说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的。到了列宁，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10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他说，“过去简报看得少，这次的简报都看了。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

毛泽东说，自留地没有不行，多了也不好。“六十条”要写活一点，自留地7%至10%，不超过15%，要包括饲料地和小片开荒，而且要一定不影响集体生产。六十条的修改，商业工作的意见，不到这个时候大家也提不出来。现在还有些地方对六十条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至于“民主办社”、“勤俭办社”没有认真执行的地方就更多了，有的是“独裁办社”、“浪费办社”，这个问题要解决。

毛泽东说，（粮食产量）要说实话，要老实，浮夸不对，少报也不对。^①

24日，毛泽东为印发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作了批示。

下午3时，中央工作会议举行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陈毅作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

晚上，毛泽东返回北京。

8月26日至9月23日，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在北京召开。

9月24日至27日，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召开。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49页。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72~573页。

四十五 到南方视察

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在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来一些省委负责人谈话，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的高度重视，感到不满，决定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一下。

1962年12月9日毛泽东离京。

10日，专列途经天津。河北省委刘子厚、万晓塘等到火车上汇报工作，主要是汇报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和当前农村工作情况。毛泽东作了插话，大意如下：

整风整社不要打击很多人，只打击那些违法乱纪、投机倒把的，对这些人也是处分那些严重的，一般的采取教育，这些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分子。

单干哪一年也会有一点。有百分之几的人单干不怕，让他单干。

有的讲吃饭靠集体，花钱靠自由。要把副业搞起来，不搞副业，集体就分不了多少钱，就要吃饭靠集体，花钱靠自由。

猪就是化肥厂。现在看生产队非养不可，但是不要变为机关生产，万万不能再搞一平二调，不要把农民的猪调上来，调一头猪也要受处分，要自己搞猪苗么。猪养多了，农业就会大发展，副食品、吃肉也就解决了，肉的价格也就下来了。

解决滦河涝的问题，还是修水库。水库能发电、能灌溉更好，不能发

电、不能灌溉，只拦洪也好。

打井要搞个几年计划。农业上去，首先解决水、肥。水就要修水库、打井、洼地的排涝，肥主要是养猪。

造林。一棵树一天吸收地下水，经过叶放出来的水分就是一吨。房前屋后、公路两旁、道路两旁、火车路两旁、渠道两旁，都可以栽树，树多了，空气当中的水分就多了。树还可以防风、防沙，夏天劳动者还可以休息，还可以用材，种水果树还可以吃水果。农、林、牧、副、渔，都要上去。

(农村秩序很好)，是啊，仓廩实而后知荣辱，衣食足而后知礼节。

豆类植物要多搞一些，不仅营养高，还可以肥田。

水利、工业都不能冒进，要分步骤有计划地一步一步的搞，比如前面讲的打井、修水库，十年的事情，在三几年内搞成就不行，要抓紧，要控制，要有规划，要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大权独揽，就是集中在中央、中央局、省，下面各级都要听指挥。不然搞不好就又会浮夸、不听指挥，瞎指挥就又来了。你们要好好掌握住。

一搞铺张浪费，国家、集体、个人就没有积累了。

按劳分配搞多了也不好，搞多了四属五保、困难户就有困难，劳动力多的分得过多，也会发生两极分化。^①

12月11日下午，专列途经济南。谭启龙到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14日零时25分，毛泽东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一文上批示：

小平同志：

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

毛泽东

十二月十四日，零时廿五分

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请酌定。^②

15日，专列途经南京。毛泽东接见了出席中共江苏省第四次代表大会

^①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76~57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223页。

的全体代表以及省市机关、部队和厂矿企业的干部。毛泽东勉励大家“团结起来，努力奋斗，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同一天，毛泽东在南京接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上校以上军官。12月16日，专列到达上海。

21日，毛泽东在上海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要点如下。

要讨论国内外修正主义，保卫马列主义路线，例子各省都有。

福建今年增产不少。经济作物有没有发展，城市吃统销粮的人口为什么那样多？“生之者寡，食之者众。”

有些木材烂在那里，是否想办法运出来，能否从海上运？动员人上山要有一个政策，是否上山的人多吃一点粮食，不上山的少吃一点，上山的要求免征购。

“人口越报越多，土地越报越少，产量越报越低，灾情越报越大。”这种情况改变没有？要依靠农民，引导他们到生产上去想办法，不要引导到分配问题上去。分配要公平合理，也要照顾四属户五保户。

没有干部条件，搞不好。

早稻很好，适宜的地方应该种，可少遭灾。红花草也很好，是很好的化肥工厂。南方各地种大豆没有？大豆也很好，又是好肥料。



1962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刘顺元、江渭清陪同下在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省市和部队干部。（摄影/吕厚民）



1962年12月15日，毛泽东由江苏省和南京军区领导陪同在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省市和部队干部。（摄影/吕厚民）

河堤是生产资料性质，水利设施是生产资料。

“对修正主义有办法没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毛泽东批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毛泽东表示：“东风要占优势”。毛泽东表扬：“过去的文工团只有几个人，反映现代生活，不错。”同时也认为“有害的戏少”，《杨门女将》、《罢宴》还是好的。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上层建筑。党、政、军，公社，民兵，都是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不能太多，抗战时期就规定根据地的脱产人员不能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几；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只有五个人：我、恩来、弼时、定一、乔木，只有我有一个秘书。现在省级机关人很多，减人要继续贯彻。粮食坚决实行少购少销。

要搞个编制，请地方提意见。现在公社、大队的干部很多，这是很大一笔人头税。历来就是人少好办事，层次多了不好办事。

安徽省委改正“责任田”的指示，总的是好的，提出春耕前要改70%至80%，何必那样着急，不要匆匆忙忙，一批一批地搞，春耕前搞一批，秋后再搞一批。

（整社）不整好，没有希望。

两次郑州会议都开得太短了，没有把问题搞透，当时要忙着去搞春耕，缩短了，未解决问题。广州会议，北京会议，都开一个月，就好了。思想问题要搞透，开会短了不解决问题。^①

22日，毛泽东对《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批示：

柯老：

此件很重要，请你印发会议各同志。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在最后一页写下了清代诗人严遂成的诗《三垂冈》。

古诗一首。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崇（存）勛诗。

三垂冈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且〉拥晋山河。

风云账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飒〈瑟〉三垂冈下〈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②

12月25日，毛泽东就请刘晓等来杭州一事给刘少奇等写信：

少奇、恩来、小平同志：

我想请刘晓、伍修权、赵毅敏、廖承志四位同志来杭州一谈，听取他们所知的情况和意见。他们可以缓缓南来，沿途（天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作点调查研究，在年初（一月六日以前）到杭州即可。如你们及他们四位都同意的话，请即照办。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五日^③

^①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77~578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225、1226页。

^②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224~225、226页。

26日是毛泽东69岁生日，他写了《冬云》诗一首，早上7时他给林克写信：

林克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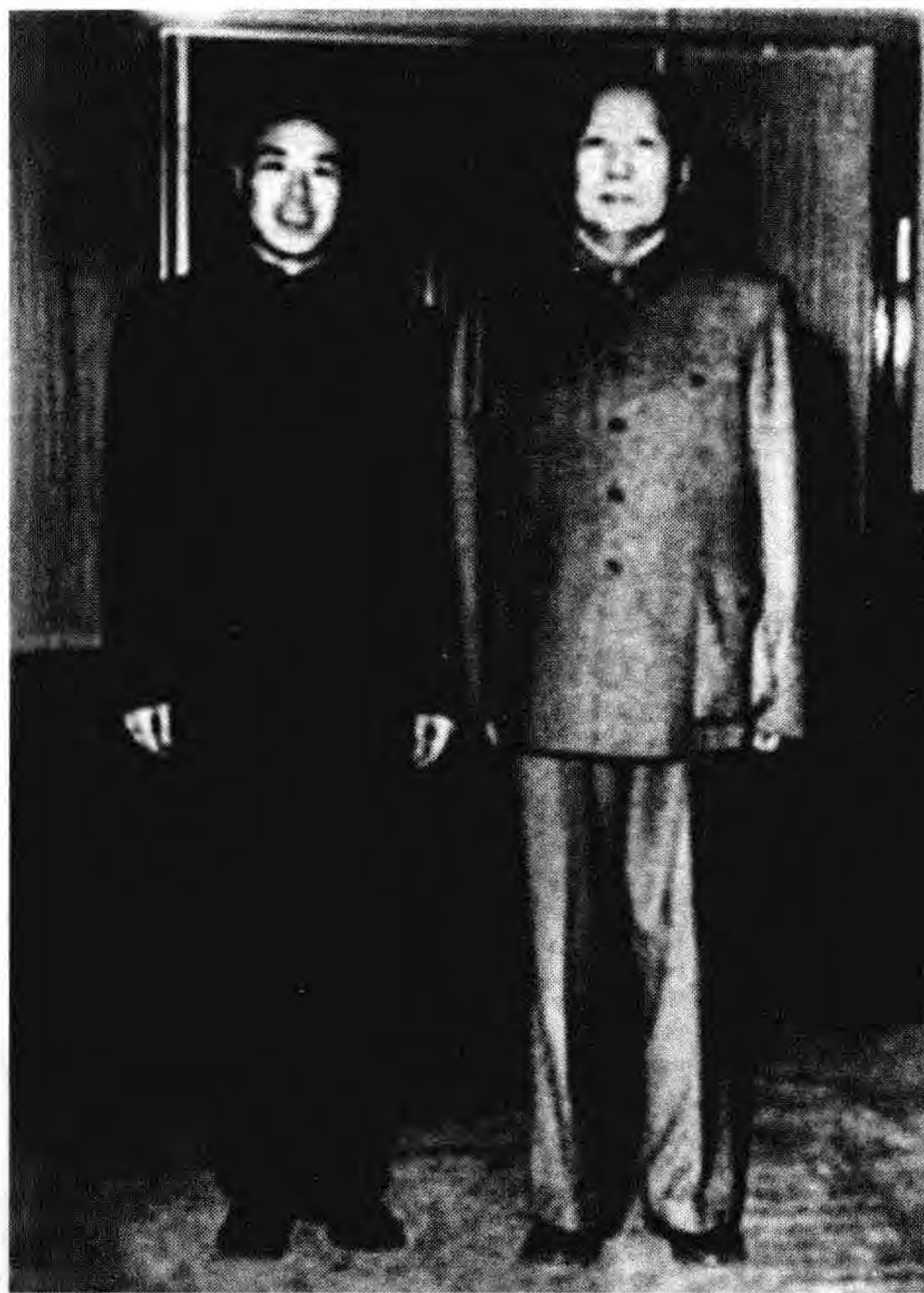
请将诗一首付印，于今天下午印成50份，于下午六时前交我为盼。

毛泽东

廿六日晨七时

冬云诗一首

雪压冬云白絮飞，
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泄，
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
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①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与秘书林克在上海。
(摄影/吕厚民)

按中国人的习俗，69岁生日，家人应祝贺他70大寿，而这一天，毛泽东只是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照了相。

30日凌晨2时，毛泽东对《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作了批示：

小平同志：

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

毛泽东

十二月三十日上午二时^②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227、231页。

31日凌晨4时30分，毛泽东对《文艺报》刊载的三篇文章作了批示。
1月3日，毛泽东在《史记项羽本纪》上写了一则批语：

《项羽本纪》，送各同志阅，几天还我不迟。这个新版《史记》，
标号及批注，都很醒目，好看。

毛泽东
一月三日^①

这一天，毛泽东离开上海到了杭州。住汪庄。
4日，毛泽东给女儿李讷写信：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张耀词、吴旭君在上海。（摄影/吕厚民）

李讷娃：

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了。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238页。

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

爸爸

一月四日^①

5日18时,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了由周总理陪同来杭州的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

晚上,毛泽东接见了由陈毅陪同来杭州的印度尼西亚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博士。周总理参加了会见。

6日,毛泽东返回上海。

下午,毛泽东会见并宴请日本共产党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有些党依靠压力过日子,还搞收买、颠覆,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让各国党自己制定自己党的路线。”在谈到当前的论战时,他说:“这一法宝是从意大利取来的。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意共把结构改革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一般方向。我们并非干涉内政,但由于意共说是一般方向,同时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还说,“陶里亚蒂也作了一些好事。”^②

1月7日,毛泽东回到杭州。



1963年1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摄影/吕厚民)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23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67页。

8日，毛泽东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欲学鲲鹏无大翼，虬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千万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①

同一天，毛泽东在中组部关于各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的报告上作了批示：

小平同志：

此件请准备印发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

毛泽东
一月八日^②

9日，周恩来公务繁忙，痔疮发作，并有炎症，常睡不能安，坐不能稳。在杭州的毛泽东经人介绍认识了痔科专家陆琦。经毛泽东再三催促，周恩来偕邓颖超来杭州，住苏堤附近杭州饭店五楼。

这天，毛泽东将刚作不久的《满江红》词书赠周恩来。

1月9日至15日，周恩来与毛泽东研究1963年计划、基本建设、农业、市场、财政和精简等问题。受毛泽东之托，周恩来就上述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准备在大区书记到京时讨论。

15日，毛泽东给李讷写信：

李讷娃：

信收到，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壮志雄心，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极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们多谈，交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267~126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241页。

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

爸爸

一月十五日^①

当日，毛泽东离开杭州。

专列途经南昌，抵达株洲，毛泽东接见了湖南省委负责人。

专列抵达长沙。毛泽东听取了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对农村工作情况的汇报。王延春谈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

据警卫日记记载，由于毛泽东连续几个月以来工作一直紧张繁忙，奔波往返，精神上有些过度疲劳。沿途几个地方都组织了文娱活动，毛泽东都应邀参加了，想缓解疲劳、调整精神。在长沙，有关方面组织了舞会，乐曲少而且节奏较快，毛泽东觉得跟不上，便同大家告别，回居所休息。但是他心中有事，不想休息，便叫来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等人座谈农村情况。

19日，毛泽东在长沙机场接见了空军干部并合影。

1月20日，毛泽东离开长沙到了武汉。



1963年1月19日，毛泽东在长沙机场同空军干部合影。（摄影/吕厚民）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240页。

21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并宴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副主席约多和团员优素福·阿吉托罗普·马高多，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25日晚上23时，毛泽东对《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社论稿作批示：

小平同志：

廿四日送来的社论，已经看过，写得很好，可以发表。

毛泽东

一月廿五日下午十一时^①

29日，毛泽东接见古巴《革命报》国际部主任贝尼特斯和摄影部主任萨拉斯，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晚上，毛泽东离开武汉。

1月30日2时39分，专列途经郑州，停在专用线上。

31日下午，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第二书记何伟、常务书记兼省长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杨蔚屏在专列上汇报了工作。

下午19时15分，专列离开郑州。

当晚，专列途经邯郸。

2月1日下午，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力矢、邯郸地委第一书记庞均、邯郸市委第一书记刘英登上了毛泽东的专列。

毛泽东说：“我从去年12月10日到南方，现在有一个多月了，情况有什么变化没有？”

刘子厚向毛泽东汇报说：“在社会主义教育中，我们官教兵、兵教官，对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和农业‘六十条’原原本本地进行了讲解。由地、县委负责同志讲，另外还培训了辅导员。”

毛泽东说：“这样就提高素质了嘛，这对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提高，因为他们要备课、要讲课。当讲师、当教员是提高学问的一个很好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245页。

方法。”

当汇报到传达贯彻“六十条”时，毛泽东说：“这么多人得多少天呀？得个把星期吧。这是几百万人的事呀，还得早出晚归，礼堂里不冷吗？”

“有火炉。”刘子厚继续汇报说，“在讨论‘六十条’时，有的群众说，过去拉锯没有线，拉着拉着就偏了。有了‘六十条’就好办了。”

毛泽东觉得这个比喻很恰当：“有了‘六十条’就有了准则，就有了规矩。‘六十条’就是社章嘛。是公社的章程，就是农村搞社会主义的章程，没有这样一个章程，农村怎么搞好呢？你搞你的，我搞我的，那怎么能搞得好的。这个章程是广州会议时搞起来的，合作社时期还有章程嘛。”

毛泽东接着问：“你们这里什么时候开始春耕。”

刘子厚说：“马上就开始。现在的主要危害是天旱。”

毛泽东问：“河北第一大河流是哪个？”

“滹沱河。”刘子厚回答。

毛泽东又问：“水利工程有哪些？”

“我们准备搞滦河、拒马河水库。”

毛泽东问：“动工了吗？”

“没有。我们正在建潘家口和桃林口两个水库。”

毛泽东问：“是大型的吗？作用是什么？是防洪和灌溉？”

林铁说：“蓄40亿立方水，可以发电。”

毛泽东说：“40亿就成了河北省最大的水库了。”

林铁说：“搞十年水利建设计划，就可保丰收。”

毛主席说：“看来河北的根本问题还是水的问题。”

谈完水利，毛泽东又问：“你们这里生产队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呢？”

“平均28户。”

“28户不算很小。”毛泽东又问，“你们对干部不参加劳动，多吃多占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刘子厚说：“干部做检讨，表示个态度。”

“这就算完了吗。不退赔吗？要退赔嘛。”

当汇报到棉花收购完成三亿时，毛泽东问：“去年呢？”

“两亿三。”

“你们的产棉区主要还是南部吧？棉农的口粮是怎么定的？”

“八两，加上自留地能吃到一斤。”

“你们还没有吃到 360 斤，怎么能行？”

林铁忙说：“我们打算把棉农口粮提高到 360 斤。”

“那好。”毛泽东又问，“棉籽、花生收购情况怎么样呀？”

“花生少了。”

“为什么花生少了，研究了没有？”

“主要是价格问题。”

毛泽东说：“应该叫群众榨油，我们收油不收果，你们为什么不改？应改嘛。棉区有油吃，没棉区怎么办？”

“一是调剂，二是种芝麻。”

毛泽东风趣地说：“有芝麻就吃芝麻吧，还打油干吗？”

毛泽东还了解了他所关心的阶级斗争问题，他强调说：“有没有阶级，有没有斗争，你们这里的例子说明确实存在嘛。”

毛泽东对林铁、刘子厚说，你们有多少三类社？要扎根串联，要贫雇农团结起来。^①

19 时 30 分，专列离邯返京。

2 月 2 日，毛泽东回到北京。

^① 王兴、马金南：《毛泽东与邯郸》第 63 页。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 536 页。

四十六 主持起草“前十条”

毛泽东开展社教运动，是以比较谨慎的态度开始的。原因是：他在北戴河会议、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刘少奇怕因为搞阶级斗争再发生反右，提出不要把有关阶级斗争的讲话传达到县以下。毛泽东鉴于庐山会议的经验同意了。所以当他提出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时，在全党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各地几乎没有动作。

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批转了湖南、河北关于进行社教和整风整社的报告，并号召在农村开展社教运动。但从后来的情况表明，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并不满意。原因是，他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想延长会期，专门讲讲社教问题。为此采取了一个非常婉转、含蓄的办法，将湖南、河北省委书记王延春、刘子厚安排在第一排就座，想以此引起中央第一线领导同志对社教问题的关注，但中央的领导并没有领会他的意图，会议如期结束。

5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2月会议的时候，我准备叫他们两人讲一讲，我也讲一讲，你们不赞成。当时为什么叫他们讲呢？无非是因为他们是从下边来的，是从群众中来的。由此可以感到毛泽东的不满。

依当时的情况看，2月会议已经布置了社教运动，但毛泽东还不满意什么呢？

据分析：关于城市的“五反”，2月会议通过了一个文件，毛

泽东很可能想对农村的社教也要通过一个指导性的文件，以便各地有所遵循。但毛泽东没有明说，他期待其他领导说，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反映，怎么办呢？5月，毛泽东亲自出马，在杭州找来大区书记，举行以大区书记为主包括部分政治局委员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制定关于开展农村社教运动的文件。

事前，他打电话通知彭真来杭州，起草一个中央关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批语。结果彭真提交的“答卷”未被通过。彭真坦言，自己的思路总的概念就是跟不上，一方面跟不上主席，一方面跟不上群众的先进经验。有的大区书记也有此想，他们建议毛泽东常常召开小型会议，通通气什么的。

毛泽东2月2日回到北京，得了感冒，到2月23日还没有好。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五反”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式之一，只限定在城市中进行。农村中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议没有作什么决定。而毛泽东所关心的恰恰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

15日，毛泽东对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报告作了批示：“湖南报告很好，印发会议同志研究。河北的经验也很值得介绍，请河北省委同志考虑一下，是否可以写一个不长的报告，印给会议同志们看。”^①

20日，毛泽东对河北省委关于农村整风整社运动情况报告作了批示：“此件印发会议各同志。请各同志连同湖南那个报告（已印），一起加以研究。两个报告各有特点，都是好文件，值得引起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研究一下。”^②

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作“关于反修斗争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在插话中说，蜕化变质问题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可能的，一种是不可能，如蜕化变质，就会由无产阶级专政化为资产阶级专政。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25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257页。

止修正主义。^①

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有刘少奇、邓小平参加。

毛泽东说：“各省农村情况究竟如何？王延春、刘子厚同我谈过，他们都写了报告。但刘子厚的报告没有写清楚。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讲什么？他们原来写了提纲，按提纲讲碰了钉子，后来才按中央文件（十中全会的三个文件）原原本本地讲。谁讲？我看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凡是年轻力壮的都要到公社去讲。”

毛泽东说：“在农村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

毛泽东说，贫下中农组织一定要搞，第一步找贫下中农开会，然后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对农民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在农村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

毛泽东说，现在重新搞土改，重新搞合作化。要重新整党。（彭真插话：顺义一劳模，做支书十年，很起模范作用，那里的生产搞得很好。）毛泽东说，像这样的各地总都有一些，这样的也可以不实行两年一换。

毛泽东还说，要把粮、棉、油抓好，今夏再把农业纲要四十条议一议。^②

27日，毛泽东接见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毛泽东说：“看来我们的军队还是要抓政治工作，抓四个第一，抓三大民主，加强薄弱环节，搞好党的建设。”

28日，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专门讲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毛泽东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又说，“国内的修正主义也不少，要反对我们自己内部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这些牛鬼蛇神。”毛泽东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团结起来，教育那些不懂或不大懂马克思主义的干部和群众，目前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大意义在此。

毛泽东说，我们已经发表的反修文章，在知识界里有90%的人是赞成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07、114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10~1311页。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79页。

的。可见过去十多年的思想教育是有成绩的。

毛泽东说：“我跑了这么多省，两个省的同志（王延春同志在长沙，刘子厚同志在邯郸）突出地跟我讲这个问题。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

他说：“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没有教材嘛，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请各省把湖南省委、河北省委这些报告，参考你们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只要五个晚上，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就打下去了，不需要多少时间。”

毛泽东问王延春：“只要五个晚上，是不是这样？”王延春答：“是这样的，可能有的多一点。”

毛泽东接着说：“这个教育问题，提出来还只有一两年，从‘六十条’起，还只有两年，从去年七千人大会着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也只有一年多。再有几年，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打的方法，也不能个个拿来枪毙，不能用那个生硬的方法。像少奇同志那一天讲的斯大林那个办法，动不动就杀人，那不解决问题。”

刮“共产风”那几年，毛泽东曾批评过基层干部不懂社会主义，主要是指他们不懂得按劳分配原则和价值法则，违反和破坏了这些原则。现在又说基层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主要是指他们不懂得阶级斗争。

毛泽东嘱咐大家，要抓紧社会主义教育同今年的经济工作。他说，今年如果能够再增产150亿至200亿斤粮食，棉花再增产若干，油料再增产一些，工业的调整再有一个进步，那就很好了。^①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11~1312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46页。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537~538页。

会议后，各地纷纷行动起来，把农村社教运动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并且初步总结了一些典型经验，上报中央。毛泽东对这些经验报告极为重视，选其重要者，及时批转各地，催促参照实行。

3月，2月会议后，毛泽东转发的第一个文件，是山西昔阳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这个材料以中央名义于3月23日转发，题目是《中央转发一个调查材料：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毛泽东审批时，觉得标题太平，不足以引起注意，重新拟写了一个标题：《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①

4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家里召集政治局常委讨论苏共中央的来信。

在讨论中毛泽东说，就是这么一种情况，要准备中苏两党会谈时大吵一顿，要有这个思想准备。现在马上就要动手，集中力量起草一个关于总路线的稿子。要把原先准备会谈时用的各个专题发言稿暂时放一放，先搞一个全面阐述我们的系统观点的文件，提出同苏共来信针锋相对的国际共运总路线。毛泽东交代此事由小平同志负责准备，弄好以后再提到政治局常委来讨论。^②

毛泽东讲话以后，陈伯达没有与邓小平同志沟通，自己动手，起草了一个对苏共纲领的意见《备忘录》。毛泽东出发前，陈伯达将自己起草的一部分《备忘录》手抄稿送毛泽东审阅。

4月7日晚，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了天津。

8日，毛泽东听取了河北省委的汇报。在谈话中毛泽东说：“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要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怎么搞社会主义。”^③

毛泽东在天津看到了保定地委4月4日关于“四清”工作给河北省委的报告。

报告第一次提出“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工分、清理财务）问题。报告针对农村干部中大量存在的多吃多占、账目不清、贪污盗窃等现象，认为这些都是损害社会主义、损害集体经济的行为，报告中说：“事实再一次证明阶级和阶级斗争确实存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激烈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265页。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559页。

③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1月第1期，第57页。

的。在生产队开展‘四清’实际具有农村‘五反’性质。这是又一次反击资本主义向集体经济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毛泽东当即予以肯定，说不搞“四清”怎么搞社会主义？毛泽东路过济南、南京时，向山东省委和江苏省委负责人推荐了这个报告。^①

9日凌晨2时，毛泽东在陈伯达起草的关于对苏共纲领的意见《备忘录》上批示：

伯达同志：

这些都已看过，写得很好。未完部分，请续寄来。

毛泽东

四月九日上午二时^②

当天，专列途经济南。毛泽东在济南西郊机场听取了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白如冰，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袁升平、省委秘书长杨岩的汇报。

毛泽东问白如冰：“你们山东的工作怎么样？”白如冰就全省开展农村社教、“五反”的工作情况作了汇报。

毛泽东一边听一边作指示。当白如冰汇报到省里召开了先进集体代表会议时，毛泽东问：“你们这里有个吕鸿宾，现在怎么样？”

白如冰把吕鸿宾和爱国大队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毛泽东问：“谭启龙同志下去是看一看，还是帮助下面解决实际问题？”当时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正在曲阜县指导社教，帮助基层解决社教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白如冰回答：“是帮助下面解决问题。”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那很好嘛！”白如冰说，先进会议中揭发出很多严重问题，不仅有地下工厂，还有地下医院。毛泽东问：“还有地下医院？”白如冰说：“某地方修家庙，地主坐在上面，许多党员、团员和群众向他三拜九叩。”毛泽东不解地问：“为什么呀？”白如冰回答：“他以族长的身份要人家叩头。”

毛泽东严肃地说：“这是封建复辟活动。”白如冰讲道：有些地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有些干部思想有抵触，有点怕。毛泽东问：“究其原因何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31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276页。

在？其原因是群众没有发动起来。”

白如冰汇报到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时，毛泽东问：“你们今年小麦怎么样？”白如冰说：“1962年小麦实际产量是41亿斤。”毛泽东听后笑了笑，说：“你们不是说只有30几亿斤吗？”白如冰说，考虑到受灾等因素，留了一点余地。毛泽东说：“留有点余地好。”白如冰讲到1963年全省小麦播种质量和麦苗生长情况都很好，今年有可能收获50亿斤和计划征购13亿斤小麦。毛泽东说：“你们是大省，要增加一点库存，要把经济搞上去嘛！”

毛泽东突然问白如冰：“舒同同志到哪里去了？”白如冰回答：“调到陕西工作了。”毛泽东问：“做什么工作呀？”“省委书记处书记。”毛泽东说：“换个地方好。”

白如冰谈到，全省还有一部分社队的生产生活存在困难。毛泽东把目光转向大家，说：“首先要帮助基层解决生产上的困难，生产上有困难帮助解决，等于增产。”白如冰汇报：社会秩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群众生产积极性很高。毛泽东说：“总的说来，我们的政策上了轨道。共产党把事情办不好，我就不相信。办错了事，就改嘛。”白如冰讲：山东灾区群众现金很困难，目前货币流通量过少，对群众生产、生活产生了不利影响。毛泽东说：“这样大的省只有四亿多的货币太少了，解决这些问题要快。”白如冰讲：1962年全省人口净增一百五六十万。毛泽东说：“人口增长得太快了，要想个办法，同劳模商量一下嘛。”

白如冰汇报，农村干部和群众经过社会主义教育，阶级觉悟有很大提高。毛泽东说：“如果我们不整风，哪个县都要出修正主义。地主坐在上面，党员、团员跪在下面叩头，那算什么主义呀？”

白如冰讲：山东省的林木遭到了严重破坏，省委要当作一件大事来抓。毛泽东说：“听说山东比河南的树木破坏得轻一些，是谭震林、陈正人他们说的，我没亲自看。”

白如冰汇报增产节约和“五反”情况。毛泽东说：“‘五反’要有步骤地去搞。”白如冰讲：大办钢铁遗留的问题还很多。毛泽东说：“那是老账了。”白如冰讲：大办水利、救灾、防汛的粮、款和物料都发生了贪污和疏漏很多。毛泽东反复追问：“究竟漏到谁的手里呀？”白如冰回答：“主要是漏在干部手里。”毛泽东严肃地说：“只要是救灾、防汛，不管共产党、

国民党，总有人在打主意。”

白如冰汇报，各个试点揭发出大量浪费事实。毛泽东说：“抓浪费问题，大有文章可做。增产节约运动要先搞起来，先搞节约，才能增产。”

白如冰讲到“五反”要注意的一些政策。毛泽东说：“‘五反’不要搞到工人当中去，但工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小偷小摸，主要是正面教育。要洗温水澡，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要使他们心情愉快。”

白如冰讲到要发动群众、大鸣大放。毛泽东说：“群众揭发的有些不一定正确，要经过调查研究，不忙作结论和处理。”

白如冰汇报讲到试点工作中已收到的效果。毛泽东说：“我们如果不搞增产节约和‘五反’，不搞社会主义教育，不搞阶级斗争，就要变成南斯拉夫。”

讲到山东省正准备在“五反”中对一些犯有严重贪污盗窃和其他罪行的人进行严肃处理时，毛泽东问大家：“要不要杀人哪？”

白如冰说：“个别罪恶极大的看来是要杀的。”

毛泽东说：“要不要杀人？可不可以不杀人？你们好好研究一下。坦白不好的，下次再来，何必一定要杀呢？劳动改造可以嘛！人杀了以后就没得杀了，杀人是比较简单的事，一会儿就杀掉了，何必那样急呢？”

白如冰讲有一个16级干部，犯有严重贪污盗窃罪行，被揭发后，又行凶、杀人、放火，这种人不杀群众意见很大。毛泽东说：“有血债，民愤大，不杀群众很不满意，脱离群众，属于这样的，又当别论。”

白如冰问毛泽东进行“五反”的范围。毛泽东说：“民主党派不搞，他们没有什么责任，主要整共产党。”

白如冰汇报完，毛泽东问杨得志和袁升平：“军队如何搞呀？”

杨得志汇报了有关开展“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运动，要注意防止死人。

毛泽东说：“不要逼死人，人总是要死的，尽量少死点，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不要逼、供、信。”

汇报工作结束时，毛泽东讲：“这次汇报有军队参加很好，要有文，也要有武呀！”

快离开毛泽东的会客室时，毛泽东到房间里拿出两份文件，交给白如

冰说：“河北保定地委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四清’工作的报告很好，这个地委是河北的一个好的地委，请你们很好地研究一下，替我再印15份。”^①

10日，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向毛泽东和中央报送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两个问题的报告，提出用村史、家史等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

4月11日，专列途经南京，毛泽东就农村开展“四清”试点问

题作了指示。亲手将保定地委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四清’工作的报告交给省委领导，请他们很好地研究。

12日，毛泽东听取了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的汇报。在汇报部队训练时毛泽东指出：野营训练是一种好办法，应该在全军推广这种方法。

13日，专列途经上海。

陈伯达将铅印好的他自己的关于对苏共纲领意见的《备忘录》报送毛泽东审阅。

15日，毛泽东离开上海到了杭州。

这一天，河南省委向中央、毛泽东并中南局报送关于当前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报告。汇报了中央二月会议以后，对全省社教运动的部署。

17日凌晨4时，毛泽东在邓小平负责组织起草的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上批示：



1963年，毛泽东打乒乓球。（摄影/吕厚民）

^① 山东省档案馆编：《毛泽东与山东》第137~143页。

林克：

讨论对苏复信，请邓小平、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四同志于本月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来杭州。请你通知，叫他们如期来此为盼！

毛泽东

四月十七日早上四时^①

20日，毛泽东在4月14日陈伯达送审的关于对苏共纲领的意见《备忘录》稿上批示：“已阅一遍。”

毛泽东将陈伯达的稿子送回北京，并打电话要邓小平主持讨论一下陈伯达的稿子。

当天，毛泽东就刘晓工作安排问题做了批示。

21日，邓小平、康生、陆定一、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到杭州，讨论给苏共的复信稿。

4月23日，毛泽东从杭州到上海。

24日16时，毛泽东接见由周总理陪同来上海的阿联部长执行会议主席阿里·萨布里和他的随行人员。



1963年4月24日，毛泽东会见阿联部长执行会议主席萨布里。（摄影/吕厚民）

25日，毛泽东同周恩来、邓小平等讨论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的复信稿。

毛泽东特地对他们说，东北局宋任穷和河北省委的报告，河北保定地委关于进行“四清”和邢台地委关于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的报告值得注意。但当时大家的心思都不在这里，没有怎么讨论。毛泽东觉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278页。

得，这么重要的问题，没有引起注意，实在有加以强调的必要，于是便找彭真来，帮助起草转发这些报告的批语。后来，周恩来追述说：“那次，小平同志和几位同志到杭州去修改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我陪阿联的萨布里到上海去见主席，在上海会合。4月25日在主席那里谈了一次，主席就提出这个问题，说这几个文件值得很好地注意。当时主席说了，我们也听了，也说应该注意，但是也没有展开讨论。我们当时还是对反修正主义谈得多，这个问题比较谈得少。主席感觉大家还是印象不深，所以我回来不久，主席就打电话要彭真同志去，起草这些批语。这是4月底。到5月2号，就起草了对东北、河南的报告的批语。”^①

当天，毛泽东分别接见了印尼军事友好代表团团长艾哈迈德·亚尼少将和夫人，以及代表团其他成员；同时接见印度尼西亚军事友好代表团。

26日，毛泽东分别接见了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团长郑浚基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古巴全国保卫革命委员会主席何塞·马塔。

当天，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杭州。

毛泽东很快觉得，指导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仅仅依靠一个一个地批转典型材料不够，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全面阐明指导整个运动需要解决的一系列思想认识问题和具体的方法、政策，使全党统一认识，保证社教运动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他指定彭真（后加陈伯达）具体主持决定的起草工作。这个决定后来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5月2日清晨，周恩来致信在杭州的毛泽东、彭真，报告“跃进号”万吨轮5月1日在首航日本途中沉没。

当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海军问题向中央的报告》上批示：“希望海军各级党委同志们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同其他军种一样，把海军工作做好。有错误并不要紧，只要改正就好了。”^②

当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央转发宋任穷报告和河南省委报告的批语。

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有彭真、陈伯达和各中央局第一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313~1314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07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171页。

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

会议的任务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订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文件在5月2日前已由彭真主持写出第一稿。各大区书记到后，彭真同志和他们一起讨论、修改了两次。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也参加了会议。^①

2日，毛泽东在住地刘庄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讨论两个问题，总题目叫“反修防修”，一个国内防修问题，一个国际反修问题。

毛泽东说，他把中央局的同志找来，要酝酿起草一个关于“四清”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②

这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吴冷西、姚溱、范若愚等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文件写作班子成员到达杭州。

晚上，毛泽东在住地刘庄召开会议，除一些中央领导外还有彭真、陈伯达、吴冷西参加。毛泽东问到关于总路线两个稿子（一个是邓小平同志



1963年5月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前十条”。（摄影/吕厚民）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78页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562页。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组织文件写作班子起草的，一个是陈伯达自己起草的《备忘录》的情况。因为有不同意见，毛泽东要求双方交换意见。他不参加，但派秘书林克旁听。毛泽东集中力量搞《前十条》。

3日晚，毛泽东到上海去接见外宾。

3日、4日、5日连续三天，每天上午，写作组和有关的人在西泠饭店后八楼西头的会议室开会，讨论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两个稿子。林克参加了三天的会，把双方的意见记录下来，等毛泽东回到杭州后向毛泽东汇报。

4日，毛泽东接见了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凯塔·恩法马拉，几内亚妇女代表团团长卡马拉·洛福夫人，以及两个代表团的成员。

5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阿尔巴尼亚工会代表团、阿尔巴尼亚档案工作代表团。

5月6日，毛泽东分别接见了朝鲜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团长朴世昌和团员金斗七。马里政府文化代表团团长穆萨·凯塔及团员巴布卡、巴契里。

下午，外宾接见完了，毛泽东离开上海返回杭州。

回到杭州后，毛泽东听取了林克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两个稿子讨论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并且说，等开完会以后再把大家找在一起谈。

当天，毛泽东在刘庄住所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写作班子和陈伯达两个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稿子怎么修改的问题。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正在国外访问），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康生、吴冷西也参加。

毛泽东对吴冷西说，还是年轻人行呀，我们都是老头子了，伯达你也算是老头子了，被年轻人攻得不行了。他说，依我看，还是年轻人的意见对。

毛泽东说，他在北京时讲过这个总路线要从分析当代矛盾讲起。这一点陈伯达做得对。他希望经过七改八改，最后形成比较正确的文件，不至于一下子被人驳倒。

接着毛泽东提出，先由陈伯达根据大家提的意见，改出一个稿子来。不一定所有的意见都接受，自认为哪些意见可以接受的就接受。

毛泽东要求，陈伯达修改的稿子出来后就到北京去讨论，同北京的秀才们一起修改。周恩来、邓小平都赞成这么做。

毛泽东又提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我们还是慎重一些为好，先不要提到政治局去讨论。要先在常委范围中搞得比较成熟，然后征求一些兄弟党的意见，比方朝鲜党、越南党、新西兰党、日本党，还

有印度尼西亚党等东南亚一些党的意见。这样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可能会搞得更完备些、更周密些。毛泽东说，但是，这不是作为各国左派党的共同文件提出，而是中国党提出的建议，针对苏共3月30日给中共的来信提出的一个反建议。^①

5月7日，毛泽东主持讨论彭真主持起草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第一稿。他对这个稿子提出了指导性的修改意见。

毛泽东说，不要那么长，要短些，严肃些。要写些这样的问题，如认识不一致的问题。他说，他走了11个省，只有王延春、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他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的省就不讲。三级干部会开了，社会主义教育没有抓住要点，方法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这样一套。

毛泽东阐述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他说，各地都要试点，试点很要紧。凡是一般化的，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就不能抓住问题。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来没有搞阶级斗争了，只是土改搞了一次，“三反”、“五反”是在城市，1957年搞了一次，也不是现在这个方法。现在的方法，是要使90%以上的人洗温水澡。说精神愉快，那是结果，要有点紧张，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紧张。有些人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来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贪污，二不叫盗窃，伤人不要过多。十年来，“四清”就没有搞清楚过。“四清”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就是敌人的破坏。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用现在这个方法，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要把90%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过来，发动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要使多数人有敌我观念，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

毛泽东又提出：不要性急。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搞。明年搞不完，就后年。社会上总是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没有贪污盗窃，不成世界。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

毛泽东与大家一起进餐。他举杯祝酒：“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他接着说，“有人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565~567页。时间5月5日有误。周恩来当时在北京，并不在杭州，邓小平、康生5月10日下午乘火车去杭州，所以，周恩来、邓小平、康生参加了会议有误。

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

饭后，继续开会。他说，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请大家注意一下。昔阳的材料很好，你们看了没有？那个县的干部每年参加劳动，至少有60天。那是一个在山上的县，很穷。越穷就越要搞社会主义。富了就不搞了吗？各省都有这样的材料，浙江搞了七个。请每个省都搞一批。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支部书记参加劳动了，大队长、队长、会计就会参加，整党整团就好办了。这样，修正主义就少了。县、社两级干部也要参加劳动。我希望在几年之内，分期分批，办到昔阳那样的程度。

说到组织阶级队伍问题，毛泽东认为，“六十条”中对阶级队伍问题写得不突出是一个缺憾。他说，农村里贫下中农大约占50%到70%，组织起来了，就有了中心。搞“六十条”时，还没有好好注意提依靠谁的问题。依靠谁，总得有阶级，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较贫苦的。^①

8日，毛泽东从《中南通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做法特辑》上六篇文章中选了四篇，拟题“四个好文件”并做了批示。毛泽东还对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作了批示。

晚上，毛泽东又在住地召集会议。由彭真汇报前一天晚上他们自己讨论的情况，表示文件没有写好，作了自我批评。彭真说，大家感觉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跟不上主席，跟不上下边那些先进单位。毛泽东说：“你们的文件就是平淡，逻辑性也不够，有的长，有的短。”会上有人说，看到一些报告受到了启发。毛泽东说：“启发就是河南的这两个材料。我又看了一次昔阳的报告，写得很好。浙江的七个材料我都看了。”

彭真汇报到对阶级斗争调查研究做得不深入时，毛泽东说：“什么是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生产斗争，一个阶级斗争，一个科学实验。不然，哪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不参加生产，是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了，就靠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现在要好好提倡干部参加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生产同时搞就不行？一边开会，一边生产，生产劲头就来了。阶级斗争可以促进生产嘛。”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316~1318页。

有人谈到，北戴河会议后认识仍不一致，大家要求两三个月就在主席处开一次会。毛泽东说：“噢！就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毛泽东说，“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注意这种会不要伤人。伤人只伤少数人，百分之五、百分之六也多了。我看最后还要缩小，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些事不要搞绝了。过去几年没有管，要在几天就解决，恐怕也困难，还是要慢慢打通思想。压服不行，压而不服，一定要说服，说服就要有一个过程，一次谁都认识不了。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心情舒畅。贫雇农不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贫下中农也不能心情舒畅。要反对修正主义。要不这样搞，地富反坏就要反攻倒算，投机倒把分子也要猖狂起来，不出修正主义才怪！”

谈到整党时，毛泽东说：“整党，我看不忙，明年后半年再搞。你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不搞‘五反’，不搞‘四清’，不把贫下中农组织搞起来，整党怎么搞得起来？这些事，两年做好就不错了。”

最后毛泽东说：“现在我的事情完了，你们明天走不走？你们就走吧。”他宣布会议结束。^①

5月9日，周恩来再次致信毛泽东、彭真，报告对“跃进号”沉船事件的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同时想就便在杭州与各中央局书记谈谈粮食、精简和农业生产问题。他告诉毛泽东，他拟与罗瑞卿或杨成武10日赴沪。

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来信，问各中央局书记：“总理要来，你们留不留？如果你们要走，我打电话请总理不要来了。”大家表示留下来等总理。这样，会议就又延长了四天。

当天，毛泽东就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写了批语：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318~1320页。

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

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 and 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试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①

5月10日，毛泽东5月2日起草的中央关于抓紧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批语以中央的名义下发。

当天，周恩来飞南京转上海，邓小平、康生等一行因天气不好，下午三时乘火车去杭州。

10日至12日，周恩来为向毛泽东当面报告关于“跃进号”事件的处理问题，先到了杭州，并参加了10日、11日的小型会议。

10日和11日，毛泽东集中两天时间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先后修改了四稿。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292~294页。

后来形成的文件差不多是由毛泽东口授，陈伯达整理的。

决定草案附了经毛泽东批转过来的 20 个材料。这几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并对决定草案进行修改。毛泽东在修改时加写了具有前言性质的一大段话，回答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哲学问题。

毛泽东对决定草案的第十条也加写了一段话，强调学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必要性，提出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①

5月11日晚，毛泽东将决议草案改好后，在住地召集第三次会议，再次进行讨论。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说，这个文件还是个草案，因为在座的常委还不到半数，还要拿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去议一议，讨论决定。请总理明天带回去议。彭真同志可到南方几个省跑一跑。他对在座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说，你们明天可以把草案带回去，每个省也可以发一份。开会的方法，可以先发材料，要先看这 20 个材料，看个三天五天，议一天，引起议论。不要使大家对中央的东西先有一个框框。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他说，不要性急，横直准备搞他一年、两年，两年搞不完就三年。有的地方一时还搞不了，就不要勉强搞。可以允许两个办法，一个搞，一个暂时不搞。这样一来，就防止了急。总之，这一次要搞得稳一点，分期分批，一个县也要分期分批，先搞试点，可以有先有后，允许参差不齐。这样就做得好。

接着，大家对决定草案进行讨论。周恩来提出：“是提团结百分之九十几，还是写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李井泉说：“是否写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好些。”毛泽东说：“我看可以这样说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经批的文件，都改过来。”

周恩来又说，小平同志建议写上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毛泽东表示赞同。

周恩来问：“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顺序，要改成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还是怎么写都可以？”毛泽东说：“按社会科学来讲，首先是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不好搞。”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322~1325 页。

关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关系的问题，后来毛泽东曾作过专门分析。他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我说石油部作出了伟大的成绩，既振奋起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六百万吨石油，还有一百万吨的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

刘澜涛提出：“搞社会主义教育还要注意不同地区，例如新疆就不同。”毛泽东说：“要注意不同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做法要有不同。西藏、新疆做法要有不同。甘肃、青海、宁夏也要注意民族地区的特点。”

在前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把阶级斗争现象比作“蚂蚁”，说大踏步走路就看不见蚂蚁，一蹲下去就看见了。这主要是批评忽视阶级斗争的倾向。这一次谈话又强调了另一面，说：没有“蚂蚁”的地区就不要去找“蚂蚁”，比如那些一类队，一定要搞阶级斗争就不一定。那些地方，过去注意了阶级斗争，注意了社会主义教育，就不一定采取这些方法去搞。但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普遍的，那要搞多少年。

讲到干部退赔时，他说，赃物赃款，不退不行，但又要合情合理。退得太挖苦了也不行，使干部生活过不去也不好，群众过些时候也会同情他的。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毛泽东说，从基本上说，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依靠群众，依靠省、地、县、社的广大干部。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办好人民公社。^①

晚上，毛泽东一夜未睡。

12日凌晨，毛泽东又把各中央局书记找来谈了一次。中心意思是：不要性急，要搞稳一点，不要搞乱了。

毛泽东说，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谈谈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7月20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动。要自觉的，不要勉强的，要他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325~1327页。

“四清”我们从来没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于干部要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老口号不行，没有贫下中农来说服不行，那些顽固的，你们说不行，他就是听群众的。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了。毛泽东强调指出：对于95%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毛泽东说，干部行不行，好不好“这次是一次大考哩！”^①

当天，杭州小型会议结束。周恩来冒着浓雾飞上海，处理“跃进号”事件。

5月中旬，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陈伯达将修改后的关于总路线的新稿子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没有看。让陈伯达带着稿子从杭州回北京。毛泽东说，他现在不看这个稿子，等小平同志、少奇同志主持讨论过以后再看。^②

5月17日，邓小平主持中央反修文稿起草小组的同志和秀才们，在钓鱼台八号楼的大会议室里开始修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每天上午和下午都开会讨论，晚上秀才们加班，把会上讨论时还未修改好的段落再加工修改，提到第二天会上讨论。这样连续讨论、修改整整一个星期，从头到尾，逐段修改，终于搞出了一个比较像样的稿子。

18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5月20日正式下发。

19日至21日，毛泽东多次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作修改。

21日，毛泽东接见坦噶尼喀妇女代表团。

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并宴请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征求威尔科克斯对当时还没有经过北京讨论修改的陈伯达起草的那个稿子的意见。

毛泽东说，这个文件还要征求其他兄弟党的意见。他说，现在的文件还不太成熟，我对总路线的第一部分很不满意，文字太长，而且有些重复，不够简练、鲜明、概括。还有，稿子中说要批判五种观点，其实全文21条，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327~1328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09页。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 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567页。

再加一个尾巴，都是批判他们的，不仅是批判五个观点，每一条都批判他们的错误。

毛泽东在这里之所以讲全文 21 条，是因为当时陈伯达起草的稿子全文一共只有 21 条。后来经过北京讨论修改，加了四条，最后成为 25 条。当时毛泽东还提出，有关斯大林的问题，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在这个关于总路线的文件里不展开讲，只出一个题目，留一手，将来在中苏两党会谈时再考虑提出。因此修改稿中没有专门讲这几个问题，只在最后一段中提了一下。毛泽东还同他谈到中国党内的斗争。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路线。^①

22 日左右，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 5 月 21 日起草出来以后，送给毛泽东。

第二天毛泽东来电话，建议先征求在北京的外国党的同志和一些外国专家的意见。小平同志要联络部作具体安排。我们把这些外国同志的意见综合整理，能修改的实时修改，待斟酌的开列清单分头认真研究。被征求意见的外国同志中有缅甸党、马来西亚党、泰国党等东南亚一些兄弟党的负责人，还有中联部的顾问艾德勒和柯弗兰，他们都是美共党员。柯弗兰曾任美国国务院财政司司长，是 50 年代末到中国来的。

5 月的一天，毛泽东去钱塘江游泳。从钱塘江大桥东侧 100 多米处的守桥部队营区码头下水，计划从北岸下水，横渡钱塘江后，根据主席的体力、意愿再选择乘车、乘船、返游等回归方案。谁知一下水，毛泽东便不按工作人员规定的路线向上游游去。毛泽东说：“逆流能锻炼人的意志。”一直游到距大桥万米开外的珊瑚沙。当时江水温度不到摄氏 21 度。

23 日，邓小平等在刘少奇处开会，谈复苏共信稿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邀请金日成、胡志明、黎笋等到京，征求他们的意见。

5 月 24 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当天，专列途经南昌。

25 日，专列途经长沙。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 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 568~569 页。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 576 页。

26日，专列到达武汉，毛泽东住在湖滨别墅。

28日，刘少奇陪金日成到武汉，邓小平带着秀才们也乘另一架飞机到武汉。

29日，毛泽东在湖滨别墅与金日成第一次会谈。

毛泽东说，这次请你们来，主要是征求你们对我们给苏共复信的意见。这个信已经由秀才们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也看过了，虽然政治局还没有正式讨论，但大部分同志都看到这个稿子了。现在请同志们来，请你们提意见，看看草稿行不行，需要大改还是小改。如果这个稿子不行，可以重新写。除了已经征求威尔科克斯同志的意见以外，现在又请你们来，还要请越南同志来。为什么这样做呢？主要是我们怕犯错误，是想在发表之前能够搞得正确一点。本来还应该征求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意见，因为相隔万里，来往不便，只好作罢。越南同志将在你们之后来。印度尼西亚党和日本党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党，可惜也不能征求他们的意见了。

毛泽东说，我们中央常委在北京、杭州交换过几次意见，在杭州我参加了，北京的意见也告诉我了。现在又到武汉来，征求你们的意见，然后再加以修改，最后正式提交我们党的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以后再以中国党的名义向苏共发出。

毛泽东说，这个复信你们刚刚接触，也许有些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多加考虑。我们已经搞了一个多月，我也看过几次。这样的文件不反复若干次是搞不好的。我们已经反复了好多次了。

毛泽东说，金日成同志和其他同志在北京提了一些意见，小平同志都告诉我了。你们提的意见很好。我们的目的主要是把问题搞得正确一些，只要是正确的就不怕孤立，如果错了那就闯祸了。正确的东西人家暂时不理解，将来人家就会理解的。

金日成在会谈中讲到他们只粗看了稿子，还可以再看看提些意见。

刘少奇谈了他最近访问越南的情况，他说，我在访越期间，把我们的主要观点跟胡志明同志、黎笋同志谈了。他们担心破裂。我跟他们讲，你们担心也没有用处，要设想一旦真的破裂怎么办。毛泽东说，赫鲁晓夫要破裂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愿意破裂的，不破裂当然好，可是如果他硬要破裂，我们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要把这个问题想通。刘少奇说，我们在越南谈的结果，胡志明最后表示，他们希望不破裂，最好不破裂，但是对

破裂也要有准备，要准备破裂。刘少奇说，越南同志的态度不错。

这次会谈时间较短，到快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征求金日成的意见。毛泽东说，你们跟少奇同志在北京谈过了，你的意见初步讲了。在这里是不是把这件事情交给秀才们来搞。你们出几个人，我们出几个人。我们出吴冷西、伍修权、王任重、姚溱、范若愚、王力，再加上康生和大使郝德清，共有八个人。你们出多少呢？金日成说，我们就出朴容国、许锡暄、蔡喜正、金忠源、金琬政，再加驻华大使和两个翻译，一共也是八个人。毛泽东说，正好各出八个，这就对等了。让他们去讨论、修改，争论也可以，反正总的是把问题搞得准确一点。^①

30日，毛泽东与金日成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由金日成先讲。他讲了对文件的看法，总的感到很好，很有力量，右派是驳不了的。不管有没有这个文件，他们还是照样攻击我们是宗派主义、民族主义、托洛茨基好战分子等等，帽子满天飞。

毛泽东说，我们搞这个文件的目的是争取中间派，要使右派驳不倒。至于他们给我们扣上这顶帽子、那顶帽子，那没有关系。但是，我看他们是不会给我们扣上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的。

金日成说，这个文件原则方面没什么问题，问题是要考虑一下发表后刺激有多大。

毛泽东说，这个文件是辣椒多、糖少。

金日成说，糖多了没有辣椒也不好，两样都要给他们吃。

双方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中间派的问题。会谈中对这方面的议论比较多。

毛泽东说，原则问题你们都提了很多意见，文字上、词句上有什么意见你们还可以提。

金日成说，因为我们看的是翻译过来的朝文，所以只能就我们看到的一些观点问题交换意见，文字、词句恐怕还是请你们自己多加斟酌。

毛泽东还谈道：“我们这些国家如果不进行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不同右派和修正主义划清界线，那么再过十年、二十年也会出赫鲁晓夫。”^②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 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 570~572 页。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 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 572~573 页。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 538 页。

31日，金日成离开武汉回国。

6月2日，越南代表团到武汉。

3日，邓小平和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会谈。越南同志谈了一些意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见是，对苏共提出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经济基础问题究竟怎么看，复信中应该有所阐述。

4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客舍会见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因为前一天邓小平已经和他们谈过一次，所以毛泽东和他们谈的时候，首先是谈越方的意见，然后听他们介绍越南的情况。

毛泽东在谈到越南同志提出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经济基础问题时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们没有触及，你们越南同志看出来，这很好。你们提出的意见可以使这个问题讲得更有说服力。这说明交换意见很有益。我们总是想多听听兄弟党的意见，目的就是搞得正确一些。

毛泽东还谈到，本来我们是不赞成把内部争论公开于全世界的。比方说，赫鲁晓夫1958年提出中苏建立共同舰队的问题，这个问题你们也知道，但是我们没有公开讲。在1958年跟赫鲁晓夫的争论，不但当时没有公开，而且还发表了一个共同对敌的声明。原来赫鲁晓夫是秘密来的，后来临走时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就变成公开的了。虽然当时内部争论很激烈，我们反对搞共同舰队、反对他控制我们，但是公开声明还是一致对敌，反对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我



1963年，毛泽东在武昌梅岭三号门口。（摄影/吕厚民）

们不怕人家攻击我们，也不怕发表人家攻击我们的演说和文章。有一些我们只发表不加评论。比方说，我们发表了苏联四篇东西，有赫鲁晓夫的两篇讲话，还有《真理报》的两篇社论，都是指名攻击我们的，我们都公开发表了。但是，我们没有直接

答复，没有直接指名批评赫鲁晓夫，只批评了陶里亚蒂、多列士等的观点，他们的观点中有些也是赫鲁晓夫讲过的。

接着，毛泽东又介绍了最近几年我们同苏共争论的情况，以及我们对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意见，其中讲到苏联是怎样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讲到苏联撤出全部在华专家、撕毁几百个经济技术合同以及同阿尔巴尼亚断交等等。

毛泽东还谈到即将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说，我们在农村经过几次整顿，总整不好，现在找出原因了，一是过去土改不彻底，领导权并不在真正共产党人手里或者共产党起了变化，名为共产党，实际上不是了。二是土改后合作化有十年了，没有搞阶级斗争了，产生这种现象（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也是很自然的，社会上总是有这些事的，那么干干净净是不可设想的。

毛泽东说，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干部也没有经验。过去对干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也不够。所以这次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参加劳动，支部书记、大队长都参加劳动，公社以上干部也参加一部分劳动，最好县一级干部也参加一部分劳动。

毛泽东说，出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其社会经济基础。偶然的、不成系统、不是一贯的不能叫修正主义，是认识问题。我们这些人的认识也有个过程。

毛泽东问越南同志，他们还欠苏联多少债。黎笋说还有六亿多卢布。毛泽东说，我们下决心要把债还清，这几年我们平均每年还七亿卢布，明年要还六亿，后年再还五亿，就差不多了。

毛泽东说，同资本主义国家（法国、日本等）做生意，有两个好处，物美价廉，维修设备也卖给你，守信用。而苏联帮助我们几十个厂，很好，但在六样东西上卡我们，那就是大、小、厚、薄、精、尖，不卖给我们。从1960年以来，我们没法依赖，自己想办法，结果搞出了不少东西，大、小、厚、薄、精、尖都搞出了一些。^①

在毛泽东和朝鲜党、越南党领导人会见期间，在武汉的写作班子考虑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 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574~576页。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81~582页。

他们提出的意见，不断修改稿子，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毛泽东会见黎笋以后，要写作班子回北京去，召集起草小组的全组人员，再加一些其他同志，再讨论，再修改。他还说，他很快即回北京，那时候再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这个文件。

5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再次作了修改。并将标题改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6日，邓小平一行由汉口回北京。

11日凌晨2时，杨尚昆将修改好的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送毛泽东秘书处。

6月12日，毛泽东离开武汉返京。

13日3时，专列途经郑州，停在省委三所专用线上。省委副秘书长苗化铭、省委办公厅主任郝友三前往迎接。

当天17时，在省委第三招待所，毛泽东接见了第一书记刘建勋、第二书记何伟、书记处书记杨珏、候补书记纪登奎和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许昌地委书记赵天锡等。刘建勋向毛泽东汇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其他同志也补充了一些意见。

当夜，专列途经邯郸。

14日，毛泽东在邯郸听了林铁等的汇报。

在谈话中毛泽东说，不搞阶级斗争，不搞“四清”，不搞干部参加劳动，整党是整不好的。又说：反了投机倒把，对自由市场是不是有影响？是不是有人认为自由市场不搞了？不要这一反，自由市场不搞了。

毛泽东说，干部参加劳动，也得两年三年才能解决问题。又说，封建阶级形式上倒了，实际上未倒。不要忙，分期分批搞，没有强的领导，叫他们自己搞不行，不要急躁，有的支部书记就是敌人。

毛泽东说，你们跟湖北差不多，湖北同志讲他们（那里被篡权的基层）是占三分之一，有的土改就不彻底，有的后来变了，有的是富裕中农当权，这就是说，有三分之一不是社会主义的，他们挂的是社会主义牌子，实行他们的一套。^①

^①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82页。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33页。

上午，毛泽东打电话，告诉杨尚昆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可以送出，不要等他了。

18时40分，毛泽东离开邯郸，当晚回到北京。

当天，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作了最后审阅。

6月15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由中国驻苏大使潘自力当面交给苏共中央的苏斯洛夫。

1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四十七 赴中南、华东讨论“后十条”

杭州会议以后，各地开始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城市的“五反”运动进一步展开。到今年9月，中央机关的“五反”运动基本结束。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在农村社教运动中出乱子，搞过了头。尽管对此三令五申，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乱子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试点过程中普遍发生了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的问题。

在一线负责这项工作的彭真，从5月15日到6月15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一些省份视察，发现了不少问题。7月4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份情况报告，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同时，各地陆续报来一些材料，反映农村社教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和问题，提出要划清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为此，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的一个起草班子负责。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5月间下发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9月6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议程之一，就是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同时提出一些意见。

在中央工作会议后，“后十条”经过多次修改，于10月5日

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拿到稿子后，没有表态，也没有立刻看。于是，党内就出来一种议论，说“后十条”右了，是纠偏的。究竟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呢？起草者一无所知。突然，有一天得到正式通知，说毛主席同意了这个文件，而且还要将它同“前十条”一起，向党内外普遍宣读。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毛泽东带着“后十条”，于10月10日晚离京南下，分别向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的省委、一些地委和中南局的负责人征求意见。随后，又到华东同华东局和华东地区各省市负责人商量。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点面结合去做最有利。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意见，在文件上加了有关点面结合的一段，同时还做了其他一些修改和补充。随后于10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通知》肯定“后十条”是一个“重要文件”。指出：由于“后十条”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作了修改，“前十条”通知中的规定要作相应的改变。原先规定，暂不搞社教运动的县、社和大队，“前十条”暂不传达；现在改为：“前十条”和“后十条”两个文件向农村每个支部发两本，由县、区、社的党委领导干部向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宣读。城市工厂、机关、学校、街道以及军队，都照此办理。民主党派成员发给他们阅读。对地、富、反、坏、右也要向他们宣读。“总之，要使全国人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

10月26日，毛泽东将修改过的“后十条”和中央通知稿，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陈伯达、谢富治、杨尚昆、田家英阅，请他们开会讨论一次。“如认为可，即照办；如认为不可，即再商量。”^①

10月10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中南、华东、找中央局和各省委领导同志讨论“后十条”。

当日24时，专列途经邯郸，停靠在邯郸火车站内。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28-1329页。



1963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邯郸听取河北省委领导汇报水灾情况，查看地图。（摄影/吕厚民）

11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省长刘子厚、邯郸地委书记庞均、市委书记刘英、石家庄地委书记康修民、邢台地委书记刘琦开会。

1963年8月，河北省大部分地区连降暴雨，致使山洪暴发，水位猛涨，河堤决口，千里平原一片汪洋。平均水深一米至两米，低洼处深达三四米。四千多万亩土地被淹，两千万灾民家园被毁，三万多人在水灾中受伤，酿成了千年罕有的大洪灾。大家

围坐在专列客厅内的长方形会议桌旁。毛泽东的面前摆放着一张大幅的《河北省水利工程长远规划图》。

林铁、刘子厚向毛泽东汇报了河北省的受灾情况及今后水利工程长远建设规划。毛泽东一边听汇报，一边在规划图上寻找受灾地区的方位和水利规划中要治理的河流。

毛泽东仔细地了解了河北的受灾面积、口粮救济、群众情绪、群众生活，询问救灾工作的安排。毛泽东问得很详细，包括受灾面积有多大，哪些县受了灾，哪些县没受灾，灾区群众是不是悲观失望，粮食安排得如何，烧的怎么办？老百姓安定下来没有，外流的有多少，采取了哪些救灾措施，等等。

毛泽东一边问一边嘱咐：要做好宣传工作，讲清全国的形势，也要讲附近的情况，把群众情绪稳定住；对于抗洪抢险中的英雄模范人物，有一个表扬一个，有多少表扬多少，要给牺牲的人立碑。毛泽东问：“对

于救灾当中可歌可泣的事迹，新闻记者有没有报道，剧团没有演他们的戏吗？”

“报道搞得很及时。戏曲也正在排演。”

林铁回答。毛泽东说，运粮、运煤、运菜等是大问题，要安排好，要使灾民的体质不下降；要搞些副业生产，大的可以集体搞；今年麦子种了不少，要管好。

林铁回答：“麦子大部分都种下了。”

毛泽东说：“麦子不管早的迟的都出来了，明年麦收有希望。房子恐怕得几年才能恢复。”

林铁回答：“盖房正在抓紧办。由于受灾后上下支持，工作做得细，群众的思想情绪很稳定，外流人员很少，两千万灾民中只有 800 多人外流。”

毛泽东说：“遭这么大的灾，只 800 人，基本上算没有盲目外流，就是有个三两万人，工作也做得好。”

“但也有些问题。”林铁接着汇报说，“大水期间，个别地方发生了趁火打劫、偷抢等现象。”

毛泽东说：“国家要补助一下被抢的，抢劫要做处理。”

林铁说：“在救灾中有个别干部趁机多吃多占。”

毛泽东讽刺地说：“干部要真正救灾嘛，不要只救你自己嘛。”

林铁说：“有一些县城由于有城墙，群众没有受到大的损失。”

庞均说：“邯郸的永年老城就是这样。”

毛泽东听了很受启发：“城墙现在不是对付敌人，而是对付水，我看还得搞。大村庄也要有护堤。要把城墙和护堤看成是生产资料，没有它，耕牛、犁、耙等生产工具都要被冲跑。现在是两个问题，一是大城市，如邯郸、石家庄、邢台，要不要修城墙，二是大村修大围子。”

林铁说：“石家庄正定的群众就不让我们扒城墙。”

毛泽东说：“我们没知识，不能再扒了，城是为了对付水，不是对付打仗的敌人。”

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与会同志的身体状况，还详细了解了“四清”工作的情况。最后，毛泽东提出：“我就打算和你们谈这些情况，我们是不是去看看那座老城。”

当时，瘟疫流行，交通不便，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大家劝阻了他的这

次行动。^①

毛泽东还向河北省委征求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后十条”的意见。

17时，专列离开邯郸南下。

21时56分，专列途经郑州。毛泽东住在省委第三招待所八号楼。省委副秘书长苗化铭、省委办公厅主任郝友三前往迎接。



河南省委第三招待所第八号楼。

1963年8月，河南全省遭大暴雨袭击，造成新中国成立后河南遇到的第一次大水灾。商丘一片汪洋，大水居然涨到永城的芒砀山山坡。河南省委紧急动员全省人民奋力抗洪救灾，纪登奎自告奋勇提出愿到商丘，并提出三年解决商丘问题。10月，纪登奎到商丘兼任地委第一书记。

为解除水患，纪登奎下令所属各县拆圩扒堰，疏通河道。但是，安徽省与商丘毗邻的几个县，在省界线修筑的阻水工程，不是纪登奎下一道命令即可拆除的。纪登奎寻求上边的支持。正好谭震林来河南视察，纪登奎连忙从商丘赶回郑州求见，纪登奎向谭震林汇报：商丘水问题不能解决，主要是因为安南几个县堵水，商丘的水排不出去。纪登奎说，如果江苏在下游堵安徽的水，他们也同样难受。应当让黄河以南的水系按原来的走势，流入淮河。他请求谭震林给安徽省发个指示，让他们扒堤排水。谭震林表示他个人不好作决定，待中央出面，召集豫皖苏等省开会协商解决。他给李葆华写了一封信，要纪登奎持信到安徽见李葆华先协商一下。

纪登奎不甚满意，决定“告御状”。他对刘建勋说：“毛主席什么时候来

^① 王兴、马金南：《毛泽东与邯郸》第69~72页。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领袖在河北》第99页。

河南，一定要通知我，我要直接向毛主席反映边界水利问题。”

这次毛泽东要来河南，刘建勋告诉了纪登奎，当晚纪登奎从商丘赶回郑州，求见毛泽东。

工作人员向毛泽东通报：“纪登奎要见主席！”毛泽东乐意见纪登奎，说：“快让他来吧！”纪登奎来到八号楼，向毛泽东汇报了商丘救灾情况，并向毛主席保证不饿死一个人。然后纪登奎报告了他在解决两省边界水利问题上遇到的麻烦。

毛泽东听后，只说：“你讲的是个不小的问题，但也好办，叫李葆华来嘛！”

纪登奎连忙说：“那样最好。让葆华同志听听上游的情况，把他们的困难也讲一讲，大家在一起研究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纪登奎在毛泽东那里，仅用了半个小时，就解决了问题。纪登奎离开后，毛泽东的秘书连夜通知安徽省委：毛泽东明天要在郑州召见李葆华。

10月12日，李葆华坐着毛泽东派去的飞机，从安徽来到了郑州。

李葆华不知毛泽东何故突然在郑州召见他，心中没底，因而他没有直接去见毛泽东，而是先到河南省委，与刘建勋见面。

李葆华问刘建勋：“主席突然找我来有什么事？”

刘建勋说：“可能为两省边界的水利纠纷问题。”

李葆华说：“这件事情，咱们商量解决算了，何必惊动主席他老人家？”

刘建勋把纪登奎找来，与李葆华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安徽同意河南的要求，拆除边界阻水工程。

下午三人一同去见毛泽东。李葆华与毛泽东关系非同一般。李葆华的父亲是李大钊，毛泽东对他另眼相看，在安徽省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派他出任安徽省第一书记。

毛泽东在会客室里接见了他们，一见面就问：“你们还打仗吗？”

李葆华回答：“不打啦。听登奎同志说，主席叫我来，是为了两省边界水利问题。请主席放心，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按河南提的要求办，我回去找有关地县开个会，解决问题，不堵水了。”

刘建勋表扬说：“葆华同志可顾全大局啦，让安徽人民作出了牺牲。”

毛泽东说：“问题解决了，这好嘛。”

接着，毛泽东给他们讲了齐桓公葵丘会盟的故事。毛泽东说，葵丘就

在现在兰考县，春秋时候兰考是宋国的国土。宋国的首都就是现在的商丘。这商丘原是商朝的国都，后来盘庚迁殷，国都迁到安阳去了。公元前 651 年，就是周襄公姬郑元年，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为盟主，并缔结了盟约。这个盟约中就有一条：各国不能在边界筑堤阻水，要疏通河流，联合治水。毛泽东是要借这个故事晓谕各地党政首脑人物：几千年前的诸侯们尚且知道顺河流之走势疏导之，联合治水，不筑坝堵水，难道我们现在有的领导干部还不如诸侯的眼光？

安徽河南两省领导都向毛泽东表示，请主席放心，一定顾全大局，团结治水。几天后，陶铸、钱正英、李葆华、刘建勋、纪登奎等人到永城等县实地察看，研究拆堤方案，圆满解决了几年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1964 年春，毛泽东见到李葆华，还表扬李葆华，要他到北京介绍团结治水的经验，为其他省解决边界水利纠纷问题提供榜样。^①

13 日 12 时，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第二书记何伟和正在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八个地委第一书记上车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向他们征求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后十条”的修改意见。

13 时 30 分汇报结束后，专列向南开去。

10 月 14 日，毛泽东到武汉。

15 日，报纸刊登了毛泽东祝贺恩维尔·霍查 55 岁生日的电报。

16 日，毛泽东对《关于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指示》作批示：“全国学习解放军”。

18 日，毛泽东接见古巴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领导人。

毛泽东在湖北期间还向湖北省委征求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后十条”的意见。

20 日，毛泽东离开武汉到了长沙。

在长沙，毛泽东听取了华国锋、李瑞山的工作汇报并向他们征求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后十条”的意见。

当时岳阳县毛田区是湖南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4 月 2 日华国锋发表《贵在鼓劲》的文章，介绍岳阳县毛田区的先进经验和革命精神，强调“把革命热情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鼓干劲，必须是鼓实劲，而不是鼓虚

^① 河南省党史办二处处长贺明洲文章。1998~1999 年在河南省民政厅《当代民声》杂志连载。

劲，鼓蛮劲”。毛泽东听了省委的汇报后，对此作了充分肯定，称赞岳阳搞得不错。

22日，《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

经过一路的调查研究，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

26日，毛泽东将修改过的“后十条”和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的通知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同志。



1963年10月，毛泽东在长沙。（摄影/吕厚民）

刘、周、朱、邓、彭、瑞卿、伯达、富治、尚昆、家英同志阅，并开会讨论一次，如认为可，即照办；如认为不可，即再商量。

毛泽东

十月二十六日^①

当天，毛泽东会见了湖南省三级干部会和湖南省委二届七次全会的代表并合影留念。毛泽东听取了两会主要内容的汇报，肯定了生产救灾的主题。在接见时中南局书记陶铸、王任重座，毛泽东还找岳阳地委书记、零陵地委书记分别谈话，询问地区工作情况并向他们征求对农村社会主义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386页。



1963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湖南三级干部会议代表合影。
(摄影/吕厚民)

教育运动及“后十条”的意见。

当天，毛泽东离开长沙去杭州。

当天，专列途经江西。

27日，毛泽东听取了江西省委的汇报并向他们征求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后十条”的意见。

10月28日，专列离开江西。

29日，专列途经杭州。

当天，专列抵达上海。

30日，毛泽东收到康生、乔冠华为送审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的报告。

31日，毛泽东对《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一文作了批示：

写得很好，完全同意。

毛泽东

十月卅一日^①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394页。

当天，周恩来与在上海的毛泽东通电话，报告同富尔谈判中法建交等问题。毛泽东约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11月1日飞沪面商。并准备在沪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当天，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开会议论通过了“后十条”文件的第六稿。

11月1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飞沪，当晚，将中法建交方案报毛泽东。

11月1日至3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并面商中法建交方案。参加会议的还有华东局负责人和华东各省省委第一书记。

2日凌晨，毛泽东对中法建交方案批示：“很好，照此办理。”^①

当天，毛泽东就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作了批示：

印三十份，发给各同志研究，准备修改意见。

毛泽东

十一月二日^②

17时，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法国前总理富尔和夫人，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毛泽东说，（吃饭不要钱），有些地区这样搞，现在看来太早了一点。但社会主义性质一直是坚持的，不是超越社会主义阶段，实行“按需分配”。我们一开



1963年11月，毛泽东在上海会见哲学家冯友兰。
（摄影/吕厚民）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9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卷，第386页。



1963年11月2日，毛泽东会见法国前总理富尔和夫人。（摄影/吕厚民）

始就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人民中间还有差别，不是旧社会的差别，如地主、农民、资本家之间的差别，而是劳动力多和劳动力少的家庭之间的差别，不能说有三个强劳力同一个强劳力所得相等。一个强劳力都没有的家庭也有，这种家庭就要得到社会的帮助，不使他们流离失所，讨饭。社会上没有讨饭的，就是社会互助，也可以说有社会保险。对毁灭性灾害，就由国家去帮助。今年河北一地就调来200万吨粮食。这是通过国家的社会互助。^①

当天，毛泽东还在上海接见了尼泊尔王国全国评议会议长塔帕和夫人率领的尼泊尔王国全国评议会代表团全体成员。

3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教育代表团团长高等教育部部长阿卜杜阿齐兹塞义德及代表团全体成员。

当天，毛泽东离开上海到了杭州。

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刘少奇、邓小平及柯庆施与华东各省省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修改“后十条”。

^①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85~586页。

11月4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讨论的结果，邓小平主持对“后十条”再次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后十条”由田家英送交毛泽东。

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刘少奇、邓小平、柯庆施、罗瑞卿、田家英以及华东各省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再次讨论修改“后十条”。

8日，毛泽东对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讲话稿作了修改和批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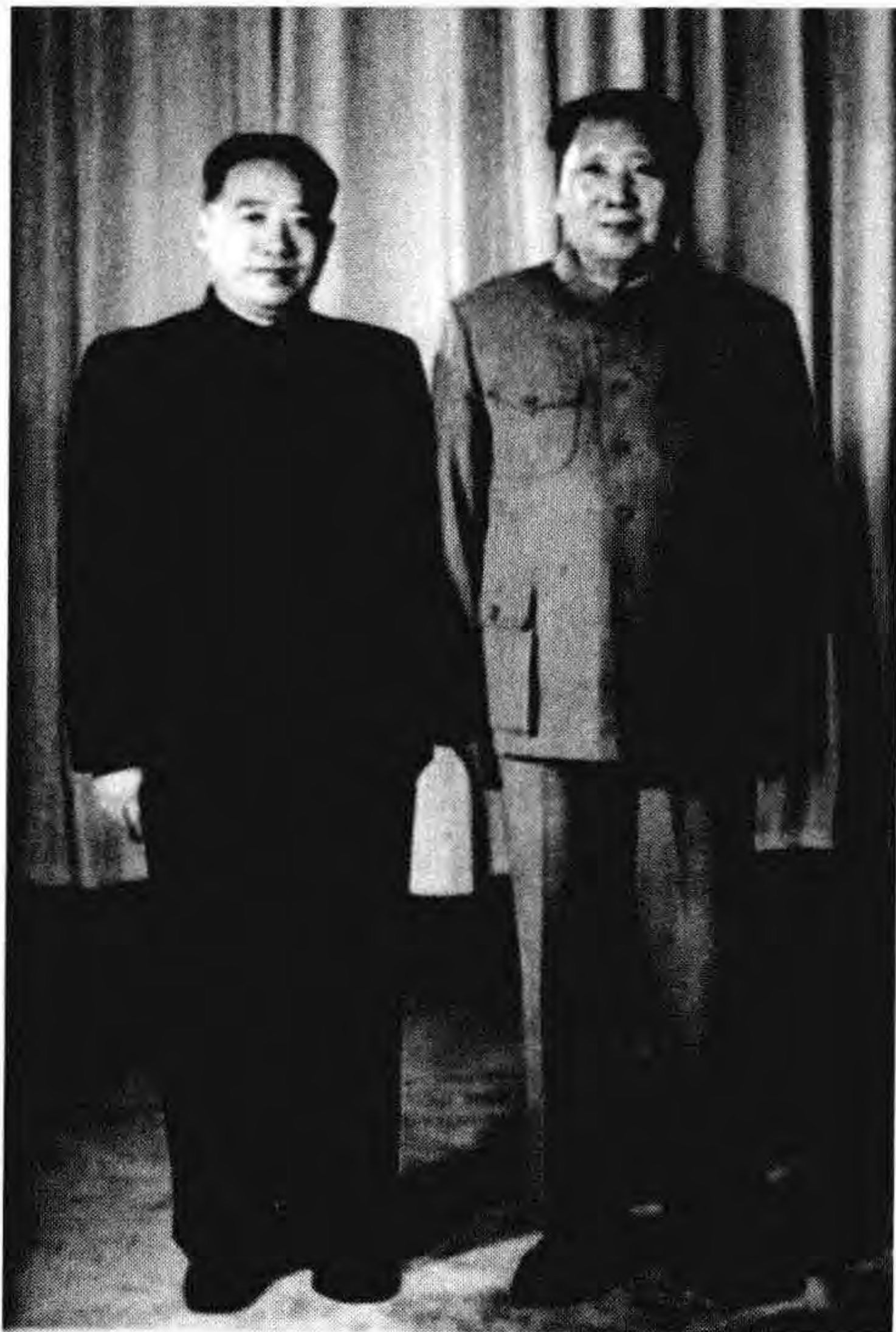
9日，刘少奇、邓小平由杭州回北京。

11月10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去上海。

11日，毛泽东离开上海返京。

12日，专列途经天津。毛泽东听取了河北省委林铁、刘子厚等汇报工作。

毛泽东询问生产救灾怎样，搞了些什么副业，群众口粮每天五两不够怎么办，烧柴怎么办？他说，运粮食、运煤、运菜，这是大问题。并指示



1963年，毛泽东与汪东兴在杭州合影。
(摄影/吕厚民)



1963年，毛泽东与沈同在杭州合影。
(摄影/吕厚民)



1963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观看被击落的U—2飞机残片照片。（摄影/吕厚民）

说，你们都是河北人，你们要把河北的灾救出来！要把水切实地治起来！你们十年能把水治好吧？我70多了，看不见了，你们这一辈子把水治好吧！

当时，天津正在搞一个抗洪斗争展览，河北同志请毛泽东为展览会题词，毛泽东当即答应，接着又说，我现在不做湖南人了，要做河北人，生在湖南，死在河北。

毛泽东说，我们缺20亿斤粮食，就是依靠各省搞。总之，我们全国团结起来，哪里有灾就救哪里。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是丰收；华东地区去年增产60亿斤。

毛泽东对防汛工作，解决群众住房，干部教育，群众生活作了许多指示。^①

晚上，他回到北京。

^①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86~587页。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领袖在河北》第99~100页。

四十八 巡视中南、华东，了解“双十条”贯彻情况

1964年2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学完英语后对章含之说：过了春节，我打算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在外面时间更自由，我可以多一点时间学英语。你向学校请个假，同我一道去。不过我不好剥削你，我们交换。你教我英语，我教你读《史记》。毛泽东说：初五启程，一路坐火车，去江苏、浙江。

2月15日下午，毛泽东打电话，让章含之去一趟。毛泽东说，我暂时离不开北京了，旅行只好推迟。^①

1964年3月17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讨论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三线建设问题。

毛泽东说，近一年来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联系国内反修防修问题。毛泽东还提出今年4月是赫鲁晓夫的70寿辰，可以发贺电，不完全是礼节性的，应讲点实质问题。他越大反华，我们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姿态。^②

24日，毛泽东与李先念、薄一波等谈经济建设问题。当有人提到：1960年上海会议上有的同志就提出了粮食产量高指标的问题。毛泽东说，是啊，那时候都反对他们，那个压力才大呢！他们是对的，他们很勇敢，多数人是错误的。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缅怀毛泽东》编辑组：《缅怀毛泽东》下卷，第578页。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733~734页。

毛泽东说：干部参加劳动，是山西省昔阳县教给我们的，以后又有浙江省的几个材料。又说，不经过1958年到1960年的经验教训，是学不会建设的。

毛泽东说，多年提倡下去调查研究，就是不下去。搞了多少年工业，并不知道什么叫工业，不懂机器，不懂设备，怎么行？

毛泽东说，工业、基本建设不能太急，（年产100万吨以上的煤井过去一般要六年才能建成）现在四年、五年建成，这就算是多快了，太急了不行。你逼得厉害，他就要弄虚作假。

毛泽东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而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①

26日和27日，毛泽东连续两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谈到同赫鲁晓夫的斗争和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问题，但他更多的是谈到赫鲁晓夫的问题。

毛泽东说，我所以提议要发一个给赫鲁晓夫的贺电，还考虑到一种可能，就是他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上来的人有可能比赫鲁晓夫好，也可能比赫鲁晓夫更坏。比他坏的可能性更大。所以要拉赫鲁晓夫一把，推迟中苏分裂。会上还讨论继续评论苏共《公开信》的问题。“八评”的稿子毛泽东已经看过了，也基本定稿，只须在文字上再斟酌一下就可以发表，并且考虑在月底发表。会上大家估计，我们发表“八评”以后，苏共很可能要发表他们二月全会的决议。毛泽东说，如果“八评”发表以后，苏共发表二月全会的决议，掀起一个反华运动，那我们要考虑把过去几个月以来没有发表的我们同苏共来往的双方信件公开发表，而且要求他们也这样做。现在要做准备，到时候再说。

毛泽东最后还说，关于给赫鲁晓夫的祝寿信，要在北京准备好。我过一天就到外地去，传给我看了以后再发出。贺信要用四个人的署名，这是党、国家、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联合贺信，用毛、刘、朱、周四个人的联名签署。^②

①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90~591页。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734~739页。

3月27日晚，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视察。

28日凌晨1时40分，专列途经邯郸。

下午2时，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应他之邀在此等候的山西省委负责人陶鲁笏、阴发祥，河北省委负责人林铁、刘子厚及保定地委负责人陈子瑞，石家庄地委负责人康修民，衡水地委负责人赵树光，邢台地委负责人刘琦，邯郸地委负责人庞均，邯郸市委负责人刘英等十多人，开“四清”工作座谈会。主要听取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笏、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的汇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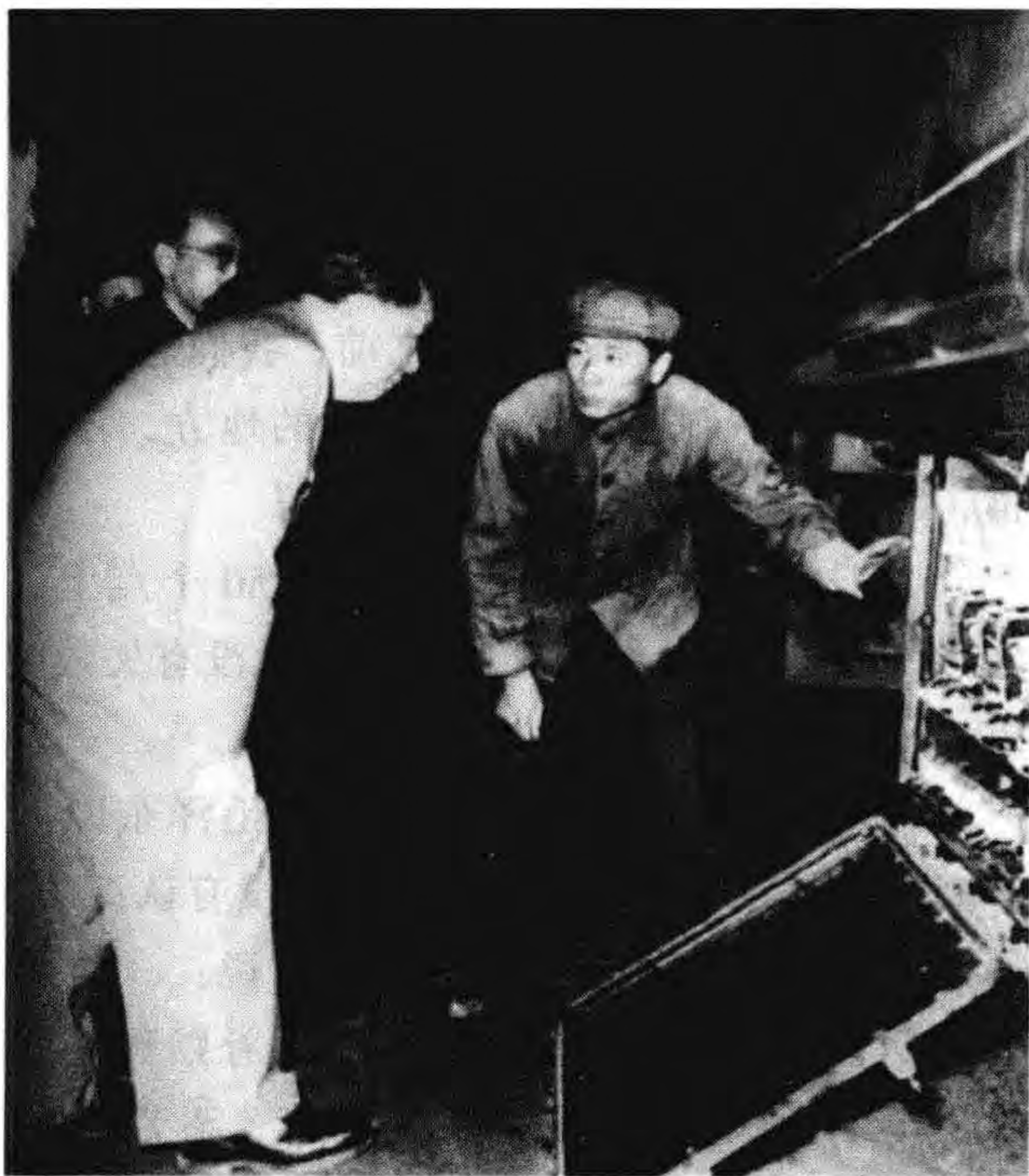
毛泽东招呼大家坐下，说：“鲁笏同志，你先谈点情况吧。”

陶鲁笏汇报：山西全省从去年12月以来，在面上普遍宣讲了“双十条”，点上正在公社搞“四清”试点。

毛泽东问：“你们这样做，究竟妨碍了生产没有？生产情况如何？”并说，“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

陶鲁笏汇报：有人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挑起来的。

毛泽东说，什么挑起来的呀，共产党是反映人民的要求。人民要求“四清”，反贪污、反浪费、反多吃多占、反对反革命破坏。因此才写了“五反”指示，才出了“双十条”，然后发下去，到工厂、农村去念，看他们赞成不赞成，有无修改。你说这些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主观挑起来的吗？说是共产党想出来的，为什么群众欢迎？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四类分子跃跃欲试。地主用归宗图教育



1964年3月28日，毛泽东在邯郸专用线停留时看望乘务人员并了解检车作业情况。（摄影/吕厚民）

他们的后代，还要搞阶级斗争，他们用送礼、美人计拉拢我们的干部，是谁挑起来的？阶级斗争确实存在，不能把没有说成有，也不能把有的说成没有。

有人汇报：一些人想降低“四清”标准，贪多求快。

毛泽东表示：革命要革到底。农村“四清”要讲质量、品种、规格嘛，要验收，不能只讲数量出次品，出了次品要重新来，要搞好搞透。紧了不行。我说的是至少三年到四年，是从去年5月算起。因为5月以前，还没有第一个十条，不能算。第二个十条是去年11月发出的。今年搞一年就取得了比较完整的经验。现在全国有点苗头，就是太急。要什么今年搞50%到60%，明年要搞完，何必那么急。劲头上来了就急，我看宁可慢一点。无论“五反”也好，“四清”也好，时间长一点，搞好一点。急了就不能达到目的。当然也不是说要慢腾腾地搞，现在不是慢腾腾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在另一方面，就是太急。

陶鲁笏介绍了陈永贵的经验，说他们在依靠政治挂帅、防止出现高工分阶层问题上，解决得好。有制度，不烦琐，有差别，不悬殊。

毛泽东第一次听到陈永贵这个名字，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陈永贵领导大寨大队，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改变了那里的面貌，引起毛泽东极大的注意和兴趣。不久，他发出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陶鲁笏说：“杭州会议之前，我们通过搞‘四清’，清出2400万元。”

毛泽东讽刺地说：“有借款的地方，不向帝国主义借，不向赫鲁晓夫借，我们的干部就有得借嘛。”

当汇报到“四清”试点，在150个点上，有三个点失败。毛泽东说：“什么叫失败？世界上哪能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呢。立个典型，失败的经验很重要，要抓失败的经验。”

谈到对中央指示的认识过程。毛泽东说：“对情况要逐步了解，没有客观世界就没有主观世界，不要把没有认识的东西，当作不存在的东西。”

谈到农村的干部情况，毛泽东说：“支部书记、大队长是不是非要工分补贴，过去打仗就没有什么工分补贴啊。就是吃饭穿衣，还要死人。人吃了饭穿了衣，不就解决问题了嘛。不劳动的不能当支部书记、公社书记，也不能当县委书记。为什么一定要到县委机关开会，万里长征还不是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开。有什么房子呀，睡觉哪有什么钢丝床，有块门板就行了。

南方是睡稻草。革命就是这么过来的嘛。现在大房子也来了，钢丝床也来了，汽车、火车也来了，病也来了，官僚主义也来了。自己不写东西叫秘书写，我直到现在还不叫他们写。秘书只能找找数据，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么部长、厅长就可以取消，叫秘书干。”

毛泽东对部分干部脱离劳动颇有意见，多次强调要加强阶级斗争教育，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①

29日下午2时，毛泽东又接着昨天的议题继续听取河北省委的汇报。

毛泽东首先询问了河北的生产救灾情况：“你们秋耕地多少？种麦多少？比前年呢？”毛泽东又指着衡水地委的同志说，“你那个地方我从照片上看，够呛的，你们受灾地区也有好的嘛，如邯郸就不是全部受灾嘛。”

当林铁汇报到国家支持情况时，毛泽东问：“国家给你们调了多少粮食，是26亿斤吗？”

刘子厚回答说：“29亿多斤。”

毛泽东问：救灾中发生过贪污克扣没有，有没有发给富的不发给穷的，或者根本不发，就卡在公社。

毛泽东说，集体副业要搞起来，生产队初步搞一些，大队初步搞一些，公社也可以初步搞一些，多了也不行。灾区修建房子，最重要是木料，烧砖还来得及吗？最好改为砖房，土房不顶事。

当汇报到农村集体经济巩固、自留地下降时，毛泽东说，自留地不能太少了。

当提到海河治理，最近还准备开挖献县减河时，毛泽东说：“献县是哪个专区？搞减河有多长？”

刘子厚说：“属衡水专区，有300华里。”

“300华里算大工程了嘛！你们搞了这条减河，天津也受益嘛。”毛泽东引经据典，“衡水是历来遭灾的，为什么叫衡水？衡水混流，患难于中国，这是舜皇之事。《山海经》有记载”。

接着林铁汇报了“四清”情况，他说：“公社、生产大队的干部，在试点中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占70%。”

^① 王兴、马金南：《毛泽东与邯郸》第72页；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91~59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39~1340页。

毛泽东问陶鲁笏：“你们那里占多少？”

陶鲁笏说：“百分之三四十。”

毛泽东幽默地说：“你们那里还是清水衙门呢。”

陶鲁笏说：“山西每个公社贪污平均达到3800元。”

毛泽东说：那还不是从老百姓身上刮来的，国民党又叫刮民党是有道理的。这些人不改，就叫国民党，不整怎么了得呀。”

在当时的情况下，上面所说的数字都有些夸大。当林铁汇报到有问题的大队占三分之一时，毛泽东说：“我们真有三分之二就了不起了，天下三分，我们占二分。”毛泽东运用西周时殷纣王与周文王争霸的例子说，“三分天下，一分事殷，那是假话，没那么回事，是两个民族互相争斗，纣王客气点，把文王关了起来，没杀他的头。说文王是圣人，不见得。纣王是吃了这个亏的。我们有三分之二就不错。三分之一也要具体分析，大部分是可以争取的。”

毛泽东最后说，基本核算单位是河北提出来的嘛，就是在这个地方定下的。我就是听听你们的，我没什么意见，北京是不产生意见的，办厂没材料，等候你们的材料加工。山东下边提出了四权统一，所有权、生产权、管理权、分配权。结果省委主管农村工作的书记反对，反掉了。正确的是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他反映了农民的意见。一切真理，开始的时候，总是在少数人手里。在核算单位下放这个问题上，当时，少数人代表了全国大多数，多数人并不代表全国大多数。^①

晚上18时30分，毛泽东离邯南去。

3月30日，专列途经郑州。毛泽东住省委第三招待所八号楼。

下午，毛泽东在郑州召集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负责人李启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以及河南几个地委的负责人，听取他们汇报。

一开始，毛泽东就接连提出几个问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粗一些好，还是搞细一些好？时间长一些好，还是短一些好？毛泽东说，中央最近发了一个指示，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要搞彻底，至少要三年到四年的时间。

^① 王兴、马金南：《毛泽东与邯郸》第75页；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92页。

毛泽东在听了大家的议论后说：“现在各地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的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问题。”

毛泽东再次强调：“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着急，一定要搞彻底，不要滑过去。两年不行搞三年，三年不行搞四年。过去民主革命没有搞彻底，现在要补课。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滑过去，将来又要补课。”

他要安徽、河南两省的负责人汇报黄河下游的排水问题。河南、河北、山东、苏北、皖北五个地区，由于以前执行以蓄为主的方针，下游各省到处筑坝，大雨一来水排不出去，地下水往上涨，土地盐碱化。他向两省负责人了解情况后，嘱咐说：“要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不要再互相‘打仗’了。”毛泽东决定由谭震林召集五省主要负责人开会，解决这个问题。^①

31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以朗诺为首的柬埔寨军事代表团。然后继续开会，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文敏生等汇报了工作。

当天，新华社发表《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八评”发表以后，开始同时起草给赫鲁晓夫70寿辰的贺电和对苏共中央3月7日来信的复信。

4月1日，毛泽东离开郑州去武汉。

2日，专列抵达武汉。毛泽东住东湖宾馆梅岭一号。

下午，毛泽东听取了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汇报。

湖北当年计划一半的社队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问：“你们是不是要求太急了？这样做，会不会走过场？”毛泽东强调：“四清”运动要搞深搞透，保证质量，不要走



1964年，毛泽东与湖北省长张体学握手。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340~1341页。

过场。又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是从对敌斗争入手，还是从‘四清’入手？”了解了湖北的做法后，毛泽东提出，下一批是不是可以从干部洗澡放包袱搞“四清”入手？

毛泽东还问王任重，你们是不是向群众宣讲过两个十条？王任重回答：“省委、地委、县委大多数同志都去宣讲过了。我自己还未去讲过。”

毛泽东说：“你为什么不去？你又不老，又没有病，应当亲自向群众去宣讲两个十条。”

就留口粮标准等问题，毛泽东说，关于留粮标准，是不是要有个杠杠。谈到生产队粮食分配问题，毛泽东主张要有基本口粮。^①

4月初，党中央给苏共中央3月7日来信的复信定稿，刘少奇批示送到武汉，请毛泽东最后审定。毛泽东审定后准备发表。

3日，苏共中央公布了他们二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和苏斯洛夫的反华报告。在公布这两个反华文件的同时，《真理报》也发表了一篇反华的社论。

上午收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报告了在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

刘少奇说，这个事情要请示毛泽东再作最后决定。刘少奇还说，估计苏共在发表二月全会这两个文件之后，还会有一系列的动作，我们要等着看一看。他们所谓的“坚决反击”开始了，这是个新的情况。我们答复他们3月7日的信，要联系到这个新情况进行修改，然后再发出。这个事情也要请示主席。

下午，刘少奇给邓小平打电话说，主席同意复信不忙发出，要修改，但怎么样修改要等等看，要看看苏共还有什么动作再说。^②

4月5日，刘少奇在家里主持召开一次小会，周总理、邓小平、彭真、陈毅参加。

在这次会上，刘少奇说，已经报告了主席，对苏共采取的这样一个新步骤，我们要把它看作是一个严重事件。

刘少奇说，现在我们要看他这场戏怎么唱下去，我们要稳坐钓鱼台，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341~1342页。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92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15~1116页。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 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740~741页。

不动声色。要考虑准备先发表他们这三篇东西，就是苏斯洛夫的报告，他们二月全会的决议，和《真理报》4月3日的社论。我们先按兵不动，观察一个时期，但也不能太久。

大家议论我们下一篇评苏共的《公开信》的文章怎样写，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九评”要分析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和国际根源，批评他的全民党、全民国家，指出他们高薪集团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主席指定的还有一篇边界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开始谈判，我们可准备稿子，晚一点发表。主席还出了几个题目，也都要准备。看来，对付赫鲁晓夫新一轮公开论战，“九评”要作大的修改，着重分析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根源，挖他的老底。

邓小平说，秀才们从去年准备中苏两党会谈起，一直忙到现在，一年到头很辛苦，太紧张了，现在可趁观察一阵的时机，放松一下，索性离开北京休息一些日子。

刘少奇和周恩来都赞成。会上决定，邓小平带领秀才班子到外地去参观。^①

这次毛泽东到武汉，王任重向毛泽东汇报了黄冈地区保留了大队核算制的情况。早在1961年4月，毛泽东在梅岭开座谈会时，就听到这种观点，当时仅说说而已，现在已成了现实。但毛泽东听后很感兴趣，要听详细情况。王任重让省委办公厅通知黄冈地委书记姜一、荆州地委书记王玉珍来省委汇报。

5日，毛泽东与湖北荆州地委书记王玉珍、黄冈地委书记姜一谈话。

姜一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了保留大队核算后，这些大队依靠集体经济，大办农田基本建设，改变了落后生产条件，战胜了自然灾害，连年增产的情况。汇报了欣欣向荣的大队办企业，拖拉机以及大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汇报了实行公社核算的三个公社的经济发展，除了大队办企业外，公社还办有林场、畜牧场、水产养殖和加工厂、拖拉机站，真正形成了三级所有。农业生产朝专业化方向发展。

毛泽东问：“你们地区共保留了多少个大队？”

姜一回答：“共993个大队。”毛泽东又问：“这些都是好的大队吧？”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741~744页。

姜一答：“都是群众一致要求的。”

毛泽东说：“不搞一刀切，这很好。只要群众自愿，办得又好，就是实事求是地执行了政策。”

毛泽东说，将来所有的公社，都要走这个方向，再过十多年，也许就可以了。

毛泽东问：“哪个公社的拖拉机站办得好些？”

姜一回答：“新洲县刘集公社的拖拉机站办得早，也办得好。”

王任重说：“他们除了搞农田耕作外，还搞运输，作用很大。”

毛泽东说：“拖拉机站还是以公社建站为好。我们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就要以公社建站，走刘集的道路。湖北要好好地总结一下经验，建立健全各种制度，逐步发展农业机械化。”^①

7日，邓小平和彭真带队，乘专列出发。先到大同，参观云岗石窟。然后到包头，参观包钢和那里的稀有金属矿山。在包头停留两天，然后又到银川。在银川待了一天，看了大雁塔，听了宁夏党委书记介绍宁夏的情况。然后到兰州，在兰州停了两天，听甘肃省委介绍情况，还参观了国防工业。

在兰州的第二天晚上，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要邓小平带几个人马上从兰州飞长沙，毛泽东要在长沙开会。

当时兰州还没有大飞机场，只有在陇西，在我国核试验基地附近才有大飞机场，而那里离兰州太远，当时又正在进行试爆第一个原子装置的准备工作，也不能去那里。后来想从兰州先到西安，然后再去长沙，但是西安也没有大飞机可以降落的机场，只有武功有个大的军用机场，于是决定从兰州经过武功飞长沙。

4月上旬，汪东兴将公安部党组4月7日关于调查处理胡芷芸案件的情况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对汪东兴说：你看确有此事吧！有些人只爱物，不爱人，只重生产，不重改造。把犯人当成劳役，只有压服不行。其实，抓紧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以思想工作第一，做好这一面，不仅不会妨碍生产，相反还会促进生产。^②

^① 章重：《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第390~39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65页。

8日，毛泽东为准备同日共代表团谈话给林克写信：

林克：

日本代表团，何日经武汉去越南？我想同他们在武昌谈一次话。在〈再〉问明白为要。

毛泽东

四月八日^①

10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日本共产党袴田里见等人，再次谈到中国共产党内的斗争。

毛泽东说，就在那年（1962年）8月，我们讨论了整个路线，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开了一次十中全会，发表了十中全会公报。当时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同赫鲁晓夫的调子一样，即强调“三和一少”。在国内问题上提出“三自一包”。即强调自由市场、自留地，把集体经济、社会主义市场放在第二位，把私有经济放在第一位，农民的自留地放在第一位。第三就是自负盈亏、小商人做生意要自负盈亏，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三自”。还有一包是主张把土地包到各家去种，不搞集体。当时是一股风，1962年很猖狂。

毛泽东还说，中央联络部部长就主张“三和一少”。他本来害病，那年春季，他突然积极起来了。此外还有统战部，一部分人主张把几个资产阶级政党在几年内改变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只是两个例子，其他还不止。中央各部，每个部都不是太平的。每个部都可以一分为二。地方上也不是太平的。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就有十几个人是修正主义者。

又说，中国如果搞修正主义，你们就不好混。如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你们怎么办？你们要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②

谈话结束，毛泽东离开武汉去长沙，王任重随行。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58页。

^②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79~580页。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142页。

4月11日凌晨，专列到长沙，毛泽东在长沙住了一个星期。

12日，根据毛泽东点名，邓小平带康生、吴冷西，从兰州到长沙。其他同志由彭真率领从兰州到西安参观。当天中午邓小平一行飞抵长沙。

刚吃完午饭，毛泽东通知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王任重（中南局第二书记）和张平化（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毛泽东见到邓小平后即说明给赫鲁晓夫70寿辰的贺电要修改。这个贺电稿子原在北京时准备好的。按照原来的设想，写得比较长，其中谈到了分歧和争论的问题。刘少奇修改后送毛泽东主席审核。

毛泽东说，他不赞成这样写法。他说，这个贺电应该争取苏联发表，使他能够发表。写的内容要从这么一个设想出发。因此不能多谈分歧和争论问题，什么公开论战不能停呀，要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才能停呀，等等，这些问题不要多谈。但可以说尽管我们还有分歧，我们还是要加强团结之类的话。毛泽东说，要点出这么一个意思：说尽管我们有分歧，但是一旦有事，我们两党会团结起来的。

毛泽东说，这个“一旦有事”，是指对赫鲁晓夫不利的事情，而不是讲别的。就是说，你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帮你的。要含有这么一个意思，但不要说得那么露，可以意会，不可言传。

毛泽东说，我在北京说过，赫鲁晓夫在苏联领导集团里边，还不是最右。与其让比他更右的人上台，还不如现在我们同赫鲁晓夫建立某种形式的统一战线。我们同赫鲁晓夫打交道十年，对他比较熟悉，也比较容易对付。他搞的那一套，我们的估计八九不离十。所以我们在贺电里面要暗含这么一个意思，一旦有事，我们还是能够团结起来对付的。这是第一点意见。

第二点意见，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是怕争论的，从世界工联北京会议起，他们就怕，现在是越来越怕。二十大的时候，他到了顶峰，他发起对阿尔巴尼亚的公开论战，从此以后走下坡路，气势一年不如一年。

这次他们发表的二月全会的报告、决议，看起来形式上似乎气壮如牛，但内容很虚，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真是色厉内荏。我们要准备发表，中央一级报纸全文发表，省一级报纸则要压缩一下，摘其要点，约为十分之一，还要向国外广播。毛泽东说，摘要要摘其精彩的。我们不怕他放毒。让大家看一看他究竟有什么货色，让国内群众、干部都了解赫鲁晓夫究竟放了

什么屁。

第三点意见，毛泽东说，我们原来在北京定稿的那封复信，少奇同志建议要推迟发表。这个意见好。因为现在他们二月全会的文件公布了，情况变了，所以要改写后才能发。发出这复信以后，我们就可以把从去年11月29日他们那封来信起，一直到我们将要给他们的复信，这中间双方几次来往的信件，全部公开发表。

第四点意见，毛泽东说，“九评”、“十评”要抓紧。之后还要组织一批文章，题目我在北京讲了一些，你们再想想看，还有什么题目。

此外，毛泽东还谈了一些事情，要邓小平告诉总理。毛泽东说，中苏贸易谈判，要减少进口苏联的东西，要坚持顺差，否则我们只还账，用我们出口的物资来还账。如果他们不要，那就把账挂起来。但是，我想他们还是要我们东西的，这是还账。不进口你的东西，那是因为我要的你不给，我不要的你给，我何必要进口呢。当天晚上，邓小平打电话把毛泽东的意见告诉了总理。^①

晚上和第二天上午，吴冷西等同志改写给赫鲁晓夫的贺电，然后邓小平加上王任重、张平化和康生，一起议论修改。在议论过程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稍微详细一点好，一种意见认为简单明了说两段就行了。后来邓小平要吴冷西把大家的意见集中一下，根据大家意见起草两个不同的稿子，一长一短。下午再讨论，讨论完毕再送毛泽东。

13日下午，毛泽东召集邓小平、康生、吴冷西开会，讨论贺电稿的修改等问题。

毛泽东说，原来北京起草的稿子太长不好，但现在搞得太短也不好，还是稍为多说一点的比较好，不要太潦草。因为我们是把这个当作重要的策略步骤来看待的。

毛泽东基本上同意第一个稿子，就是稍为详细一点的那个稿子，并且作了修改。

毛泽东在开头的地方加了“亲爱的同志”几个字。原来稿子的开头只是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接下来第一段就是“在你70寿辰的时候，我们向你祝贺，祝你健康长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 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745~747页。

寿”。毛泽东在“在你 70 寿辰的时候”之前加了“亲爱的同志”。用意是很明显的，就是表示我们这个电报是一个和解的电报，而且使他能够发表。

同时，毛泽东在最后的的地方又加了“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颤抖吧，它们总是会失败的”这么一句。

修改以后，毛泽东要我们马上电发到北京，请刘少奇和周恩来再过目，看看他们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就照这个稿子发出。因为赫鲁晓夫的 70 寿辰是 4 月 16 日，在长沙定稿的时候已经是 4 月 14 日。这个贺电必须在 4 月 16 日前发出。同时毛泽东还要邓小平告诉总理，贺电发出以后，在一个星期内，我们不发表反修的文章，任何反修文章都不发表，以表示友好，也满足一下那些说我们老是好斗的人的愿望，中国不是那么好斗，也不是永远斗下去的。我们还是讲团结的，就看对方怎么样了。这个贺电不仅对赫鲁晓夫有这么一个作用，而且对各兄弟党，不管是中间派，不管是右派，也有这个作用，就是告诉他们，我们还是坚持团结的。

毛泽东说，这个贺电甚至连越南党这样的左派，看了也会高兴的。因为分裂总不是好事，我们尽量推迟分裂也是这个原因。能够维持某种即使是表面上的团结，也是有好处的，比起公开的、完全的分裂要好。

毛泽东还谈到，要准备赫鲁晓夫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我们一切要从坏的方面准备。最坏的准备是他片面地召开国际会议。不管中苏两党会谈是否达成协议，不管筹备会议是否达成协议，他硬是秋天召开国际会议，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开除我们，公开分裂。所谓公开分裂就是公开把我们开除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像过去情报局对南斯拉夫那样，像后来赫鲁晓夫对阿尔巴尼亚那样。我们要做这个准备。

毛泽东说，如果赫鲁晓夫召开国际会议，我们要考虑坚决不参加，但同时也要准备另一手，万一需要参加怎么办。我们说中苏两党会谈推迟到明年 5 月，还提出两三年以后再开国际会议。虽然我们这样提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准备万一他提前开，万一他不顾是否达成协议硬要开，我们要考虑参加会议同他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准备一个纲领草案，提交国际会议讨论，同他针锋相对。让各国共产党看看，他的纲领是什么纲领，我们的纲领是什么纲领，要货比两家。这样，即使会议破裂，对我们也有利。因此我们要准备两手。

议论完了以后，毛泽东请大家一起吃晚饭。邓小平在晚饭前指示立即

把贺电稿发给北京。后来总理来电话，说刘少奇和他都同意毛泽东在长沙修改过的稿子。这样，贺电在16日凌晨用明码电报发到莫斯科（当地时间正是15日夜），16日晚上新华社广播，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贺电的全文。^①

4月15日，毛泽东接见由阿尔及利亚国家指导部顾问马利克·本·纳比为团长和阿尔及利亚外交部文化司司长本·科比为付团长率领的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全体成员。

毛泽东在谈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说，现在还在试验过程中，最后做结论是以以后的事情。帝国主义说中国政府要崩溃，看样子，中国还没有崩溃。我这个人倒是会崩溃的。快要见马克思了。我们的医生说是不能保证我活几年。这是客观规律，人总是要灭亡的。是辩证法。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但是，一个人灭亡，一群人灭亡，并不等于一个国家灭亡。现在马克思不在了嘛，恩格斯不在了嘛，后来又有了列宁、斯大林。现在这两位也不在了嘛。世界就灭亡了吗？不但没有灭



1964年4月15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阿尔及利亚客人。（摄影/吕厚民）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 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747~752页。

亡，还更加发展了。

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做过的事，资本主义做过的事，我们人民也能做到。我就不相信就只有欧洲或北美、日本的资本家才能做到。第一条，我们人多，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总是占多数。第二，在这些人里头，总有比较好的领导者和干部，他们不会的可以学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们也犯过幼稚病，犯过三次之多。最后一次把我们南方根据地丢掉了，还跑了一万多公里，就是长征。那时我们叫“教条主义”。就是不根据中国实际，专门抄书本，抄教条，抄外国经验。我们也有过几次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拿现在的话说就叫修正主义。那是从资产阶级来的思想。现在进行对人的教育，思想教育，看来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也是这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有比较充分的准备的，是有几十年经验的。在人民中间，在党内，在干部中间，什么叫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什么叫买办资产阶级，是比较清楚的。怎样对付它们的政策，也是比较清楚的。但是也经过曲折，犯过错误。至于怎样搞社会主义，就不清楚了。所以现在要重新对老干部、新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胜利了14年，我们又重新抓起社会主义教育。我们自己不懂，怎么教育别人呢？现在情况好了一些。我们这个党也不是顺畅走过来的，是经过艰难困苦过来的。现在我们党内也不是什么都是好的。有许多党员挂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有许多干部也是这样。

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①

16日，周恩来陪同刚果客人到长沙，晚上，周恩来与毛泽东谈话后陪毛泽东接见刚果客人。

17日，周恩来陪外宾去韶山访问参观。在路上周恩来向省委副秘书长杨树青询问农业生产情况，其中问到湖南的猪产量为什么下降，杨树青回答说，是猪饲料供应不足。回到长沙，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这个情况，毛泽东认为湖北猪饲料供应是100斤，湖南为什么才75斤，责成湖南解决农民养猪饲料不足的问题，提高生猪产量。^②

从这天起，中国报刊和通讯社、广播电台不发表也不广播批评苏共的文章。毛泽东原来批示是要暂停一个星期，实际上停了十天。

4月18日，毛泽东在长沙与张平化、李瑞山、王延春等谈话。张平化

^{①②}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142~145、130页。

告诉毛泽东，陶铸和王任重让他向主席请示一个问题，城市街道是否可以成立劳动人民协会，进行阶级划分。这个问题，4月5日在湖北的谈话中，王任重曾经提出过，毛泽东没有表态。这一次，他作了明确的回答：“我赞成。农村有阶级，工厂有阶级，城市无阶级，那是全民党、全民国家了。城市也有阶级，过去没有划就是了。”^①

毛泽东说，株洲一个会计贪污了两次，只评功摆好，不评过摆坏，能解决问题吗？

当汇报到湖南农民比湖北、广东收入少时，毛泽东说，其原因是副业少，单打一。而且劳动力有剩余，没有事做。不平衡就用比、学、赶、帮的办法。省与省之间要沟通。^②

19日，毛泽东离开长沙到了江西南昌。

21日，毛泽东同江西省委杨尚奎、方志纯、刘俊秀、白栋材、黄知真谈话，听取了江西省委的汇报，并就工业问题、农村社教等发表了讲话。

毛泽东说，1962年我到南昌时，白栋材同志说工业上还没有个章程，现在怎样了？白栋材替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工业搞了十几年，到底怎么个搞法。

白栋材说，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起草了一个工业问题十六条，把我们想到的问题大体都提出来了。因为许多问题有不同意见，特别是体制问题，条条块块的关系，不同意见多，就搁下来了。工业“七十条”，主要是企业问题，学解放军、学石油部解决了做人的工作的问题。新老企业的关系、工业方针等还需要解决。

毛泽东说，是啊，你们搞个工业的文件，各省市出人与陈伯达合作，搞一个嘛！我回去与陈伯达谈谈看。

杨尚奎认为，社教运动对干部的处理总的方针还是偏严了。

毛泽东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搞好为主，不要赶时间。要多花些时间，工作队要经常进行整顿。不要冤枉人，又要教育人，把坏人搞出来，把坏人制服，“四不清”变成“四清”，不劳动变成劳动。领导要强，要依靠贫下中农群众，干部和群众密切团结。生产要发展。如果生产搞坏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342页。

②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93页。

了，下降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失败了。我们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比土改时搞得更深入细致一些，因为土改时干部少，没有经验。^①

4月22日，专列离开南昌。

23日凌晨，专列抵达杭州。

24日，毛泽东对湖南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简报作了批示：

汪东兴、林克阅后，送江青，江青阅后送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定一阅后，退毛。

这是一批好材料，易看，有许多闻所未闻的情况，看了大有益处。这个问题要在五月会议一谈。

毛泽东

四月廿四日^②

毛泽东对公安部关于调查处理胡芷芸案件情况报告作了批示：

刘、周、邓、彭阅。这个材料可以一看，看后，退回徐子荣同志。

毛泽东

四月二十四日

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③

4月25日，总参一份对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26日凌晨0时5分，毛泽东为播发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反华文件写的《人民日报》编者按作了批示：

康生、冷西同志：

按语看过，很好。可在今日广播，明日见报。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342~1343页。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93~594页。

^{②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61、64页。

毛泽东

四月二十六日上午零时五分^①

和这个编者按语同时送毛泽东的，还有对苏共中央3月7日来信的答复信的修改稿。毛泽东把这个答复信留下了。

27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开始发表有关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三个文件：一是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的反华报告，二是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反华决议，三是苏联《真理报》4月3日的反华社论。这三个反华文件都是在4月3日在莫斯科同时发表的。

28日，毛泽东在南屏召见公安部长谢富治，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汇报工作，就社队办企业、核算单位粮食政策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林乎加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搞得慢一些，是全国最慢的。

毛泽东说，那不要紧。你们经验不足，“无证民不信，不信民不从”。搞典型才有证据，才能说服人。

林乎加提出，过两年“六十条”是否修改一下，他认为“六十条”对社办企业的劳力投入不超过2%的限制有问题。

毛泽东说：“是否暂时不改，到大多数公社、大队都有了社办企业或大队企业、公共积累，‘六十条’再承认既成事实。”法律就是承认既成事实嘛！如果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生产力终究会突破的。

毛泽东说，自留地不要动，自留地生产的粮食不要算口粮。自由市场不要动。浙江还有恢复蚕桑、桐油、茶叶的问题，要订出计划。^②

毛泽东说，看来基本核算单位要扩大一些，生产队平均17户有的适合，有的不适合，但马上改变有问题。又说，（粮食政策）再宣布三年不变好了。

对商业部召开全国电话会议把养猪的奖励压缩了，毛泽东说，电话会议怎么算数，那是独裁制度，没有民主，也不见面又不商量。

毛泽东问：现在牛还分不分省界？浙江是向苏南出口牛的嘛！不卖牛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6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43页。

不利于发展牛的政策，过去湖北也是进口牛，但不买公牛，现在出口牛。

他还说：（农村政策）变要从下边变起来，要变先从下边变，上边慢变。

公安部长谢富治汇报了带领公安部工作组在浙江劳改单位蹲点的情况。

毛泽东说，究竟是人的改造为主，还是劳改生产为主，还是两者并重？是重人？重物？还是两者并重？有些同志就是只重物，不重人。其实，人的工作做好了，物也就有了。在一定的条件下，敌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但要有好的政策、好的方法。要他们自觉改造，不能只靠强迫、压服。^①

30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作了批示：

康生、冷西同志，并请告中央常委各同志：

同意这封信，只在第7、8、9页上，作了一点增改。

在这个开会时间问题上，苏共领导的章法乱了，因此指挥棒也不灵了，因为大多数党都怕开分裂主义的会。实际上苏共领导自己也怕开这种会，因为分裂对他们没有好处。

这种会实际上是开不成的。

毛泽东

四月卅日^②

1964年春，毛泽东写《贺新郎·读史》：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是〕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③

①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94~595页。浙江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与浙江》第265页。

②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68、63页。

5月2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到了上海。

毛泽东在上海住了几天，就准备回北京，主持中央工作会议。

9日，毛泽东接见了由塔德·西里乌尤蒙西率领的布隆迪等五国国民议会代表团。

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5月7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还全文发表了中苏两党之间的其他六封来往信件。



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西郊宾馆散步时观看地里长出的蚕豆（右一为周富明）。（摄影/吕厚民）

这天，毛泽东接到北京电话，说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要来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因为这个问题要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

当天，毛泽东离开上海到了南京。

5月10日，毛泽东在南京的专列上听取了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参加汇报的有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薄一波等。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作并参加了国家计委的汇报会。

11日，汇报会在专列上继续进行。

10日至11日，毛泽东的谈话大意如下：

据说越南需要多少万吨石油。我们要把越南、朝鲜需要的石油打进计划去。其他的需要也要打进去。

工业干什么，搞钢铁干什么？它既不能吃，又不能穿。工业要为农业服务。当然，重工业本身还有个相互关系的问题。

当汇报说第三个五年计划农业平均每年递增5%左右，工业递增10%左右，并且有可能超过，毛泽东说，不错了，总比捷克、东德要好。



1964年5月，毛泽东在南京看小麦生长情况。
(摄影/吕厚民)

稳产高产也是相对的。河北省去年8月3日至8日，六天内下雨达700~800毫米，也就稳不住了。

要注意种好16亿亩地。在这个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农田。要点面结合，很对。

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也不借国家的钱，也不问国家要东西。

(对搞化肥增产棉花和建设维尼纶厂那个经济效果好) 维尼纶的投资可能大些，但机器可以一直用下

去么，还有棉花的播种面积总是有限的，还是要搞。

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

张家口至白城子铁路是不是只是军事上需要？经济上有没有价值？经济上也有价值。

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来办事。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建设也是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钱也是工人创造的价值，农民创造的价值。就是有了钱，还要打歼灭战。

财政收入你们不要打得太满了，太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

还是小而全，可能还是小而不全，小而不全比大而不全好，大而不全

就要浪费。并且小就有可能比较全。

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要注意种好 16 亿亩地。在这个基础上建设 4 亿多亩稳产、高产农田。

（苏联经济）他们不仅哲学上贫困，工业上也贫困，粮食上也贫困，猪肉也贫困。

在这次会议上，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只有那么多钱，我们的财政除了支付工资、折旧、维持简单再生产、支付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等，积累并不多。只能那么多了。安排要少些，多做少说。技术政策很要紧，如大庆油田就从国外取得一套资料，要搞。

（外贸政策要逐年减少粮食进口，增加新技术进口）很好，必须从明年起就这样做。这个好，必须如此，而且有可能。

（对高工资职工是否还应减些工资）是不是采取下边每年增加点，上边不减的办法？像少奇同志家现在就比较紧些，震林、一波你们孩子也多嘛，能不能减？我就是怕搞得大家叫苦连天，又要补贴不好。

农村人口也在增加，劳动力目前有些过剩，城市人口再下乡，怎么办？要靠多种经营，精耕细作。湖南要种棉花，说你们不让。

养猪怎么不奖粮食了？浙江省说你们开电话会议不奖粮食了，为什么？不行嘛！农民喂猪，一是为粪，二是为自己吃点肉，赚不了多少钱。当然，奖得太多也不好。

人民需要一个统一调度的国家，这是个问题，没有这么个社会主义制度，调这么多粮食怎么行？去年算是个大灾年，北方几个省是水灾，南方有几个省是旱灾。

要少而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留有余地，要把基础工业同各方面的关系摆好。要记住过去几年的教训。要像一波同志说的“赶猪办法”，走一百里路，是越赶越壮些好，还是越赶越瘦些好？

必须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没有做。这几年留了，要保持这几年。

1962 年上半年到 1964 年，只有两年半的时间，形势就好了。1962 年上半年时，很多人说形势的全面好转要八年、十年，要包产到户。不搞社

会主义经济了。^①

当天，专列离开南京。毛泽东在从南京到济南的专列上继续听取汇报。

5月12日，专列途经济南。

上午，毛泽东在专列上休息。

下午3时，毛泽东听取了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的汇报。谭启龙也参加了国家计委的汇报会。毛泽东在会上的插话大意如下：

湘潭地委华国锋1962年上半年跟我讲，他钻了牛角尖了。他估计人的体力下降了，畜力弱了，地力弱了，农具差了，因此一时不可能恢复，而就是没有估计到“六十条”的作用。那年结果增产了十亿斤，常德地区也增产十亿斤。两个地区合计就是20亿斤。

“六十条”、“双十条”为什么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呢，因为它解决了人民内部的矛盾，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把力量组织起来。

我赞成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各级有工会，就是没有农会。要依靠大多数，依靠贫下中农，把他们组织起来。看你站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这一边，还是站在百分之五的人那一边，要算这个基本账。“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会忘记了。我们许多人中间，地委书记也忘记了，他们现在丰衣足食了。”“你们做计划工作的也要注意绝大多数，注意贫下中农。”

还是靠自力更生，事情总是起变化的。“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可以。”我们不走这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很好；要贷给我们，我们也不要。

工业上要从外国引进一些，比如尖端技术，要搞一些，但不宣传。至于农业，我们要靠（山东曲阜）陈家庄陈玉梅、（山西昔阳）大寨陈永贵。^②

18时，专列离开济南。

5月13日，专列途经天津。毛泽东在从济南到天津的专列上和在天津继续听取汇报。毛泽东的插话大意如下：

江西有人说管了多少年工业，对工厂的情况毫不知道。中央发了管理

^①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95~596页。《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第44页。

^②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97~59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43~1344页。

工业的“七十条”，也只解决企业管理问题，对工业我还是毫不知道。为什么不可以学，应该懂些嘛，没有到工厂学习，不向工人学习，不同技术人员请教，总是内心无主。

单一领导好些，江华同志对我说，企业上面多头领导，下面不好办，好像演木偶戏一样，有那么多条线，很多线牵着，牵一下动一下，下面工作很被动。

“工业、农业、商业都要划阶级，学校、机关、军队、文化团体也要划阶级。此外，街道、小市镇也要划。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是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的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的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地富子弟要团结，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只要愿意改造，就应该要他们。我们在工厂中划阶级，主要是把那些国民党的书记长、反动军官、逃亡地主、地富反坏分子清查出来。并非查所有的人，并非主要为了查剥削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他们过去有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只要现在表现好，就要信任他们。即使表现不大好，也要改造。这个问题，我是首先看了西安在工人中查阶级的报告才提出来的，去年转发给大家。”^①

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只能经过知识分子。工人每天在剥削压迫之下生活、工作，为了吃饭，那么忙，自己产生不出马克思主义，要有知识分子。马克思本人不是工人，但他能看出发展的趋向，经过分析研究，把资产阶级哲学变成无产阶级哲学，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变成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这样来教育工人。其实，工人也读不了那么多书，读不了那些大部头的著作，先进的可能读得多些。

黄巢的部下朱全忠建立了梁朝，梁朝有个张全义，是“豫州刺史”，就是现在的河南省长，他也注意搞农业，是所谓亲民之官，对生产好的加以奖励。古时也有这样的人，何况我们是共产党。

搞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标准是什么？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第三，发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344页。

现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四，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

干部不参加劳动，永远“四不清”，“懒、馋、占、贪”，都由懒而来。

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安排时，毛泽东说，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一定要把三线建设好。^①

专列离开天津，当晚回到北京。

1964年春末夏初，毛泽东对章含之说：我的老师啊，有件事要同你商量。我的英语课恐怕要暂停了。党内出了点大事，我最近要处理很多事，很忙，顾不得学英语了。等忙完了再接着学，好不好？^②

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三线建设问题等。

17日，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由谭震林主持修改“后十条”。

8月5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后十条”的修改，也改由刘少奇主持。

^①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98~599页。

^② 章含之在许多文章中都谈到毛泽东的上述谈话，文字有所不同，现仅举一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第27页。

四十九 1964 年夏天在北戴河

1964 年 6 月 16 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谈到接班人时说过：要准备随时离开自己的岗位，随时准备接班人。每个人都要准备接班人。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毛泽东将中央工作的领导权交给了刘少奇，退居二线。就连对“后十条”的修改，也不参与。所以，6 月 17 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在讨论根据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意见对“后十条”进行修改时，决定由谭震林负责主持。

这样才能解释毛泽东当时怎么能有时间准备沿黄河考察。

根据侯波回忆：

1964 年夏天，毛主席突然提出要去黄河。毛主席说，这次可好了，可以如愿了。我不当国家主席了，事情不那么忙了。我想搞点儿科学研究，再不搞就来不及了。我要带一个智囊团去，这里面包括有天文、地理、历史、气象、土壤、地质、化学、肥料、水利、电力等一批专家，要像李四光这一级的专家。骑马去，沿着黄河走，逆流而上，去寻找黄河的源头，把这条河从头了解起，让他更好地为我们的民族造福。几天后，汪东兴从北京调来骑兵团和一些经过选择和训练的军马。所有随行人员开始了骑马训练。一切都准备好了，甚至连出发日期都定了，结果由于“北部湾事件”，去黄河的计划不得不取消。

侯波所说的毛泽东说“我不当国家主席了，事情不那么忙了”，其实有误。1959 年 2 月，根据毛泽东多年的请求和做工作，他已放弃了“国

家主席”的职务。国家主席一职，由毛泽东推荐，人大讨论，经过投票选举，交给了刘少奇。而这次毛泽东放弃的是中央工作的领导权，他退居二线。

6月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6月28日至7月24日，刘少奇就到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同各省市党委负责人座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

回到北京以后，8月1日刘少奇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

他突出地强调，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如果不去，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

他说，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到处都有。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方式。利用我们的口号，利用我们的政策，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利用我们干部的面貌来篡夺领导权，或者把持领导权。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

刘少奇说，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毛主席开调查会的方法已经不行了。

刘少奇对“后十条”提出批评，提出应当加以补充修改。

他说，现在证明，这两个十条，包括第二个十条，普遍读一次有好处。但是，地、富、反、坏分子，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他就利用这个第二个十条的许多政策规定来顶工作队，来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搞“四清”。群众还没有发动，怎么就拿第二个十条去搞呢？以后不要强调了。他批评第二个十条讲的“两个依靠”靠不住。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联，不要经过基层组织。他批评第二个十条上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讲得不对，讲反了。他批评第二个十条不分好坏，讲工作队只能一切经过基层，只能当参谋，解决不了问题，常常是不妥当的。

刘少奇的这次讲话，在各级干部中引起很大反响和震动。既然刘少奇对第二个十条不满意，提出要修改，而且指定田家英随他去广州参加修改。于是8月5日，中央书记处在北戴河开会决定，“后十条”的修改工

作改由刘少奇负责。并决定成立中央“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①

7月29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北戴河。

毛泽东到北戴河前，已经做好了沿黄河考察的准备，这次到北戴河又特地带了一匹军马，有空便练习骑马。

当天，毛泽东就题写《湖南日报》报名给张平化写信。

平化同志：

《新湖南报》报头写得不好，宜改换为《湖南日报》，使与《湖北日报》相一致。现写了两张，不知可用否？如不可用，退回重写。如可用，则以在今年国庆节改换改〈为〉宜。请你酌定。

敬礼！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九日^②

同一天毛泽东还为《新华日报》、《北京日报》、《天津日报》题写了报名。

30日，苏共就我28日复信回信，断然拒绝我们的劝告，赫鲁晓夫是下定决心，要开分裂会议，时间定死了，参加会议者也定死了。赫鲁晓夫孤注一掷，使形势急转直下。

8月1日，毛泽东为《解放军报》题写的报头“解放军报”和“思想战线”发表。

3日，毛泽东为找《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给林克写信。

林克同志：

我要找一部金圣叹批的《水浒传》再看看。我又要找一部《共产党宣言》，一部列宁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都要是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345~135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118页。

新出大字本的。请你办一办。

毛泽东

八月三日^①

8月4日，田家英将随刘少奇到广州起草“后十条”，临行前田家英请示毛泽东对修改“后十条”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②

当天，毛泽东召集邓小平、彭真等开会（刘少奇和周恩来未到北戴河，刘少奇准备南下广州修改“后十条”，周恩来准备住院做手术），讨论苏共来信。

毛泽东说，我们估计对了，赫鲁晓夫一触即跳。我们28日发出的信，他30日就来信答复了，把文章做绝了。效率很高，是早就准备好的预谋。现在既没有中苏会谈可谈，也没有什么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需要考虑了。因为他下命令开会，是下决心要分裂了。所以，我们现在只要对他的来信简单地答复就行了。^③

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后十条”的修改由刘少奇主持。当日，刘少奇带田家英赴广州。田家英在从北京往武昌的专机上，把8月4日毛泽东的意见转告了刘少奇。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

6日上午6时10分，毛泽东对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略越南的声明稿作了批示：

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毛泽东

八月六日上午六时^④

“我的行动”，可能指毛泽东原计划骑马沿黄河考察的行动。

同一天，毛泽东对某部泅渡金沙江经验的通报作了批示：

①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119、12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52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810页。

瑞卿同志：

此件看了，很好。是否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部队中的大多数人都可以试验学游泳？军委是否已发出了指示？

毛泽东

八月六日

条件不好，主要是：（一）有血吸虫及其他毒害的河流、池塘；（二）有大旋涡的河流地段；（三）有鲨鱼的海中。此外，部队中总有一部分人不适宜于游水的，不要强令人人都下水。^①

当天，毛泽东又召开会议，还是谈苏共复信问题。毛泽东说，现在看来，赫鲁晓夫是决心要开分裂会议了。

因此我们要考虑，在他开分裂会议之前，我们和朝鲜、越南等左派各党用不着商量，也不要搞什么纲领草案。因为我们决不参加这样的会，他开什么会我们都不参加。

毛主席对吴冷西说，你们秀才现在可以在北戴河游泳、休息，酝酿写“十评”。纲领草案不搞了。既然没有中苏会谈，又不参加筹备会，更不待说国际会议，还要什么纲领草案呢？

这次会，还议论到我们国庆15周年要不要邀请外宾的问题。原先中央不准备请左派兄弟党来参加。后来阿尔巴尼亚建议，左派各党要利用这个机会碰碰头，交换意见。大家认为，现在看来，不要请大批左派兄弟党来参加，因为他们的负责人不可能都来，大家事情都很多、很忙。有些兄弟党的代表来参加庆祝国庆，也不要开会商量。在苏共召开分裂会议之前，我们不走第一步。因为如果我们左派党在苏共的分裂会议之前在一起开会，就给苏共一个借口，他们会说，你们可以开会，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开，好像他们有理由开了。所以我们在国庆的时候不宜大请左派，更不要开左派党的会，只请他们中的一些人来，也请苏联派代表来，只是惯常的外交礼节，只参加庆祝我们的国庆，不开会，也不争论。^②

8月6日至16日，刘少奇先后在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向机关干部作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121页。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811~812页。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并在广州修改审定“后十条”。

8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等悼念萨瓦茨基逝世的电报。

10日，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的报告作了批示：

朱、邓、彭、康阅。请书记处考虑一下，此建议是否可行？并以决定告知卫生部。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日

毛泽东在审阅这一报告时，除写了本篇收入的批语外，还写有两条批注。在第一项改进办法旁，毛泽东批注：“保健局应当取消”。在第二项改进办法旁，毛泽东批注：“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①

当天，毛泽东观看了山东省京剧团演出的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并接见了全体演员。

8月12日，毛泽东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作了批示：

退罗瑞卿、杨成武同志。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国务院组织项目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

毛泽东

八月十二日^②

当天，毛泽东观看了山东省淄博、青岛市京剧团演出的现代京剧《红嫂》，演出结束后，毛泽东走上舞台和演员们一一握手，并一起照了相。

13日，毛泽东会见从朝鲜回国，路过中国的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

在谈话中，黎笋告诉毛泽东，朝鲜劳动党也接到苏共的信，他们准备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124~125、126页。

发表一个声明，拒绝参加这个筹备会。黎笋说，他已跟国内商量好，在朝鲜党发表声明之后，越南劳动党也发表声明，也拒绝参加26党的筹备会。毛泽东对黎笋说，等你们两家发表声明以后，我们也发表声明，支持你们两家拒绝参加苏共召集的26党筹备会。^①

14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19周年的电报。

8月，毛泽东就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作了批示：“江青阅，此文有些道理。”^②

8月15日，毛泽东在半山腰上他住的那间宽敞的平房里召开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谈了同黎笋会谈的情况，并且说，我们要发表声明，支持他们两党不参加苏共召集的26党筹备会。

会上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最好把我们这样一个立场通报有关的左派党，比如日共、新西兰党、澳大利亚党、印度尼西亚党和亚洲其他一些党。毛泽东说，这个问题恐怕要政治局正式讨论一下再决定，现在还不忙，等到回北京在政治局会上正式做决定。

会上决定，要起草一个简单的复信，答复苏共中央7月30日的来信，谴责他们下令强行召开国际会议筹备会的做法。^③

16日，刘少奇从广州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了《关于集中力量进行城镇五反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建议》。

他建议改变原先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说，各个县分别搞时，一个是缺少办法，一个是县委同下边犯错误干部有牵连。因此，建议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一个县可集中工作人员上万人，声势浩大。省地机关派工作队，上下左右同时清理。建议中央机关也要抽出人组织工作队，科长以上各级干部大体抽出三分之一，再加上其他工作人员，可以有一万至几万人。^④

17日，“后十条”的修改在广州结束。文件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

①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 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81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130页。

④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19页。

导中撤开。^①

当天，毛泽东接见了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穆罕默德·西拉，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当天，毛泽东在书记处讨论三线建设会上发表讲话。毛泽东问李富春三线建设为什么这么慢？李富春说，攀枝花地区地理复杂，勘探需要时间，我们缺乏资金，筹措三线建设的投资计划需要开会研究。毛泽东当即说道，没有钱用我的工资。他说，三线建设的步子太慢，责任在国家计委，并批评国家计委计划方法不当，工作不力；要求立即把三线建设好，把大工厂和科研机关搬进去。^②

8月18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宣传部8月14日给中央书记处的关于公开放映并组织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作了批示：

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毛泽东

八月十八日^③

同一天，毛泽东作了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

毛泽东说，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学哲学的应当下去，参加阶级斗争，身体不好的死不了，多穿点衣服就行了。大学文科这样搞法不成，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不成，书本怎么能出哲学呢？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三部分：科学社会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想说服资本家发善心不行，要依靠无产阶级斗争。

研究哲学的人，认为第一位是哲学。不是，第一位不是哲学，是阶级斗争。因为有压迫者，被压迫者就要反抗找出路，从这一点出发，才有马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353~1354 页。

② 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第 636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1 卷，第 135 页。

列主义，才找到了哲学。文科大学生，今冬明春都下去。理工科不动，动一些也可以，其他通通下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法律、历史的通通下去。今冬明春分期分批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学到阶级斗争，学到革命。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

现在知识分子穿暖吃饱住好，养尊处优，身体有病，思想有病。因此知识分子必须参加阶级斗争，参加“四清”才有生气。

要读些书，为需要而读书，为现在斗争去读书，与无目的地去读书不相同，有知识很重要。

社会主义也得灭亡，不灭亡就不行，就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至少搞个百把万年、百把千年，就不分质的阶段？我不信。完全一个性质。几百万年不变，我不信。按照辩证法，这是不可设想的。一个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搞一百万年，就是一种经济学。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

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了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阪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

毛泽东还说，农村工作部专搞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借贷、贸易、雇工、土地买卖自由，过去出过布告。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永远巩固下去，就是搞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能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并不触动民族资产阶级。分地给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私有制变成个体农民私有制，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分地并不奇怪，麦克亚瑟在日本分过地。拿破仑也分过。

在说到年轻时研究农村各阶级、各阶层关系，花了十年工夫才搞清楚时，说曾无偿援助个别农友一点钱。“那时候这种无偿援助是难得有的。我父亲就是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反对他。我父亲死时，送葬的很少；我母亲死时，送葬的很多。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我母亲也很不能接受。”^①

同一天，毛泽东给刘少奇8月16日的来信写复信。

少奇同志：

八月十六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十七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十八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十月工作会议还应该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同意，统一党内思想。在此以前，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先行讨论一次，收集各种意见，以利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八月中旬至十月中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时间，即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

即送邓、彭、康生、朱德、贺龙、荣臻、瑞卿、伯达、冷西阅后，请尚昆印发。^②

8月19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并中央，谈第二个十条修改情况，他说，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十月会议时定稿。文件由田家英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我也将带到其他几个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见。

同一天，刘少奇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推荐王光美“桃园经验”报告的信并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发出。他在批语中说：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

① 高凯、于玲主编：《毛泽东大观》第659页。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604~60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132~133页。

“有普遍意义”。^①

田家英带着刘少奇的信和“后十条”修正草案稿回北京，送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在北戴河。刘少奇按原定计划，到广西、云南、四川、陕西、山西五省区，继续作关于社教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

同一天，毛泽东又召开会议，再次讨论不参加苏共召集的筹备会的问题。

大家一致同意坚决不参加苏共召集的26党筹备会，即使只剩下中国党和阿尔巴尼亚党两个党，我们也决不参加，在这个问题上决不后退。当时接到日共的来信，他们征求我们是否参加筹备会的意见。他们说他们还没有最后决定是否参加，想知道我们的态度。从日共的来信看，他们似乎倾向于参加到里面去进行斗争。因为过去我们退出情报局在布拉格办的那个《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以后，日共还留在那里进行斗争。所以这次他们也考虑这么办，参加进去斗争。

由于有日共的这封来信，所以8月19日的会议确定：我党坚决不参加苏共召集的26党筹备会，即使只有中国党和阿尔巴尼亚两个党也坚持不参加的方针，会议同时决定把我们的这个态度告诉日共。至于他们是否参加，请他们自行决定。毛泽东说，我党采取这样坚决的立场，可以使左派兄弟党更加坚定。若欲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②

20日上午，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计划工作方法革命化问题。毛泽东与他谈了四个小时。

毛泽东谈话的大致内容如下。

一、计划工作的革命问题。

二、六大，就没有把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分清楚，而且说，必须打倒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才能胜利。

三、那时不是能动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分配土地（也不能侵犯中农；也不能“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分配土地是可以的，拿破仑也分配过土地，麦克亚瑟在日本也分配土地。这是革命的第一步。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145页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55页。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812~813页。

四、那时也犯过侵犯地主在城市的工商业的错误。

五、1961年“六十条”出来了，到下半年就见了效，1962年继续见效。

六、1962年7月，北京有人大讲包产到户，也有人向我建议40%包产到户，60%保持集体。不要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

七、他们说包产到户，解放军是欢迎的，因为解放军都是农民出身。说照他们这样做，四年可以恢复，如果说按“六十条”办事，要八年才能恢复。实际并没有那样，今年搞得好一点就可以恢复了。

八、现在报的有隐瞒，人要报多，产量要报少，灾情要报多，土地要报少。

九、关于食堂问题。发现食堂不行的，是科学院的一个小组到河北昌黎县调查的结果。他们认为不行。我当时说，试办一下，无可厚非。我听了科学院的报告，就派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分别到湖南、浙江、四川调查。

十、我跟斯诺谈话，我讲我们搞民主革命有一套。至于搞社会主义，我们不会办。在这个问题上，不但不能逞英雄，而是不行。不懂，没有经验。

十一、关于高指标问题。1958年11月武昌会议，我就感到高指标不妥当。1959年就更有此感觉，感到不妥当。那时我找几个人来谈，想降下来，搞这么多行不行？我是想降下来的。1959年1月，我提议召开会议就是要降下来，但还是两千万吨，降不下来。开了几天会，大家准备上火车了，纷纷要走，我说会议是我提议开的，你们开了一星期，我也开一天么！留了一天，我讲了几句话，搞好，很好；搞不好，也不要如丧考妣。

十二、为了搞农业，为了搞国防，就要搞基础工业，就要搞重工业，就是“屁股”！这就要搞钢材，就要搞化学工业，就要搞有色金属，就要搞合金钢，就要搞精密仪表，搞工作母机……

十三、现在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你搞到二线也好么！为什么不可以搞到二线？二线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山西、陕西、江西、吉林、内蒙，都可搬去么，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都可以搬去么！要好好地研究，学习斯大林的经验：（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就是教训。

十四、各省都要搬家。比如福建，可以把漳州、厦门、福州的工厂搬

到闽西的上杭、汀州；浙江可以搬到衢州、丽水；江苏可以搬到句容、无锡以西……不仅工业交通部门的，而且整个的学校、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家。一线要搬家，三线、二线要加强。

十五、成昆铁路要两头修，滇黔路也可以两头开工。

十六、对沿海工厂搬家热心些，积极性越高越好，哪怕是粗糙一点也好么！

十七、我的服务人员有几十个，现在减下来了，减到八个人，还可以减秘书、服务员、医生各一人，剩五个人。

十八、我跟军事学校的学生毛远新（他是我的侄儿，干部子弟，烈士家属）讲，你们啥事情也不懂，马牛羊，鸡犬豕，稻粱菽，麦黍稷，什么都不懂，你们到农村搞一个冬春。

毛泽东还说，文化团体也要赶下去。文化部可以改为“帝王部”，最好取消。农村工作部可以取消，为什么文化部不可以取消？^①

当天，陈伯达对国家计委来人口述了对计划工作的四点意见，并转报毛泽东。

同一天，毛泽东在北戴河同正在这里参加华北学习会的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等人谈话，向他们征求对刘少奇 16 日来信的意见。

李雪峰说，大家认为那样做牵涉太大。

陶鲁笳说，现在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已经铺开了将近 4000 个点，如果今冬一个地委集中搞一个县，已经铺开的点，大部分都要把工作队从半路上撤回来，这样做贫下中农很不满



毛泽东和罗瑞卿在北戴河谈话。

^①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 605~607 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1227 页。

意。他提出按刘少奇的做法，有十大缺点。华北的同志不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但讲得比较婉转。他们说，每个县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河北 141 个县，如按这个进度，五年才能搞一半；应主要搞落后区，一般地区可先在面上搞。

毛泽东说，少奇同志的信，我已经批了，中央讨论后发了，你们不赞成，怎么办？

李雪峰提出，是否到十月工作会议再议？

毛泽东当场打电话告诉邓小平：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

毛泽东还打电话给正在昆明的刘少奇，告诉他由于华北几个负责人对运动部署的建议有不同意见，请他回北京立即召开大区书记会议就社教运动如何进行的问题再议一议。刘少奇即中断了行程。^①

毛泽东对李雪峰说，你带两个炮手（陶鲁笳、刘子厚）去，准备南北打一仗。华北明显地意识到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的办法。^②

当天晚上，毛主席接见了以肯尼亚新闻、广播和游览部长阿钦·奥内科为首的肯尼亚友好代表团，并同他们进行了谈话。

晚上，毛泽东回北京。

8月22日，毛泽东将刘少奇19日报送的“桃园经验”和中央批语稿，交邓小平，并告诉他等大区书记会议以后再处理。

26日，刘少奇回到北京。

27日，刘少奇找李雪峰、陶鲁笳、刘子厚谈话。据陶鲁笳回忆，刘少奇不但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还对他们提出了批评。南北打一仗的情况没有出现。

8月29日至9月1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召开。刘少奇在会上阐述了他的意见。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支持刘少奇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性的发言。

30日，毛泽东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说，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355~1356 页。

^②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 年 1 月第 1 期，第 64~65 页。

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他说，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样做法好？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毛泽东话中有话，实际上对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是有意见的。^①

9月1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结束。会议同意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意见；同意将“桃园经验”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下发，并通过了刘少奇起草的转发批示。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356~1357页。

五十 视察“四清”运动

1964年8月29日，毛泽东与薄一波、李富春、陈伯达谈计划工作。

毛泽东批评基本建设战线，说了十来年了，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就是不做。他提议，组织一个（经济统帅部），六个经济口的人参加，富春、一波、先念、震林、荣臻、瑞卿，加上少奇、小平、总理、彭真、伯达，连我12人。

毛泽东说，我给富春说，我是当面讲，你们革命好，不革命也好，今明两年再不改，要另立机构。^①

30日，我党发出致苏共的回信，明白宣布我们坚决反对苏共召开分裂的国际会议，绝不参加这个会议。

同一天，毛泽东与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中南局书记陶铸、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等谈话。

毛泽东说，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毛泽东主张搞一个总司令部，他说，现在经济工作不统一不行。^②

毛泽东准备离京南下，出发前，他在住所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

毛泽东提出要继续发表反修文章。他说，我们7月14日发表了“九评”，从这以后到现在已经快两个月了。他问吴冷西原来计划要写的“十评”准备得怎么样。吴冷西告诉他，“十评”正在准备，主要是讲中苏关

^① ^②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607~608、608~609页。

系，包括边界问题，但是边界问题准备写专门文章来谈，“十评”中只涉及原则性的问题，具体细节不谈。毛泽东说，要继续准备，在我们发表“十评”之前，可以陆续发表左派兄弟党的反修的文章。

在这次常委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赫鲁晓夫已下决心召开国际会议。毛泽东问，苏共定在12月召开筹备会议，是让它开成好，还是开不成好？有些同志觉得，要使他们开不成，要发动各方面的力量来反对开会。毛泽东说，依我看，还是要他们开成好，因为他手里拿着这么一张王牌，经常用来吓唬我们，那个会议一开，他们手里就没什么牌了。

会上也谈到左派各兄弟党的态度，分析了各党的情况。

这次常委会议上还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即我们国庆15周年庆典是否按照过去的规矩，即逢五逢十庆祝活动热闹一些，请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派代表团来参加，也请亚洲、非洲一些民族主义政党、民族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来参加。在讨论过程中，有的同志说，考虑到现在公开论战吵得这么厉害，是否请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都来参加值得考虑。如果大家到北京来大吵一通，也不是个办法。后来周恩来（他住院做手术，刚出院不久）提出，可以考虑都请，请社会主义国家派代表团来，也请一些亚洲、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其他兄弟党，能够来的也可以请他们派人来，但不一定都是第一把手。开庆祝会的形式，就是我们自己讲话，其他兄弟国家发来贺词、贺电，我们在报上发表。在庆祝大会上，所有外国人都不要讲话，这样就可以避免在会上吵起来。毛泽东说，看来可以这么办，大家再考虑一下，因为还有时间。按惯例，逢五逢十是大庆，今年因为有公开论战这么一个因素，是不是还照样大事庆祝，可以再研究一下。

周恩来还谈到，因为今年是国庆15周年，专门委员会（即负责研制核武器的委员会）已认真讨论，准备争取在国庆节前或者国庆节后，爆炸一个核装置，就是首次核试验。技术上的准备已经完成，什么时候爆炸，这决定于气候的因素。总理说，虽然这个核装置不大，但是一旦爆炸，就说明我们第一次核试验成功，自己会做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第五个能爆炸核装置的国家。这可以让大家高兴高兴。这也向全世界显示：尽管苏联不给我们样品，把专家撤走，把数据、图纸拿走，但是我们还是自力更生搞出来了。这对赫鲁晓夫也是一个示威。

周恩来问：是不是可以在国庆节前后实现爆炸？当时大家认为，能够在国庆前后爆炸最好。毛泽东说，主要看准备情况，不要勉强，要一切都准备好，万无一失，然后爆炸。不要抢时间，宁可在国庆节之后，甚至迟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都可以，不要匆促行事。^①

9月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外地视察“四清”运动。

专列途经邯郸停车休息。

2日3时，专列离开邯郸。

3日，专列抵达武汉。毛泽东此次是来湖北调查“四清”运动开展情况。毛泽东问王任重，大区会议的精神是什么？

4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团团长宋西·德沙坎布和副团长巴色·西沙隆以及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的主要演员，同他们进行了谈话。

毛泽东说，我这个人有缺点、有错误。20年前我就讲过，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可是这15年我们没有很好抓，这还不是怪我不行，现在我改正错误。^②

毛泽东批评文艺界通统演古的，表演的戏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就缺乏反映工农兵的，反帝的。谈到京剧现代戏，毛泽东说，这是少数，是开始。

毛泽东说，政治教育是一切教育的中心，教育青年是个大问题。如果我们麻痹睡大觉，自以为是，资产阶级就会起来夺取政权，资本主义复辟。马克思主义不克服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就克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进行复辟，挂共产主义的招牌，实行资本主义政策。你们要知道，这个问题十年几十年也不好解决。^③

6日，毛泽东找王任重谈话，其中说，15年了，我们的经济工作还没有总结起经验，希望总结经验，在这个基础上对经济工作实行彻底的革命。关于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毛泽东主张中央有个领导小组，加上各大区书记，来实现计划经济的统一领导，表示自己年岁大了，情况又不明，是不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 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815~819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227页。

③ 高凯、于玲主编：《毛泽东大观》第661页。

是能够领导起来？^①

9月7日，专列离开武汉到长沙。

毛泽东同张平化、华国锋、李瑞山三位书记做了长篇讲话。

毛泽东说，与华国锋同志谈过两次话，有帮助。当时你说在四个方面钻了牛角尖，说人的体力差了，地瘦了，畜力弱了，茬口乱了，结果1962年的收成超过了估计，增产九亿多，讲的老实话。

毛泽东说，有两种人，一种讲真话，一种讲假话。

毛泽东说，不要反瞒产。瞒产20%，无非也是养猪、养鸡鸭，大队、小队、社员都有点存粮好。公开让瞒产。增产就增购，不好。反瞒产是最笨的办法。粮食本来是农民的，他不会把粮食丢到地里腐烂，有的要上自由市场卖。干部瞒着社员私分是不对的。

毛泽东说，你们单一经济转得如何？只搞粮食不搞棉麻？棉花湖北能种，湖南不能种？常德地区能种，湘潭地区不能种？有的私人种，集体也种，关键在教育干部。

毛泽东说，嘉禾（县）不多产粮，多种了经济作物吗？分到私人的山，种树吗？

毛泽东说，山收回集体不乱砍？能植树吗？所谓乱砍有两种，一种连根砍，一种砍得留下很少树枝了。要依靠集体造林。人还是这些人，要把他们的思想讲通，少数为私，多数为公。国家干部有薪水有饭吃，搞什么私？公社干部以上要为公。

毛泽东说，（林场）所有权是生产队的，公社经营哪里来劳动力？公路、河流两旁要植树，运输便利。湖南有湘、资、沅、澧四大河流，有不少的支流，可以放木排，云湖水银田到麻石桥以下都可以放木头。造林不要只造一种，用材林有杉树、松树、梓树、樟树。桑树湖南不多，湘绣有名，但不产丝。桐油以后搞它100万担。瞒产10%到20%，动物吃，留储备。粮食、经济作物、山林，都要搞好。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教育十年可以搞得完吗？十个地委，每个地委搞一个县或半个县，有了经验，培养了骨干，以后就可以快些。

“六十条”下去以后，群众讨论反映说，这样大的事情还和我们商量，

^①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609页。

过去种田的事情农民不能管，没有种田的人管种田。下去蹲点很要紧，是转变作风的关键，不管哪一行业，都要摸清情况，才能有正确的政策。

毛泽东对湖南同志说，你们为什么对中央不批评？中央的人也是一分为二，有比较好的，有比较不好的，越到中央，越脱离实际，越没有知识。

毛泽东说，此次中央工作会议开了五天，各中央局同志要求谈中央与地方的矛盾问题。过去放得太多，什么都下放，现在中央又管得太死。有一个部长，一万元的修补费都不能批。有的旧厂，投资一万元、十几万元，就可以设备更新，不给。而要搞一个中等的新厂，要花几百万元，就可以。制度不合理，不违反是错误的，错误的东西要顶住。一切正确的东西是下面来的，工人、农民、技术干部、支部书记，我们请教了他们，才有一点知识。正确的东西就是从他们来的嘛！自以为什么都懂，其实什么都不懂。

毛泽东说，制度有正确的，有错误的，“双十条”还在改嘛！计委、经委工作没有一个章程，要求他们搞出来。文化、教育也要革命，学生越读越蠢，离了书本还是书本，离了概念还是概念，越学越蠢，特别是文科。这一代是吃蜜糖长大的。一参加劳动，当兵，身体也好了。

机关里的年轻人，要他们做那样多的工作？搞半天工作，半天学习或劳动。不读一点书，学一点本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不足畏矣！”他们只知道扫地、倒茶水，招呼老爷。这些服务人员有几百万，一个县有几百上千人。武昌县30万人，有800人。搞那么多人做什么？领导不办事，科员当政。我的文章，一定自己写。害病就自己讲，别人记，记后再修改。1947年12月25日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讲，江青记录的。不要搞那么多的秘书、公务人员。我过去官也不小，中共中央的委员，国民党中央的候补委员，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从广州到长沙，一个人也不带，经过坪石，雇了一个挑夫。从长沙到上海，从上海到广州，都不带一个人。还得大批精简下去，或者去读书。不然，人多了，吃了饱饭要革命，就多搞报表，多开会，打电话。

不要读那么多的书。大学没有课本，只准抄。抄了，背了，考了，就完了。搞个课本嘛！让学生自己看，你讲几句就行了，讲要点，出题目研究，所有的大学生都应当是研究生。要允许学生提怪问题，允许标新立异。打五分的并不见得不好。北大一个女生，不抄讲稿，平常考试最差，毕业考试是文科第一名，大家奇怪，因为是她自己用心研究学的。我的办法是从

不争多少分，我的品行分数都不好。有人说要开除我，王人美的父亲是数学教员，不主张开除。肖楚女，一天学校也未进过，是武昌茶馆里跑杂的。在广州当教授，是农民讲习所的主要教员，会讲帝国主义，有讲义。当时农民讲习所的考试方法不是突然袭击，出题目讨论，答了以后由肖楚女写出答案，分给大家对照讨论。学习就是搞清思想嘛！先生也不一定完全正确。一师有个湘阴的柳先生，借给我《资治通鉴》看，《文选》、《红楼梦》也是这个时期学的。有一个先生可厉害啦！给我下不去，我也给他下不了台，乘此机会我写了一篇文章，引王安石的话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惜”，后来这位先生还公道，说我的文章做得还好。不管对先生也好，对家庭也好，要斗争。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主要从老百姓那里找知识，要接近工人、农民和工农出身的干部。修正主义说我个人独裁，只有我说得对。其实，我就不相信我的都对，我说的都是别人的，如三分之一、十大问题，都是别人告诉我的。

马列主义是从无产阶级来的，是总结了无产阶级一两百年的斗争经验。^①

9月8日，专列离开长沙途经南昌，毛泽东同江西省委负责同志谈了话。

9日，专列抵达杭州。

毛泽东住在刘庄。这期间，他数次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罗瑞卿等同志参加的会议。

当日，毛泽东给康生写信：

康生同志：

请你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一些美国历史给我。不要大部头的，如《美国全史》之类，只要几万字的，十几万字的，至多到卅万字为止。其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不知能找到否？费神为盼！

毛泽东

九月九日^②

^①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127~130页。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609~61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159页。

9月10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在北京展出的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法国技术展览会名誉主席乔治·皮科和夫人，法国技术展览会执行主席杜阿梅和夫人，法国实用电子公司秘书长贝尔纳·戴高乐等人，并同他们进行了谈话。

毛泽东说，搞经济我们没有你们有经验。搞社会主义经济经验还不够。我们正在制订计划，还未制订好，以前订计划方法不对头，都是从外国来的，到现在还未改过来。中国是不发达的国家。

毛泽东说，我们很欣赏法国这种独立政策。不能跟着少数大国转，它们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世界在变化，不是一两个大国所能管住的。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来管，不能允许任何外国人干涉。^①

11日，毛泽东对利瓦伊汉在民族宗教问题上主要言论摘录作了批示：

徐冰同志：

希你坚持阶级立场，团结大多数同志，叫他们千万不要动摇。

毛泽东

九月十一日^②

12日，毛泽东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同一天，毛泽东在杭州与计划领导小组同志进行了谈话。

毛泽东说，工作方法，这是思想问题。问题是思想从哪里来的，始终没有搞清楚。计划是从哪里来的？我看是俄国的书本，再加上自己脑筋的“想当然”。我看要上谋中央、下谋前后左右。^③

13日，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李富春建议，成立以毛泽东、刘少奇两主席挂帅的国民经济统帅部。李富春提出，要争取七到十年时间改变目前工业布局的面貌。

当天，毛泽东会见并宴请了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等一行。

15日，毛泽东离开杭州。

^①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611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4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160页。

^③ 毛泽东1964年9月12日与计划领导小组同志的谈话。

专列途经上海，毛泽东在上海锦江俱乐部听取了上海青年京昆剧团赴西欧演出的情况汇报。

根据中央的指示，国庆节快到了，邀请的外国客人也陆续到来，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暂不发表我们自己写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文章，也暂不转载其他兄弟党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文章。

这一天，中央以毛泽东的名誉向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家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发出邀请信，邀请他们派遣代表团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5周年国庆典礼。

17日，毛泽东对有关赫鲁晓夫攻击毛泽东谈话的一个材料作了批示：

刘、周、彭、朱、陈阅，退毛。

还是上一次谈过的老话。以威胁为防御。色厉内荏。

全世界多数舆论，都不以为然。

毛泽东

九月十七日^①

9月18日，毛泽东离开上海。

19日，专列途经南京。

毛泽东在南京接见了刚果（布）工人联合会领导人、刚果（布）国民议会第一副议会长坎布·儒利昂和夫人。

晚上，专列途经济南。

20日中午，毛泽东在济南接见了阿尔及利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谈话。

毛泽东说，过去有一个时期我们不重视农业和轻工业，就发生许多问题，粮食不够，轻工业品不够，吃、穿、用都不够，恰好这些是广大人民生活的必需。同时，这两个方面是积累资金的主要来源。要自力更生，非积累资金不可，靠帝国主义是不行的。有些兄弟国家把专家撤走，这一来我们不得不自己干。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164页。

技术、资金从哪里来呢？任何外国不贷款给我们，我们也不愿向外借。技术从哪里来？都得靠自己。当然从外国购买一些技术，如我们从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日本进口一些技术，但是要付款，不然他们不给，只好把建设拖长一些。要很快建设先进的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是困难的，把时间放长一些就可能了。过去我们在国内发公债，现在不发了，正在还。我们欠苏联的外债，明年就可还清，明年再还 1700 万外债就没有了，至于内债，国内公债到 1968 年就还完，现余很少了，欠了一身债日子是不好过的。

毛泽东说，中国现在还不行。中国经济上还没有站起来。大概再有一百年，那个时候他们就可以区别中国人和日本人是不一样的，看起来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是黄脸皮，但是两个民族。^①

下午，专列离开济南继续北上。

晚上，专列到天津。

翌日，专列离开天津，当天回到北京。



1964 年 9 月 21 日，毛泽东视察归来在北京站与乘务员合影。

^①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 611~612 页。

第十章

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



- 重上井冈山
- 滞留南方

五十一 重上井冈山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的“四清”工作路线受到了批评，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毛泽东对怎样具体地推进“四清”运动很少再谈起。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出现这种变化，并不是由于他认为“四清”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恰恰相反，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和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使他对不少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以至同群众相对立的问题越来越感到忧虑。他十分担心：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便不能巩固，甚至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他已透露出这种想法：“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也就是说，他在考虑单靠城乡“四清”运动仍不足以使问题得到全面解决，需要寻找出一种能够全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他阅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

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接着就批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话：“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陈正人在信中还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毛泽东又写了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引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然而，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自1959年以来，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估计、农村“包产到户”等意见分歧，一步步积累起来，更使他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他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毛泽东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还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

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注重点有了很大变化。这从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的几句极不寻常的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二十三条”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点出了这个问题。

但对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毛泽东并不是很快就能下定决心。他还需要时间，需要继续观察和反复思考。所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只是含蓄地提出问题，并没有把他的全部想法说得更明白。“二十三条”虽然提出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它指的是哪一级的“当权派”，更不知道它所指的是什么人。^①

1965年3月1日至5日，苏共勃列日涅夫召集了一个所谓“协商会晤”，10日才发公报。

12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起草评论文章。

3月14日，毛泽东会见了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主席默·威廉斯和他的夫人，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席爱弗希尔和由他率领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代表团，毛泽东同新西兰、澳大利亚同志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并设宴招待了他们。

当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方，18时，专列途经邯郸休息。

15日15时15分，专列离开邯郸继续南下。

这天，评论苏共“协商会晤”的文章《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写出初稿，翌日做了修改。因为毛泽东已到武汉，初稿和几次修改稿都在当天派人乘飞机送去。毛泽东对起草过程都了解。

16日，专列抵达武汉。毛泽东住东湖梅岭一号。在汉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毅、贺龙、林彪、谢富治等先后来汉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388~1391页。

汇报工作，其中周恩来三次，邓小平、陈毅各两次，毛泽东在汉分别召开了几次会议，还接见中南局扩大会议代表。

17日，毛泽东秘书从武汉打电话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说，（《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文章的题目要改得醒目一些；整篇文章很长，应该分几节，每节加小标题，也要醒目一些。^①

下午9时，毛泽东就《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一文作了修改和批示：

退康生同志：

已阅，同意。并同意你们明天回北京。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下午九时^②

18日凌晨4时，毛泽东对《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稿作批示：

小平、彭真、康生同志：

今天，你们如能留一天，我还想同你们谈一次。请酌定。

毛泽东

三月十八日上午四时

再请韩先楚、陈再道两同志留两天，十九日谈一次，二十日飞京，不知是否可能？请韩、陈二同志酌定。^③



1965年，毛泽东在武汉。（摄影/钱嗣杰）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 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922页。

②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346、348~349页。

下午，毛泽东同邓小平、彭真、康生，在毛泽东处研究《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文稿，决定加上小标题：

- （一）这是一个什么会议；
- （二）苏共新领导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 （三）回答几个问题；
- （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的轨道上团结起来。^①

当天，修改后的文稿再送毛泽东审定。

在这两次修改过程中，除了题目、标题以外，比较重要的修改还有三点：

第一，对苏共新领导讲得尖锐一点，既揭穿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但是又区别于美帝国主义，没有说他们跟美帝国主义已完全一致。

第二，文章的基调不变，但是删去了一般人难于接受的和说得不那么准确的词句，不把问题说得太绝对。

第三，还是抓团结的旗帜。虽然他们召开分裂会议，但我们还是要强调团结。苏共新领导上台以后，口头上也讲团结，也讲革命，也讲反帝，但实际上做的与此相反。我们在揭穿他们的假象的同时，要高举团结的旗帜、革命的旗帜、反帝的旗帜。

毛泽东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要联络部请一些在北京的外国专家和兄弟党的代表到武汉，说他要征求他们对这篇文章的意见。美国专家爱泼斯坦、柯弗兰，英国专家艾德勒和一些亚洲党的代表都到了武汉。^②

3月19日，毛泽东同韩先楚、陈再道谈话。

同一天，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别墅同美国专家爱泼斯坦、柯弗兰，英国专家艾德勒和一些亚洲党的代表座谈，征求他们对《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文稿的意见。

毛泽东向他们提出三个问题：

- 第一，发表这样的文章有没有必要，要不要发表；
- 第二，发表了有没有危险，有什么坏处；
- 第三，这篇文章有什么地方不妥当，需要修改和补充。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349页注1。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922~923页。

毛泽东跟爱泼斯坦比较熟，首先对他说，你看有没有必要发表这个东西？

爱泼斯坦说，很有必要。我们过去一直讲，如果他们要开分裂会议就怎么样怎么样，讲过多次。现在他们开了会，我们一声不响不好。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有许多人对苏共新领导，对勃列日涅夫还有幻想，希望他改变赫鲁晓夫的做法。苏共新领导虽然没有说他要改变赫鲁晓夫的做法，但最近以来他们口头上大讲革命、大讲团结、大讲反帝，这就给人一些假象，好像他们真的是要改正。所以现在很需要有一篇文章，通过对三月会议的分析，来揭穿苏共新领导的真面目，揭穿他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毛泽东说，你说得蛮有道理，但是我们发表这篇文章有没有危险呢？有没有坏处呢？这得认真想一想。

有些客人提出，这篇文章讲得很尖锐，旗帜很鲜明，直截了当地戳穿了苏共新领导的真面目，但是，恐怕有些人还接受不了，因为他们对苏共新领导还存在一些幻想。另外一些客人觉得，现在是有一些人存在幻想，但是正因为有人存在幻想，所以需要把苏共新领导的假象加以揭穿。文字是尖锐了一些，可以略加修饰，但是恐怕还是比较鲜明地揭穿他们的假面具比较有利。

毛泽东说，要想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自己要旗帜鲜明。我们的基调就是要揭穿苏共新领导，个别地方讲得太尖锐的，可以改得稍微含蓄一点，但是整个基调应该是旗帜鲜明、尖锐泼辣。

美国专家柯弗兰说，中文里面讲“挂羊头卖狗肉”，直译成英文，人家不懂。

毛泽东说，是呀，中国成语外国人看不懂，怎么办？

柯弗兰说，澳大利亚党的领袖希尔曾经说过他不懂这句成语。现在我们想了一个代替的成语，英语里面有一个成语，叫作“把马肉当作牛排卖”，意思跟“挂羊头卖狗肉”是一样的。

毛泽东笑着问：西方人吃马肉吗？

柯弗兰说，战争时期是吃的，那个时候牛肉很贵，马肉比较便宜。

客人们都笑了起来。一位亚洲党的代表说，我们知道毛主席喜欢吃狗肉，我们以为毛主席不会同意用“挂羊头卖狗肉”这句俗语，因为这里贬

低了狗肉。

毛泽东说，我过去是不吃狗肉的，上了井冈山以后才慢慢吃起来，而且觉得挺香。

有一位客人再补充说，现在发表这样的文章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西方的舆论认为，召开三月会议是苏共新领导软弱的表现，不是他强大的表现。我认为这个看法是对的。现在他们处于弱势，我们正应该乘胜追击，不让他有喘息的机会。

毛泽东说，你的意思是不是我们以后要大张旗鼓地反修？这恐怕值得考虑，要多加斟酌。苏共新领导和赫鲁晓夫有所不同，这就是他们刚刚上台，新干的坏事还不多，过去许多坏事他们可以推到赫鲁晓夫头上。我们要抓到他们新干的坏事，才能批评他们。如果我们把批评赫鲁晓夫的老话再安在他们头上去，就不得人心，别人不会接受。

亚洲党的一些同志表示赞成这篇文章的基调，认为很有必要，而且要乘胜追击。

毛泽东说，可能有一些人对一些比较尖锐的语言一时接受不了，这不要紧。只要我们讲得适当，过一个时期他们自己也会知道是正确的。现在

大概还有不少人喜欢语言温和一点，但是过一个时期连他们自己也不那么温和了。前一个时期，在反修斗争过程中就有这种情况，有过一些同志劝我们多加糖少加辣椒，后来他们自己也加辣椒了，也讲得很尖锐了。

一些外国客人提出的意见中，还有一点很受毛泽东重视。这就是他们觉得，这篇文章还可以多讲一些团结的话，把团结的旗帜拿在我们手里，要更



1965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摄影/钱嗣杰）

多地强调团结大多数，强调亚非拉美人民的革命团结。

对这个意见，毛泽东很称赞，他对当时陪同外国客人到武汉去的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说，把这个意见带回北京，请北京的同志再议论一下，看看在什么地方需要强调团结的，写得更突出一点。这个意思在修改过的稿子中已经有所加强，但还不够，还可以考虑再加强一点。

赵毅敏回到北京以后，就在3月20日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会议上，把毛泽东在武汉会见外国客人时谈的意见作了汇报。在会上，当场对文章做了一些修改。关于怎么样更强调一下团结的问题，邓小平要我们在会后在文章末尾再加强一些。^①

21日，把《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文稿通改一遍，特别在末尾一段谈团结的话，更加加强了。修改以后，邓小平又召集书记处会议讨论定稿。然后分送周恩来、刘少奇和在武汉的毛泽东。

3月22日，毛泽东回电话说，没什么意见了，可以发表了。刘少奇和周恩来只改了个别词句。这样，文章在22日最后定稿。^②

23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评莫斯科三月会议》。

这天，毛泽东接见了由哈桑·穆拉维德率领的叙利亚访华友好代表团。

26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

4月9日，毛泽东在杨成武关于坚决打击美国军用飞机入侵海南岛上空的挑衅活动的报告上批示：“美机入侵海南岛，应该打，坚决打。”“海军应该调强的部队去，不够就由空军调强的部队去。美机昨天是试探，今天又是试探，真的来挑衅哪！既来，就应该坚决打。海军航空兵和空军应该统一指挥，海军和空军应该很好配合起来打。”^③

同一天，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在成都去世。

4月上旬，在广州的罗瑞卿要回北京去参加军委作战会议。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拟先到武昌向毛主席请示作战会议的问题，然后再到上海去向林彪请示。”

①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 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923~926、927页。

③ 杨肇林：《建立强大的海军》第257页。中国军事博物馆编著：《毛泽东军事活动纪事 1893~1976》第938页。

不久，毛泽东秘书回电话说：现在不要来，也不要来上海，先回北京开两个星期的会，以后，再分别到主席和林彪处去请示。这样，罗瑞卿直接去了北京。^①

11日，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追悼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送了花圈。

当天，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了阿联总统外事顾问佐勒菲卡尔·萨布里。

毛泽东说，至于经济建设，无论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在开始时，我们是没有经验的。社会主义，我们没有搞过。现在搞了15年了，可以总结一些经验。讲成绩，有一些，不大，中国在西方人看来，仍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他们看不起我们。但是，我们这些国家是相互看得起的。

毛泽东说，我们主要是靠自己的人力、资源、市场，以此为主，国际贸易为辅。

毛泽东说，至于国内的困难，找出了原因就可以逐步解决。早几年，我们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油不够。别人又不帮忙，外国把专家一撤退，有那么两三年老天也不帮忙。现在，我们恢复过来了，粮、油、棉都多起来了，自己能供应石油，机械自己能供应90%以上。还有一部分，目前还不行，没有那个原料，有的不会制造，要向别国学。买一部机器来，照样子就可以制造。^②

4月13日，毛泽东批准了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指示稿说，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我们已经向全世界一再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我们绝不能置之不理，我们准备随时同越南人民一道共同战斗。我们还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火引到我们的国土上来。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加强备战工作。在全党县委以上的干部中，应当加强备战思想，密切注意越南战局的发展。要估计到敌人可能冒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应当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准备对付美帝轰炸我国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我们的国土上作战。我们必须把情况设想得严重一些，把备战工作做得充分一些，特别是在重要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要切实做好对付敌人空袭的准备。我们对

① 舒云：《大将罗瑞卿》第25页。

②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625页。

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①

当天，毛泽东在武汉会见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外交事务顾问侯赛因—佐勒菲卡尔·萨布里和夫人及随行人员。

14日，经过毛泽东同其他领导人反复商议，中共中央发出了经他审阅同意的《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当天，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接到汪东兴的电话：“平化同志，请你马上到武昌来。”张平化急忙乘车到武昌。毛泽东问张平化有没有时间？能不能陪他一道上井冈山？张平化一口答应下来。毛泽东委托张平化回去，为他上井冈山做准备。^②

毛泽东还要汪东兴打电话给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工业的白栋材。

汪东兴说：“栋材啊！主席准备到江西去。他说，‘江西的白栋材不在家啊，我去后要找他’，你要有所准备哟！”^③

21日，毛泽东接见了中南局第九次全体会议的代。毛泽东说，搞“四清”，要把民兵搞好。首先要落实组织。有没有队长、班长？组织起来没有？首先是有没有，然后讲政治。民兵，第一是组织，第二是政治，第三是军事。^④

4月28日至29日，贺龙、罗瑞卿、杨成武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备战计划。

毛泽东在同他们的谈话中指出：战争仍有发生和不发生两种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做到有备无患。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现在蒋介石是想保住老本钱，什么反攻大陆都是假的。”“不仅蒋介石是机会主义，美国也是机会主义，它才不那么冒险哩！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它都是等人家打得差不多了才出兵。当然，我们要准备他们冒险。”

关于改变人民解放军的帽徽、领章问题，毛泽东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359页及注1。

②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273页。章重：《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第403~404页。

③ 章重：《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第407页。

④ 高凯、于玲主编：《毛泽东大观》第665页。

了。”他还说，“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

汇报完后，毛泽东又提到了1960年在三年困难时期，林彪与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关于军队干部能不能向地方干部提意见一事发生争议。毛泽东当着罗瑞卿的面，谈这件事已是第二次了。当时，毛泽东支持了林彪，但后来修正了意见又转而支持了罗荣桓。使事情越发趋于复杂。

这一次，毛泽东对罗瑞卿说：“我就不同意林彪的那个意见，说军队干部对地方干部有意见，不能提。”“地方和军队，哪能分得清？”^①

29日，毛泽东对棉花收购、分配和战略储备情况摘报作了批示：

此件可阅。形势大好。

毛泽东

四月廿九日

我今日离此去别地爬山。又及^②

毛泽东离开武汉前，在梅岭一号草坪分别与警卫人员、工作人员合了影。



1965年5月，毛泽东在住地后山上了解茶叶生长情况。
(摄影/钱嗣杰)

当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武汉。晚上11点，到达长沙，住省委九所三号楼。

在长沙，毛泽东除了调查了解湖南工作情况之外，就是准备重上井冈山。正在这时，接受陪同任务的张平化患了阑尾炎。毛泽东知道后对张平化说：不要慌，先治病，我可以在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91~1392页。章重：《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第398~39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361页。

这里等一段时间。毛泽东还建议他开刀。毛泽东派汪东兴、华国锋打前站，先从衡阳、耒阳方向和株洲、醴陵、茶陵方向各探了一回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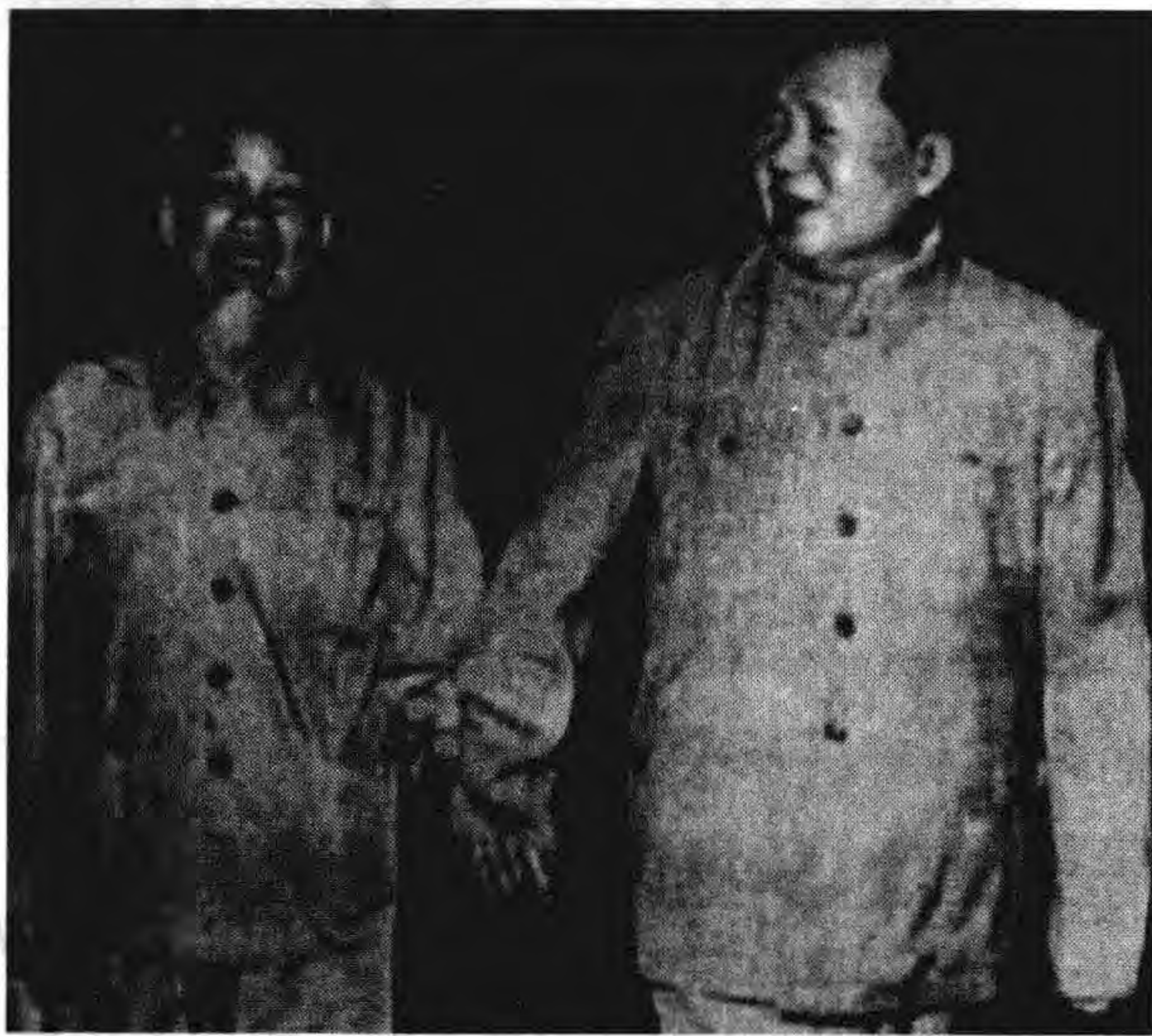
在长沙，毛泽东找省委同志谈过两次话，讨论湖南的工作规划、农业生产和水利问题，研究湖南农业怎样才能旱涝保收。

毛泽东因患感冒，身体不适，暂留九所休养。另一方面，当年中苏关系紧张，需观察动向；在党内，也有人劝主席退居二线。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在湖南向我们保卫人员谈过这类问题。^①

毛泽东在长沙的伙食很普通，通常是四菜一汤，外加一块烤红薯和苞谷，有时饭内还放些蚕豆、川豆等杂粮。毛泽东对服务人员说，吃杂粮，我习惯了。现在全国粮食都很紧张，大家都吃杂粮，我怎么不能吃呢？^②

5月2日，罗瑞卿到上海向林彪汇报。林彪对罗瑞卿、贺龙先去武昌不满。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接见了秘密来华的越南胡志明主席。毛泽东对胡志明说，我们是一家人嘛！你说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胡志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这是越南北方要抢修的12条战略公路的绝密示意图，请求中国党和人民给予支持。毛泽东当即答应了胡志明代表越南人民提出的



毛泽东和胡志明在一起。（摄影/钱嗣杰）

要求。胡志明离开长沙时，赠送了一些芒果给毛泽东。毛泽东转送给湖南省委的同志每人一个。^③

5月11日23时30分，毛泽东对《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作了批示：“请徐秘书用电话告总理，同意发表这个声明。毛

① ② ③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246~247、149、145~146页。



1965年，毛泽东与湖南省委、省公安厅负责人在长沙合影。（摄影/钱嗣杰）

泽东五月十一日下午十一时半”^①

12日，北京召开群众大会，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斗争。

这一天，毛泽东对《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作了批示。

5月中旬，中央军委召开备战会议。毛泽东对一旦战争爆发后应该采取的作战方针、加快大小“三线”的建设、现代化武器的研制、军事资材和粮食的储备等，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很周密、具体。^②

18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了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阿布德。

21日上午11时，毛泽东乘专列出发，起程去井冈山。

下午1时，在株洲醴陵阳三石车站下车，换乘吉姆轿车经攸县渡过洣水河，下午4时40分，到达茶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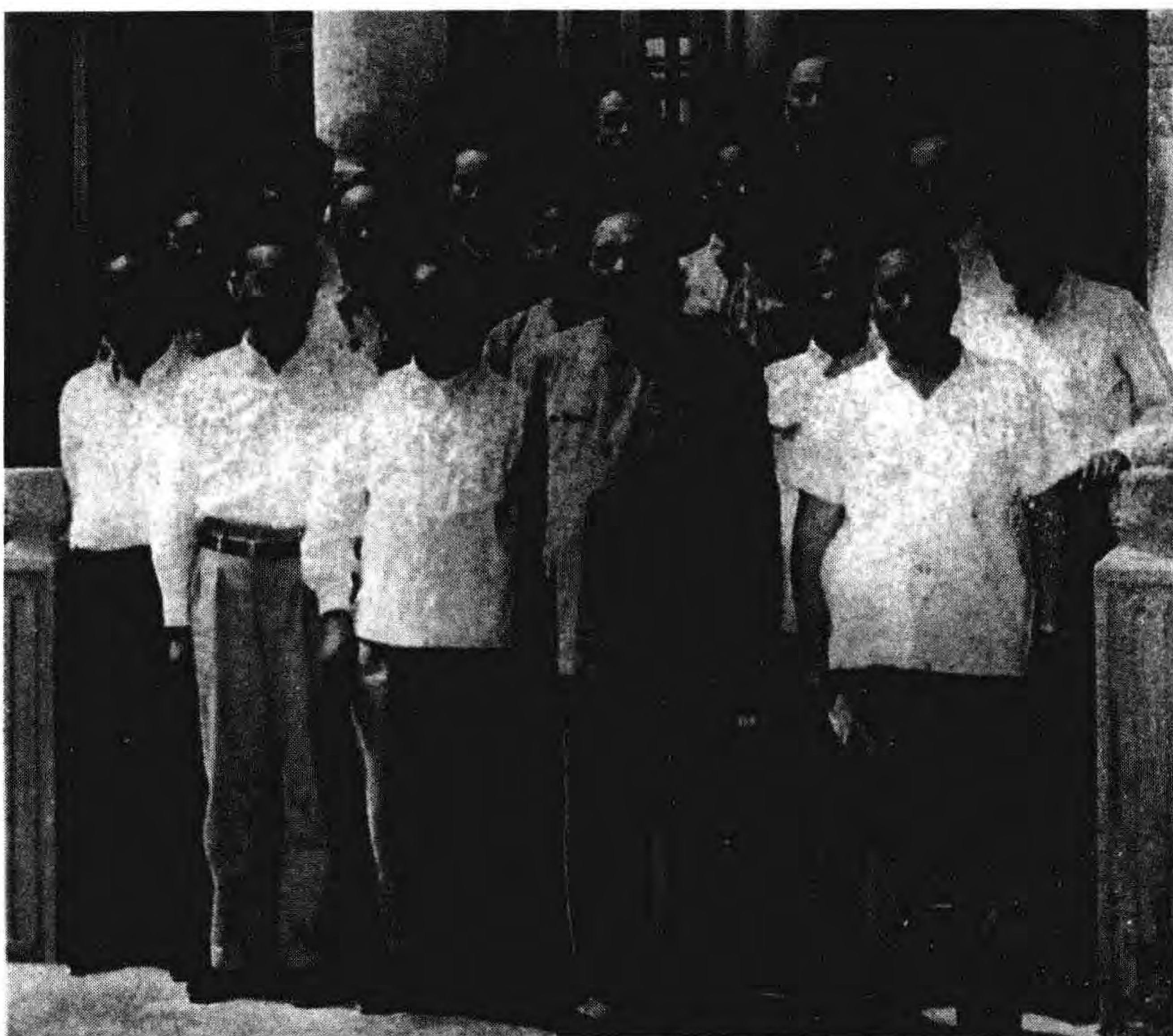
当晚，毛泽东就住在茶陵县委常委办公楼。晚上，他顾不得一天的旅途劳累，查阅了《茶陵州志》。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36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92页。



1965年5月21日，毛泽东在井冈山茶陵县与县委同志合影（左六张平化、左四汪东兴、左七徐业夫、左三李强）。（摄影/钱嗣杰）



1965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永新县招待所（左一王卓然、张平化、刘俊秀、毛泽东、汪东兴）。（摄影/钱嗣杰）

5月22日一早，汪东兴转达茶陵县委领导的要求，希望能见见主席。毛泽东说：当然要见嘛！路过一次茶陵也不容易。38年前，路过茶陵时很狼狈。那时我们秋收起义的队伍一部分被敌人追赶着，一部分被敌人阻截着，到茶陵吃住都很困难，这一次可完全不一样！^①

上午九时半，毛泽东同县委常委们会见并合影留念，然后出发。

12时30分，到江西永新，午餐后，14时从永新出发直奔井冈山。

途经宁冈县境，根据毛泽东的要求，绕道几公里，特意看了当年住过，并召开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茅坪。汽车未停，绕八角楼一圈，继续上山，至黄洋界。

毛泽东下车站在黄洋界上，他让汪东兴看看，还有没有当年工事的痕迹。毛泽东和张平化夫妇在黄洋界合影，然后出发去茨坪。下午6时，抵达目的地井冈山茨坪。

毛泽东在茨坪宾馆住了七天。在茨坪，张平化向毛泽东提议，抽时间向他汇报一下湖南的社教运动情况。毛泽东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②



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电影资料）

5月23日下午，毛泽东要汪东兴办两件事：

一、拟一个电报给中央、周恩来，告诉他们我已安全抵达井冈山，请他们放心。这里山高路远，如没有急事暂不要送文件来。

二、安排工作人员和专列上的工作人员，还有湖南的同志分批参观一下井冈山。最好请

①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259页。

②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131、26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91页。

当地熟悉情况的同志帮忙介绍一下情况，让年轻人增加些历史知识。你抽时间去参观一下井冈山博物馆，回来向我讲讲展览室的情况。

电报经毛泽东审批后发出。^①

5月24日午饭后，毛泽东外出散步。汪东兴向他汇报了井冈山博物馆的情况。毛泽东谈了当年在井冈山几支部队的情况。



1965年5月，毛泽东、张平化、王任重等在井冈山。
(电影资料)

25日下午2时，毛泽东找汪东兴、张平化、刘俊秀谈话。

毛泽东问他们，这几天在井冈山的观感如何？印象如何？

毛泽东说，我离开井冈山已经38年了。这次旧地重游，回忆起38年前的这段历史，心情总是非常激动的。为了创建这块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早想回井冈山看看，一别就是38年啊！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高兴、激动，没有过去井冈山艰难的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了。

毛泽东说，什么事情都是开头难。他讲述了1927年4月12日反革命政变以后的情况；秋收起义的情况；井冈山当年的斗争、生活情况。

毛泽东说，今天井冈山各方面比起38年前是大不相同了。上山坐汽车，住楼房，吃饭是四菜一汤，穿的是干净、整齐的衣服，真是神气多了。我相信井冈山将来还会变得更好、更神气。但是我劝大家，日子过好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

什么是井冈山精神，毛泽东在谈话中说，那个时候，“政治上官兵平等，进行民主建军，成立了士兵委员会。赋予士兵委员会很大的权力，军官要受士兵委员会监督，做错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制裁。整编前，

^①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261页。

官兵生活待遇相差悬殊。整编后，改成官兵完全一致，军官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很快使官兵的关系密切起来。”这是一种新型的政治关系、民主关系。虽然生活相当艰苦，“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穿的是百家衣。自己有什么穿什么，没有统一服装。夜里盖的是禾草，脚上穿的是草鞋。有的同志甚至连草鞋都穿不上，打赤脚。上山下山全靠两条腿。所有吃的、用的东西全靠两肩挑”。大家是“坚定乐观的”，“红军官兵斗志昂扬，作战勇敢”。“许多同志英勇献身”。^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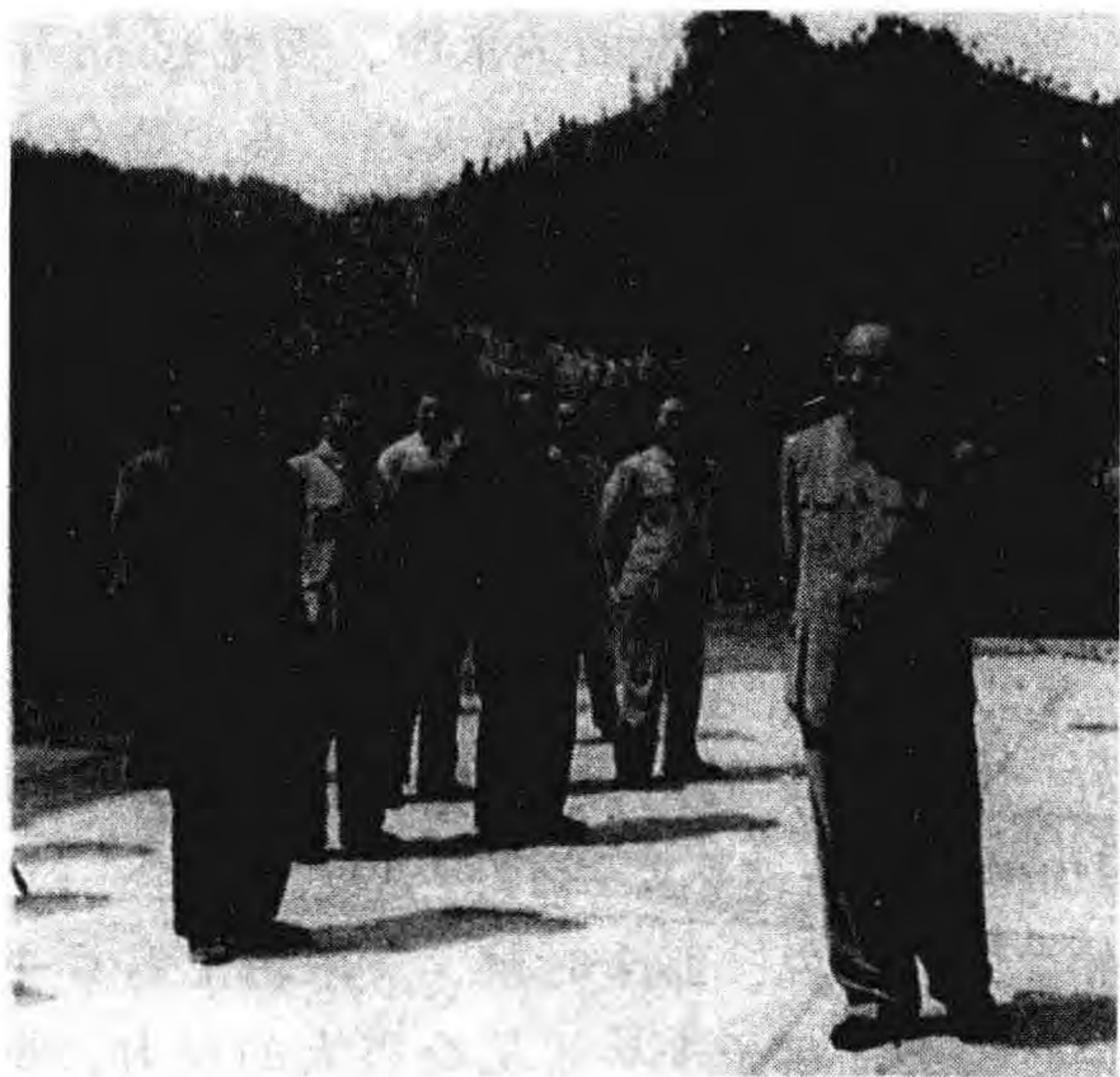
毛泽东讲了两个多小时，没有人打断他的话。

据当时接待毛主席的江西省公安厅厅长王卓超回忆：

主席的谈话是一种漫谈的形式。关于井冈山斗争，主席谈到革命青年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的作用，说牺牲了一大批青年人。他特别提到这么几个人，印象很深。第一个是卢德铭。原话记不准确，大意说：井冈山道路的探索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一步。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同志牺牲了。他们是一批有信仰有抱负的年轻人。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有智慧，能吃苦，在文家市决定进军路线的会上，就是他有力支持我退

入萍乡向罗霄山脉转移的提议。他在芦溪一战牺牲了。

三十一团党代表何挺颖，原是上海大学学生，北伐时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任团指导员。三湾改编任第一团三营党代表，很年轻（1905年生）。还有二十八团第一任团长王尔琢，是黄埔一期学生。红四军成立时，王尔琢任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



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摄影/钱嗣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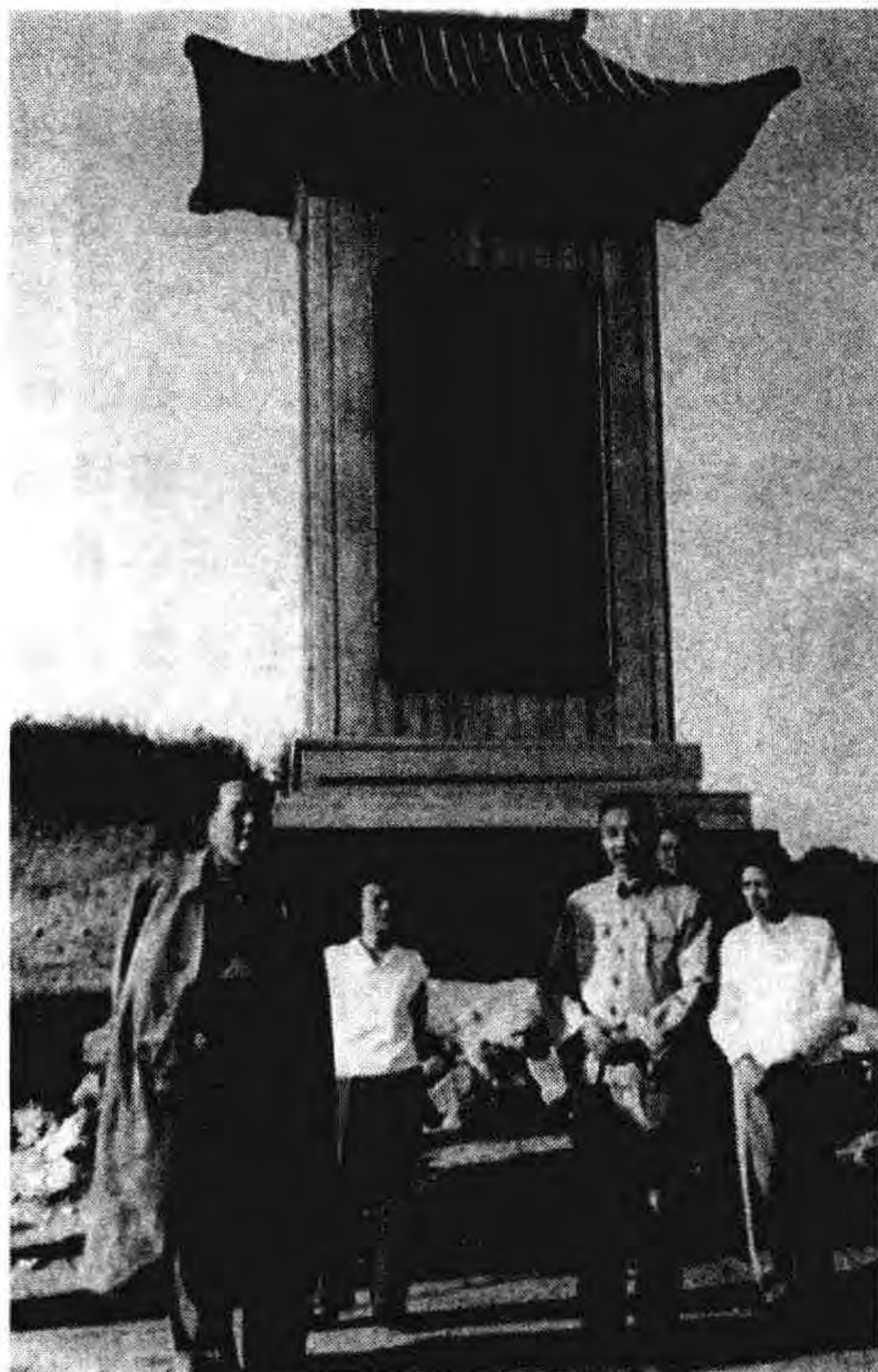
^①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263~268页。

1928年7月打郴州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回到崇义。8月，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和党代表叛变，团长王尔琢前去追赶，士兵们一听团长喊话，跟着回来。袁崇全从躲着的寺庙出来，掏出手枪打死了王尔琢，带着几个人逃跑叛变了。当时二十八团第一营营长是林彪，第三营营长是萧克。林彪比较会打仗，被提拔为团长。

还有张子清，参加过北伐，是秋收起义三团第三营营长。三湾改编时，黄埔一期学生陈浩当团长。1927年12月，陈浩从茶陵率部队没有回井冈山，准备投降敌人，张子清和宛希先坚决反对。陈浩被逮捕后，张子清升任第一团团长。他很会打仗，立场坚定，

1928年春下山接朱德的部队，在酃县战斗中负了重伤。那时井冈山医疗条件差，有一点药，张子清都先让给战士用，战士们流着眼泪留给他，他坚决不肯。井冈山的官兵关系，比亲兄弟还要亲，还要真。人心都是肉长的。革命的理想使官兵上下一致，整个部队团结得像一个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张子清为了不给部队增加负担，主动提出留在山上做辅助工作，调任红五军参谋长。1930年牺牲在永新。张子清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志，牺牲时也只有28岁。

毛泽东那天很激动，他说，一回到井冈山，脑子里重现出他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有牺牲精神的好同志。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几岁呀！井冈山斗争说到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枪杆子青年运动。井冈山斗争高举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进一步反剥削反压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井冈山斗争是伟大的，这些为革命牺牲的青年人是伟大的。



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黄洋界哨口。
(摄影/钱嗣杰)

他还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权利，你提意见他们不听。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忽“左”忽右、形“左”实右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报喜不报忧，也是官僚封建东西，做官的有特权、有政治需要、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这一代不变，下一代、下几代会不会变？有变的社会基础嘛。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中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毛主席很强调路线，这点给我印象很深。主席结合当年井冈山的斗争，说了这样一些话。他说，路线对头，也会出现打败仗的时候，有时候是敌人太强大，有时候是我们的判断出现错误。不能简单地以一两次失败、挫折来判断路线问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我们就会变得比较聪明起来。当年在井冈山，开始不会打仗，后来是“十六字口诀”越用越活。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就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看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感到苏联这样的事情离我们国家、离中国共产党很远。记得主席一边抽烟一边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

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主席说，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主席像老师考学生一样问我们，井冈山精神是什么？

我们回答说艰苦奋斗。

他笑了，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向，只是一点，还差两点，要从制度方向想。

汪东兴加了一条支部建在连上。

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大作用的。主席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重新提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说全国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

我记得，当时刘俊秀请教主席说：现在工厂都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主席说：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它有很大的权力。现在工厂的工会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



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摄影/钱嗣杰）



1965年5月，毛泽东与钱嗣杰、舒世俊、贾秋在井冈山合影。

主席还说，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能成为新型的军队，就是在改造旧中国的同时，也改造了我们自己。人的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井冈山上的袁文才、王佐，就是被改造了过来，为井冈山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嘛。红军中的不少干部原来是旧军官，一个月拿不少大洋，后来不是心甘情愿和士兵一样嘛。关键还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官兵一致。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一万多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

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就是路线正确不正确。

主席最后总结说，今天的井冈山比38年前是大不一样了。上山有汽车，有楼房，吃饭是四菜一汤，穿的是整齐干净的衣服，和过去是大不一样了。将来，井冈山和我们整个国家一样，前程是好的、光明的。现在日子好过了，井冈山艰苦奋斗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这个精神不简单地是几根灯芯。（1927年上山不久，毛泽东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关于用油的规定：各连及机关办公时，可以用三根灯芯，不办公时，连部只留一根灯芯，供带班、查哨用，大家都严格遵守。）

主席继续说，我早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由于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要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有一整套好

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意义一样深远。它们都是井冈山革命精神。

毛泽东再次谈到干部特权和干部子女教育问题，说现在的干部特权对我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条件优越，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可以看内部电影。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中，有些现象令人担心。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要丢了。^①

毛泽东为什么这么看重士兵委员会，把它同支部建在连上，和艰苦奋斗同列，其深层的理论意义在于党、政府、军队的权力应该而且可以通过普通群众监督、制衡。

25日，毛泽东写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②

这一天，毛泽东还对中央常委接见军委作战会议全体同志时指示纪要作了批示。

5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住地附近散步。一面在山路上观看对面群山变换不定的白云，一面向井冈山管理局的负责同志询问井冈山的建设情况。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的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没有战斗，没有工作，没有流血，没有牺牲，不去推翻反革命政权是不可能的，敌人的几百万军队，是不会自行灭亡的。”

晚上，毛泽东又找汪东兴谈话。

毛泽东说：“这次重上井冈山，往事都想起来了。有些事情还想和你说一说。我们军队里也不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嘛！军队里有要闹事的，历史上也经常有闹事的。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

①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毛主席五十次回湖南》第341~34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375页。



1965年5月，毛泽东接见井冈山的干部群众。（摄影/钱嗣杰）

有人闹乱子，闹就闹吧，闹一下不要紧，闹一下就不闹了吧。最大的闹乱子的是张国焘。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比如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八千子弟兵，可长征保留革命的种子，后来建立陕甘宁根据地，队伍又壮大了。”毛泽东说，“大大小小的事没有断过，井冈山闹过，闽西闹过，赣东北闹过，中央苏区也闹过。他要闹，你有什么办法”。^①

27日，毛泽东安排身边工作人员及专列工作人员第二批参观井冈山。毛泽东让汪东兴给党中央、国务院周总理发电报，报告主席平安无恙。如中央有重要文件，可派飞机送往南昌樟树机场，然后用汽车送上井冈山。

下午3时，中央派人将文件送到井冈山。毛泽东当时正在聚精会神地写诗，《念奴娇·井冈山》：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

^①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268~270页。

万怪烟消云落。^①

5月28日上午，毛泽东散步后，回到住所看中央送来的文件，其中有关于苏联赫鲁晓夫下台后的情况简报。

下午3时，毛泽东找汪东兴商量安排接见井冈山革命老同志，井冈山上的负责同志，宾馆的服务、警卫、医务人员，工厂的工人、山区农民，还有湖南来的送毛泽东上井冈山的同志等。

29日，毛泽东同张平化、刘俊秀、汪东兴谈话。毛泽东告诉他们：“我们已住了一个星期，该走了。”毛泽东听取了关于接见各方面人士的安排情况。毛泽东表示：下午见面，见完就走，不要他们送了。

下午4时，井冈山人根据安排，很有秩序地和毛泽东见面、照相。毛泽东在群众的欢呼声中登上汽车，开始下山。一路上井冈山人民自动形成夹道欢送，依依不舍地送毛泽东离去。

毛泽东一行经拿山、泰和县行驶150多公里到达吉安。在吉安地委招待所休息、过夜。

30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吉安地委常委和吉安市委负责人并一起照了相。然后，毛泽东一行经峡口、分宜，行驶130多公里，到达江西樟树机场。毛泽东和张平化、刘俊秀话别后登上专列。在樟树机场的专列上宿营一夜。

6月1日，毛泽东离开樟树机场到达杭州，住汪庄。

2日，毛泽东在国际关系研究所一份内部材料上批示：

江青阅。这是一个研究所〔的〕分析，可一看。他们认为有可能马上打仗。我看也许如此，也许暂时还不会。一、二、三〔年〕之后才打，我们就有准备了。但我〔们〕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中央已作了决定了。

毛泽东

六月二日于杭州^②

7日，毛泽东在《山西省农民讲习所办得很好》的材料上作了批示：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378、381页。

江青阅。共四件，如精神好可以一看。

毛泽东

六月七日^①

6月9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了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议长阿鲁季·长塔威纳塔和夫人。

11日，毛泽东对《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文作了批示：

康生、冷西同志：

此文已经看过，写得很好，照此发表。

毛泽东

六月十一日^②

当天，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上海、安徽、福建、山东等省市书记及南京军区司令员、政委参加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魏文伯、陈丕显、江华、许世友、谭启龙、陈光、李葆华等。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粮食报得多了，危险，害人。不要层层加码。差的，情绪上不要急躁；好的，不要自满。慢慢地搞个两三年就差不多了。备战宣传要稳当，不要一宣传，什么也卖不出去了，自行车、手表、花布都卖不出去了，馆子里无人吃饭了。

这次苏联接受我们12万吨猪肉，可能还会增加。这些东西，有人要，农民才养猪。也可以提倡农民吃肉，猪是粮食变的嘛。物价也是问题，货物多，可以便宜卖，肉太多，结果农民不生产了。薄利多销这原则讲了多少年了，就是没有这样做。

毛泽东说，主要是中央，中央不发大水，下面灾难少些。

华东的同志反映，粮食产量估计1970年达1500亿斤。毛泽东说，要打算有水灾、旱灾等天灾，这个数字每年要增产几十亿斤，要靠得住。江西那些地方有主意打，亩产量低，要加入肥、水，多搞一些山犁山耙，肥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383、385页。

料，小型水利，大有潜力可挖。

毛泽东说，安徽省粮食过去外调太多。还有四川、黑龙江、河南。外调多了，一征来就回销，人大概总要做些蠢事才行。

毛泽东说，国民党断我们的饷，断我们40万大洋不发。1941年冬天，天冷了，没有棉衣，我们下命令自己想办法，还不是一个月就解决了。

毛泽东说，我们在1961年至1964年进口400亿斤粮食，吃了200亿斤，80亿斤出口支持别的国家和做生意，还有120亿斤储备，以后逐年减少进口了。

毛泽东说，对中央部门，我们这些人抓迟了。唱京戏，文艺工作，在20多年前我放过空炮，这只能怪我，谁叫你放了空炮，不实际抓呢。结果文艺为资产阶级服务，帝王将相在台上乱跑，劳动人民在台上只能打旗帜跑龙套。现在可要改一改，让劳动人民在台上跑，让劳动人民当主角。要根本一风吹，把旧戏里帝王将相吹掉。现在要改正错误，要亲自抓，要抓紧。^①

6月12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余秋里带领第三个五年计划编制组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

听了余秋里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期计划的一些问题的汇报后，毛泽东说，基本建设投资太多，指标也定得过高。五年投资要从1080亿元压缩到八九百亿元。

汇报到三线建设，毛泽东说，三线建设也要压缩，从四五百亿压缩到300多个亿。三线建设战线不要拉得太长，项目不要搞得那么多。建设就像打仗，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

毛泽东又说，内地建设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慢一点，慢一点能达到。

余秋里汇报说：“1970年粮食搞到4800亿斤。”毛泽东表示怀疑：粮食4800亿斤能达到吗？订计划要留有余地。

毛泽东说，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要减少下来，搞化肥我不反对，但还要养猪、养羊，搞绿肥。猪还要发展，一头猪等于一个化肥厂嘛。

毛泽东告诉余秋里，工业布局不能太分散了。农轻重的次序要违反一

^①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625~626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227~1228页。

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钢的产量能达到 1000 万吨就可行了。

毛泽东说，要留点余地给老百姓。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张，把老百姓搞翻了不行，这可是个原则问题。

毛泽东说，总之，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到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的储备，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荒年常常是不可避免的。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不要丧失民心。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国家计委对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进行了修改。^①

6月13日，毛泽东打电话给浙江省委领导，要他们来汪庄汇报来华秘密休养的胡志明在杭州的生活、警卫等情况。省委领导马上叫负责胡志明安全警卫工作的省警卫处处长伍一去向毛泽东汇报。



1965年6月13日，毛泽东在杭州看望胡志明同志。（摄影/钱嗣杰）

汇报后，毛泽东马上提出看望胡志明。他说，胡志明身体不好，不要通知他说我要来，不然的话，胡主席就要先来看我了。我是主他是客，应当我先去看他。

毛泽东从汪庄到胡志明的住处谢家花园，胡志明头戴前进帽，身穿黑风衣已从房间里走出来。原来，工作人员还是打电话通知了胡志明。两位领袖谈笑着，肩并肩，沿着弯曲的石径，走入一片绿丛，来到湖边。在湖边老柳树下，纵论天下。从越、柬、老三国谈到东南亚，

^① 浙江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与浙江》第266页。

从社会主义阵营谈到全世界。

15日，周恩来到杭州与毛泽东研究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问题。

当天，毛泽东召开有周恩来、彭真、李先念、陈毅、罗瑞卿等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听取余秋里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期计划的一些问题的汇报，指出：总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①

6月16日，毛泽东继续召开有周恩来、彭真、李先念、陈毅、罗瑞卿等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

毛泽东说，我看那么多项目，投资那么多，不仅各部、各地的要求高了，你们定的指标也高了。安排得少一点不成？打起来，你打你的，我建我的，实际上真正打起来，只能是你打你的，我建我可能建的一部分。

我看还是房子底下挖洞，各家搞各家的，也不用国家出钱。搞个计划，今年下半年就开始，在一部分城市试验。

吃、穿、用，不要降低现在水平，每年略有增加就好。北方农民每人有330斤粮食足够了。投资不要那么多；要靠大寨精神，你给他钱，他搞得不好；你不给他钱，反而会搞得好些。农业靠大寨，工业靠大庆。

农业投资我看还要减。过去在农业方面花了些冤枉钱。对农业真正有效的还是化肥、小型水利、机械。

基础工业，有一、二、三线之分，在一、二线的工厂可以搬，矿山就搬不走。提出搞小矿、搞富矿，这个路子是对的。三线建设也要准备两手，一个是搞起来，一个是搞不起来。搞不起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打仗也不都打胜了吗？

搞不成，无非是时间长一些。哪里来那么多钢材、木材。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你们是被各地各部抬起来了，你们也想多快，多快害了你们了。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指标不要过分紧张。搞1260项跟过去1700项差不多了。

（工业根据各行业情况布点），这个对。（分散、靠山、隐蔽问题强调过了一点），靠山近水扎大营。

^① 浙江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与浙江》第230~232页。

“小三线”要花21个亿，是不是多了一点？三线建设问题，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莫及。

1959年3月郑州会议本来是反“左”的，以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结果搞到经济上也反起右来了，把我也搞糊涂了。证明一个人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是常有的。

1970年那些指标，不要搞那么多。要考虑来个大灾荒，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钢，是不是1600万吨就行了？要留点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这是个原则问题。新开荒不征税，让他们有20%到30%的黑地也好，不要查黑地。储备点粮食在老百姓家里有好处。

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

化肥厂要多搞小的，800吨、1000吨的，大的容易打起仗来被炸掉。

搞点小城镇，还是搞小城市的方针。最近看到一个材料，波恩才14万人口，不是很好吗？^①

当天，毛泽东离开杭州到了上海。

6月18日，陈云在北京给毛泽东写信，承认自己1962年对农村形势的估计有错误。

陈云在信中说：在1962年，我对农业恢复速度的估计：粮食方面，每年只能增长2.3%，因此，要由2800亿斤粮食恢复到3600余亿斤，需要八年时间。经济作物的恢复更要迟些。现在事实上三年就恢复了。这完全证明了我的估计是完全错的。1962年7月初，我曾经向你提出，同时也向中央常委中有几位同志谈过，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产量。这个意见是错误的，它关系到农业方向集体经济与小个体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现在用加强集体经济的办法，三年就恢复了农业，如果用分田的办法，可以想是资本主义会大发展，后患不堪设想。思想根源，在于没有把人与物的关系搞准，没有人的因素第一这种思想。这是右倾错误。^②

20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了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刘大杰。毛泽东就

①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626~62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第134页。

《辞海》、京剧现代戏、学术讨论、教学改革、开设宗教课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①

20日或21日，毛泽东返京途经南京，在专列上接见了江渭清等负责人。

6月22日，毛泽东回到北京。

26日，毛泽东与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谈话。

毛泽东说：这次我又压了他们一下。早就讲要他们注意三线问题，但没有人注意。这次一来就是一千多亿，这样老百姓怎么得了？搞这么大的建设，要供给粮食，运输跟不上去，西南三条铁路一下修不起来，钢材、木材供不应求，将来可能又要来个反复。不要把老百姓惹翻了。惹翻了还能打仗吗？要他们搞三线，要么就听不进去，不搞，要搞就拼命搞。现在就是过分了。什么都怕过分。我先纠正他们一下，免得将来又反复。

其实，大三线我有点担心。小三线我不担心，反正省里搞嘛，他搞多少就多少。比如你们江西吉安某地有铁矿、煤矿的话，就建一个五万吨或几万吨的钢铁厂，可能搞得快些。大三线就不同了，有的厂不能搬就不要搬。像鞍钢那么大，怎么能搬呢？旧的搬了，新的没有搞起来，也不行。能搬就搬，不能搬就算了。

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等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一定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你没有建设起来它就打，也可能你建设起来了它又不打。所以，我们要有两手准备。^②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上海》第438页。

^② 《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第41页。

五十二 滞留南方

1965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郑重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泽东还提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①

毛泽东这些话，是10个多月来，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来的。他决心发动一场革命。

年底，他决定由汪东兴取代杨尚昆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0月29日上午，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在人民大会堂约杨尚昆谈话，代表党中央通知杨尚昆到下面工作两三年，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由汪东兴接任。^②

11月10日，毛泽东同杨尚昆谈了话。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任命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③

同一天，上海《文汇报》发表江青几个月前在上海秘密组织，由毛泽东多次修改定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也是同一天，毛泽东在北京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毛泽东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

① 《红旗》杂志1967年第13期。《解放军报》1966年6月6日。

②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下卷，第682页。

③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下卷，第68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97~1398页。

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①

第二天，11日晚上，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偕江青去杭州休养。

11月12日，专列途经天津，毛泽东同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刘子厚等几位负责同志谈话。

林铁和刘子厚表示，要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事。毛泽东问：“我有什么指示？”他们回答：“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回答没有提到他最关心的“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毛泽东说：“为人民讲了多少年了。”他又问：“你们看，搞四清好，还是不搞四清好？”大家并不了解他的想法，回答说：“搞四清好。”

毛泽东继1964年，再次谈到河北要实现粮食自给的问题。林铁和刘子厚汇报了省委计划以五年时间实现河北粮食自给，尽量上得快一点，争取三年解决。毛泽东考虑了一下，很慎重地说：“搞成了才算数。”河北的同志汇报了各地上报的产量和来年的计划。毛泽东说：“粮食拿到手才算数。”毛主席问：“大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会不会是浪费？会不会化为水？”众答：“不会的，就是敌人不来，从经济建设上说，也是有用的。”毛泽东表示满意。^②

13日，专列途经济南，毛泽东在火车上听取了山东省委负责同志谭启龙、杨得志、苏毅然、刘秉琳同志的汇报。

苏毅然回忆：

1965年11月13日，毛泽东去南方视察路过济南。我和谭启龙、杨得志、刘秉林同志接到通知：毛主席要听取我们关于山东年景、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山东的工作重点以及山东的三线建设、军事工作等情况的汇报。我们临去车站的时候，谭启龙对我说：“主席要专门听你关于三线建设情况的汇报，你最好带上一张地图。”我觉得启龙说得有道理，就随身带了一幅地图。

我们来到火车站，其他三位同志都顺利地上了火车，我却被汪东兴拦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34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98页。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领袖在河北》第102页。《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第47页。

住了去路。他表情严肃地看着我，用手指了指我携带的那幅卷着的地图，问我：“这是什么？”“这是给主席汇报工作用的地图”，我边解释，边把地图递了过去。汪东兴接过地图，慢慢展开，仔细地看了看，又慢慢地卷起来还给我，说：“请进去吧。”

进到车厢，谭启龙等和主席相对而坐。主席问：“山东今年的年景怎么样？是不是还是五个（丰收区）包四个（灾区）？今年全省共收了多少斤粮食？”谭启龙回答：“今年的年景不错，虽然遇到了大旱，但粮食总产可以达到250亿斤，去年是228亿斤。”主席问：“大旱之年还能丰收？”谭启龙详细地向主席汇报了山东的旱情，以及山东人民进行抗旱斗争的有关情况。

主席听后，比较满意，“嗯，河北省井陉县有个抗旱丰产沟经验也很好。领导班子思想作风建设，你们是怎么抓的？”主席在听了我们解决领导班子思想作风问题的一些措施后，说：“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有两条，一是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我们无论进行什么工作，都要采取这两个方法。”

“任何工作没有一般号召，就不能动员群众行动起来。但只限于一般号召，领导人员没有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再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不能验证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不能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一般号召也就有落空的危险。”

“工作之中，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没有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这种工作就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如果只有群众的积极性，而没有有力的领导去组织群众的这种积极性，群众的积极性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再提高到更高的程度。我们在工作中要注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我了解到，河北省开会就检查了三条：自上而下的多，自下而上的少；一般号召多，个别指导少；从领导到群众的多，从群众到领导的少。这些都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主席问：“你们山东的后方在哪里？”

苏毅然回答说：“在沂蒙山区。”主席从苏毅然手里要过地图，苏毅然和杨得志马上帮助毛主席把地图摊在车厢的地毯上，苏毅然面对主席，席地而坐。

主席问道：“沂蒙山区大体在什么位置？”苏毅然说在津浦路以东。

主席又问：“这个地方到津浦路具体多少里路？”

“具体多少里路我不大清楚，大约 100 多公里。”

“离胶济路有多远？”主席继续问我。

“离胶济路就更远一些了。”我回答。

“为什么没有莒南、莒县？”还没等苏毅然回答，毛主席的目光离开地图，抬头又问：“敌人进来了怎么办？”

“这个地方不容易进来。”苏毅然说。

“这个地方就真的进不来吗？”主席反问道。

“这个地方确实不容易进来，如果敌人要进来，除非他们想当张灵甫。”苏毅然语气坚定地说。

“这里有个孟良崮？”主席问道。

“孟良崮就在沂蒙山的里头。”苏毅然回答。

主席面对地图，沉思了一会，似是自言自语：“这个地方是不大容易进来！”

在汇报到山东已试制出半自动步枪时，主席问：“你们三七高射炮有没有？其他炮有没有？”

杨得志回答：“炮都是由华东统一安排生产的。”

主席看着我们，语气坚定地说：“将来真的打起仗来，不要靠中央，要自力更生，中央既没有粮，也没有布匹，现在还有点枪炮，打起仗来枪炮也没有了。我们历史上，就是抗美援朝、中印边界冲突这两次靠后方供应了点枪炮。真正打起来，中央什么也没有，只有发号施令！”

接着主席又让我继续汇报山东三线建设的有关情况。

主席听完汇报，明确指示：你们看美国人会怎么样？只要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内，不发生战争，我们就可以把大小三线建设起来，就不怕了。

津浦线一带有没有驻军？有没有地方师？抗战时期，我们只有三个师，现在各个地方共有十几个师了，将来打仗单依靠中央是不行的。每个地方有一个师就好办了。

不要说群众了，连我们党内还有人认为打不起来，或者只是小打，不相信会大打。他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

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要把这件事情搞好。把大小三线搞起来，后方建设起来，敌人如果不来，浪费不浪费？没有什么浪费。粮食储存一些有好处，反正要吃的。棉布存一点也有好处，也反正要穿的。

打起仗来，没有粮食是不行的，打仗要有饭吃。枪炮子弹如果用不着，就只好当废铁了。打洞，不过用了点劳动力。

敌人登陆要找我们的弱点。青岛工事修得那么好，敌人为什么要在青岛登陆？龙口、成山头，过去日本就在那里登过陆。越是我们认为它来不了地方，设防薄弱的地方，它可能就在那里登陆。

还是让敌人进来，尝点甜头，诱敌深入，好消灭它。先消灭它一个营，再一个团、一个师地消灭。

军队过去是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现在军队就是搞些生产，不大做群众工作了。我们还是要恢复过去的传统，要打仗，要生产，还要做群众工作。

你们这些省市委书记同志，过去都是在军队里去的。现在搞地方工作，就不大问军事了。军队的同志搞了军事，也不问地方工作了。这都不对。搞地方工作的要管军事，搞军队工作的也要管地方工作。

有了地方师，有了小三线，地方就有了东西了。中央有了大三线，也就有了东西了。

毛泽东十分关心山东的钢铁生产。谭启龙表示：山东准备搞一万多吨，将来再发展到三五万吨。主席赞许道：“搞三五万吨，那好，那好。”

主席说，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是支持地方的。各省总要有个几万吨的钢铁厂，能制造机器，制造武器。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这时毛泽东又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并告诉他们，你们可以造反。但不能随便造反，不能造马列主义的反。

主席突然冲着谭启龙问：“粮食问题你们解决了没有？”谭启龙回答“三五”期间我们将主要解决粮食问题。“是吗？打起仗来，没有粮食是不行的。打仗要有饭吃。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占领了延安，我们退出延安，在山里转，还有饭吃，有粮食，有酸菜。后来，我们一个旅一个旅地消灭它，它就不要再延安了，我们也全国解放了。”

当时，谭启龙等向主席汇报：这几年山东在改造自然方面摸索到了一些经验。1965年夏季，省委常委、各部委负责人以及地市委书记集中起来学习了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并到各地现场参观、座谈，总结了22条经验做法；在治山方面，出现了厉家寨、下丁家那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

主席问：“你们还有个22条？下丁家在什么地方？”启龙同志回答说在黄县。主席说：“黄县，我记得吴佩孚是登州人，张宗昌是莱州人。”主席询问了下丁家、厉家寨的情况，了解了养猪典型。

主席又问：“南四湖是哪几个？北四湖是哪几个？”谭启龙等同志说南四湖是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北四湖在抗战时还存在，现在已经变成了耕地。主席根据我们说的情况，仔细地在地图上做了记号。“金乡、鱼台今年怎么样？”“不错，今年济宁整个地区的粮食产量将达到七亿斤。”刘秉林讲。“怎么搞的？”“是因为进行了稻改。”“亩产多少斤？”“四五百斤。”“过去多少？”“过去颗粒不收，或者一百多斤。”刘秉林一一作答。

“从颗粒不收或一百多斤，到四五百斤，那很好嘛！”主席非常满意地称赞。主席说，稳产高产田要搞到5000万亩，亩产五六百斤，一个人五六百斤就有吃的了。

当汇报汶河治理时，主席风趣地说：“汶河分流南北，北会黄河，南入长江，‘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

“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之说，始于清朝乾隆年间。据说，乾隆做皇帝的时候，对于汶河的治理颇费了一番脑筋。当时有人提出了让汶河水向南大部分流入长江，少部分向北流进黄河的治理方案。为了把这一治理方案说得形象且使乾隆皇帝高兴，当事人就把这一治理方案称为“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

汇报完治水和改造涝洼地的情况以后，毛主席又了解山东多种经营的情况。在汇报到“三五”期间多种经营山东要达到人均收入增加20元时，主席反问道：“20元吗？”当时苏毅然说，现在全省只有一个栖霞县达到了多种经营收入人均20元。主席听了之后，语调比较缓慢地说“只一个？独一无二？有一个也好嘛。”

谭启龙接着对主席讲：“现在群众干劲发动起来了，比1958年要扎实，但也发现有的干部在工作中表现出急躁情绪，贪多、贪大、求快、平调。”听到这里，主席有些气愤地说：“又在瞎指挥！”

谭启龙等同志还就当时的社教、军事工作等问题向主席作了汇报。^①

^① 山东省档案馆编：《毛泽东与山东》第426~433页。《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第41~42页。

晚上，专列途经徐州。

11月14日13时，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徐州市委副书记兼市长吴明政、地委副书记丁平。

吴明政回忆：

1965年11月13日，我们接到上级通知，说毛主席的专列当晚到徐州，要我们准备汇报工作。当时我任徐州市委副书记兼市长，由于地委第一书记刘锡庚和市委第一书记韩本初都在省委开会，我就和地委副书记丁平、冯克玉、市委副书记王铁民一同准备了汇报内容。本来打算四人都去汇报的，后接毛主席秘书通知，第二天下午一时接见我和丁平两人。

接见的地点是列车的会客室。毛主席当时身着一身米灰色服装，一双棕黄色的老式皮鞋已穿得很旧了。他老人家脸色红润，精神焕发，身体健康。会客室的一头是办公桌，桌上摆放一些文具。中间是一小茶几，茶几两旁是沙发，当时我和丁平坐在两个单人沙发上，毛主席则是坐在对面长沙发上。

坐下后，毛主席便和我们闲聊起来，先是问我和丁平的姓名、籍贯，接着又问我：“你今年多大了？”我说：“今年42岁。”毛主席说：“你看起来只有30多岁的样子嘛。”毛主席讲话时，我拿起笔想记下毛主席有什么指示，毛主席看了说：“我们随便谈谈，就不要记了。”

接着，毛主席就问我们，今年你们这里的粮食产量比去年怎么样？丁平回答，我们今年比去年少收了两亿斤粮食。毛主席很关切地问为什么？丁平回答说，今年两头旱、中间涝，气候不好是个原因，同时我们的工作也做得不够好。毛主席说，听说今年江苏全省比去年好一些，你们这里今后有没有希望？丁平说有希望，我们对过去和今年工作的失误和教训，认识上前进了一步，在改变生产条件上做了一些工作，只要我们今后继续狠抓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就会大有希望。看到我们满怀信心的样子，毛主席显得很兴奋，就问，你说的改变生产条件是什么？是不是水。丁平回答主要是水，前几年搞了些骨干工程，对沂、沭、运三大河作了治理，大大小小修了数十座水库，这样加上骆马湖、微山湖蓄水，我们种水稻就有了条件。另外还搞了一点台田、梯田、条田及一些小型田间工程。毛主席又问，微山湖的水你们用得上吗？丁平说我们的丰县、沛县沿湖及铜山、邳县沿运河地区都能用上一些。毛主席接着又问，台田主要是防涝吧？灌溉怎么

办？你们打不打井？丁平回答，台田也可以灌溉，我们这里也打了点井。毛主席说，河北省今年旱得很重，他们打井有了经验，打不深不浅的井1000多元一口。你们的井打多深？丁平回答说深的有30多米。毛主席说那就不浅了，要花多少钱呢？丁平说，机井要花2000多元一口，砖井200块钱左右就行了。谈到这儿，毛主席点点头，沉思了片刻说，听说江苏省有个县搞得很好，有很多人去参观，是哪个县？我回答可能是启东，或者是灌云县。农田水利听说是灌云县搞得很好。丁平补充说，粮棉双高产是启东县。毛主席说，听说江苏全省情况比去年好。江苏几个专区中哪几个专区好？听说苏州专区、南通专区不错？我答道，全省七个专区中，南方的几个好些，镇江专区今年也不错。毛主席问扬州怎么样？我说比过去几年好得多。这时毛主席向我们颌首微笑，并语重心长地说，我看徐州也是大有潜力的，相信你们这样努力干下去，会大有希望的，困难是暂时的嘛。我们听了深受鼓舞，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千方百计尽快改变徐州贫穷落后的面貌，以不辜负他老人家对我们的期望。

接下来，毛主席又和我们谈起人口流动问题，问我们人口还流动不流动？我回答说，今年有人口流动，多时有两千多人到这里来，包括河南省商丘一带及安徽的几个县。丁平又补充说，我们这里的睢宁县、邳县，因为有灾，也有人口外流的情况。毛主席问睢宁、邳县在哪个方向？下邳在哪个方向？丁平回答说睢宁在徐州东南，邳县在东边，下邳现在划归睢宁县了，位于睢宁县的北部。毛主席又问，听说江苏淮河以南的人口主要向南流，徐州的人口往哪流？丁平回答有向东北的，也有向西去的。毛主席听了，神色庄重地说，农民流动是个大问题，不光使本地的生产复苏缺乏劳动力，也给流向地区造成人口压力，形成不稳定的因素，影响社会秩序，影响生产。一定要想办法做好灾民的救济、安置工作，领导他们恢复发展生产，这是我们党和政府的职责，生产搞好了，吃穿不愁，也就不会有人口外流了，“仓禀实而知礼节”嘛。这样，你们的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其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我和丁平听了都很受感动。当即表示要记住他老人家的指示，努力控制人口外流，尽快组织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

随后毛主席转问我，你是盐城人，知道盐城有哪几个县？我说包括盐城、东台、大丰、建湖、射阳、阜宁、滨海七个县。毛主席抬起头想了一下说，老县都晓得，新县我就弄不清楚了。然后又问丁平，新海连是不是

包括在你们专区之内？丁平回答说过去是，现在划出了。新浦、海州、连云港三个地方，现在叫连云港市，有港口，还有大片盐区，是省属市。毛主席点点头说，秦皇岛市也是这种情况，也有三块地方。然后又问这里搞没搞工事？我说搞了。毛主席问在什么地方？我说从连云港起，一直到徐州周围，一些山头已搞了较长时间，有的还正在施工。毛主席听了，饶有兴致地给我们分析说，我们军事上的指导思想是诱敌深入。敌人来，无外乎两个目的，一是想占地方，一是想抢劫。诱敌深入，我们才能消灭他。敌人要来的话，你们徐州所处的位置就相当重要了，工事要抓紧搞好，另外还要教育群众在平时要提高警惕，让敌人轻易不敢来，来了我们也有备无患。我和丁平连连点头称是。

毛主席话题很广，刚和我们谈完军事，马上又谈到了工业。记得毛主席当时说，江苏有石油，在深层。过去江苏是个大海，就露出栖霞山、云台山、云龙山等几个岛。紧接着便问起徐州市的工业情况，你们这里工业怎么样？我回答说，解放初期有个说法，这里只有两个半烟囱（即两个半工厂），基础很差。现在大大小小的有190多个厂，不过都是些小厂。除煤矿外，其他的有小型化工厂、机械厂、轻工业厂。毛主席听了，点头表示满意。又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中央管、省管的厂子，你所说的小厂大约有多少人？我说有几个中央部属厂，其他都是地方国营和集体所有制工厂。小厂一般只有一二百人，二三百人。毛主席说一二百人不算是小厂了，国际上有个说法，30人以上就是大厂。我说话虽是这样，但我们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都很落后。我们徐州的工业能谈得上水平和规模的，也只能是煤炭了。毛主席听了就给我鼓劲说，不要泄气嘛，由解放初两个半烟囱发展到现在的190多个工厂，只有十几年，成就不小嘛，你们这里能源丰富，交通便利，有发展工业的许多有利条件，只要充分利用起来，逐步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相信你们的其他工业也会像煤炭一样发展起来的。毛主席的话，给我们描绘了徐州经济发展的灿烂前景，使我们信心倍增，认识到徐州不能再贫穷，也不应该再贫穷。毛主席接着又问，听说你们原来有个贾汪煤矿？我回答说，徐州解放前就有个贾汪煤矿，当时由于管理落后，加上战争破坏，年产只有几十万吨。解放后矿山回到了人民的手中，重新焕发了青春，建了一些新的矿井，现在年产400多万吨煤。毛主席听了，赞许地点了点头，说江苏的工业较为发达，煤炭、能源少了些，你们

的煤炭对全省工业的发展很重要，要加快开发。不过这样可能还不够用，听说安徽的煤炭较多，工业相对较少一些，我看互相调剂一下，有利于发展。说到这儿，毛主席又问，电怎么样？我说有个韩庄电厂。毛主席说韩庄不是属于山东吗？我回答说厂址在山东微山县，是山东、江苏交界的地方。毛主席又说，徐州解放前不是有电厂吗？我说有个贾江电厂，那个厂比较小，只有一万多千瓦，韩庄电厂有十万千瓦，我们用电大部分是由韩庄电厂提供的。

这时毛主席站起身来说，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我还要赶路。我和丁平连忙站起来说，毛主席还有什么指示？他满面慈祥地跟我们说，没什么，我找你们只是想了解一些情况，谢谢你们给我提供了许多情况。我握着毛主席的手说，十分感谢毛主席对徐州的关怀。然后毛主席把我们送到车门口，再次和我们亲切握手，我们才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走下车来。会见将近两小时。^①

11月15日凌晨，专列途经蚌埠。

上午7时，毛泽东同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副书记李任之、王光宇在专列上谈话。

主席风趣地说：“到了这里，一律平等，请坐。”看着李葆华，主席想起了他的父亲李大钊。主席说：“三大时，我、大钊同志，还有十几个中央委员，主张搞革命的统一战线，张国焘等人反对。”说完，他问李葆华知道不知道。李葆华回答，不知道。他说那时自己的年纪很小，只有13岁。主席说：“党内长期斗争，情况是复杂的，也要一分为二。”

李葆华向主席介绍了李任之、王光宇。主席分别问了两位副书记的年纪、籍贯，打过仗没有？大家一一作了回答。

主席对安徽的矿产资源十分关心，他问李任之：“安徽有多少煤？据说濉溪煤矿很大，储量多少？”李任之将沿淮及淮北地区的煤炭储量向主席作了详细汇报。主席又问：“皖南地区有多少煤？”当得知有3000万吨后，他惋惜地说：“皖南煤太少。”

服务员给主席送来了早餐——几片烤馍。主席边吃边谈，话题由矿产资源转到安徽的三线建设。

^①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毛泽东在江苏》第113~117页。

“安徽哪里有山？”主席问。李葆华等拿出地图，向他作了汇报。主席一个县一个县地问。他特别关心津浦路沿线，尤其是津浦路东的山区，问是不是打洞了。李葆华等回答：有些地区正在打洞。在听了安徽小三线及有关国防工程项目、规模和进度的情况汇报后，主席问：“三线工程建成，将来如果不打仗怎么办？”李任之说：“不打仗就改，现在就作两套准备，不打仗就生产民用产品，如枪厂将来可以生产机床，炸药可以作为民用。”主席满意地点了点头。他还问了津浦线驻军情况，李葆华等作了汇报。

吃完早饭，主席拿了一个橘子，剥了皮，给三位领导一人分了两瓣。

李葆华等省委领导向主席汇报了安徽社教情况。主席兴致颇高，侃侃而谈。他说：“精神变物质有一些人不服，有一个驳我的意见，和我辩论。此人看《矛盾论》看了七遍，工作了十几年。他认为精神变物质，能变粮食，变钢铁，就是不能变石头。我认为还是可以变石头的，如人造大理石等。革命战争，最后全国解放是精神变物质，人民大会堂也是精神变物质。精神是设计图纸，按照图纸建起的大会堂就是物质，就是力量。”

李葆华简要汇报了安徽党政机关干部下基层情况。主席认为：“机关可以留三分之一的人工作，三分之二下去。机关人越多事情越难办。中南海九局，解放后编制有两千人。我找汪东兴说，能不能减，他说可以。我说减一半是不是可以，汪说可以减到一千人。我又说再减一半是不是可以，汪说可以。现在是五百人，一半下去搞社教了。”主席进而说：“过去在我身边有十几个人，现在留在身边的只有四个人。一个秘书，是你们安徽人，一个公务员兼剃头的，还有一个护士、一个卫士长。护士、卫士长是多余的，没事干。”在场的同志纷纷劝道：主席年纪大了，还是需要的。

讲到机关，自然谈到工作方法。主席说：“只有一般号召，没有具体指导；只有领导核心，不与群众结合；只到群众中去，不从群众中来，是不行的！只剩光杆，怎么能领导呢？”

这时，主席的秘书提醒主席，时过9点，该休息了。主席摇了摇手：“我吃的安眠药已经没作用了，还要谈。”

从社教谈到秋种，毛主席高兴地说：“今年，沿途庄稼不错。从车子上看，麦苗很整齐。去年一二月份还看不到东西，稀稀拉拉的。现在11月份就长得很整齐了。”李葆华向毛主席汇报了粮食征购情况。听后，主席叮嘱在场的书记们：“你们不要调八亿五千万斤嘛，给中央少调一点。要稳，

不要冒失，要藏粮于民。”

毛主席强调要藏粮于民，要稳，不要冒失，不要调多了。猪多了，让群众多吃一点肉，就可以少吃粮食。并说沿江农民每人只有20元收入太少了，除粮食外，每人有50元、60元就好了，将来要搞到100元。主席似乎在提醒各位要吸取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教训。他特别询问灾民的口粮标准，李葆华汇报：“灾民口粮标准，中央规定的每人每天五大两不够，我们供应六大两也不够。因此，我们又加了二大两劳动补助粮，一共是八大两。现在基本稳定了。”主席赞同地点了点头说：“这样做不错。”

主席问到了农民的收入。李葆华如实地作了汇报。谈到教育制度问题，主席与在座的同志交换了各自的看法。随后，他问李葆华的妹妹在哪里？李葆华说在民间文学研究所。主席说：“在民间文学研究所干什么？要下去才能研究出东西来。”

毛主席说，现在学生连马牛羊鸡犬豕都不识，没有受过实际锻炼，怎么不出修正主义？总之，教育制度非改革不行。让青年学生在学习期间，就接触一些社会实践，了解工人、农民是怎么生产和生活的，据有起码的社会生活的实际知识，这一点很有必要，也很重要，对于青年的健康成长以及他们一生的工作大有益处。^①

主席提到了曾希圣。他带着商量的语气说：“曾希圣有点好处吧，挖渠有点好处吧，‘三改’怎样？”李葆华等回答道：“河网化是有作用的，淠史杭是有作用的，只是硬性推行。”

最后，主席关切地问：“你们与河南的纠纷解决了没有？”在得到回答后，主席说：“你们要向河南让步，向江苏让步。我就是一再向四方面军检讨，说对不起他们，结果就主动了。”主席又说，“前几年高征购、瞎指挥，我也有一份。当然，我还是有干劲的。一晚没睡觉，吃了安眠药以后，找你们来谈的。今天谈得很好，很高兴。我要睡觉了，你们也要走了。”^②

11月16日，专列途经南京。

毛泽东在专列上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和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陈光及部分地、市委书记谈话。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64~1165页。

^②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毛泽东在安徽》第182~185页。

毛泽东向江渭清、陈光及部分地、市委书记了解全省的经济工作，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建设“小三线”的情况，询问了全省的粮食收成、棉花产量，各地区的不平衡情况，指出可以从高产地区平调一些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到低产地区去搞革命、搞建设。询问了工业生产情况、全员劳动生产率、工人平均工资后毛泽东说，工人工资一个月50元，一年600元，还有7400元上缴国家。因此，农民说工人落后是不对的，工人为国家创造了很大的财富。又谈到了计划生育工作，指出要节制生育，避孕药、避孕手术最好采取少要钱、不要钱的办法，这还是划得来的。^①

江渭清回忆：

11月16日，毛主席来江苏视察战备和全省工作，找我和陈光同志谈话时，我们汇报了要按照毛主席关于反对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和少奇同志答复我的一封信的精神，进一步检查省委的思想作风。他老人家听了惊讶地问：“你们还要作检讨？”我诚恳地回答说：“主席的指示，少奇同志对我的批评，给我教育很大，每检讨一次就有一次收获。”毛主席说，好嘛，你们就检讨嘛！接着他叮嘱：检讨也要“一分为二”，不要说得一无是处。^②

这件事源于1964年。这年五六月份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后，中央决定由刘少奇挂帅，建立“四清”“五反”指挥部，并负责修改“后十条”。

这年7月刘少奇来南方视察“四清”运动。当刘少奇到济南时，华东局曾派魏文伯专程前往迎接，然后陪他到安徽。刘少奇一行抵达合肥后，魏文伯来电话向我和省委打招呼。一个总的精神是，刘少奇对前一段“四清”运动很不满意。魏文伯在电话里说：“渭清同志，你要小心！这次少奇同志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提醒我要有思想准备，要在刘少奇到南京后“注意”。

7月14日，刘少奇到了南京。少奇这次来南京，没有住招待所，而是住在省委大楼，在办公室里临时搭了个铺。

17日，江渭清和刘少奇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

刘少奇在南京的几次讲话，对于城乡阶级斗争状况所作的估计，特别

^①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毛泽东在江苏》第193~194页。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635页。

^②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501页。

是“不止三分之一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超过了毛主席关于全国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对毛主席的估计，我已觉得过头了，对少奇的估计，我认为显然更过于严重。对于基层干部状况和社会主义教育成绩的估计，以及“桃园经验”中撇开基层干部搞“扎根串联”、“访贫问苦”的一套做法，我也有不同看法，或者持保留态度。记得在刘少奇7月17日下午讲话以后，我曾向他当面直言了自己的看法。

我讲了学习他讲话的体会，对他所说城乡社会主义教育都没有搞好，我认为江苏不是这个情况。少奇说：过去一年多，“小四清”打了败仗嘛！我说：不能这么讲。据我们了解，已经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社队，60%打了胜仗，是有成绩的；30%比较一般，成绩不够显著；只有10%不够好，需要补课，或者要重搞。

我对他讲话中所说好的、没有“四不清”问题的基层干部是少数，公社、大队干部大部分烂掉了，也讲了不同看法。我说：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江苏没有发现烂掉的社、队领导班子。少奇说：你这是没有下去，不知道实际，讲的还是三年前老情况。我回答说：我经常下去，对本省情况是知道的。毛主席也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少奇打断我的话，问我对王光美向参加省委四届四次扩大会议的同志所作的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有什么看法。这是因为，王光美作报告时，我没有到会，请了省委其他常委主持会议，可能少奇认为这是对“桃园经验”重视不够。特别是“桃园经验”基本的一条，是认为社、队干部烂掉了，有的是“和平演变”变过去的，有的本来就是地、富、反、坏，都不能靠。所以，他听我讲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就很反感，并进而问我：究竟赞成不赞成王光美的报告？我说：从江苏的实际出发，学习精神实质。符合江苏情况的，就学习运用；如果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少奇说：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我说：不盲目执行。当时，刘少奇听我讲了看法并未发脾气。第二天晚上，临他离开南京前夕，我偕同我爱人徐敏，去看望他和王光美。少奇与我个别交谈，严肃地说：你昨天讲的那三个不同意见（即农村“四清”、城市“五反”是有成绩的，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对王光美的报告不能盲目执行），是不对的。我坚持原来的看法，这就引起了“顶撞”，少奇发了脾气。

事后，刘少奇给江渭清写了一封非常严厉的信，批评江渭清及江苏的工作。经过毛泽东的批准，这封信作为中央文件发到了全国。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发生了争执，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曾找江渭清谈话，问到刘少奇对他的批评，检讨了没有？江渭清回答说开始不检讨。少奇给我写信以后，作了检讨，但不深刻，还要再检讨。

毛泽东听江渭清这么说，就以他惯有的幽默口吻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这么回事。你感到批评对的，就检讨；不对的，就申诉；申诉还解决不了，就等历史作结论。

毛泽东还曾当着江渭清和刘少奇的面说：“少奇给你的一封信，是错误的。你的意见是对的，少奇是错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毛泽东才对江渭清仍在检讨表示惊讶。^①

11月17日下午，毛泽东找彭冲、刘中两人谈话。毛泽东向他们了解南京市的工业生产情况，其间插话说，南京解放时才6000工人，蒋介石是应该失败，他不发展生产，怎能解决群众生活？现在15万产业工人，一人养活四口，那就是60万人！毛泽东还询问了化肥厂、炼油厂、汽车厂的情况。^②

在谈话中，毛泽东问：南京人喜欢看什么戏？旧戏都扔掉了没有？得到回答后，他说：旧戏已没有观众了，现在的青年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没有什么兴趣，跟他们距离远了，只有我们这些懂历史知识的人还看得懂。但是，群众不要看旧戏，我们这些人也只好和群众一齐不看了，来一个一刀两断。^③

当天，毛泽东到了上海。

17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上海市委陈丕显、朝哲一、曹荻秋谈话。毛泽东听取了上海市工业、农业情况的汇报，对上海工业产值高、农业的粮食亩产高、棉花亩产高表示特别满意。

从北京到上海，毛泽东沿途都找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大家所谈的，几乎还是集中在农业生产和粮食、备战和三线建设、领导方法、教育制度

①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482~488、501页。

②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635页。

③ 陈晋：《文人毛泽东》第609~610页。

这些问题上。毛泽东自然很不满意。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以后，毛泽东在观察，江青一伙也在观察。毛泽东到上海以后，张春桥通过江青向毛泽东汇报了“观察”的情况，毛泽东很不满意。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是一篇普通的学术批判文章，而是发动文化改革的信号。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毛泽东有意以上海为阵地，向文艺界发动的一场攻击。同时它也是一种试探，对北京市委、对中宣部乃至中央一线领导的试探。毛泽东事先没有向中央的任何人打招呼，就是要试探他们对这样一场政治斗争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

早就明了毛泽东意图的张春桥后来回忆说：“我们天天等北京消息，天天看，天天盼，北京就是不理睬。”^①

毛泽东后来也说：“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刊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②

这段时间内，《光明日报》编印的《情况简编》有两期引起了他的注意。一期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里面讲到吴晗在11月14日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1961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我的《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1960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1961年要‘刮风’。”他表示：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还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毛泽东看了这篇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另一期是《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里面说：“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毛泽东看后在旁边画了三个圈。^③

11月19日，毛泽东离开上海到了杭州。

20日，毛泽东做出决定，指示上海立即把姚文元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发

① ②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12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98~1399页。

行。然而北京方面一本也不订。毛泽东后来对外宾说：“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①

毛泽东在杭州同浙江省委负责同志谈了话。据一位当年参加过谈话的老同志回忆：“文化大革命前夕，有一次，毛主席当面对我进行反修教育。主席问我：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党在主席英明领导下，不会出现这种事。主席看我很不理解，就用袁世凯登基做皇帝，云南的蔡锷起来造反的历史故事来启发诱导我。可是我仍然没有领会主席教导。”^②

同一天，毛泽东对林彪提出的五项原则作了批示。

21日，毛泽东在杭州谈到：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提出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他认为，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③

11月22日，毛泽东从杭州到达上海。

24日，毛泽东接见了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及其他美国朋友；接见了智利、印度尼西亚、新西兰的朋友。

25日，周恩来和罗瑞卿陪同外宾到了上海。

毛泽东同周恩来谈到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询问北京为什么不予转载。毛泽东指示，北京各报刊要立即转载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④

罗瑞卿在上海则更多的是从侧面了解到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而且了解得更深。根据罗瑞卿女儿的回忆：

25日，父亲到了上海。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在上海。上海的各种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399 页。

② 这个老同志的回忆见 70 年代浙江省委的文件。曾正式传达学习。另参见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394~1398 页。

③ 浙江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与浙江》第 266~267 页。

④ 周恩来 11 月 27 日回到北京，传达了毛泽东要北京各报转载姚文的指示。见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上，第 40 页。

报纸都在刊登有关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当时上海市的一位负责同志（曹荻秋）告诉父亲；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满意。并告诉上海市的人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毛主席还交待了：什么人都不要讲。那位同志对父亲说，他什么人都没有告诉，但他考虑父亲可以例外。父亲听了后，叫秘书要了一本单行本来。26日下午，父亲陪同毛主席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在外宾来到时，父亲向主席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要了一本，还未看。”毛主席只笑了一笑，未说什么。

晚上父亲看到江青，江青也对父亲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为什么。”并说，“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回到驻地，罗瑞卿立即给《解放军报》通电话进行了布置。然后给彭真同志打电话。他在电话上说：“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这时，周总理也给彭真同志打了招呼，所以，11月29日，《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同时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

《解放军报》因为了解真情，所以在编者按中直言不讳地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而《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在被迫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时，由彭真和周总理分别审阅定稿的编者按仍然把《海瑞罢官》的问题看作学术问题。

罗瑞卿准备离开上海的时候，去见主席，对毛主席说，他准备到苏州去看林彪。毛主席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毛主席将这话重复了好几遍。毛泽东这时是急切地希望林彪能出来工作。^①

这天，毛泽东还会见了日本中岛健藏和白土吾夫等日中友好人士和参加中日友好大联欢的日本青年代表团及其他日本朋友。

26日，毛泽东接见了朗诺率领的柬埔寨军事代表团。

晚上，毛泽东离开上海回到杭州。

11月底，毛泽东通知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到杭州来。

^① 点点：《非凡的年代——女儿眼中的罗瑞卿大将》第180~181页。

他计划像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那样读一些马列的经典著作，边读边议，然后自己亲自动手写序言。把中国革命以至近半个世纪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同本书有关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陈伯达、胡绳、田家英等到杭州后，毛泽东同他们谈过一次话。

但是，读书还没有开始，一场新的政治斗争又将毛泽东的精力卷走。

28日，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向彭真汇报：“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①

30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11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

12月1日，叶群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诬陷罗瑞卿要夺取军权；罗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毛泽东偏听偏信了林彪、叶群的话，准备开会解决罗瑞卿的问题。

2日，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信：

伯达同志：

乔木修改的那九篇文章，不知看了没有？请交来人带回，我想查一件事。如未看完，改日送上，再请斟酌。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②

当天，毛泽东在兰州军区党委一个报告上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毛泽东在报告上还批示：“此件如转发时，请先给少奇、恩来、彭真同志一阅。”^③

同一天，毛泽东同浙江省的一些领导同志谈了反对折衷主义问题。毛泽东说：“哲学上的折衷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④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401页。

②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485、486页。

④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33页。

当天，毛泽东还同人谈到罗瑞卿的问题，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则。“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看待”，罗“是野心家”。^①

5日，读书活动没有开始，毛泽东带了陈伯达赴上海，把其他人留在了杭州。

7日，毛泽东又在林彪关于转发兰州军区党委报告的来信上批示：“林彪同志：将此信一同印发。”“彭真同志暂不来此，可以不送阅了。”^②

12月8日至16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事前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开会时才知道是批判罗瑞卿。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绘声绘色地捏造事实，说罗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

罗瑞卿在12月11日被召到上海，但没有得到在会上申辩的机会。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③

在组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并同彭真、中宣部、北京市委进行斗争的重要时刻，罗瑞卿“问题”的出现，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巨大的。

14日，毛泽东同中办副主任李质忠谈话，就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做出指示：“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会出来破坏。要把这个意思告诉中央机要局、机要室，还要告诉军队的机要局、广播事业局的负责同志都要注意。”^④

上海会议以后，毛泽东同许世友进行了一次谈话。毛泽东问许世友：“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怎么办？”毛泽东告诉他，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这是最危险的。^⑤

几个月后，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

① ⑤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33、635页。

②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486~487、489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00页。

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防止‘苦跌打’”“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在那个时代，对这种事情，林彪是不会信口胡说的。尽管毛泽东不同意“政变”说，尽管毛泽东当时仍然认为，罗瑞卿“反对林，还没有反对我”。^①

12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结束。这天，参加上海会议的刘少奇为印发毛泽东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刘少奇在信中说：“此件我又看了一遍，觉得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将此件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昨天见主席时，主席已同意这样。望主席再看一遍，并批交小平、彭真同志办理。”^②

16日，周恩来、邓小平受毛泽东的委托向罗瑞卿传达了会上大家就人际关系、作风、工作、政治、组织等五个方面对他提的意见。并传达了毛泽东的话：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还说：罗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没有及时教育，然后又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③

当日，毛泽东离开上海返回杭州。

18日，毛泽东在刘少奇15日就印发毛泽东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来信上批示：“送交小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④

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把注意的重点转回到批判《海瑞罢官》上来。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

① ③ 舒云：《大将罗瑞卿》第65、67~6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490页注。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490页。

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

他对作序讲得很简单：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做注释。写序言，政治的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太好搞。

谈话大量的是涉及当时正在激烈开展的“批判”运动、教育革命等。

毛泽东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办法。吴晗老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①

关于教育革命，毛泽东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作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②

关于哲学研究，毛泽东说，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样多。

从上述讲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心在政治不在读书。就像战争时期专心军事一样，他正专心于政治斗争。读书没有开始就停下来了。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400~140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492~493页。

12月22日，毛泽东召集彭真、康生、杨成武等人谈话，再次提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①

毛泽东的这句话是对《海瑞罢官》争论的公开表态，而且是当着彭真的面，讲给彭真听的。如果说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过去毛泽东没有打招呼，这次就是正面打招呼了。

23日，毛泽东应彭真的要求，同他单独进行了谈话。彭真向毛泽东介绍了吴晗解放前后的表现。毛泽东表示：有些问题是不能马上做个结论的。吴晗的问题，最快也得两个月后才能作政治结论。我回到北京，再找少奇、恩来、小平他们议一议。^②

24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前往武昌。

当天，专列途经南昌。毛泽东住南昌滨江招待所。

毛泽东在南昌重读了当年在江西写的《长冈乡调查》。毛泽东在该文上批注：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者们，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但是这是难免的，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③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232页。

② 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上，第47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499页。

毛泽东在南昌填词《七律·洪都》：

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
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
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①

12月26日，是毛泽东72岁生日，他在散步时受凉感冒，发烧，继而转化为严重的支气管炎。

1966年1月1日，当时正在江西铅山县搞“四清”的汪东兴奉命带医生赶到南昌给毛泽东看病。经治疗，逐渐好转。在汪东兴来之前，在毛泽东身边的有：张耀祠、徐业夫、曲琪玉、周富民等。

1月5日，毛泽东要离开江西，在专列上与杨尚昆、方志纯、刘俊秀、白栋材、黄知真谈了话。

毛泽东询问了江西农业生产的情况。毛泽东对他们说，太急了不行。要有积极性，要稳步前进。江西的同志汇报说，江西有的同志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争取达到亩产800斤。毛泽东问：你们现在是多少？回答：500多斤。毛泽东问：每年增50多斤，做得到吗？江西的同志表示：江西的潜力很大，但很不平衡，不登报，时间还可以长一点，留有余地。毛泽东问，今年可不可以不购过头粮？江西的同志回答，根据主席藏粮于民的指示，今年注意了这个问题。毛泽东说：就是要藏粮于民。江西的同志答：看来要下一番苦功才能做到。毛泽东说：是要下一番苦功夫。毛泽东听说下面有些地方现在还有苛捐杂税，他让江西的同志做点调查研究，报告中央。

毛泽东问了汪东兴在江西挂职的情况，并谈到罗瑞卿。他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

毛泽东询问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情况，询问了招生生源，年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第501页。

文化程度等。^①

专列离开南昌，直奔武汉，途经长沙也没有停车，当天就抵达了武汉。

当年湖南省公安厅厅长、负责毛泽东在湖南的安全保卫工作的李强回忆：“1966年1月5日，毛泽东乘专列路过湖南。我们在车站和铁路沿线保证专列顺利通过。”^②

毛泽东这次到武汉仍住武昌东湖梅岭一号。在武汉，毛泽东主要是休息，看材料和思考问题。

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11月28日来信的复信（草稿）和康生、吴冷西的报告上作了批示。

1月9日和24日，毛泽东将湖南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简报第一期、第八期批转江青阅。

12日，毛泽东与正在武汉开中南局第十次全会的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了话。

陶铸等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南区的工作。当汇报到中南区准备在1970年努力争取实现《纲要》提出的四、五、八粮食产量指标时，毛泽东说，四、五、八原定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实现的，你们可以努力去做，也可能达到，也可能接近，也可能根本达不到，看来需要再长一些时间，再多十年实现也可以，不能勉强，勉强是不行的。

当汇报到要突出政治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要突出政治。我们不少同志，长期重业务、轻政治，谈起生产来津津有味，而对阶级斗争懵懵懂懂，兴趣不大。毛泽东又提到：“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是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

当汇报到要切实搞好城乡“四清”运动时，毛泽东表示：一定要认真搞好，可以再以三年时间，到1968年全部结束，但也不要再拖长时间。

毛泽东还谈到，总路线还是不改，每个时期都有所侧重，有所强调，不必改。藏粮于民，藏富于民，这样一宣传，公粮还能拿得出来？这件事

① 关于罗瑞卿同志问题的谈话部分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00页。

②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349页。

只能在干部中讲，不要到群众中宣传。^①

当天，毛泽东给章士钊写回信：

行严先生：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惠书及附件均已收读，极为感谢！三国志一部亦已收到，可作纪念，便时乞代致谢意。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有当，请酌定。顺颂

春安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②

1月16日，毛泽东同中南局书记和各省负责人谈话。

毛泽东说：“现在折中主义思想实在不少。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就是折中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统率经济。”^③

18日，周恩来同越南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副总理黎清毅会谈。在谈到苏联切断对中国的援助时说：这一点伤害恐怕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它不帮助我们，倒反而逼着我们自力更生。如果说现在还有苏联帮助，我们的原子弹就响不了。即使能够炸，它也要控制我们，不让我们爆炸。科学的东西，不通过实践，没有办法前进。^④

毛泽东看到会见记录后批示：“可以明了大势。”并推荐给江青阅。

21日，过春节，毛泽东参加了中共湖北省委准备的专场宴会和晚会，接见了省委、市委和各地、市第一书记。毛泽东向参与警卫的干部赠送了芒果。

当毛泽东在武汉时，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林彪的支持下，计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1月21日，江青到苏州见林彪，提出由她在

① 谈到北京出修正主义一段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39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4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400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第4页。

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得到林彪的支持。

1月下旬，叶群奉林彪之命，打电话给总政刘志坚做了部署，2月2日至10日，16日至20日分两段召开“座谈会”。所谓“座谈会”，实则看电影、看戏，听江青谈意见。

上海会议以后，林彪继续罗织诬陷罗瑞卿的材料，毛泽东在武汉期间，又收到了所谓罗瑞卿家公务员给肖华、杨成武的报告。

29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回信：

东园兄：

数接惠书及所附大作诗词数十首，均已收读，极为高兴。因忙，主要因懒，未及早复，抱歉之至。看来你的兴趣尚浓，我已衰落得多了，如之何，如之何？谨复，顺颂安吉！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①

2月1日，彭真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1966年1月，分几次报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的七个材料，转报毛泽东。

这七个材料是：

一、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人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

二、汇报张春桥电话中的意见；

三、汇报关锋等人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

四、关于郭沫若一封信的汇报；

五、关锋在1962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在1962年写的一篇杂文；

六、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

七、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

毛泽东2月5日批示：“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②

彭真送这些材料，本意是希望毛泽东对“左”派引起注意加以限制。但也可以看出彭真的政治倾向。彭真所报的这些材料结果都被看作是中宣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6、7~8页。

部整“左”派的材料。

4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我读了一遍。我认为重新印发给县委一级，由县委组织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学习，有迫切的意义。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是引导这个高潮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6日，毛泽东批示：

彭真同志：

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点，别地不发）。看来此问题很大，要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王任重同志的修改是好的。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二月六日^①

自从批判《海瑞罢官》以后，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所谓的“学术讨论”。在一些有意组织的文章的带动下，政治批判的空气更甚于学术讨论。北京这个政治文化中心自然首当其冲，尤为显得紧张。一些著名的老知识分子郭沫若、范文澜等均闭门谢客。滞留南方的毛泽东暗里支持着这场运动，又观察着中央一线领导人的态度。在京的中央常委们知道毛泽东支持这种“批判”，但希望把这场运动置于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于是指示“五人小组”加以讨论并提出意见。

作为北京市长“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和中宣部部长、“五人小组”副组长的陆定一原本就反对在北京的报刊转载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持抵触的态度。无奈转载之后，很自然也考虑怎样控制这场运动。所以他们提出在真理面前要人人平等，防止学阀作风，并规定严格控制公开点名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9页。

批判的措施，起草了给中央政治局的《汇报提纲》。

2月5日，刘少奇主持常委会讨论，在京常委们同意“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并嘱咐向毛泽东汇报，由他最后决定。^①

7日，刘少奇又召开常委会，讨论当前外事工作中几个较重要的问题和编辑《毛选》五卷问题。会议决定由田家英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编《五卷》的设想和准备，由吴冷西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外事工作问题。周恩来告诉吴冷西，在毛泽东决定后，立即打电话向他报告。^②

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田家英等同机离京去武汉。

当天上午11时至下午1时30分，毛泽东在东湖宾馆听取彭真等人的汇报。

先由彭真说明在京向常委汇报的情况，然后由许立群和胡绳（他们两人都是“五人小组”办公室主任）分别介绍情况和汇报提纲的主要内容。毛泽东一边听一边插话或提出问题。对《汇报提纲》，毛泽东没有当面表示意见，但毛泽东再一次对彭真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毛泽东一连两次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毛泽东说，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决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当谈到“左”派也要整风时，毛泽东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当许立群谈到关锋的杂文时，毛泽东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毛泽东说：对郭老、范老要保护，不要批评。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好。对吴晗不要罢官，还是当他的副市长。就不至于形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这样说总可以吧。

从毛泽东的这些插话，实际上，可以看出他对《提纲》是不同意的，只是没有明确表示意见。毛泽东后来说，当时我没有明确指出，以为是常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631页。董边、谭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第155页。

② 董边、谭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第15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1页。

委讨论过的。^①

2月9日，毛泽东继续听取汇报。先由康生、田家英汇报编辑《毛选》五卷的问题。接着，由吴冷西根据在京常委的意见，汇报了有关苏共二十三大、印度尼西亚政变、同越南劳动党会谈、古巴问题以及周总理访问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等问题。对多数问题毛泽东当场表示了意见，只对个别问题说还有时间从长计议，不必马上作决定。

田家英特别说明，少奇等在北京讨论时都主张早点出第五卷，但也表示一切均看主席的意见而定。毛泽东开始时表示对那些“老古董”兴趣不大，后来又说大家既然觉得有用，不妨动手做准备，先编出一个选目来再说。他还说，乔木还在养病，陈伯达又另有任务，家英熟悉这一工作，可以先搞起来，将来再扩充班子。毛泽东告诉彭真、田家英等人，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除当时发给各省一个记录稿供传达用之外，他又修改了多次，请他们在此再读一遍，看还有什么要修改的，然后发给党内讨论之后，再公开发表。

毛泽东说，苏共新领导上台以后，讲了许多重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话。在召开三月分裂会议之后，他们更是不指名地攻击我们党。这些都表明他们实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理直气壮，只是说明他们内部有困难，需要这样做。他们那么怕我们，是成不了气候的。我们暂时可以置之不理，把子弹储存起来。对于他们老一套的修正主义的反华言论，我们采取评《公开信》的形式，已发表了九篇评论。对苏共其他决议、报告、讲话、文章，我们还没有答复，我们已声明保留答复的权利。现在苏共新领导，讲的都是陈腔滥调，毫无新意，值不得浪费笔墨。现在不必管它，过一个时期再看，如果有些新东西，才考虑答复。那时不但要答复，而且还要把他们的东西加以转载。

至于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说，还有一个多月他们才召开，还有时间从容考虑。我们如果不去参加，是不是要通知其他兄弟党，到时候再说。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越南党已答应参加，估计朝鲜党也会去的。如果我们决定不参加，可以通知他们，也可以不通知他们，这个问题还有时间考虑。

^① 章重：《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第411~41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02页。

最后，吴冷西谈到国际上对毛泽东思想有多种多样的提法，国内最近也有新提法，如“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吴冷西说，在京常委都不同意上述两个新提法，请毛主席考虑是否仍然按照1960年3月天津会议的提法，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说，外国人怎么说法，我们管不了，由他去，但我们自己仍然按照天津会议的决定办，林彪的两个提法都不妥。毛泽东还指定彭真和康生离武汉时先去苏州跟林彪当面说清楚。

当天晚上，吴冷西通过保密电话，向在北京的周总理汇报了毛泽东关于这几个问题以及其他若干个外事问题的意见。^①

2月1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彭真、康生、吴冷西、田家英等从北京来的人，把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细读了一遍，读一段议一段。这个修改稿经毛主席多次修改，每次修改都由田家英校订。因此读来流畅，既保持主席讲话的风格，文字也很洗练，提不出多少意见，只觉得有些措辞，是七千人大会后主席说的。主持通读的康生还嫌不够，提出要把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提法增加进去。当时田家英认为不妥，但康生坚持己见，说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的提法比这还重得多。最后还是加上了。^②

11日，彭真根据大家讨论的情况报告毛泽东：“我们大家（任重同志参加）讨论了两次，提了些小的修改意见，供参考。请核定。”^③

12日凌晨2点40分，毛泽东批示：“彭真同志：都已看过，照此办理。”^④

这个讲话，中央当天就下发给了县团级党委。

18日，毛泽东同当时在哈军工读书、放寒假到武昌的侄儿毛远新谈了一次话。

在谈到军事工程学院教学改革的一些情况时，毛主席说，理工科还要有自己的语言，六年中先搞三年试试看，不一定急于搞两年。尖端科学搞三年，要有针对性也许行。三年不够，将来再补一点。有针对性才能少而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 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934~935页。董边、谭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第156页。

② 董边、谭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第156页。

③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10页注1、第9~10页。

精，有针对性才能一般和特殊相结合。六年改成三年，这样做以后步骤稳妥，方向对头。理工科有它的特殊性，有它自己的语言，要读一点书。但是也有共性，光读书不行。科学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但讲课不能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习近代史，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3000多年，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

尖端理论包括通过实践证明了的，有的基础理论中要去掉通过实践证明没有用的和不合理的部分。

讲原子物理，不必要从最早的那个学派的理论讲起。只讲阪田模型就可以了，不必要从丹麦学派波尔理论开始。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你们学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阪田都用辩证法，你们为什么不用？

人认识事物总是从具体到抽象。医学讲心理学，讲神经系统那些抽象的东西，我看不对，应该先讲解剖学。数学本来是从物理模型中抽出来的，现在就不会把数学联系到物理模型来讲，反而把它进一步抽象化了。^①

2月19日，毛泽东对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批示：

任重同志：

此件看了，觉得很好。请送少奇同志，请他酌定，是否可以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研究。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各省、市、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的计划，从少数试点，逐步扩大，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至于二十五年以后，那是无止境的，那时提法也不同了，大概是：在过去二十五年的基础上再作一个二十五年的计划吧。目前是抓紧从今年起的十五年。已经过去十年了，这十年我们抓得不大好。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②

当天，毛泽东离开武昌再赴杭州。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泽东论教育革命〉的通知》，中发〔1967〕373号，1967年12月7日。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12页。

20日，专列途经长沙，毛泽东在长沙停留了一周。

2月21日至22日，毛泽东在长沙连续两天听取了叶剑英关于战备工作情况的汇报，研究可能发生的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对付入侵之敌也可以利用城市打的思想。他说：“利用城市打也是个办法。采取斯大林格勒的办法。总不能把城市空起来。敌人进了城就不会打原子弹了。敌人进城，我们也可以进城，打巷战。”^①

2月23日上午10时至11时50分，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了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第二书记王延春、书记李瑞山、华国锋、候补书记苏钢，并进行了座谈，毛泽东发表了长篇谈话。

根据华国锋当时记录的档案资料，毛泽东主要谈了以下意见。

（当张平化汇报过去一段工作的看法，着重谈阶级斗争问题。当谈到十中全会前，我们对抓阶级斗争有些摇摆，单干风严重，有一次主席曾指出，两年怕解决不了单干问题时）主席说：从1962年、1963年、1964年、1965年，四年还没有解决，后年春可以解决。地、富、反、坏，还有富裕中农，许多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湖北同志说，1959年、1960年困难，犯了高指标、瞎指挥、五风的错误，但1961年、1962年犯的错误还严重些，损失也大，1962年蒋介石要进攻大陆，我们没有抓，敌人抓了（意指在大陆的敌人抓住此机会进行破坏活动），你们议一下。湖北同志说单干的有三分之一。

（当谈到当时我们曾提田间管理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搞试点，不到一个月即收回文件时）主席说：也是一个经验。

（当谈到1962年在劳模会讲话，我们曾提出发红财、发黑财，当时主要考虑了一部分富裕户怕冒尖思想问题时）主席说：怕冒尖的话土改就有，有些同志说不好，我说有好，广大贫下中农还困难，怕冒尖说法，是有些人（意指富裕中农）怕贫下中农说闲话。我的工作组在韶山，说40%分田到户，60%能保住就不错，生产队15户，赞成分田的是多数，不赞成的有几户，他们没有进行思想教育，队也小了，贫下中农优势不够。

（这时苏钢同志由宁乡赶回来见主席，经平化同志介绍，主席问了是哪

^①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133页。

里人后，接着谈。当谈到出工少是个大问题情况时）主席又问了。

第一是一年出工少；第二是一天出集体工时间少；第三是工夫质量差。

（当谈到人的潜力很大时）主席说：对。

（当谈到吃饭靠集体花钱靠自己的议论，如何分析认识时）主席说：全国都有此议论。

（当谈到什么也怕的干部思想动态时）主席说：怕革命。

（当谈到现在干部思想比 1962 年大有进步，偏向左的有，偏向右的多点时）主席说：1962 年到 1965 年三年多了。

（当谈到为了防止干部可能产生的急躁情绪，简单化作风，又重印发了主席六条党内通讯时）主席笑：啊！

（当谈到有的干部怕一年跨不了纲要挨整时）主席说：是“怕”字出发的。

（当谈到湘潭县中路铺点上有的同志对今年要增产一成左右的提法不同意，认为提低了时）主席问：是什么人？并说，一年增产一成左右就了不起。湖南增产多少亿？（答：一成左右是 20 多亿）一年增产 20 多亿了不起。

（当谈到尾巴主义、命令主义随时要注意时）主席说：你的厅长一年就要跨纲要是不懂得农业生产吧。

（当谈到“四十条”纲要上写的是 1967 年时）主席说：要修改一下。

（当谈到汉寿一生产队，去年亩产 1100 多斤，今年订计划是亩产 1500 斤，定高了没有余地时）主席说：少讲一点。

（当平化同志谈完请主席指示时）主席说：这个农业机械化（指任重给主席信讲湖北农业机械化问题），你们中南局讨论了没有，值得各省注意，湖北比河南怎样？（指机械制造能力，并答湖南机械制造能力是中南倒数第二，但亦有了一定基础）他们提出五年、七年、十年，我说打宽点加五年，湖南亦有一定基础，衡阳有机械厂吗？（回答了各市及全省机械工业情况）要自己搞，要有个规划，有个设想。

（当提到发展粳稻需要打谷机，去年生产一万部，今年生产 10 万部，钢材还差 7000 吨，每个小队平均不上一部时）主席问：有多少小队？（答：40 万个）不一定 40 万小队都有粳稻。

（当谈到米面油加工亦需机械时）主席说：还有桐子茶子。

（当谈到推广良种，请种过的农民现身说法，作用大，并举了桂阳请郴

县的农民去讲时)主席问:这个农民是哪里的?从郴县请到桂阳。

(当谈到湖南今年由外省调入2.1亿斤种子,加本省调剂的有三亿多,有一定的风险,目前要强调自愿时)主席说:粳稻比籼稻在国际市场上贵得多,含油量含脂肪比籼稻高,不仅高产,而且质量好,群众叫顶饿,吃干吃稀比籼稻顶饿,有胃病的不行,如陶铸同志就不能吃。

(当谈到去年洞庭湖晚禾籼稻多,碰上寒露风,减产吃了亏时)主席问:为什么洞庭湖吃了亏?湘南如何?(答:湘南地势高,有山,风小,温度高,成熟早)。

(当谈到阶级斗争每年都要突出抓)主席说:如果一次四清搞了,一万年也清,那就没有工作做了。

(当谈到一些敌人活动的特点,对干部威胁,对青年搞黄色俱乐部时)主席问:你讲的是农村还是城市?(答:指的是农村)主席接着说,农村青年打扑克、下象棋、看旧小说,有这方面的经验,然后教育过来也不坏。

(当谈到我们落后了,要加快速度赶上去,但又不能瞎干时)主席说:好啦!

最后说:以后就不和你们再谈了,你们还要下去。并接着说,有希望,比过去好。^①

毛泽东在长沙期间,收到江青的报告:2月底,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结束,产生了一份由刘志坚等人为向总政党委汇报而写的《汇报提纲》,主要追记江青的讲话。江青认为这个《提纲》“根本不行”,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总政由陈亚丁返回上海参加修改。^②

2月23日,毛泽东审阅了周恩来转来的余秋里关于西南、西北大三线建设给政治局常委的汇报提纲。周总理附信说明:余秋里在常委会做了口头说明,对主席所关心的西南、西北地区在1970年钢的生产能力争取进到430万~550万吨,二线争取进到650万~700万吨,一线争取1140万吨,已在开始进行新的布置。各地小钢铁厂,也包括在这个新的布局中。

^①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134~137页。

^②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21页。

毛泽东对余秋里报告很关心，在多处画了线，如“突出的问题还是钢铁工业跟不上，钢铁工业的核心又是矿山建设问题”。“经过一年来的实践，看来，三线地区的钢铁工业建设，也是有条件加快的。”“要抓两手，一是抓紧攀枝花和酒钢的建设。另一手是抓新探明的几个建设条件较好的富矿”。

24日，毛泽东给一个服务员题词：“要注意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分析自己和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①

25日，毛泽东将1月24日王任重在全省常委会上的发言转给刘少奇：“少奇同志：此件请你看看，是讲政治挂帅的。”^②

王任重在这篇讲话中指出：“现在农村有许多地方是工分挂帅，不是政治挂帅；许多工厂、商业单位则是奖金挂帅，其实质是物质刺激。对这些不合乎毛主席思想和生产发展的制度都可以改。工厂可以把奖金加到工资里去，只要不超过工资总基金就可以。原则有两条，一条是不增加国家开支，另一条是工人的实际收入不减少。以后只搞精神鼓励，不搞物质刺激。农村的基本办法是搞底分制，按人评底分，反对搞烦琐哲学，主要靠政治挂帅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搞政治挂帅，要有一系列的措施跟上去，否则问题是解决不了的。”4月10日，中央加批语转发了王任重的这篇发言。

26日上午，周恩来陪同加纳共和国总统恩克鲁玛到长沙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国务院有关工作。之后，去韶山瞻仰毛主席旧居，下午返回北京。毛泽东当晚也离开长沙继续他的赴杭州之行。

2月27日，毛泽东到达杭州。

经过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的一番“大手术”，《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了。这个文件很快被送到杭州，毛泽东对这个《纪要》非常重视，亲手做了11处修改，并将《纪要》的名称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的修改，这个《纪要》变得非常有分量，令人无法轻视。毛泽东对《纪要》的修改，最引人注目的是，它认定：文艺界过去十几年被一条“黑线”统治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要“搞掉这条黑线”。这个结论，无疑将正在开展的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15、16页。

“学术批判”表述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为当时的这场运动定了性。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这个文件再次被送往上海，由陈伯达、张春桥等进一步修改。

3月5日，在北京的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一个小会，参加的除周恩来、邓小平这两位政治局常委外，还有彭真、陈毅、康生以及刘宁一（他当时主持中央联络部日常工作）和吴冷西。这次小会专门讨论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会上大家倾向于我党不派代表团参加。根据这次小会讨论的结果，吴冷西同钓鱼台一些秀才起草了一份电话报告，经彭真、刘少奇阅后由中央办公厅传到武昌去请毛泽东决定。

过了几天，没有接到毛泽东的回音。彭真于是请少奇再召开一次会议复议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

10日，刘少奇又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周恩来（他到邢台去视察地震）和邓小平（他在5日会议后即赴西南视察大三线）都没有参加，只有彭真、陈毅、李富春三位政治局委员和康生（政治局候补委员）参加，刘宁一和吴冷西列席。

彭真在会上先说了他的想法。他认为毛泽东对重大问题决策时经常反复考虑。上次请示已经四天，主席还没有复电。可以考虑从另一角度再提出一个方案，供主席参考。他着重说明，对苏共二十三大，上次会议讨论时认为不宜参加，现在可考虑从另一角度来看，可以参加。因为这不是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对我毫无约束力。我们是应邀作为客人列席的。既然是人家自己开的会，人家请我们，我们也可以接受邀请，这是个礼节问题。估计越南党和朝鲜党会去参加，我党不宜同它们距离太大。这些是从另一方面考虑去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理由。

会上大家觉得，这些理由很不充分，上次小会上都考虑过，结论是相反的，因此仍然倾向不去参加。刘少奇认为，上次会议已有定论，并且已报告毛泽东。现在从另一角度来考虑，议一下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作为常委或政治局的意见。他说，今天到会的常委只有我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会的也是少数。散会以后，彭真几次打电话给吴冷西，说已征得少奇同意，要吴冷西和姚溱就会议讨论的意见再起草一个电话报告给毛泽东。吴冷西和姚溱再三考虑，都认为不宜起草。最后彭真自己起草了一个报告，并且

把吴冷西和姚溱叫他家里去商量修改。吴冷西和姚溱对他起草的报告稿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饰，由中央办公厅用电话传给武昌毛泽东住处，一直没有回音。

3月5日和10日两次电话报告，毛泽东收到了没有？实际上毛泽东收到了。当时毛泽东已经到了杭州，中央办公厅应该知道。当时为毛泽东送文件的飞机每天来往于北京和杭州。看来，不知道毛泽东已经离开了武昌这种说法可能有误。因为2月20日王任重给刘少奇关于湖北省委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的信中说：“主席昨天离开武昌到湖南去了。”

2月26日周恩来陪同外宾在长沙还见过毛泽东。所以吴冷西说办公厅将电话报告传到武昌的说法可能有误。

11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去了一封信，谈道：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设想的文件和主席的批示已印发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并发给包括计委、经委在内的各有关部委及华北局有关同志研究，准备意见。信中还谈到了落实主席指示的一些想法。其中包括“先在湖北试验”，“这个文件暂缓转发各地”。^①

12日，刘少奇来信的第二天，毛泽东给他写了回信。原先毛泽东同意了刘少奇的意见，批示：“未发，拟不发，待讨论。”后来又改变了意见。毛泽东回信全文如下。

少奇同志：

三月十一日信收到。小计委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农业机械化五年、七年、十年的方案，并参观那里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试点，这个意见很好。建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各派人去湖北共同研究。有七天至十天时间就可以了。回去后，各做一个五、七、十年计划的初步草案，酝酿几个月，然后在大约今年八、九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才有可议。若事前无准备，那时议也恐怕议不好的。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等方面，对原材料等等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也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也要中央确有原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21~22页注2。

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后再说。为此，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例如超出一倍以上者），在超过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类，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

以上几点意见，是否可行，请予酌定。又小计委何人去湖北，似以余秋里、林乎加二同志去为宜。如果让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派人去的话，似以管农业书记一人计委一人去为宜。总共也只有大约七十人左右去到那里开一个七天至十天的现场会。是否可行，亦请斟酌。

毛泽东

三月十二日^①

3月13日，毛泽东又收到我驻苏使馆关于我党是否应邀派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事给中央的电报。毛泽东致电中央，谈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可以看到他对中央前两次电话报告是了解的）。

毛泽东认为：驻莫斯科使馆党委的分析是正确的，这符合中央的第一次分析和不参加的结论。不参加出不了什么大问题，无非是大反华、越反越显得苏修不对，我们对苏共二十三大大是否发贺电，也值得考虑。不发就犯了罪吗？是否同阿尔巴尼亚谈一下，连贺电也不发。“灵活性”，这十年来也很不少。现在双方国交未断，贸易在做，还有人员往来，文化交流和派留学生等。国际群众团体会议，我们也都参加，两党不断地还有书信往来。这些都是灵活性。将来一旦有事，灵活性可能更要多些。毛泽东决定3月18日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各大区书记参加。

14日，经过修改的《文艺座谈会纪要》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再次作了修改。

17日，毛泽东对《文艺座谈会纪要》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②

一个《汇报提纲》，一个《座谈会纪要》，是明显对立的两个文件。它实际上向全党公开了中央上层由来已久的意见分歧，形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因在西北三线视察而请假）外，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会议议题事先没有通知，只在开会时说要讨论中央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也可以谈谈。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19~21、23页。

3月18日上午9时，毛泽东在西湖西南岸的刘庄别墅召开常委扩大会，讨论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等问题。

吴冷西回忆：

会议开始，毛主席提出，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议题，一是讨论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二是对当前的文化革命交换意见。毛主席说，上个月在武昌的时候，曾经谈过，关于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还有时间考虑。现在苏共二十三大快要召开，我们要确定一个方针，决定参加还是不参加，要回复苏共中央的邀请。至于文化革命，在武昌时也谈过，情况变化很快，也需要交换意见。各中央局书记将参加。

毛主席在谈到苏共二十三大时说，我们去不去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去参加是一个重大步骤，不去参加也是一个重大步骤，都关系我们对中苏关系采取的方针。依我看，我们不能去。如果去参加，那就跟中间状态的党混同了，也同右派分不清了。我们不去参加，无非他们在会上大反华，这正合我们的需要。右派去参加是不成问题的。处于中间状态的党，有的是想去的，有的想去但又不大愿意，还在犹豫不决。左派兄弟党中，估计越南党是会去的，因为他们需要苏联援助。朝鲜党怎么样？可能去也可能不去，看来他们还在考虑这个问题。因此，在去参加或不去参加这个问题上，有些党在动摇不定。要使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我看不能去，也不必发贺电，只告诉他们说不参加就行了。此事可以告诉阿尔巴尼亚，也可以告诉朝鲜和越南。对其他兄弟党是否通知，大家可以议一下。至于十月革命节，那是苏联国庆，中苏之间目前还有国家关系，可以照过去一样发贺电。对受苏共影响较大的群众团体，比如国际妇联、国际青联、国际学联以及世界工联，还有世界和平会议等等，是否还参加它们的活动，也要区别对待。

大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彭真解释说，过去给毛主席的第二个电话报告是仅供主席参考的另一设想，在北京的常委并没有肯定的意见。

会议的结果，决定答复苏共：我党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由彭真通知中央联络部告诉苏联驻华大使馆。^①

3月20日上午，开大会，大区书记都参加，毛泽东讲了三个问题。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 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937~938页。

一、关于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

毛泽东表示，不参加苏联二十三大。我们靠自力更生，不靠它。不拖泥带水。要人家不动摇，首先要自己不动摇。无非是兵临城下，不打，就是笔墨官司。毛泽东表示，贺电发还要发，向苏联人民发。

二、学术问题、教育界问题。

“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这是改变苏区政策。这种区别是很灵的，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各个方面，请各大区注意一下，学校、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各方面都要管。”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下乡劳动、半工半读、搞四清。再一个，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年轻人，让他们冒出来。”“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强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决的。”^①

毛泽东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

《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②

三、工业体制问题。

毛泽东说，中央是虚君共和好。中央只管虚，只管政策方针，不管实，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404~1405 页。

② 高凯、于玲主编：《毛泽东大观》第 671 页。

或少管点实。中央部门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现在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调，这样不行，要改变。^①

毛泽东谈到：义务劳动，先作普遍宣传，打破老一套，逐步实行。

备战、备荒、为人民。地方积累要搞，不能都集中到中央，地方不能扩大再生产，苏联吃了这个亏。

搞小钢铁厂，一个省搞几十个。我们的国家，秦以来统一了，秦始皇中央集权，停滞了，长期不发展。我们也许走了错误道路，统一，也有好处，发展了，但要长期下去，也不能发展。中央计划要同地方计划结合，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完全统死。计划也不要统死。总而言之，不能太死，要卡，不能卡死。不论农业扩大再生产也好，工业扩大再生产也好，都要注意中央和地方分权，不能竭泽而渔。救灾也是一样，要靠自己，要独立自主，天天靠人救不是办法。^②

林彪在会上又大谈要学毛主席著作。毛泽东表示，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那些，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限制，不要受束缚。林彪坚持说：列宁也是超，我们现在要提倡学毛主席著作，是撒毛主席思想的种子。毛泽东表示，那样说也可以，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缚。

参加这次会议的王任重日记中写道：“主席在谈话中谈了曹操、司马懿的当机立断，讲古比今，要我们的同志们不要优柔寡断，要大胆，不要顾虑多端。”^③

在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在一次小会上严厉地批评《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又批评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是半马克思主义，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

列席这次会议的吴冷西回忆道：“从会议厅出来，我向周总理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总理对我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回到西泠饭店，我又对彭真同志谈了这事，他也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他们两位的话可以说是安慰我，但我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④

① 高凯、于玲主编：《毛泽东大观》第671页。

②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638页。

③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05页。

24日，在《文艺座谈会纪要》下发前，毛泽东再次批示：“各件都看了，都同意。只在《纪要》内的几处，增加少数文字，或者改了几个字。请酌定。现在原件退还给你。”^①

3月26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到上海。

3月初，《二月提纲》下发以后，张春桥派上海市宣传部长杨永直到北京“摸底”。3月11日晚，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向彭真汇报了同杨永直的谈话并请示如何答复上海方面提出的问题。许立群说：“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彭真回答说：“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许立群说：“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彭真反讥道：“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许立群说：“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彭真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彭真的答复很快传到了上海，毛泽东知道后非常生气。^②

3月28日、29日，毛泽东两次接见了以宫本显治为团长的日共代表团。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在谈到党内斗争时，毛泽东说，要坚决反对我们党内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思潮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如若不注意，并采取措施加以克服，那是十分危险的。^③

3月28日、29日，毛泽东两次找康生谈话，对《二月提纲》公开表态：《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线，颠倒敌我关系，不分是非，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说：“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针对许立群责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不向中宣部打招呼，毛泽东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提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23~24页。

②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23~624页。

③ 这个谈话的内容毛泽东加进了《联合公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32页。

毛泽东说，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他还说：“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毛泽东说，《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①

毛泽东要康生告诉彭真，要就许立群的问题打电话向上海道歉。

30日，毛泽东在上海西郊同康生、赵毅敏、江青、魏文伯、张春桥五人谈话。

毛泽东说，学术批判文章不要送审。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②

毛泽东主张两条：驳倒、吃饭。驳倒，就是搞有职无权，这比秦始皇好！

毛泽东提出，要有策略。不要太多。要区别对待。对郭沫若、范文澜要保护，郭功大于过。谁也会犯错误。

3月31日，康生回北京向周总理、彭真同志详细地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三次谈话。^③

毛泽东发话之后，形势急转直下。

4月1日，毛泽东最后签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当天，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杭州。

同一天，张春桥拿出了一个批《二月提纲》的《几点意见》。

2日、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被中宣部“扣压”的戚本禹、关锋等人批所谓“要害”的文章。中宣部被撇在一边。

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会议，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书记处会议上对彭真进行了批评，彭真和到会的一些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并“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406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34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31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406页。

书记处会议决定：

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

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①

4月12日，周恩来视察了北京某地电台，嘱咐把全国的电台布局（包括中央直属台、战备台）分类分颜色在一张大图上标出送来。周恩来这样做并非无的放矢，中央已做了防止意外的准备。

同日，在北京的陈伯达，按照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精神，起草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草稿。

14日，陈伯达起草的《通知》草稿由周恩来等报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

上午8时30分，毛泽东圈定了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名单。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刘志坚。组员：尹达、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吴冷西、王力、穆欣、杨永直。顾问：康生。毛泽东将此件与陈伯达起草的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一起，批送在上海的江青。

江青：

送上北京来件二份，请你们研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请康生、伯达诸同志于今日或明日去上海同你们共同讨论一次。然后由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来此地报告，最后定案。

毛泽东

四月十四日上午八时半^②

上午9点，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写信。

恩来、小平、彭真同志：

四月十二日的来信及附件，收到阅悉。请康生、伯达同志和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406~140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38页。

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组同志于今天（十四）或明天去上海，同上海同志商量一下文件问题，然后请康生、伯达同志于十六日夜間或十七日上午来此地。你们可于十六日来此。各中央局是否要来人，请你们酌定。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上午九时。^①

上午，毛泽东又批：“有一些修改，请斟酌。送恩来、小平、彭真、康生同志。”^②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康生、陈伯达和其他起草小组同志14日即赶到上海，住锦江饭店，开始重新起草《通知》，小组每写成一段文字，即由张春桥负责，派专人送到杭州，由毛泽东亲自修改，然后再返送上海，直送张春桥。^③

从4月14日至17日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作了三次修改，加写了许多重要的话。

14日，毛泽东对4月12日中办机要室《文电摘要》第一六八号上《在京艺术院校试行了半工（农）半读》一文做了长篇批示。

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譬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38~39、39页。

③ 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上，第67页。

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一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极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从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一些从事过一二次四清运动从工人农民那里取了经回来的人，他们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干劲，这就好了。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泯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

毛泽东

四月十四日^①

同样在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办印发的毛泽东关于机要保密工作的一些指示中，毛泽东在1949年9月21日在政协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的一段话：“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34~35页。

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后面批注：“这一段话讲得准确，请同志们经常地讨论这个问题。”^①

4月16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等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再次来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同志的错误。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刘少奇因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在20日才到杭州出席会议。

当天，在彭真直接指挥下，北京市委在《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人的材料，并加了一个《北京日报》和《前线》的编者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当天广播了这个按语。毛泽东认为，彭真和北京市委这样做是“真包庇，假批判”，“舍车马、保将帅”。指示通报全国，禁止转载《北京日报》的材料和按语。当晚，新华社通知撤销了这个广播。^②

18日，毛泽东在康生上报的批判和撤销《二月提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修改稿上批示：“已阅。退康生办。”^③

《通知》的修改基本完成。

19日，中央通知首都各新闻单位，不要转载16日《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中央负责同志批评，北京市委16日按语，避重就轻，舍车保帅，包庇右派。^④

20日上午6时半，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4月22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彭真同志。

4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作长篇讲话。

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朝里有人。”“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评一、二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区、各省市。”

①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37、39页。

② ④ 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个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上，第69、70页。

“各地方党委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现在抓嘛！”

“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不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

毛泽东严厉地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①

23日，毛泽东在中办教育办公室4月19日关于高教部党委召开座谈会，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情况简报上批示：“此件好，发各同志看。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②

24日8点45分，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有政治局大部分成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初步通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毛泽东同意邓小平提出的文化大革命搞六个月结束的主张。

27日，毛泽东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稿上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28日，毛泽东又在康生、陈伯达28日下午6时报送的27日修改誊清件上做了两处技术性改动，定稿。毛泽东对《通知》进行了多次修改，亲自动笔加进了不少话，但最重要的是公开号召全党开展文化大革命，夺取文化领域的领导权，清除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是史无前例的。

毛泽东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③

4月28、2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毛泽东又讲了两次话，对彭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407~1408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242页。

②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46、43~44页。

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批评。

毛泽东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情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条件。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①

这样彭真被打倒已成定局。

原来周恩来主管党的日常工作，彭真管党，罗瑞卿管军队，周恩来管政府。彭真、罗瑞卿一倒，主持工作的就只剩下周恩来了。这次会议为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准备。

5月3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到了上海。

4日至26日，根据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部署和毛泽东在会前的安排，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参加。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约80人。全是在北京工作的和临时抽调在北京工作的。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都没有参加。

16日上午，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18日上午，林彪在大会上讲话。

这次会议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但会议的开法是由他会前安排的，会中又有康生的请示汇报，获取指示。所以这次会议虽然是由刘少奇主持，但真正的主持者是在外地的毛泽东。

5日，周恩来陪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到上海，毛泽东接见了代表团，向他们介绍了中共党内斗争的情况。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在座。

毛泽东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

^① 高凯、于玲主编：《毛泽东大观》第671~672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242页。

晓夫修正主义。”斯大林完全没有料到他一死就大反斯大林。

毛泽东说：“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毛泽东谈了从陈独秀到高岗、饶漱石这种“部分分化”现象。毛泽东说：“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

毛泽东说，第二种可能就是“剥笋”政策，（把坏的）一层一层地剥掉。45年来，前后一共“剥掉”了几十个中央委员，但现在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毛泽东说：“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毛泽东说：“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①

在这期间，毛泽东于5月5日下午和5月7日下午同周恩来等人谈话。

5月7日，毛泽东看到军委总后勤部5月2日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即兴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人们后来称它为“五·七”指示。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41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第4卷，第1841页。

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①

5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修改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10日，经毛泽东同意，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批判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和吴晗在《前线》杂志的“三家村札记”专栏所写的杂文。文章提出：“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次吹捧，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53~54页。

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这已十分清楚地向社会公开点明，批判对象不只是邓拓、廖沫沙、吴晗，他们背后还有更大的人物在“指使”和“支持”。

同一天，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了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全体同志，双方进行了会谈。毛泽东设宴招待了阿尔巴尼亚同志。

11日，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声讨所谓“三家村”的斗争很快在全国蔓延开来。

同一天，毛泽东对原北大哲学系教员张恩慈《我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一文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①

14日，毛泽东再次给林彪写信，对下发5月7日信提出意见。

林彪同志：

此件如你同意，即可印发中央军委以及此次会议，让他们带回去，加以讨论，如无意见，即可执行。印时，要请中央加个批语。请你酌办。

毛泽东

五月十四日^②

5月15日，毛泽东离开上海返回杭州。

同一天，在北京，遵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与叶剑英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提出组织以叶剑英为组长的首都工作组，保卫首都安全。

16日，北京，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17日，毛泽东对章士钊的来信做了批示。5月10日，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信，害怕文化大革命，害怕成为斗争对象，提出暂不出版《柳文指要》一书。信中说，连日读到各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详细记载，“我的思想不期受到绝大的震动。而将自己的笔墨工作，仔细检讨，觉得最近提交中华书局准备出版的柳文指要，应当撤回重行检查”。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57、55页。

毛泽东批示：“刘、周、邓阅。送康生同志，与章先生一商。一是照原计出版；二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二者择一可也。”

毛泽东针对章士钊信中反映的思想，做了一些批注，其中说道：“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①

5月18日，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安全工作，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拟调部队进京和任命付崇碧为北京卫戍司令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批示：“照办。”^②

2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关于陆定一、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草稿）。

同一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在中央书记处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③

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

同一天，首都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决定：如遇有紧急情况，需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31日，周恩来将会议情况及部署报告毛泽东。

27日晚，汪东兴给毛泽东传来常委商定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对4月2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名单做了三项修改。1.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各增加一人，成员另定；2. 原组员陈亚丁改为谢镗忠；3. 去掉吴冷西。

28日，毛泽东同意了中央常委商定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改组后的名单为：

组长：陈伯达。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58~5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1~32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12页。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顾问：康生。^①

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召开碰头会研究，决定派工作组，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张承先到北大。周恩来当场用电话请示在杭州的毛泽东，获得同意。

30日，刘少奇、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说，两个月来，《人民日报》的威信大大下降，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由于报社编委会不能改变现在的局面，许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组去。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的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5月31日即进报社工作。报社内部进行整风，学习文件，也可以继续写大字报。一部分态度较好、愿意积极工作的编辑人员，要集中力量维持每日版面。在报纸版面改观后，再进一步解决内部问题。毛泽东当天23时批示：“同意这样做。”^②

31日，陈伯达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并改组报社的领导班子。

6月1日，毛泽东对《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1966年5月27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登载的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1966年5月25日写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珏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批示。

康生、伯达同志：

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

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③

当时，毛泽东正在考虑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觉得，单靠发表一些政治批判文章（不管它写得怎样尖锐），单靠采取一些组织措施（不管它牵动到多么高的层面），都还远远不够，许多人对这些仍不那么注意，仍不足以形成一股势不可当的巨大冲击力量，不足以解决他所深深忧虑的

① ②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45页注7、第61、62页。

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它的突破口又在哪里？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同一天，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大字报，他们写道：“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毛泽东觉得，如果公开发表这张大字报，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突破口，可以打乱原有的秩序，使群众的手脚放开。他当即写了批示。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北京大学校园内就像开了锅一样，立刻沸腾起来。第二天，《人民日报》又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一篇《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为这篇评论员文章加了一条注，其中说：“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决抵制。”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局面顿时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里，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学校党组织陷于瘫痪，乱打乱斗的现象开始出现。毛泽东这时所在的杭州也不例外。^①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授意、修改、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这天起，该报连续发表社论，把“五·一六”通知和林彪“五·一八”讲话的精神扩散到全国。

6月3日，刘少奇主持常委扩大会，制定了“内外有别”等八条规定。同意李雪峰提出的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文化大革命。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派张承先到北大。派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②

同一天，毛泽东审阅同意了新华社关于改组北京市委和派工作组替代北大党委的通讯稿。

6月初，华东局召开会议，传达贯彻5月底结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华东局委员、华东地区各省市的负责同志参加。

方志纯回忆：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413~1415 页。

^②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 31~32 页。

我就是带着这样一种心情到上海来参加华东局会议的。出席这次会议的都是华东局委员、华东地区各省市的负责同志。会议的内容是传达贯彻5月底结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先是传达，然后是讨论，讨论围绕的中心是开展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的所谓“批判”。

凭着多年的政治经验，大家更加感觉到政治气候的严峻。因此，在讨论会上，发言的不像以前开会那样踊跃，而且话语显得有些谨小慎微。结果，华东局会议开了几天，气氛总是不那么活跃、热烈、和谐。

会议中途，华东局突然接到通知，毛主席在杭州，要请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去谈话。接到通知，大家即登车赶赴杭州。

谈话是在杭州的一座别墅里进行的。毛主席与各路“诸侯”，倾心交谈。

毛主席先讲了一下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然后转到了中心话题上，他说：“今天，我把大家请来，主要是解决个别省几个同志的不团结问题。犯了不团结错误的同志，要作出认真的自我批评，吸取教训。”

毛主席说到这里，把手抬起来，轻轻地在空中划了一道弧形，指着大家说：“这里也给在座的同志们打个招呼，希望大家都要引以为戒，重视团结这个问题！团结是我们党力量的源泉，团结是我们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证，不团结，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当然啰，我们的团结是有原则的，不是和稀泥……”

毛主席的神情是严肃的，但话语里却充满着信任、爱护、希望。

毛主席的话音刚落，性情豪爽的许世友抑制不住地站了起来，激动地说：“我们坚决按主席的指示办，主席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

但是，大多数人情绪始终保持着冷静。应该说，毛主席这次杭州谈话，给大家以教育和鼓舞，思想也似乎亮堂了许多。但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人思想上一番思索：本来是个别地方、个别同志之间存在的不团结问题，毛主席为什么要兴师动众，把大家都找来亲自谈话呢？这是不是暗示着党内一场斗争、一场分裂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因而团结问题也就成为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摆在了全党的面前呢？这仅仅是一种猜测和分析，在当时的情况下谁也难以回答。

杭州这次见毛主席，是集体谈话，时间又短，毛主席没有单独找我谈

什么。谈完话，就又返回上海，继续着未开完的华东局会议。^①

“文化大革命”在不少年轻幼稚的青年学生中引起另一种极端的反应。有一个干部子弟写信说：万万想不到彭真、罗瑞卿这些老党员原来是这样一批危险人物。“现在我觉得我们只能相信毛主席，只能相信党中央（我指党内），一切人都应怀疑，只要不符合主席指示，什么人都要攻。如果我们的心软（我现在还有这样的心理），要会亡党亡国亡头。”他和另外几个学生的信，后来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之三印发。

5日，江青向毛泽东推荐反映北大和科学院社科部“文革”动态的简报。毛泽东作了批示。

同一天在北京，周恩来就中南海、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问题约周荣鑫、李质忠、童小鹏、汪东兴谈话，作具体布置和指示。

6月，毛泽东在杭州写了《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②

毛泽东后来说：“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③

6月8日，毛泽东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拟赴杭州向毛泽东请示文化革命问题表示，会议请陈伯达、汪东兴及各大区负责人参加，让中央常委酌定。

9日至12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等赴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并在毛泽东主持下讨论了“文化大革命”问题。毛泽东对派工作组已表示怀疑，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他还说，“学生不读书了。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至少有几次

① 毛泽东与我征文活动组委会编：《我与毛泽东的交往》第38~40页。

②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17页。

会有大区书记参加。刘少奇等请毛泽东回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问题。^①

6月10日，毛泽东与各大区负责人在杭州谈话，向他们打招呼，要他们在各地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

“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②

同一天，毛泽东还在杭州会见了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心。毛泽东说：“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杜甫有首诗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422页。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417页。

毛泽东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毛泽东说，中国现在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①

6月15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当日到了南昌，住在专列上。

16日，毛泽东找江西省委领导人谈话。然后离开南昌去长沙。

方志纯回忆：

毛主席途经南昌，列车停靠在南昌站，毛主席没有下车停留，而是在列车上接见了我们省委少数几位领导同志。

我是带着几分忧愁的心情去见毛主席的。

毛主席跟我们握过手后，主要询问了运动的一些情况。听完我们的简短汇报，毛主席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②

夜里10点以后专列到达长沙。毛泽东在省委九所三号楼住了一夜。因长沙天气很热，当时又没有空调，接待办的同志在走廊里摆了几口大缸，里面放上冰块，想降一下温，但还是起不了多大作用，毛泽东没有休息好。湖南的同志说韶山滴水洞很凉爽，建议毛泽东去那里住一住，毛泽东同意了。

17日下午4点半，在王延春、徐启文等省委领导同志陪同下，毛泽东前往滴水洞。同行的还有中办副主任张耀祠、中办警卫局局长曲琪玉，身边工作人员张玉凤、护士吴旭君；省委接待处处长肖银如，省公安厅副厅长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18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67页。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上，第83页。

^② 毛泽东与我征文活动组委会编：《我与毛泽东的交往》第4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18页。

长高文礼、记者钱嗣杰。

毛泽东的滴水洞之行，显得非常神秘，有些人写文章，说毛泽东在滴水洞是搞阴谋，要整刘少奇。实际情况远非如此。这段时间是毛泽东离开杭州避开运动，短暂休息的几天。他很少找人谈话，整日与书籍文件为伴。审批飞机从北京，汽车从长沙，用机要通讯送来的文件资料。当时，江青住在杭州，她打电话说要来湖南，毛泽东制止说：不要她来，她来我就走。在这个安静的地方，他整整待了21天。他每天都要看许多从北京送来的文件资料，沉思应该怎样对待这场他在事前“也没有料到的”来势如此迅猛的“造反”浪潮，怎样迎接新的更大风暴的到来。

《毛泽东回湖南纪实》对毛泽东在滴水洞的生活，做了客观的反映，现摘录如下。

1966年6月17日下午4时左右，一支由三辆轿车、一辆客车组成的小型车队驶上通往滴水洞的专用公路。平日里，这条路极少有车过往。蓦然出现这支神秘的车队，正在路边山脚打柴的一个小女孩直起身来，好奇地朝行驶在中间的轿车瞥了一眼。恰好，车内的乘坐者经过100公里的旅行，压抑不住临近目的地时的一种渴望，正拉开了窗帘向车外浏览。天啊！小女孩稍稍一愣神，然后一溜烟跑回家，气都喘不过来，兴奋地宣布：“我看见毛主席了！毛主席住进滴水洞了！”

爆炸性的消息，像风一样传开。韶山人立刻想到了毛泽东1959年6月的故园行，山村里又开始洋溢着节日的气氛。

但是，很快就有公安人员找到了小女孩家里，告诉她：“你看错人了，车里坐的不是毛主席。你再不准乱说了！”韶山人盼望毛泽东回来，但他们相信公安人员，山村又恢复了平静。

其实，车里坐的正是毛泽东。但他不能像七年前那样回到父老乡亲中去，根据规定，他这次回韶山要求做到“绝对保密”。为此，有关部门还对工作人员规定了七不准：不准主动接近主席，以免影响主席的休息与工作；不准主动和主席握手；不准主动和主席交谈；不准直接向主席提出问题；不准向外打电话与通信；不准违反安全规定到自己工作以外的地方去；不准随意出走，外出要经过批准。

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为毛泽东的主要随员。湖南省由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省委书记处书记徐启文出面接待，具体事宜由省委副

秘书长杨树青、刘亚南直接处理，安全保卫由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负责。

炎夏，滴水洞的平均气温比长沙低2~3度，但因为没有任何空调设施，对年迈体胖的毛泽东来说，仍然是十分闷热，衬衣汗湿了，沾在他魁伟的身躯上。王延春很是难过，对毛泽东说：“主席，对不起，太热了！”晚年的毛泽东，说话又慢又柔，他风趣地安慰王延春说：有什么办法么！老天爷的事嘛！后来，在毛泽东的卧室和办公室各放了一只猪腰型的木桶，每个桶里放了200斤冰块，再用电扇不停地吹冰，才算解决了降温的问题。

一般，毛泽东一天只吃两餐饭，第一餐是下午1点至两点之间，第二餐是晚上11点左右。每餐不超过四菜一汤，即一个荤菜，一个半荤半素，两个素菜，一个汤。菜要求少而精。他对服务员说：菜吃不完就倒掉了，饭若剩下来，热一热还可以吃嘛！湖南省委接待处特级厨师石荫祥，当年为毛泽东掌厨，他记得食谱有如下内容：红烧鲫鱼、火焙虾米炒辣椒、青炒马齿苋、苦瓜烧肉、鱼头葱汤。干饭二两，烤玉米棒子一个或少许面条、烤红薯。

除了偶尔外出散步，毛泽东终日在滴水洞一号，关在一个书和文件、材料的世界里。放着浏阳菊花砚的办公桌上是书；2.1米长、1.5米宽的木板床上也是书；因为毛泽东患有便秘，工作人员还在卫生间的坐式马桶前放了一个茶几，供他看书、批文使用。北京每天一趟专机飞往长沙接送文件，长沙的专车及时往返于机场和滴水洞。韶山冲瞻仰毛泽东旧居及旧居陈列馆的人群熙熙攘攘，一日多似一日；滴水洞一片宁静，毛泽东在静默中不停地看、读、写、想。普通工作人员以为毛泽东真的是来山冲深处休息，他们严格恪守着十不准的规定，但却没有想到毛泽东也会有孤独，一种知音难觅和高处不胜寒的孤独。

这天，一辆客车停在一号楼门外，一行人说说笑笑准备上车。毛泽东笑着细声问服务员：他们都上车，去么子好地方？

服务员笑道：瞻仰您的旧居和陈列馆。见毛泽东兴致很好，她又调皮地补了一句：您也去不？

毛泽东摇摇手，顿时失去了先前的兴致：你们去吧，我不去，我知道我在那里站岗。

参观回来，工作人员讨论，都说对毛泽东一家六位亲人为革命而牺牲的事迹印象很深。毛泽东知道后，对王延春说：韶山的烈士很多，不要只

宣传我一家，要宣传韶山党支部。

“站岗”一说，服务员听着很有趣，以后还是传开了。红语录、毛泽东瓷像、石膏像、金属像、花岗石雕像在各大机关、工厂、街道、广场举目皆是，人们才理解到“站岗”的幽默含义。“T”字形的一号楼坐北朝南，南北伸出的“T”字尾巴是一条含在房子内的宽敞过道，过道下面是一条由东向西的水沟，沟内有小金鱼成群悠游，毛泽东小憩时我也去观赏。有一回，他笑着对服务员说：捞上来看看，看谁捞得着？一个服务员用手去捞，当然捞不着；另一个想了想办法，找来一个捞子，一下就捞上一条，毛泽东看了看，笑着说，捞上来就不自由啰，还是放它回去吧！

共产党和人民，领袖和群众，是鱼和水的关系。他毛泽东好比是鱼，当然也希望在水中获取自由，毛泽东做的正是巧妙暗示，可惜没有人领会。

对于工作人员来说，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是第一位重要的任务，为此，他们还不惜限制毛泽东的另一种自由。

一次，毛泽东踱出一号楼散步，走过走廊，走过二号楼，再向北，这就要上牛形山了。工作人员劝阻道：主席，山上没有路了。毛泽东怔了怔，没有吭声，往回走，退到一号楼前，向南可以上龙头山，但是刚到山脚，又有工作人员前来拦阻，说是山上没有路，不好走。毛泽东有些愠怒，说了一句：路是人走出来的嘛！但是，他不能难为一个工作人员，只好又默默走了回去。按照规定，工作人员不能靠得太近，他在毛泽东后面不远不近地跟着，遥遥照应。

湖南省委当时将下到各地工作的省委书记和省委常委以开会的名义召集到韶山招待所（即今天的韶山宾馆），湘潭地委、县委书记也应召而来。6月26日，毛泽东在滴水洞一号楼会议室接见他们。

据华国锋回忆，有王延春、徐启文、华国锋、万达、李瑞山、苏钢、杨树青、刘亚南、樊茂生、郝诚、熊清泉等人参加了这次接见，而且还在客厅和门口照了相。华国锋回忆说，这次就是同大家见见面，不是召开会议，没有谈多少话，“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更是没有提及，因为湖南省委认为“文化大革命”只是文艺界的事情，贯彻《五·一六通知》要求成立文化大革命小组时，华国锋还以主管财贸、应集中精力搞好湖南的小化肥工业为由，表示不便参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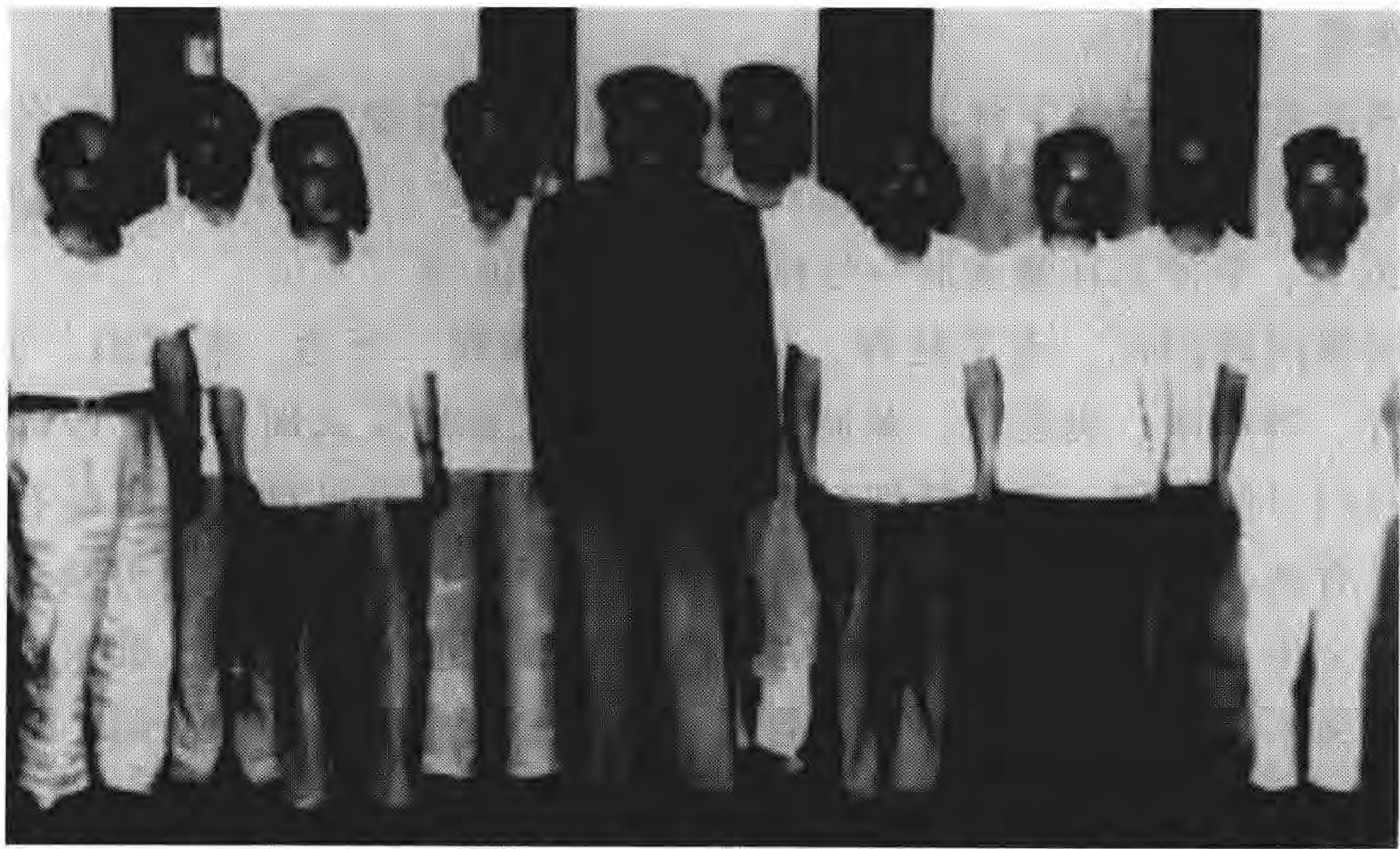
接见完毕，毛泽东风趣地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

长征了。但是人们以为毛泽东说的只是一般意义上的“长征”，并没有过分注意。在这次接见前，王延春还曾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南省的“四清”和社教情况，谈到派出工作队的人数时，报告了一个很可观的数字，毛泽东打断他的话头，缓缓地说：哪有那么多明白人哟！这已表达毛泽东对“四清”和社教的不满意，但王延春也没有细究个中深意。

到了韶山，毛泽东的心充满乡情，在滴水洞，他以主人的身份给人们摆龙门阵：喏，从这里上去是龙头山，龙头山过去是黄田坳，以前以黄田坳为界，山那边是湘乡，山这边是韶山，所以黄田坳又叫湘潭坳……

6月18日夜，阵雨袭击了滴水洞，这正是早稻抽穗扬花的季节，农民的稻子会不会受这场雨的影响？19日散步时，毛泽东径直朝山口走去。过了三号楼，过了哨卡，过了门卫，地上漆着醒目的白线和“警戒线”三个字，毛泽东视而不见，继续往前走，警卫急得莫可奈何。山下稻田已经清晰在望了，保健医生匆匆赶上来，轻声劝阻道：主席，这里风太大，您会着凉的。毛泽东还准备往前走，医生又喊了声：主席。显然，医生在执行“命令”了。毛泽东只好转过身，走到韶山水库的大坝上，朝山下深情凝望，百十亩稻田像绿色的绒毯，在风中微微起伏着。

22日，安排了一次游泳。上午11时，毛泽东在王延春陪同下乘车来到韶山水库（这个水库又被称为滴水洞一号水库）。他一扫连日的庄严肃穆，



1966年6月26日，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会见湘潭地、县委书记。（摄影/钱嗣杰）

兴致勃勃，与工作人员说笑不停。忽然讲到工资问题上，他问护士吴旭君：你每月工资多少？吴答道：90元。毛泽东又问：你爱人呢？吴回答：120元。毛泽东说：你工资不低哟！给你减工资好不好？吴旭君答道：比我工资高的多了，要减一块儿减。毛泽东笑道：好厉害，将军将到我头上了，好，一块儿减。

更衣后，喝了一杯酒，点燃一支烟，毛泽东走到水边，用手沾水拍了拍胸部，一路踩水到水库中间，换成仰泳，舒展了身体，轻轻松松地说：我休息了。

然后静止不动，直到把那支烟抽完，才又重新游泳。边游边问：“水库容量多大？”有人答道：“15万立方米”。“占多少田？可灌溉多少亩？”“占十多亩田，可以灌溉40余亩。”又有人回答。

游到水库尾部，陪同请毛泽东上岸休息。随游的几个青年人上岸，有的起了鸡皮疙瘩，有点寒意。毛泽东风趣地说：这里上面是夏天，下面是冬天，正好避暑，游过去，在水里休息吧！游到另一边，陪同送来肥皂，毛泽东擦得满脸泡沫，一头钻进水里，洗了个干干净净。浮上来又要肥皂，工作人员说：主席，这水碱性很强。毛泽东说：那是很好的自来水嘛！工作人员又说：您已经洗了一次，够了。毛泽东幽默地回答：多洗一点肥料，给老百姓下田。

又一次被故乡的山水怀抱着，毛泽东舒舒服服游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尽兴上岸，站在水库大坝上。他再一次久久凝视山下的田野和村庄，然后驱车返回。

毛泽东接见湖南省委领导后，滴水洞里上上下下极不情愿地感觉到，分离的日子快要来临了。根据安排，毛泽东将于6月28日下午4时离开滴水洞，这主要是考虑到毛泽东晚睡晚起的习惯，准备让他充分休息以后



1966年6月21日，毛泽东与张耀祠等在韶山滴水洞。（摄影/钱嗣杰）

再上路。但27日夜，毛泽东几乎通宵未眠。28日凌晨2时，毛泽东吃了早餐，在一号里面散步。皮拖鞋踩在地毯上，发出轻而闷的“扑扑”声，他沿着内回廊穿过娱乐室，来到凉台上，这黛色的、富有灵气的山峦，正静静地坐在暗青色的天幕下，无言地与他作别。毛泽东返回一号，洗了澡，在服务员服侍下上了床，但他怎么也睡不着，拧开了台灯，半躺着看文件。电扇嗡嗡轻响，冰块一点一点消融；天色渐渐变蓝、变白、变亮了。毛泽东将值班卫士招进来，吩咐他：通知张耀祠、高文礼，我上午就动身。

毛泽东的决定，没人敢改。他要提前动身，顿时把高文礼急得满头大汗，从韶山到长沙，从长沙到武汉，沿线差不多600公里的保卫措施和清道安排都必须重新调整，而时间只有三个来小时了。

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及常委王延春、徐启文、华国锋、万达、苏钢、李瑞山、郭森，省委副秘书长杨树青、刘亚南，湘潭地委书记樊茂生，湘潭县委书记郝诚，韶山公社书记熊清泉，省公安厅厅长李强、副厅长高文礼，韶山管理局局长王毅忱、韶山毛泽东同志旧居陈列馆馆长马玉卿、警卫处干部刘纪林、高绍英、李鸿群、于涌海及滴水洞工作人员共70余人前来为毛泽东送行。张耀祠走进一号，对毛泽东说：大家想跟您照张相。毛泽东欣然允诺：行，大家都来，一起照吧。上午9时左右，毛泽东身穿灰色派力司中山装来到人群中，大家列队站在一号门前，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按下了快门。照完这一张，未经毛泽东同意，省委办公厅负责人请前排蹲着的服务员让开，剩下各级领导，又与毛泽东合影一次，毛泽东略带不满，但仍不失诙谐地说：你们把她们都赶走了，又跟我照。

照完相，毛泽东与送行的人及滴水洞的工作人员一一握别。人们分立两旁，车队已按出发的顺序摆好，按常规该上车走了。毛泽东忽然又走进一号楼，在客厅的椅子上坐下来，小声但十分清晰地说：你们先走啰，我还要再坐一下子哒！这是无法控制的离乡愁绪。几个女服务员的眼泪一下就涌了上来。服务员郭国群赶紧泡了一杯茶，递到毛泽东手上，人们在他周围默默站立着。毛泽东缓缓喝完茶，放下杯子，起身，慢慢打量了一眼房子周围，走出一号，又看了看四面的群山，躬身上车，车门轻轻合上……

车开到韶山冲广场附近，毛泽东示意放慢速度，他拉开窗帘，注视着阳光下的毛氏宗祠和陈列馆门景。俄顷，他放下窗帘，坐正身子，两眼看

着前方。车队加速，6月28日上午10时左右，毛泽东离开韶山，往长沙而去。^①

6月28日上午10时，毛泽东离开韶山前往长沙，从长沙大托铺登上专列，当天到了武汉。

30日凌晨2时，毛泽东就6月22日刘少奇、邓小平来电话请示7月1日发表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做了批示。

少奇、小平同志：

来电早已收到。经过考虑，那篇讲演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王任重同志也不赞成现在发表。另外，请告伯达、康生、陶铸同志，将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二条草案，扩成为廿条左右。因为十二条草案中有许多条混淆不清，有若干条，每条可分为两三条，使每一条只说一件事，明白晓畅，读者易懂，较为适宜。希望在一星期内，在北京讨论几次，并草成第二稿，为我送来两份为盼。另外，华东局廿一日给中央报告华东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部署那些方面，值得参考。

毛泽东

六月卅日二时^②

当天，刘少奇、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草稿）》送毛泽东审阅。

刘少奇、邓小平的信中说，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好，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完不成。在京同志讨论后认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教

^①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160~16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1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64页。

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交、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即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①

7月2日毛泽东批示：

少奇、小平同志：

六月三十日给我的信和通知，已经收到看过。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

毛泽东
七月二日^②

当天，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通知。

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

江青：

六月廿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廿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69页。

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

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1966年7月8日^①

7月5日，刚刚上任不久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和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平化就改组后的中宣部的组织和工作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信：主要内容是：

一、彻底改组部的领导。

二、新的工作方针。今后最根本的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宣传毛泽东思想。

三、目前工作的抓法。计划在七八两月，组织对处长以上重点对象的批判，并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发扬民主，揭露问题，结合扩大队伍，把文化革命搞深搞透。同时，抽出一部分力量，抓在9月召开的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一些日常工作。

7月10日，毛泽东批示：“陶铸同志：同意你们的意见。请中央常委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71~74页。

最后决定。”^①

11日，周恩来陪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飞武汉。

下午4点半，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了尼泊尔客人。

11日至12日，王任重陪周恩来到毛泽东处汇报工作。毛泽东将7月8日给江青的信给总理和王任重看了。总理问主席，是不是我的工作又犯了错误，主席说没有那回事。总理建议回去找林彪谈谈。毛泽东表示同意。12日，周恩来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青。7月14日周恩来从上海飞大连与林彪谈话，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林彪听后很不安。最后毛泽东应林彪的请求销毁了原件，江青保留了一份抄件，批林整风时经毛泽东校阅，向全党做了传达。

6月28日，北京语言学院七名共青团员、青年学生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我们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过去他们在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经受了考验，不愧为英雄好汉。现在他们当了“官”，做了“老爷”，政治上有了地位，生活上有了特殊待遇，革命性也就远不如以前高了。长此以往，他们就会逐渐失去在革命道路上前进的“自由”，就会逐步蜕化成特殊阶层、修正主义者。为此，我们认为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革：1. 降薪，取消各种特殊待遇。2. 革命干部应该经常地参加劳动。3. 凡是违反党纪国法，做出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应一律予以制裁。4. 尽快在全国普及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5. 在假期，青年学生经常组织起来，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劳动，或者到部队去当兵。

毛泽东7月12日批示：

“伯达、康生酌处。此件已阅，请你们看一下。他们所谈问题，确实重要，应在运动中解决。请你们通知他们：信已收到，看到，并注意了。”^②

7月中旬，郭沫若到了武汉，等待陪同毛泽东接见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

毛泽东听说郭沫若也在武汉，想起去年七八月间曾收到郭沫若的一封信，希望能得到《西江月·井冈山》一词的手迹。但这两年，无暇顾及。但毛泽东没有忘。15日夜，在东湖客舍书写了《西江月·井冈山》一词。第二天游长江后，毛泽东派秘书将写好的词给郭沫若送去，并附有一封短信。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76、77页。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检阅横渡长江。（摄影/钱嗣杰）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再一次畅游长江。（摄影/钱嗣杰）

7月16日，毛泽东检阅了武汉市第十一届横渡长江游泳比赛的游泳大军，然后畅游长江。横渡长江后，王任重同他谈起给江青的那封信。

当73岁高龄的毛泽东在武汉横渡长江上船后，49岁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高兴地对毛泽东说：“主席的身体真好，我真不敢相信，你的游程近30华里，游了一个多小时。”

毛泽东不无所指地说：“我知道有人一直盼望我死，但我在短时间内是不会去见马克思的。因为这场伟大的文化革命还没有取得最后胜利，所以马克思不要我的。”

王任重笑着说：“主席万寿无疆才是全国人民的幸福呢。我看，中国的右派分子成不了气候。我看了主席7月8日的那封信，我觉得主席可能把形势估计得过重了，我认为当前形势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是一派大好的。”

“现在不说那样的话。”毛泽东摆了摆手说。

回到毛泽东在东湖宾馆的住处，王任重见毛泽东还无倦意，就坐在他对面想说些什么。但没等他开口，毛泽东就接着对给江青的信的讨论，问王任重：“你不是说我把形势

估计得过重了吗？能否具体谈一谈啊！”

王任重没有顾虑地说道：“主席7月8日致江青同志的信我看后，产生了这种感觉的。主席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主席的这个估计是对的，但我觉得中国不是这样，也不会是这样。”

“为什么呢？”毛泽东不解地问。

“因为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王任重说，“不过，我还是同意主席的断言和预见：‘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主席的这些话，写得非常精彩。”

听完王任重的评论，毛泽东对他的记忆力真有点吃惊。当时毛泽东写好那封信后，正赶上王任重陪同周恩来向他汇报工作，便把信给他们看了一遍，然后很快收了起来。而这位被称为“秀才书记”的王任重竟过目不忘。

7月17日，毛泽东在武昌接见了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以及国际组织的观察员，并同他们一起合影。

接见结束，毛泽东即登上专列离汉返京。

途经郑州，专列稍停，省委书记刘建勋等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作。

午夜，专列途经邯郸，停车休息。汪东兴从专列上下来，对匆忙从北京赶回邯郸的地委书记庞均说：“主席刚刚睡着，你们等等吧。”毛泽东睡觉一般是很晚的，也许是游泳后体力尚未完全恢复，才睡得这么早。毛泽东习惯于晚上办公。晚上11点吃过一次饭后又继续办公，直到凌晨四五点钟才睡，到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起床。一天最多睡四五个钟头。庞均等到凌晨2时，毛泽东仍没有醒来。汪东兴说：“别等了。”庞均随专列回北京。

18日凌晨，毛泽东回到北京，他没有回中南海，而是直接到了中央文



1966年7月17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
(摄影/钱嗣杰)

革所在地——钓鱼台，住钓鱼台12号楼。

毛泽东连续听取各方面的汇报，并看了北大、清华等几所大学的简报，对北京地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极不满意，认为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在校学生受到压制。张春桥把刘少奇批转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时所写的批语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①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422页。

第十一章

动荡年代



- 平息动荡的一次努力
- 南下了解九大精神落实情况
- 战备疏散到武汉
-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突发事件
- 为解决林彪问题南下打招呼
- 赴南方休养

五十三 平息动荡的一次努力^①

1967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二年。毛泽东原设想“文革”“一年开张，二年见眉目，三年结束”。但是，烈火一旦烧起来，许多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更不用说还有人要利用“文化大革命”达到自己的目的。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展开，社会上逐渐形成两大派，一派是以党、团员和干部、工人的大多数为主，他们拥护毛泽东“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要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主张按“十六条”来开展“文化大革命”；一派打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旗号，到处围攻冲击党政机关，乱批、乱斗，到处“夺权”，大搞打、砸、抢，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在那个年代，一派受到中央文革的保护、纵容，实际上是他们手中的工具，被封为造反派；一派受到排斥打击，被污为“保皇派”。两派都抬出毛泽东的招牌，攻击对方反毛泽东思想，势不两立。而参加“三支两军”的人民解放军，绝大多数，因为他们的阶级感情，很自然地站在了占多数的“保守

^① 本篇引用了较多权延赤纪实文学作品：《微行——杨成武在1967》，该作品是权延赤采访杨成武将军后的作品，是关于“七·二〇”事件的专著，搜集了一些难得的资料，该作品的真实性可以考证。笔者在1967年“七·二〇”事件期间就在武汉，亲身经历了“七·二〇”事件的前前后后，对权延赤在书中提到的一些材料、文件、记述，有深刻的感受，笔者是相信这些材料的真实性的。不管怎么样，纪实文学不等于历史记录，这里请读者加以注意，如果有更好的材料，请以真实材料为准。

派”一边。随着斗争的发展，“四川动刀，湖南抡枪，赣州打一仗，死两百人，伤者难以计数。江苏、安徽天下大乱……全国各地差不多都有了两派、三派！”^① 这种状况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他曾经谈到，现在我们的队伍分散了。全国各地，不像过去延安时集中。延安由上到下整风，很好。现在由上到下困难。我们搞社教，由上到下不解决问题，所以要开展一次由下而上的整风运动，就是由我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② 毛泽东自己也知道，对于“文化大革命”，赞成的人少，反对的人多。“都拥护？我看有人就不拥护。”这里讲的并非拥护不拥护毛泽东的领导，而是拥护不拥护打倒那么多的“走资派”。毛泽东也认为，延安整风二三年，“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搞得太长。1966年10月，毛泽东曾经谈道：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所以他希望“文化大革命”能在不长的时间里结束。他担心“文化大革命”会失去控制，无法按原来的设想，在两三年里结束。为了控制局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决定亲自走一走，调查研究，解决问题。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两派斗争尖锐、矛盾特别突出的武汉。他要到武汉去看看，到武汉去游泳，到武汉去保陈再道。陈再道不仅是一个陈再道，关系军队的稳定。通过解决武汉问题，解决全国的问题。

1967年7月6日、7日、9日，毛泽东连续召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去武汉游泳，横渡长江。

12日，毛泽东与湖南的老朋友周世钊晤谈了三个小时。在谈到长沙“高司”与“工联”的6月6日战斗时，毛泽东告诉周世钊：“‘高司’的群众基础是学生，学生素来是革命的先锋队，‘工联’的群众基础是工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从他们的历史情况和所处的地位来说，没有不革命的理由，也没有不是革命的群众，两派必须联合起来。”^③

① 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1967》第1页。

② 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1967》第15页。

③ 章重：《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第433页。

7月13日下午3时，毛泽东出发前再次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决定由杨成武和他一起到湖南、长沙、武汉去看看，15日可以到武汉，游泳去。

毛泽东交代，通知郑维山今天同车到保定、石家庄，谈河北问题。戚本禹代办公厅主任。

毛泽东的想法受到大多数人的劝阻，但他主意已定，执意要成行。于是，周恩来向杨成武交代了两项任务：（一）杨成武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联络员。随时传达主席的指示，转达我向主席的报告。（二）杨成武要保证主席安全。注意直接和我联系。他还指示飞机和舰艇都要到武汉，以备毛泽东使用。无论陆地、空中、海上、江上，要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

14日凌晨3点，毛泽东一行人登上专列离开北京。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给毛泽东打前站，周恩来提前半个小时，于凌晨2点半坐飞机赶往武汉。

周总理说服了分为两派的服务员，放下分歧，赶快行动，把宾馆房间很快打扫干净。

周总理对陈再道说：“我是给主席打前站的，也想借机了解一下武汉的情况。你们要尽快促进两派大联合。稳定武汉局势。要为主席横渡长江创造好条件，要利用主席在武汉的机会把问题解决好。”总理告诉陈再道，“不要有顾虑。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①

专列开车不久，毛泽东通知杨成武找郑维山来汇报情况，谈河北、山西、内蒙的“支左”问题，尤其注意陈伯达在各地讲了些什么。参加谈话的还有杨成武和汪东兴。

毛泽东说：“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我看解放军垮不了。垮了，还依靠什么？”“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将来要来个翻案。我过去支持刘子厚。刘子厚站出来了，阎达开就好办了嘛！”^②

专列途经石家庄，谈话结束，毛泽东休息。毛泽东表示，没谈完，可以把郑维山带上，到武汉还可以继续谈。

毛泽东睡不着，只躺了几个小时，车入河南境内，他起来，再次召郑

^① 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1967》第48~4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91页。

维山谈话。

毛泽东说：“我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采取教育的方针”，“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基本的一条。”

毛泽东说，一个工厂都是工人阶级，它本身没有阶级利益的根本矛盾，根本冲突，为什么要分成两派？我想不能。这是人为的。

毛泽东吩咐杨成武记下他的话：“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①

杨成武将毛泽东的指示通过电报传到武汉，传达到周恩来手里。

列车途经郑州，在车站稍停。

7月14日晚9点，专列到达武昌站。首先映入毛泽东眼帘的是到处张贴的“打倒陈再道”的大标语。毛泽东到达武汉后，住进了已经打扫出来的“梅岭一号”。

当天下午，谢富治、王力从四川赶到了武汉。他们不顾周恩来嘱咐他们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当晚就到湖北大学会见一群造反派，对他们表示支持。

当天晚上，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谈话。

15日、16日这两天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人在梅岭一号开会，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对处理武汉问题提出原则意见。

毛泽东提出，解决武汉问题的中心思想是：通过武汉军区的努力，做

^① 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1967》第57~59页。

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尽快促进他们大联合，稳定武汉地区的局势。为此，毛泽东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把朱鸿霞放掉；“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做好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会拥护陈再道。毛泽东要周恩来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①

7月15日至18日每天下午，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的领导和支左人员开会，听汇报、研究解决武汉问题的办法。

杨成武、汪东兴则在为毛泽东游长江做准备。

15日，武汉地区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谢富治、王力又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单方面指责他们：你们在据点上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要求召集两派组织谈一谈，定几条规矩，大家一起都撤回去，各派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能平等对待。

17日上午，毛泽东在住地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在座的有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郑维山。

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毛泽东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原湖北省副省长。）都不要打倒。”

当谢富治汇报到湖北问题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时，毛泽东说：“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

当谢富治请示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时，毛泽东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毛泽东最后说：“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13日听说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②

^①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第2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93页。

周恩来告诉毛泽东，武汉军区的汇报估计明天下午结束，希望毛泽东明天晚上能接见一下。毛泽东表示同意。毛泽东要周恩来18日回北京解决湖南问题。毛泽东提出下午要游长江，但被劝阻，毛泽东只好同意再等几天。^①

当天夜里，杨成武从总理那里过来见毛泽东。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明晚接见后，总理准备返京。杨成武将周总理拟写的准备在明天下午武汉军区汇报结束时的总结讲话提纲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破例地没有留下处理，当即看一遍，还给杨成武。

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了外面的情况：武汉街头，“百万雄师”刷了很多标语，主要内容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反对钦差大臣，我们不是阿斗……”标语点了王力的名。武汉地区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问题。

毛泽东很惊讶，因为他和总理都明确告诉谢富治、王力等人暂时不要公开露面，更不要对群众组织发表倾向性的意见，要协助武汉军区做好军队和群众组织的工作。

杨成武告诉毛泽东，谢富治、王力去过造反派那里三次，表示慰问和支持。

毛泽东问：“到过‘百万雄师’吗？”

“今晚去了。王力在‘百万雄师’联络总站批评了他们，要求他们回各自原单位去。‘百万雄师’提议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一谈，定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都回原单位。王力说，你们管你们自己，你们怎么能管得了别人？”

杨成武还告诉毛泽东，犯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想不通，军区同志想不通，同谢富治、王力争得很厉害。每天下午争论完，第二天上午又研究修改检讨。

7月18日晚上，毛泽东约陈再道、钟汉华到他住处来谈。在座的还有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和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

陈再道说：“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毛泽东笑了。说：“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70页。

线错误。”毛泽东将手一划又一兜，“都说是方向路线错误。”

“要这么说，主席，我马上开大会做检讨。”陈再道说。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上得台就下不了台啦！你这老将还不得跟小将打起来。”毛泽东深知其人其势地笑道：“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

毛泽东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不能一概打倒。

毛泽东说：“四川问题很严重，你们武汉还有所不同。”

毛泽东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他又说，“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能不能合起来？将来总是要合起来的。”“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

毛泽东又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万万不能承认是三反分子。我是讲了的，对于他们（指湖北被冲击的干部）的结论还要等一下。”“张体学（原湖北省省长）不能用了吗？他打了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现在主要做军队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要人家转，总要有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

毛泽东还对其他人说：“要他们出去。（指要陈再道、钟汉华到群众中去），不但得保证人身安全，而且要拥护他们。”

讲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的做法。

毛泽东同陈再道、钟汉华等的谈话到晚上10时才结束，他把陈再道等送到走廊上。这时，刚好有几个招待所的服务人员站在走廊里。毛泽东把他们招呼过来，要他们同陈再道、钟汉华一一握手，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①

周总理要离开武汉回北京，向毛泽东请示还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94~1495页。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第22页。

“文革”搞了一年了，明年的春天结束“文革”。接着我们开九大，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邓小平要当中央委员。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央委员。毛泽东说，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

毛泽东问贺龙现在在哪里？

“在象鼻子沟。”周恩来回答。

毛泽东交代：你们要保护好贺龙。还有乌兰夫，少数民族的代表。^①

毛泽东同陈再道等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当晚回北京。

周恩来一走，谢富治、王力立刻赶到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他们戴上造反派袖标，视察他们的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负伤人员。随后就召开大会，王力在会上讲话，把他们称为“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且说，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7月19日，造反派以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录音，还播放王力的“四点指示”：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下午，谢富治、王力按原计划在武汉军区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他们支一派、压一派，像训小学生一样训斥与会者。他们的讲话按要求连夜向下传达。这一来，大大激怒了在武汉地区拥有多数群众的“百万雄师”以及支持他们的一部分军人。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

两派矛盾激化，“七·二〇”事件发生。

7月20日拂晓，“百万雄师”的200多个代表来到东湖宾馆百花二号，要求王力回答问题。陈再道、谢富治出来会见，答应下午接见，答复他们提出的问题。这些代表将要离去，又有几百人冲进东湖宾馆，多数是部队战士。他们感情冲动地殴打了陈再道，又冲进房间把王力揪到军区大院去。这样多的人，包括相当多的军人气势汹汹地冲入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宾馆，打人揪人，在一片混乱中确实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发生了“兵变”。

当日，林彪、江青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说：武汉形势不好，毛泽东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这封信由军委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带着坐专机送到武汉。毛泽东一时也把情况估计得很严重，怀疑是不是由陈再道和

^① 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1967》第78~79页。

“百万雄师”策动的一场“暴乱”。^①

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决定请周恩来再赴武汉。周恩来的飞机没有能直飞武汉，而是被安排降落在60公里外的山坡军用机场。直到晚上，周总理才赶到毛泽东身边。在周总理等人的劝说下，毛泽东最终同意离开武汉到上海。

7月21日凌晨2时，毛泽东在专程赶到武汉的周恩来具体安排下，乘车离开东湖宾馆去机场。1958年以后，毛泽东再没坐过飞机。这次破例，他坐上飞机飞往上海。

上午11时，毛泽东乘飞机到达上海，住进虹桥宾馆。

一离开乱哄哄的武汉，毛泽东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到上海后，他一夜没有睡觉，把身边的人叫来说，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②

22日凌晨1时30分，与杨成武散步后几个小时，毛泽东向汪东兴发出指示。

1. 接触观察看法，陈是个蠢人，头脑简单，思想反动。

2. 我离开以后，北京采取这个措施是对的。

3. 军队是要打仗的。如朝鲜，除了几十万真正的打仗的之外，主要是打思想仗能锻炼人。

第二条所指北京的措施，是指由林彪主持制定，分两步。一步：以中央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进京，看他们敢来不敢来。不敢来就证明有问题，是兵变。第二步：起草处理武汉的中央文件，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王；全国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③

早上8点20分。周总理从武汉王家墩机场给杨成武打电话，告诉他，他在王家墩机场，同王力在一起。下一步的安排正同林彪商量。如果许可，晚上最好杨成武能回一趟北京，商量部署。让杨成武向毛泽东请示，带上毛泽东的指示。周总理的意见，“对外报道要含蓄，暂不点名”。^④

上午9点40分，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了周总理的电话内容，并请示毛泽东的意见。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496页。

③ 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1967》第117页。

④ 张子申：《战将与统帅——杨成武在毛泽东麾下的四十八年》第347页。陈杨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第330~331页。

毛泽东说，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我、总理、王力也出不来。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出进。先把湖南、河南、江西问题解决好一点后，再来解决湖北问题。毛泽东说，派兵问题要谨慎。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早点离开好。让他根据具体情况办理。^①

杨成武当晚要回北京，他请示下一步的安排。毛泽东说，明天、后天不要动，再后天把意见带回来。总之，不先解决几个军区的问题先解决武汉问题不利。现在我们已经出来了，就不要忙，宜慢。

毛泽东又让杨成武把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叫来一起谈了话。

下午1时30分至下午5时，毛泽东又连续找杨成武、汪东兴，以及余立金、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李静谈话，商量部队换防。

当天下午，总理回到北京。

紧接着，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北京机场出现了隆重的欢迎场面，江青和王力拥抱，谢富治、康生、吴法宪、邱会作、关锋、蒯大富等人手擎“红宝书”挽臂照相。

当天，江青在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

晚上，林彪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会议，把“七·二〇”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

23日凌晨2点30分，杨成武回到北京，他立即前往钓鱼台16号楼，向正在主持文革碰头会的周恩来传达了主席指示。接着周总理立即向参加碰头会的全体人员作了传达，并当即指示：以中央名义向武汉军区发电，召陈再道、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民武装部队政委巴方廷进京开会。^②

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王力、谢富治回到北京受到欢迎的新闻。

武汉三镇沉默了，除了少数造反派高兴以外，百万工人、群众、部队的干部战士陷入极度的悲痛，吃不下，睡不着，想不通。24日，“百万雄师”为了保证自己的人生安全，陆续乘车撤离武汉。

7月24日凌晨1时，陈再道等人飞到北京，被周恩来安排到京西宾馆保护起来。但中央文革有意透露消息，京西宾馆受到三军造反派的冲击。

^① 张子申：《战将与统帅——杨成武在毛泽东麾下的四十八年》第348~349页。陈杨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第331页。

^② 张子申：《战将与统帅——杨成武在泽东麾下的四十八年》第351页。

下午3点，杨成武乘飞机离开北京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北京、武汉的形势：

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三军联合行动，声讨“七·二〇”事件；陈再道、钟汉华一行根据中央电令飞抵北京；陈再道等刚住进京西宾馆就受到三军造反派的冲击。

毛泽东问：“陈再道、钟汉华接电报就进京了吗？”“是的。”毛泽东据此释去了对陈再道、钟汉华谋反的疑惑，但对他们进京走漏消息，受到冲击引起警惕。对“三军造反派”贴出反徐向前大标语；对叶群、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浩浩荡荡跑到京西宾馆；对南京造反派冲击军区，许世友冲出大院表示关注。^①

晚饭后，毛泽东通知杨成武去一趟，向他交待了第二次返京的任务。

毛泽东与杨成武一起散步，毛泽东问：“你过去认识不认识陈再道？这个人怎样？”

“以前不认识，解放后才认识的。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杨成武回答。

“你对武汉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

“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

“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再道、钟汉华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

“他们不会反对您。”杨成武又补充一句。

“对！对！对！”毛泽东连说了三个“对”字。然后又说，“陈再道在哪里，还有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在什么地方？”

“不清楚。”杨成武回答。

“你去告诉周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②

毛泽东说，明天你返北京，筹备建军40周年。对总理讲，不要他们那

^① 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1967》第131~13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96~1497页。

么激烈，当作犯错误处理。警惕有人做文章。

毛泽东让张春桥去找许世友谈谈，他们两个不要对立，统一不了就调和。

7月25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他在电文中写了一段重要的话：“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①

陈再道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这两个字，林彪他们要整死我们，那是易如反掌的。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同杨成武等谈话时批评王力，并且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他批评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哩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过了十来天，他又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②

25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林彪、江青亲自参加首都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支持武汉地区造反派声援大会。高呼“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下午4时50分，杨成武飞抵北京，向周总理传达了毛泽东将陈再道“保护起来”，及向陈再道转达的三句话，并转交了毛泽东亲笔所拟复武汉军区电文。毛泽东对当时被看作十恶不赦的陈再道和叛匪“百万雄师”仍取保护教育的态度。

26日，周恩来主持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揭批陈再道，会上吴法宪打了陈再道耳光。杨成武到会看了看，以便向毛泽东汇报。他向陈再道转达了毛泽东对他说的三句话。

7月27日，因周恩来要接见湖南军区负责人和湖南两派代表，解决造反派抢劫军火库的问题，他委托杨成武主持第二天的揭批会。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380~38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98页。

这一天，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

杨成武回忆道：“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林彪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乘机在军内清除他心目中众多的异己力量。^①

29日，毛泽东发出指示：

1. 武汉由××军或两个师抽一个营去接梅岭、百花的任务，原警卫队、部队全部调出来整训。（梅岭和百花都在东湖宾馆内，当时，梅岭是毛泽东在东湖的住处，百花是总理在东湖的住处——作者注）
2. 独立师可以考虑调出整训，过去已有这个计划。
3. 原梅岭、百花的原工作人员态度不好，没有转变的一律调出来（包括园林工等）。
4. 飞机场到梅岭的通道要××军部队或××师担任，通道警卫控制起来。
5. 码头上的人要清理，如果“百万雄师”的人态度没有转变，态度不好的调出来，调换。
6. 游泳船由海军调，木船由空军调，人员不好的调换。^②

29日、30日，总理三次同谢富治、杨成武、王力、刘丰等开会，讨论武汉问题。杨成武30日飞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

30日，毛泽东就武汉问题再发指示：

1. 曾思玉、刘丰的任职命令可以宣布，对陈再道、钟汉华如何宣布可以晚一点办。
2. 独立师不调出，同意分编到××、××、××师去。独立师的人不离湖北，集中起来集训。
3. 独立师原担任的任务，由××军两个师和××师来担任。
4. 陈再道可以在武汉报纸点名，全国报纸暂不点名。
5. 王任重可以全国报纸点名。
6. 武汉军区的公告，可以登《湖北日报》，可以在全国各地张贴，但不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498页。

② 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 1967》第141页。

登大报。中央电报可以发到县团级。县人武部可以转达。

另附加一句话给周恩来：“陈再道要保护起来，留下人头好办事。”^①

7月31日，就林彪、江青等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周恩来请示在上海的毛泽东。毛泽东表示，朱德、徐向前及其他受冲击的老帅都要出席。^②

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现在有种意见，说应该把9月9日秋收暴动纪念日作为建军节。

毛泽东说，这是错误的。南昌起义是8月1日，秋收起义是9月9日嘛。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这件事不能变。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是大政治，但政策错了，失败了；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不能因为我参加了，就吹上天。你去报告总理，他都知道。毛泽东让杨成武记下他的话：“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

毛泽东指示：“八一”招待会，几位老帅统统请来。都要出席。这个会一定要开好，所有老帅都要到，不许请假。

杨成武向毛泽东反映：现在有人骂朱总司令是黑司令。毛泽东非常生气，说：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来的毛？毛泽东表扬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瑞大事不糊涂！”毛泽东说，陈毅红四军七大后到中央如实报告，八大没参加，九大回来，如实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他说真话，实事求是。陈毅是个好同志。

毛泽东要杨成武回去告诉他们，都不要紧张。朱老总是红司令，叶剑英的功劳不能忘；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聂荣臻是个厚道人，什么事都是出来承担责任，一军团有林彪，别人不出来承担责任，聂荣臻出来承担责任，功劳是别人的，责任是自己的。

毛泽东说，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徐向前过去的事情主要是张国焘负责。告诉总理，不要再追他的责任。徐向前失败以后，要饭回来，回到延安；陈昌浩要饭回来，回到他的老家湖北。这就是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根本区别。

毛泽东谈到林彪。“谁封我四个官呀？”“什么永远健康！难道有永远

① 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1967》第142页。张子申：《战将与统帅——杨成武在毛泽东麾下的四十八年》第36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75页。

不死的人吗？你们不要宣传这个。要宣传马克思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如果这样搞，将来是要吃亏的。”

毛泽东交代：有些事回去不要对林彪讲。^①

“七·二〇”事件中林彪的表现，已经引起毛泽东的警惕。

中午，杨成武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准备返回北京，临行前向毛泽东请示“八一”招待会的有关问题。毛泽东重申了几天来他对“八一”招待会的指示，让他记下来交给总理。

1. 军委各副主席都出席，徐向前同志也要参加，街上有大字报不要紧，做做工作；

2. 朱总司令、刘伯承同志也要参加；

3. 各军区在京的领导同志都要参加，韩先楚一定要参加。（当时韩先楚被骂为福建的“韩老谭”、“韩再道”）

4. 各兵种负责人除吴克华、崔天民不到外，其他可到会，总参彭绍辉不到。（三位不到的将军是因为早已被毛泽东点名）

5. 其他参加的人，由北京定。

6. 由杨成武同志致祝酒词。杨成武提议：“谭震林同志是否可参加？”

主席答复：“好，他一定要参加。”^②

7月31日下午，杨成武乘专机离开上海返回北京，向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反军乱军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写道：“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③

3日，杨成武飞返上海。凌晨5点45分，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情况。

8月3日至8月25日以前，杨成武没有再回北京。毛泽东从武汉转移到上海后，在这里住了将近两个月。

① 张子申：《战将与统帅——杨成武在毛泽东麾下的四十八年》第353~363、366~367页。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1967》第120~124页。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第1077页。

② 张子申：《战将与统帅——杨成武在毛泽东麾下的四十八年》第368~369页。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1967》第143页。

③ 《红旗》杂志1967年第12期。

剧烈动荡的现实已使他难以像从前那样到处巡视，更难以自己进行以往他提倡的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主要是靠阅读文电、报刊以及从少数能同他接触的人员那里来了解国内外情况，指导工作。

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策划的几万人长期围攻中南海，搞“揪刘火线”，揪斗刘少奇，给予了批评。

7月18日，刘少奇夫妇在中南海内被批斗。当天晚上，毛泽东在与陈再道等同志谈话时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的做法。8月5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中南海内各人家里又同时遭到批斗。当晚，汪东兴向毛泽东报告了上述情况。毛泽东大为光火，问是谁批斗中央领导人？并指示要追查。^①中央文革不得已，撤退了对中南海的围攻。

毛泽东制止了反军乱军的歪风。

8月上旬，被派到武汉了解情况的余立金回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武汉的情况。余立金说，现在武汉的造反派都在传达中央的指示，要打“第三战役”。毛泽东追问：是谁提出的？余立金汇报：是北航造反派向武汉造反派传达王力、关锋的谈话，说中央首长认为文化革命已进入“第三战役”，重心转向军队，揪军内一小撮。毛泽东问：哪个首长？毛泽东还是林彪。余立金说：这些小将“通天”，不知他们说的中央首长是谁？

余立金还汇报：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造反派一个任务，要他们派出人马上到各地去介绍、推广武汉地区同军内走资派斗争的经验。造反派动作很快，一下子出去几万人，到江西、河南、安徽、南京，揪陈再道式的人物。

为了了解情况，毛泽东召张春桥、王洪文汇报工作，他们谈的都是“情况大好”。

毛泽东又让杨成武、余立金，对沪、宁、杭地区“文革”情况进行了调查。让张春桥、姚文元去济南作调查。

杨成武、余立金向毛泽东汇报，上海提出要批判打倒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

毛泽东问：许世友？他有什么问题？许世友同志是大军区司令员的标兵呀！

毛泽东说，现在打倒许世友，其他几个大军区的司令员怎么办？沈阳

^① 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毛泽东》第282~283页。

的陈锡联、济南的杨得志、福州的韩先楚是不是都要打倒啊？

毛泽东问：许世友现在在哪里？

余立金回答：金家寨。

毛泽东问：他干什么呢？

余立金回答：带个独立师，在那里种田开荒。谁到那里去，没通知他，他就开枪。

毛泽东淡淡一笑：许世友不能被打倒！要保他，你们把许世友接到上海来。

杨成武忙说：我这就去接。

毛泽东说：你不能去，叫张春桥去。张春桥反许世友，所以，让张春桥去接。

毛泽东对杨成武交代：你告诉安徽李德生，叫他准备顿饭。让张春桥吃顿饭。你再准备两架飞机，先乘直升机到金家寨接许世友，接到合肥，再用大飞机接到上海。你告诉许世友，是杨成武派直升机去接，不然他会打。

毛泽东对赶来的张春桥说：这件事马上办，今天把他接来上海。

许世友当天被接到上海，第二天去晋见毛主席。毛泽东握住许世友的手对他说：许世友同志，你受苦了。

许世友这个硬汉子忍不住哭了。待他平静后毛泽东问：去大别山干吗去了？

许世友回答：打游击。

毛泽东说，他们冲击你，要打倒你，你有什么问题呀？他们不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要把你打倒么……不要难过。毛泽东告诉许世友：要振作精神，把部队掌握好。你是司令，要靠部队，不要单独行动。回去好好干……

毛泽东还找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和驻军负责同志调查了解情况。

8月14日，面对越来越明显的林彪、江青一伙搞的所谓“第三战役”，毛泽东下了决心，对杨成武说：看来你唱你的，我唱我的还不行。弄一部《西厢记》唱到老，明年也不得收尾。

毛泽东亮出红牌，在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红旗》杂志社论上批示：“大毒草”，提出要“还我长城”。对林彪送审的文件，凡有“揪军内一小

撮”的文字一律删掉。最后索性写一句：“不用。退林彪”。以后毛泽东又传话：要追究责任，要查来龙去脉。^①

毛泽东还作出一项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决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到处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8月7日晚，得意忘形的王力，约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代表，煽动他们夺外交部的大权。

19日，外交部造反派冲砸了外交部，宣布“夺取”部党委的大权。

22日夜，首都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

25日凌晨1时，周恩来开完中央文革碰头会后，单独约见刚从上海毛泽东处来到北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把王力的“八七讲话”记录交给杨成武，要他立刻送给毛泽东看；还谈了关锋主持起草的《红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

杨成武当天上午立刻直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意见。杨成武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严肃地对杨成武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力）的错误大，王的破坏力大些，关（锋）听王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毛泽东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毛泽东解释说：“对戚本禹指出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

^①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68~71页。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67页。

改。”“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后来，又根据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的指示把戚本禹也抓了起来。”^①

8月16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毛泽东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卡博和巴卢库同志是一、二月份来的。当时我要留他们待到四月份。我说过，三个月，即二、三、四月，可以看到眉目。现在的设想有些改变。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如何对待当前“天下大乱”的局势？他仍坚持原来的看法，说：“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干部倒下的是少数。如上海市、区、县，各部委，工厂党委和支部书记，要打倒的、靠边站的是少数。”在他看来，一时被打倒的，还可以再站出来。^②

8月20日，毛泽东接见了向他写信反映“文革”情况的浙江普通演员应水珠和小丁。

应水珠回忆：

1966年上半年，当毛主席离开杭州后，省委决定，将我团26位同志划归浙江省军区代管，这样，我们这些人名义上也就参军了。

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上半年，浙江的“文化大革命”已经从激烈的派性斗争上升到严重的武斗，地方上造反派开始冲击军区机关，省军区的处境十分严峻。对此，我们非常担心。

1967年夏天，我团在龙泉演出。有一天，小丁和我联名给毛主席写了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02~1503页。张子申：《战将与统帅——杨成武在毛泽东麾下的四十八年》第375~37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99~1500页。

一封信，反映了浙江“文革”的一些混乱情况和我们的心情。

8月20日，毛主席派人把我们俩接到上海，见面时，毛主席说：“因为你们两个给我写信，所以我就找你们啰。”并问我，“你那个家还在九溪十八涧吗？”

我回答：“是的。”

“你那个阿哥还在教书吗？”

“是的啊。”我为毛主席那惊人的记忆力所感动。

毛主席要我们把下面的情况如实讲给他听。我们就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街上大字报的情况和社会上派性斗争的情况）全讲了出来。毛主席听得很仔细，当我们讲到有的大字报的标题就叫“砸烂xxx的狗头”时，毛主席严肃地插话说：“人家明明是人头，为什么说狗头啊？”我们说得很多，越说越起劲，越说越激动，后来干脆站起来把有些人在斗争别人时的动作和行为也做给他看。毛主席看了这些动作之后，紧锁眉头，显得很不安，长时间没有说话，后来才说：“谢谢你们啰，谢谢你们把下面的真实情况讲给我听。”

我们还向毛主席汇报了我们到部队一年多的时间里干了些什么。讲了怎样下连队锻炼，给战士演出，教唱歌曲，与他们一起挖坑道，给他们洗衣服、补衣服、补袜子、理发等等。我们也为老百姓服务，为他们排练节目、演出、理发等等。基本上成了一支乌兰牧骑式的文艺演出队。

毛主席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他说：“农村里缺医少药，农村妇女生孩子没有人接生，尤其是难产，苦得很，有生命危险，你们跑的地方这么多，能不能学点医啊？比方说，学会给人打针、接生之类的事。”

我们感到有很大的难度，但我们很受感动。毛主席时时刻刻想到的是人民，他是人民的领袖，和人民心连心。只要是毛主席说的，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去做的呢？我们表示了坚决照办的决心。^①

9月4日，毛泽东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汇报，然后谈了如何控制局势的问题。

毛泽东肯定了发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肯定了解放一大批干部，批评对干部不能搞得很惨。^②

^① 浙江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与浙江》第201~20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00页。

9月9日晚10时30分，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谈话。

他特别关心“大联合”问题，把它看作解决各省问题、改变当前严重混乱状况的关键。他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

三人议论，分析认为现在的情况，分裂的可能性不大。张春桥说：“我们有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可以把各派斗争引导到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毛泽东摇摇头：“讲思想还可以，对我个人不要多讲。”

毛泽东说：“一个人的出现是带偶然性的，离开也是带偶然性的。”又说，“林彪同志8月9日的讲话我看了。他讲的两点，头一点不能强调。”

林彪8月9日接见曾思玉、刘丰时讲，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二是解放军的力量。”

杨成武说：“人民要求统一，不要分裂。18年来祖国的统一人民是高兴的。谁搞分裂，谁就会被人民被历史所抛弃。”

毛泽东说：“成武这条讲得好”，“人民不喜欢分裂，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杨成武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军队是稳定的，是统一的。”“这样大的冲击，军队没有垮，坚决按主席‘四不’的指示办。”

毛泽东说：“是呀，这样大的冲击，军队没有垮，军队还是好的。”

余立金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群众的大多数是好的。”

毛泽东表示：“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红卫兵把干部扫多了。”

他计算了一下，说，现在有七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是比较好的，还有几个省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今年还有不到四个月，可不可以再解决十个省？如果再解决十个省，形势就很好了。

毛泽东又谈到上下级关系问题，说：“对干部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

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他叮嘱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你们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在会议上讲。”“现在小将提口号，不留余地。这样又要犯错误啦！”

毛泽东特别关心工人中分裂为两大派的问题，说：“工厂的问题，我就讲啦，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有人谈到有些造反派组织提出要以它为核心，毛泽东说：“什么核心？核心是实践中群众承认的，不是自封的。”

毛泽东做个截止的手势说：“总之，形势向好的方向转化。我们在上海待了近两个月，处理了武汉问题，抓了王关戚；处理了温州、抚州、湘潭几处的武斗，找回一个许世友，制止了揪军内一小撮。现在我们可以走走了。成武啊，你准备准备，我们该动动了。”^①

9月16日早上，毛泽东离开上海。接近中午，专列到达杭州笕桥机场。毛泽东提出想去汪庄，杨成武鉴于当时两派斗争的混乱局面，加之又是路过，时间又不长，建议主席留在专列上。主席无奈地同意了。

中午11点，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浙江省军区政委南萍和空军政委陈励耘。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参加了接见。在“文革”中，省军区和空军各支一派，互相对立。

毛泽东做南萍和陈励耘的工作，在支左中要互相通气，互相学习；省军区向空军学习，省军区为主，空军要服从。

毛泽东说，我们的军队历来有两种作风，一是民主作风：官兵关系好，就是互相学习进行自我批评，搞好上下级关系；另一种是训人骂人，摆架子，不平等待人，缺乏民主，上下级关系不好。现在我们的干部都是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我在上海就反复讲这个上下级关系问题。一个人挨整，一种是自己犯了错误，挨了整；一种是坏人整好人，好人挨了整。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是一大缺点。

毛泽东说：“红卫兵，工厂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500~1501页。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1967》第192~200页。

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

毛泽东说，分区司令、政委不要在那里层层挨斗，可调到军区来。

毛泽东说：“干部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他们错了就改嘛，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嘛！不能一切都抹杀了。”

毛泽东说，我们历来是团结、批评、团结，历来是讲道理，准许申辩。现在被搞乱了，破坏了。

毛泽东说，对有些干部我是一定要保的。红卫兵要打倒去打他的，我保是保我的，这是一个大局。矛盾是有矛盾的，统一还是统一。现在我们要恢复那个传统，人家犯了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现在打倒一个人太容易，只要红卫兵一轰。就是顽固到底的人也不要紧，给他饭吃，主要还是要搞训练。

贺龙这个人恐怕还要选为中央委员。邓和刘还是有区别嘛，要选中央委员。

现在红卫兵把团结、批评、团结搞乱了，破坏了这个传统。他提出什么高帽子、挂牌、罚跪、喷气式、抄家，他们引证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那是对地主、土豪劣绅嘛！现在这是干部嘛！几十年的干部他是做了一些好事。

毛泽东说，外交口子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他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

毛泽东说，孔明都有七擒孟获，我们共产党不仅可以搞七擒，还可以搞八擒嘛！

毛泽东说：“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我看（明年）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①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504 页。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 1967》第 200~207 页。

9月17日清晨，专列途经南昌，停在南昌的飞机场。

上午9点40分，毛泽东在列车上接见了江西省的领导干部程世清、杨栋梁、刘瑞森、郭光洲、黄先、陈昌奉。他们几乎都是军人。

毛泽东说，说中国没有内战，我看这就是内战，不是外战，是武斗，不是文斗。现在农村包围城市，我看不行。

他还说：哪有那么多复辟呀，天下是不会乱的，天也不会塌下来。

毛泽东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你们研究了这个问题没有？总要给他们时间，来认识和改正错误。

毛泽东说，有些人犯了错误，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

不能不教而诛，诛就是杀，诛就是杀人。不能不教而处罚人，过去就是吃了这个亏嘛！

我看还应该从教育入手，坏人总是少数。我对现在的右派不那样看死，有坏人是少数，多数是认识问题。有的把认识问题说成是立场问题，一提到立场问题就上了纲，一辈子不得翻身。难道立场问题就不能变吗？对大多数人来说立场是能变的，对极少数坏人是不能变的。“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教育要包括左、中、右。

毛泽东询问过去省委一些人的情况，然后说，我还是倾向于多保一些人，能挽救的还是挽救，如果能改，能多争取几个人也好嘛！只要我们争取了多数，极少数人顽固下去也可以嘛，我们给他饭吃算了。

当汇报到有人还要到外边去抓什么人时，毛泽东说，要保护，不要使人下不了台，要使人有机会改正错误。

毛泽东说，江西还站出来一批干部嘛。你们是省一级的，省级要多站出一些人，还有市的，能站出多少干部？

毛泽东说，现在是教育左派的问题，不是右倾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

毛泽东说，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为核心来团结起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

毛泽东强调对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要讲政策，要很好说服，不打击报复，下跪、高帽子、挂牌子，还有什么喷气式啰，这不好。

在南昌，毛泽东下车散步，和列车服务员随便聊了起来。

这些服务员们，在毛泽东面前有说有笑，一点也不拘束。有个服务员在说笑之间忽然提出，她们希望与毛主席一起照个相。毛泽东高兴地答应了，并说：“让大家都来吧。”

不大工夫，列车上的工作人员都来了，有列车员、炊事员、检修工、卫生员，还有警卫战士，大家都来了。

毛主席像老农民那样，两腿一盘，席地而坐。大家便围着他呈半圆形，前边的随便坐，后头的随便站，不论资排辈，也不管职位高低，自然极了。^①

9月18日，专列途经长沙。

上午10时20分，湖南省的黎源、华国锋、章伯森登上专列，晋见毛主席。

毛泽东问道：“湖南形势怎么样？”

黎源原担任军长，现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仍穿着军装，干脆明了地汇报起情况。

“湘潭问题基本解决了，不过，保守组织下边的工人有五万多，数量比较大……”

毛泽东说，湘潭的经验很好嘛！有那么多工人，要正确对待。对保守组织的头头尤其要政策恰当。

毛泽东说：“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

毛泽东说：“解放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过去有‘四不’，现在不拿枪，有‘五不’了。这也是个好经验，造反派给战士上课，战士给造反派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毛泽东询问以前见过的湖南省委领导现在运动中受冲击的情况。万达现在怎么样？王治国现在在哪里？华国锋汇报了王治国被斗的情况，毛泽东说，为什么斗得那么厉害呢？他身体很不好嘛。

毛泽东又问华国锋：“农业生产怎么样？”

华国锋回答：“农民照样作田。今年可产粮250亿到260亿斤，去年产230亿斤；今年棉花可产180万担，去年是150万担。”

毛泽东又回到原来的话题说，打击面宽了不好。开个会，实际上是训

^① 毛泽东在江西的谈话，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04~1505页。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1967》第210~212页。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71页。

练班，只要犯过错误的，军队的，党政机关的都要训。开会时各派专门批评自己，不要批评对方。我们军队过去就用这个办法，和地方关系不好，只检查批评部队自己，对地方不提批评意见。

毛泽东说，对造反派也要进行教育，不然回去还是不好混。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年轻人，不要性急，现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缺乏民主作风，不平等待人。打人、骂人、拍桌子，把我们的传统搞乱了，把我们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搞乱了。

“学校造反派也要学政策，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

“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总想不通。越压越反抗。”

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①

专列由湘入鄂，毛泽东对杨成武说：“这次要在武汉住几天！还住东



1967年9月18日，毛泽东在长沙大托埔与杨成武、余立金在一起。（摄影/钱嗣杰）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505页。

湖梅岭一号!”

毛泽东问杨成武：“你认识不认识曾思玉?”

杨成武向毛泽东介绍了曾思玉的情况。^①

9月19日晨，专列到达武昌车站。毛泽东在专列上与曾思玉、刘丰谈了话。

毛泽东询问曾思玉，来了一段时间啦，工作进展得怎么样?

毛泽东要他们缓和部队与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全力以赴，做好稳定局势的工作。

毛泽东说，湖北、河南两省人口有一亿多，地处中原，扼守长江和京广线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们的责任重大，要掌握两省军队，稳定局势。

毛泽东要他们搞好团结，共同做好工作。要他们学会做群众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解放军干部和大联合的工作。

毛泽东说，武汉“七·二〇”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谢富治、王力，他们知道我在这里，不请示，不报告。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抢先点了一把火，支一派，打一派，搞得群众组织对立。要把独立师、军分区、县人武部的主要干部集中起来，去北京办学习班，认清形势，统一思想。然后采取湖北与河南两省对调一部分干部。同时，在湖北省内对调一部分干



1967年9月，毛泽东在专列上。（电影资料）

^① 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1967》第212~218页。夏远生、马娜：《毛泽东的三湘情结》下，第593~595页。

部，改善他们的处境，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搞好团结，做好工作，稳定干部队伍。

曾思玉说，现在许多地方干部靠边站了，开展工作有些人手不足。

毛泽东让他们去做张体学同志的工作，得到群众的谅解，多解放一些地方干部，站出来搞结合，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

毛泽东说，武汉的“七·二〇”事件，外国人不了解，以为中国天下大乱了，我和总理商量过，10月份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率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就安排他们到武汉来，并由周总理陪同。你们要召开欢迎大会，打消国内外一些人对武汉形势的猜疑和疑虑。^①

谈话后，毛泽东住进了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毛泽东在梅岭一号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了话。

毛泽东谈到他正考虑的下一步工作部署。他说：“要开一次九大，准备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后年一月份召开。”“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中央委员会要扩大。怎样扩大？中央委员会要选些新鲜血液，代表里要有新鲜血液。”“要不要开人民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开人民代表大会？”“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应大大缩小。”^②

毛泽东这次到武汉特别吩咐把武汉街头的小报都找来，他每份必看，而且看得很认真，各个小报都看了，好坏都有评价。毛泽东说，有些小报派性特别强，纸倒特别好。

9月20日早上，毛泽东提出要到武汉的大街上看看，他要亲眼看看“七·二〇”事件以后的武汉究竟怎么样。曾思玉、刘丰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建议主席下半夜巡视，毛泽东不同意，坚持要白天看，而且要坐吉普车。在大街上，毛泽东要司机开慢点，他要看看街上的大字报。在街上，毛泽东看到很多宣传车。他对随从人员说：你告诉曾司令员，这不好，我很反感。^③

晚上，吃过“早饭”的毛泽东与吃过晚饭的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谈话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凌晨2时。

① 章重：《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第440~44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05页。

③ 武汉部队负责人曾思玉、刘丰传达毛泽东视察武汉时的指示。



1967年9月，毛泽东“七·二〇”事件后再次到武汉王家墩机场。（摄影/钱嗣杰）

毛泽东说，湖北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毛泽东问曾思玉、刘丰：湖北第二批建立革委会行不行？还问：今冬明春的工作安排了没有？明年元月、5月，8月准备搞些什么？

毛泽东表示对武汉寄有很大希望，告诫他们：要给犯错误的人一条出路，包括陈再道。

毛泽东说，听说对“百万雄师”、独立师揪得太厉害了，那样搞会逼上梁山的。搞得太凶就会脱离群众。

毛泽东再次加重语气警告：不要搞苦了。王力就是不听我们的话。

毛泽东说，体罚这个做法，我反感。凡是爱整人的人，整来整去，最后都要整到自己头上来。现在全国到处搞武斗，这翻不了天，让那些人跳出来好嘛！

毛泽东说，现在有些人破坏了我们党团结—批评—团结这个优良传统，不喜欢这个公式。解放军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现在是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毛泽东说，坏人总是少数，好人总是大多数，广大群众是好的。

毛泽东说，工人阶级分为两大派，我就想不通。7月18日我在武汉就讲，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泽东提出要“破私立公”。

毛泽东说，多给他们（造反派）讲些历史。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当了权，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盛气凌人。又说，现在是革命小将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还说，尽快实现“三结合”。希望你们成为大联合的模范，希望你们成为反对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经济主义、自私自利的模范。

毛泽东说，真正有希望的是想问题的，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他还建议去掉广播车和高音喇叭。

毛泽东说：“文革”搞一年多了，明年的春天一定要结束。“大概（明年）春节以前，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还有四个多月。”他说，接着我们开九大。他向曾思玉等提出九大什么时候开的问题，说：“我看明年秋季九月份开，至少后年一月份开。”

毛泽东说，九大，那些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贺龙、邓小平、乌兰夫等人都要当中央委员。贺龙，在延安我就讲过，他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要保护他。

谈到邓小平，毛泽东说：“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①

毛泽东对杨成武说，你要把这个话报告给总理。毛泽东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讨嫌！”这里显然流露出他对林彪已有不满。

毛泽东说，现在这些干部，哪个在战场上没受伤？在民主革命中还是



1967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王家墩机场与干部战士在一起。（摄影/钱嗣杰）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505~1506页。

立了不少功，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只要改正就行了。老干部到打起仗来，我的命令一下，他们上战场还是很勇敢的。不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好，这对革命事业，对党不利。^①

9月21日上午8时，毛泽东同杨成武谈话。

毛泽东经过一夜的工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很有把握地对杨成武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他向杨成武吩咐：准备返京，部署工作，加速文化大革命的进程，解脱老干部。并且说：“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②

“什么时候走？”杨成武问。

“明天。”毛泽东交代：“在郑州停一天。”

上午，毛泽东再次坐吉普车上街看大字报。

9月22日清晨，毛泽东要离开武汉，他来到王家墩机场，专列就停放在这里。毛泽东在车下散步，远远看见几个干部、战士朝这边张望，毛泽东招手让他们过去，他们高兴地跑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和他们席地而坐。问：“你们造反了吗？”大家回答：“造反了！”毛泽东看看机场大片的土地说：“机场荒地很多，可以种东西，可以种庄稼。”^③

当日清晨，专列驶离武汉。刘丰把毛泽东送到郑州才返回。一路上毛泽东对杨成武说，不能再搞了，明年春天一定要结束，然后开九大。要成立个专门机构，你来负责，任务就是解放老干部。不要搞清一色，陈毅这样的要选入政治局，邓、贺、乌这样一些老人都要入中央委员会。^④

专列途经郑州，停靠在郑州火车站的一段道叉上。毛泽东在专列上同刘建勋、纪登奎、王新谈话。

① 章重：《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第443~447页。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1967》第218~221页。张子申：《战将与统帅——杨成武在毛泽东麾下的四十八年》第390~39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06页。

③ 笔者当时的家就住在王家墩机场，毛泽东在王家墩机场的讲话部队做了正式传达，在广场上还立了一个很大的语录牌。

④ 张子申：《战将与统帅——杨成武在毛泽东麾下的四十八年》第391页。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1967》第221~222页。

毛泽东一见纪登奎就笑着说：“你是纪登奎？老朋友了！”

刘建勋说：“他被关了四个月，挨了四个月的斗争。”

毛泽东笑着对纪登奎说：“你说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纪登奎回答：“大有好处。”

“河南形势怎么样啊？有什么新闻吗？”毛泽东问。

“我们搞大联合，下边搞武斗，武斗搞得厉害。”刘建勋回答。“康生和江青讲话，提出一个‘文攻武卫’，打起来就分不清是谁攻谁卫了，都说是武卫……”

毛泽东问杨成武：“她那个讲话录音调来了吗？”

“调来了。”杨成武回答。

“放一遍，你们都听听。”毛泽东吩咐。

这是江青在9月5日接见安徽造反派赴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从群众的欢呼声看，派性对立严重的群众为之鼓掌欢呼的是江青所讲：“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要还击！”

毛泽东说，文攻武卫，不能这么提。我讲了一路，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我还讲了一路的大联合，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现在讲“文攻武卫”，这是唱反调嘛！双方都搞起“武卫”来，戴上柳条帽，拿起长矛来，还怎么联合？这个提法不行。

当汇报到少数人不讲政策，随便开枪，打死人时，毛泽东说，群众起来讨论，不赞成他们，群众起来都反对就收场了。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搞不久，现在已经不那么响了。他们不拥军，一拥军就没有对象了！

毛泽东说，我已经讲了一路，南京军区不能倒，许世友不能倒。南京军区是个标志，南京军区一倒，其他军区都要受影响。我讲了一路“文化大革命”不能搞下去了，明年春天一定要结束，然后开九大。有人就是不听招呼。王力就是不听招呼！

毛泽东说，我知道，有些人是不会听招呼的，他还要搞下去。谁要搞谁就搞去，我是不要搞了。有些话我不在这里讲了，我回北京再讲！

专列离开郑州之际，毛泽东再次指示杨成武：回去就搞个机构，你来负责，任务就是解放老干部。你再抓个训练班，不但党政群干部要集训，

红卫兵小将的头头也要集训，训练时间不一定长，至多两个月。北京搞，各省各大区也搞。都说林彪同志是黄埔军校毕业，什么毕业？他在黄埔军校不过四个月，那就是个训练班嘛！

毛泽东说，我现在很不喜欢“四个伟大”，讨厌！这话你告诉总理，不要对林彪讲。^①

这次毛泽东返京，在火车上听说列车乘务人员也分三派，都说自己是造反派，人家是保守派。给他们做工作，他们说“和稀泥”。毛泽东索性把三派的代表找来，听他们辩论，他们辩论了两个小时。

毛泽东说，我看你们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应该联合嘛！三派还是不想大联合，都指责对方，不做自我批评。又说：不要尽看别人的缺点错误，你就讲你自己的，人家的问题他自己会讲的。人家的缺点应该人家讲，你讲什么？

这样就没有吵起来。等到他们从主席车厢走出来，仍然说对方是“老保”。

毛泽东让张春桥去做工作，张春桥对他们说：“毛泽东和一个省谈话也不过两个小时，和你们却谈了两个小时，你们还不联合，回去怎么交账？”结果三派均照主席指示检查了自己，彼此越听越感动，他们联合起来。当然，也不那么简单，有一派还提条件，可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离北京只剩三个小时，经过做工作，也通了。

三派达成了联合协议，到毛主席那里去报喜。毛泽东说，祝贺你们，送你们四个字：“斗私，批修”。^②

9月23日，专列到邯郸，毛泽东稍事休息继续北上。

当天，毛泽东回到北京。

24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会议，谈到召开九大问题。

26日晚上，毛泽东亲临京西宾馆，接见参加集训的全国各大军区的近千名军队干部。

在热烈的欢呼声、口号声平息后，毛泽东前倾身子，朝台下人群中张

^① 张子申：《战将与统帅——杨成武在毛泽东麾下的四十八年》第392~393页。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1967》第222~225页。

^② 张春桥1967年9月28日接见江苏赴京汇报代表团时传达。

望着，搜寻着，大声问：“陈再道来了没有？”

一阵沉默，仿佛是猝不及防的闪电雷鸣，整个会场惊呆了，凝固了。略过几秒，陈再道站起来大声回答：“主席，我是陈再道，我来了！”

“好！好！”毛泽东连说两个“好”字，向他点头，向他招呼，安抚着说：“来了就好，不要泄气，要继续革命，你坐下吧！”

整个会场静听着毛泽东的话，陈再道眼含着热泪，近千名军队干部也被这情景感动了。^①

^① 章重：《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第449页。

五十四 南下了解九大精神落实情况

1969年4月九大以后，毛泽东主要抓了几件大事：一、结束动乱局面使国内局势逐步走向稳定。九大以后，毛主席、中央开始解决内蒙、山东、贵州、湖北等地的问题，稳定局势。二、整党建党和斗、批、改。三、重建党政机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开始考虑中央国家机关精简、改组、下放，成立新的国务院业务组。四、随时准备面对北方的战争威胁。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召开了中央战备会议。落实各项战备工作，军工部门按战时需要移交军队管辖。

已有一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在九大结束后，心情轻松地登上南下专列，准备到南方转一圈，看看九大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同时也算是一种休息。

1969年5月29日，他听取了周恩来关于中央国家机关精简、改组、下放，成立新的国务院业务组初步方案和想法的汇报。毛泽东表示：就照谈定的原则去做。但国务院业务组的人员调整，需等纪登奎、李德生二人到京后，先确定二人分工，再提出正式名单。^①

汇报结束，毛泽东登上专列离京南下。

30日，专列途经邯郸，短暂休息后，继续南下。

31日，专列在郑州车站稍事停留。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第300~301页。

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刘建勋、纪登奎。毛泽东询问河南的形势，刘建勋说，遵照主席上次的指示，做了教育工作，现在河南的局势好多了。但有些地方联合不起来，少数人还在闹，我们工作没有做好。

毛泽东说：“河南解放老干部多，好。干部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好，这是河南发明的”。毛泽东提出：“纪登奎要调到北京工作，两头跑，一半北京，一半地方。北京的事也难办。在北京机关工作，不可过长，不可过短，就去个短工吧！”

刘建勋问：“什么时候去？”

毛泽东说：“很快就去。”^①

5月31日，专列到达武昌。毛泽东住进东湖宾馆梅岭一号，在武汉停留了27天。

毛泽东对曾思玉等说：“我这次来，不是给你们谈工作的，因为在北京很忙，到这里是休息的。”^②

毛泽东很关心武汉的形势，他准备到南方转一圈，看看九大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

5月26日，也就是出巡的前几天，毛泽东在听取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汇报会上，批评了一些地区提出的“反复旧”口号。其中就是指湖北的一些人。翌日，总理草拟中共中央对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的批示。指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是不符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毛泽东当即批示：“照办。”^③

毛泽东在武汉多次同曾思玉、刘丰、张体学谈话。询问中央对湖北省革委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的批示的贯彻执行情况，鼓励他们做好湖北的稳定工作。

在武汉期间，他一再谈到要减少对他个人的过分颂扬。到了梅岭一号，他看到从走廊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里，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

① 林英海主编：《毛泽东在河南》第2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58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00页。

他针对林彪“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对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

毛泽东在观看中共九大纪录片时，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他生气地站起来中途退场，并且说：“哪有一个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他还告诉工作人员：“‘四个伟大’，太讨厌！”^①

毛泽东到武汉后看到到处都在搞“忠”字化运动，到处张贴主席像，就连吃饭、睡觉都要搞“早请示，晚汇报”。很是反感。在他建议下，6月12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停止了这种到处泛滥的“忠”字化运动。^②

这时，毛泽东关心的问题也发生明显变化，越来越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到经济形势方面来。在武汉期间，他多次听取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主要内容是工农业生产和重点工程项目的开发建设等。据曾思玉回忆：

“1969年夏，毛主席在湖北视察时，对湖北农业生产十分关心。当我汇报战胜1968年长江洪水，以及今年早稻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时，毛主席说：对，人是要吃饭穿衣的。湖北是个好地方，是鱼米之乡，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湖北这个地方盛产粮食和棉花，你们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③

对水利问题，毛泽东十分重视。一次，曾思玉和张体学等向毛泽东请求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毛泽东说：你们真是敢想敢干，这么大的水库，

^① ^②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558、1559、1560页。

打起仗来敌人丢原子弹一炸，下游统统被水淹掉。我看上游要修几个坝，重庆以上的金沙江要修两座坝。宜昌江段湾道多，江面不宽。你没有去过，可以坐一条船去看一看嘛。除了农业、水利问题，他在武汉还过问了焦枝铁路（河南焦作至湖北枝城）建设、江汉油田会战等情况，批阅了有关技术革新、渤海地震、华北防汛等文件。^①

毛泽东在武汉，仍然关心着解放干部的问题。到武汉前十来天，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专案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5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军委办事组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时说：“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有的学生没有经验，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他还说，“不要把责任推到下面，不要怪下面，谁叫我们不管呀！”



1969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与青年学生交谈。（摄影/钱嗣杰）

在武汉，他对当地负责人说：“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组搞了一二年，没有搞出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我不是完全反对专案小组。搞专案要有经验的人，年龄大的人，要与群众结合。现在有的人年纪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听说河南地专县一级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来主持工作，这个经验很好，全国不太多。”^②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560页。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第44~4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560~1561页。

有一次毛泽东在散步时看见湖对岸的武汉大学，他对曾思玉说，李达校长不应该被人整死，可惜呀！毛泽东说，有一种做法我不赞成，就是动不动就捉人，有的关在什么“牛棚”里，关在地下室里，报纸也不给他看，这就与世隔绝了。世界上干了些什么，他们都不知道。这实际上是一种“推一推”的办法，不是“拉一拉”的办法，对于干了些坏事的人，推一推就过去了，拉一拉就过来了。干部不给他与群众见面，家里人还要靠他养活吃饭呢。^①

这年3月，中国和苏联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等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本来就很不平静的两国边界地区的局势更趋紧张，苏联领导人和其他军事首脑不断地放出战争威胁的言论。他们调兵遣将，进行具体的军事部署，大量增加军费，增加在中苏边境和远东的驻军（以往在蒙古没有驻军，这时陆续增加到八个师）；在中苏、中蒙边境修建一系列空军基地和导弹基地；不断在中苏边境举行“军事演习”；下令大规模征兵；向中苏边境大批“移民”并发给边境居民武器；频繁侵犯中国领空、领土，制造边境挑衅事件。甚至提出：“苏联部队的核武器是有无限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导弹部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进行“毁灭性的核回击”。据英、美等西方报刊报道，苏联人“在口头上向华盛顿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首都进行试探”，要它们“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苏联方面这些不同寻常的动作，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和强烈反应。^②

6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打仗”的问题。

一天下午汪东兴打电话通知曾思玉，毛泽东要他去谈话。曾思玉立即赶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见到曾思玉说，你来得真快哟，的确是军人，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很好。

毛泽东说，今天请你来，谈谈鄂西山区三线建设的情况。你们要抓紧配套工厂的建设，一个·一个地落实。如果打起仗来，要有大量的枪炮、弹药、汽车做保障。

曾思玉将鄂西三线建设情况作了扼要的汇报，其中提到有一个工厂正

① 章重：《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第462~46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61~1562页。

在试制师团配属的多管滑膛火箭炮时，毛泽东很高兴地说：那就是中国式的卡秋莎嘛！要抓紧试制、定型，小批量生产。这样一旦打起来，我们才有备无患。现在苏美两国争霸，弄得世界不得安宁。大仗没有打，小仗没有断，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日趋紧张。北面人家在我国边境线陈兵百万是为了什么？不是摆给我们看的嘛！一旦打起来，不但要注意北面陆地入侵，还要准备对付敌人从海上来，要多准备几手，我们要居安思危，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我讲过备战、备荒、为人民。

曾思玉向毛泽东汇报，遵照周总理指示，和刘丰、体学最近到鄂西山区，主要是为第二汽车厂选定厂址，因二汽在建设中有东、西方案之争，现在处于停工状态，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经我们实地察看比较，觉得在十堰地区建厂的西方案较为妥当。

毛泽东说，二汽厂址要尽快定下来，争来争去有什么好处，利用丹江口水库的水上运输，是不够用的，由襄樊进四川的铁路修通了，二汽也就方便了，有了铁路打起仗来就好办了。毛泽东问：你们在河南搞了什么名堂？

曾思玉说，按照工程规划，在河南郑州以东平原地区正在施工，堆两座山，在河南还修建了机库。

毛泽东问：西边的铁路修了没有？

曾思玉答：“没有修。”

毛泽东说，中央、国务院早就定了建焦柳路，总体规划和设计方案我都看了。焦柳路是从河南的焦作经豫西、鄂西、湘西到广西的柳州。如把焦柳路修好，纵深还有宝成路，可通云、贵，我们就灵活多了。你和其他同志及河南的刘建勋商量一下，先修好焦枝铁路。

毛泽东说，战备工作不能放松，要认真落实，要准备打仗。你们在江南给我建一个临时指挥所，若打起仗来，我就在江南照样可以指挥嘛！

当曾思玉汇报说，河南南阳地区钻探打出了油气层时，毛泽东高兴地说，湖北江汉平原会有石油的，我曾问过李四光同志，对地球的构造研究得怎么样？他说对地球的了解还不到一张纸那样薄一层，从地质结构看，我国油气层分布很广。你们报告国务院，请石油部派专家和勘探队来探明情况。若江汉平原有油，战略价值可就大了，如果打起仗来，大庆和沿海地区的油田很容易被敌人破坏。江汉平原有石油，平时把油井封闭不用，战时启用，作用就大了。人没有饭吃不行，飞机、坦克、汽车没有油也不

行。没有油，飞机、坦克、汽车再好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嘛！

毛泽东说，湖北要是煤就好了，可惜都是些鸡窝煤。

毛泽东说：今天谈了不少，湖北、河南两省有一亿多人口，地处中原，部队不少，你是带兵的司令员，兼职较多，要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发扬民主，要明确分工，有的工作让其他同志去做，多发挥助手的积极性。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掌握第一手材料。要读书。你要注意抓好部队建设和战备工作的落实。

毛泽东谈话以后，曾思玉、刘丰、汪东兴乘直升飞机在咸宁地区选择了地址，调了一个团施工，为毛泽东修建指挥所。后来听说关于咸宁指挥所有多种传说，都是误传。

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开展江汉油田勘探会战。^①

毛泽东很喜欢在东湖边散步，他说：“东湖真好，湖水静静的，这个湖湾里的鱼一定很多。”他点了几种鱼的名字，笑着说，“洪湖有一种红眼土壳鱼，手指一般大小，肉很细，刺很软，很好吃。”他指指东湖边的柳树说，“柳树蘑是个好菜，肉细，做汤味道非常鲜美。”

毛泽东说：“东湖比西湖好。这里有长江，夏天还可以游泳。东湖的樟树、桂花树、竹子，风景真好，四周的柳树和水杉树很多。”“你们看，对岸是老虎尾，远处是中山亭，那边是珞珈山，茂密的树林里是武汉大学校址。”^②

毛泽东在武汉除了批阅文件、看书外，有时也观看战士们打篮球。毛泽东说：“你们打球赢了人家是好的，但光想赢人家也不好。要尊重人家，要帮助人家，要帮助人家把你们赢了才好。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③

毛泽东在武汉还召开了一次有十多位服务员和领导同志参加的座谈会。

当时服务员多数是部队的女战士。毛泽东逐个问了他们的姓名、籍贯、年龄、文化程度。毛泽东说，你们都很年轻，你们正是精力旺盛时期，成长学习工作时期，要好好学习，可以学文化，也可以组织学习点军事，将来还可以学习些技术，有的可以学习医务工作或其他适合女孩子的技术性工作，多学习些本领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① ③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第40~44、320~321页。

② 章重：《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第462页。

6月26日，毛泽东计划离开武汉，行前同曾思玉、张体学、刘丰又谈了一次话。

曾思玉、张体学、刘丰带着地图向毛泽东汇报修焦枝铁路问题。

毛泽东说：南北两线，我看还是北线好。你们是同意南线的，你们是从地方主义出发的。现在美苏两国争夺世界霸权，到处伸手，弄得世界不得安宁。我们要做好早打、大打的准备。我们不是他们的参谋长，天晓得他们什么时候挑起事端，发动战争。要做到有备无患。焦枝线修好了，然后再经湘西向南延伸修至广西柳州，同时修从襄樊入四川的铁路，形成四通八达的铁路网。你们同河南刘建勋同志商量一下，动员两省人民大力支持，与铁路部门同心协力，争取时间把焦枝路修好，为在湖南、广西修焦柳路创造有利条件。

1969年8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指示铁道部召开了专题工作会议。11月1日破土动工，百万筑路大军展开会战，仅用38个月时间，就建成了这条800公里的铁路。后来，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说，修铁路还打人民战争呀！说罢哈哈大笑，十分高兴。^①

毛泽东与曾思玉、张体学、刘丰谈话结束后，在梅岭一号门前同他们和工作人员合影，然后离开武汉赴长沙。

当日，毛泽东到了长沙。因为湖南省公安厅在“文革”中被“砸烂”，已经瘫痪，毛泽东在湘的警卫工作由省人保组、军管会负责。毛泽东看到原来认识的湖南省公安厅长不见了，很关心，强调要解放干部，让他们出来工作。

毛泽东说，党的九大以后要抓革命，促生产。“湖广熟，天下足”，中南各省要抓好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②

28日，毛泽东要离开湖南，他对黎原、华国锋说：“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那股思潮，‘省无联’（指‘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③

当日，毛泽东到了江西，第二天接见了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毛泽东

①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第41~42页。

② 夏远生、马娜：《毛泽东的三湘情结》下，第381、596~597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61页。

讲了党的历史，清理阶级队伍，教育革命，扩社并队，工作作风，政治建厂，军队建设，井冈山，农村工作等十个问题。^①

毛泽东在湖南、江西与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中肯定了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作用和周恩来等的历史功绩。

6月29日，毛泽东到了杭州，一直住到9月18日，历时两个半月。

7月3日，毛泽东原则同意，批准了周总理对中央、国家机关精简方案的设想。

8日，毛泽东在浙江对当地负责人说：“要教育帮助新干部，就是要当见习官。他们没有经验嘛，就是要当见习官嘛！老干部是有经验的。”他还详细地询问了浙江工业配置情况、新安江水电站生产情况，并谈到修建杭州到长兴的铁路问题。^②

11日，陈毅等老师提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

21日毛泽东在军委办事组关于成立解放军报社领导小组报告上批示：“肖力已下放，不应任此职。”（肖力即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李讷没有当上九大代表，毛泽东让她到江西“五七干校”去劳动锻炼。）^③

7月23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

8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

“7.2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和“8.2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其主要精神是：对分裂大联合，破坏三结合另立山头，拉队伍的都要立即解散。宣布解散一切大联合以外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中央文革宣扬和保护的打、砸、抢活动，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活动”予以严惩。绝对不许任何人冲击人民解放军，不准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车辆。对煽动、威胁职工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坏人，依法惩办；对长期不回生产和工作岗位的停发工资，直至开除。这些条款都是针

①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江西》第24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61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第53页。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97~98页。

对当时横行霸道的“造反派”的，对于借制造动乱以夺取权力的“造反派”无疑是釜底抽薪。没有了上面的支持纵容，只好偃旗息鼓。这就为彻底结束动乱，恢复生产，安定社会治安，稳定全国局势创造了条件，解放军也逐渐从内乱中脱身，得以集中力量加强战备。^①

7月28日，毛泽东看到一些材料，也听到一些反映，有些地方公社的生产队又在搞合并，又出现了杀猪、砍树、刮共产风的问题。毛泽东很担心，怕农业又起风波，破坏生产力，又苦了农民，他让汪东兴通知警卫队长陈长江回家调查。

汪东兴对陈长江说：“主席让你回老家走一趟，看一看，做些调查了解。这是个急事，快去快回，往返给你五天时间，你看行不行？”

陈长江赶回家中，五天按时返队。向汪东兴汇报，总的印象农民思想安定，生产搞得不错，丰收在望。农民和干部普遍反映，这几年农业发展不错，集体生产搞得好，家家都有自留田，家庭副业也搞起来了。他们最担心的是，怕党的农业政策有变化，怕瞎折腾。没有听说发生杀猪、砍树、刮共产风的问题。省、地、县也都没有提出过生产队合并方面的问题。“文革”对他家乡的农民影响并不大。

后来毛泽东见到陈长江，对他说：“你这次回家了解的情况，东兴给我讲了。看来，你们那里搞得还是不错的。”毛泽东说，“农业是关系到大多数人生活的问题，抓好农业，解决了大多数人的生活问题，这就是抓住了大多数人。1958年后的那几年，农村政策不稳定，使农业受到很大损失。”“搞农业，一定要稳定政策，叫农民放心。”^②

8月31日，毛泽东在江青关于京剧《智取威虎山》改名等问题请示信上作了批示：“牵动太大，至少暂时不要改动戏名和主要人物名字，地名暂时也不宜改动。对小说作者的批评也宜从缓。”^③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观看了浙江的文艺演出。在当时“样板戏”一花独放的情况下，对地方剧种的发展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对当时已被江青宣判“死刑”，被诬蔑为靡靡之音的越剧曲调给予了保护。他说：“越剧不能砸烂，好的还是要用。”对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毛泽东说：“我看还可

①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第54~55、59~61、62页。

②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101~103、110~111页。

以，不要全盘否定啰。”当时江青被说成是文艺革命的旗手，有人说，是她创造了革命样板戏。毛泽东说：“不是，戏原来就有，经过加工提高，是文艺工作者的劳动成果。”

据浙江文艺界人士回忆：

1969年秋天，毛主席莅临杭州，再次观看了浙江的文艺演出，并接见了演员。在毛主席亲切询问浙江文艺界的情况时，一个演员反映说：“现在的越剧改革，改得京不京，越不越，歌剧不像歌剧。”主席认真倾听意见，慈祥地说：“你唱一段老越剧给我听听吧。”演员立即唱了越剧《红楼梦》的一个唱段，主席表示曲调好听，微笑着说：“调子还是高昂的嘛。再唱下去吧。”演员回答：“下面不会了。”主席和蔼地说：“那你找些唱片来我听听。”

这一下大家可有点着急了。越剧的代表作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在那个年代里，到哪里去找录音呢？因为越剧的曲调已被说成是靡靡之音，女子越剧已被江青定为“60年代的怪现象”而宣判“死刑”了，一些服装也早在“文革”初期就作为“四旧”烧掉了，所以估计录音唱片也难以免遭劫难。当时，有同志提出到浙江越剧一团去借借看，但敢去借的人却没有。因为在那时，谁若再开口借《梁山伯与祝英台》，定会引起极大的误会。别人不是以为他思想有问题，就是以为他不正常，为什么还敢听这靡靡之音？最后，有人想出一个办法，请驻杭空军的文化处徐处长去借，因为空军当时是在杭州的支“左”部队，地方造反派听他们的。这个点子出得好，《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录音带果真借来了。在一次跳舞休息时，毛主席一改听京剧的习惯，而听越剧了。

当时我们这些人受“左”的影响比较深，加上已有几年没有听到越剧了，有些生疏。所以当录音放出来的时候，有点觉得听不习惯，不入耳，表现出不爱听的情绪。但是，毛主席却不是这样，他老人家在认真地、仔细地听着。大家看到他这个样子，也就迅速地安静下来了。把“梁祝”的“十八相送”、“楼台会”等主要选段都放了，毛主席一直全神贯注地听着。

听完录音，我问他：“主席，你觉得越剧怎么样？好听吗？”

毛主席非常认真地对我说：“我看还可以，不要全盘否定啰。”

主席表示：“这个戏的音乐基调是好的，只是个别太低沉的地方才需

要改一改。”他说：“各个地方剧种就是要有自己的特色，不然要那么多的地方戏干什么，一个剧种就够了嘛。”

一个器乐演奏员问主席：“听说越剧要砸烂，这到底对不对呀？”

主席听了后皱皱眉头，严肃指出：“越剧不能砸烂，好的还是要用。”

在听了所谓“改革越剧”《红灯记》以后，毛主席说：“我不赞成把越剧改成不像越剧。”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浙江的文艺工作者，开始批判民族虚无主义，扭转戏曲改革中走偏的方向。

浙江的地方剧种改革，逐步从民族虚无主义的错误轨道上拉回来，是毛主席亲自关心，批判了江青的胡作非为、谬种流传的结果。人们还清楚地记得，在1969年主席到杭州的那一次，当一位演员提到，江青创造了革命样板戏时，主席严肃地说：“不是，戏原来就有，经过加工提高，是文艺工作者的劳动成果。”说到“不是”的时候，毛主席有力地摆了摆手。^①

9月11日，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会谈，双方达成“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谅解协议。会谈中，周恩来就最近苏方对中方进行核威胁一事向柯西金提出严词责问，柯西金无言以对。两天以后，周恩来将会谈情况向在外地的毛泽东作了汇报。

9月间，召开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军队不要松懈”和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防止对手发动突然袭击，作好精神、组织



1969年9月23日，毛泽东视察返京途经天津，走下专列。（摄影/钱嗣杰）

^① 浙江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与浙江》第203~263页。



1969年9月22日，毛泽东同汪东兴在天津。（摄影/钱嗣杰）

和物质上的准备。

9月，毛泽东修改《人民日报》社论《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初稿，几乎把所有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删掉了，还删掉以下一段话：“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的典范。”他并且写了一个重要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①

9月16日晚，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其中第二十二条是他加上的，即：“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②

18日，毛泽东离开杭州返京，他先到了上海。

9月21日，毛泽东离开上海。

专列途经南京。毛泽东在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陪同下，视察了南京长江大桥并接见了守桥部队的部分干部、战士。

当晚，专列途经济南。

22日11时35分至13时15分，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了济南军区司令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55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第66页。



1969年9月23日，毛泽东在天津同随行的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同志合影。
(摄影/钱嗣杰)

员杨得志、政委袁升平、山东省革委主任王效禹的汇报。毛泽东就正确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坚持文斗，不要武斗，工农业生产，落实政策等作了指示。

当天，专列离开济南到了天津。

23日，毛泽东在天津专列停靠站与随行的干部、战士、乘务员合影。

当天，毛泽东回到北京。

五十五 战备疏散到武汉

1969年9月11日，中苏总理在北京机场进行了缓和局势的会谈，达成了若干口头谅解，但苏联总理柯西金回国后，苏方却拒绝换文。

9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很快召开了有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作战部长以及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人参加的作战会议，研究加强“三北”（东北、华北、西北）战备问题。27日会议结束。晚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及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并合影。接见结束后，毛泽东表示：“不留同志们在北京过国庆了。大家早点回去抓紧做好战备工作。”

1969年首都国庆活动，是在外松内紧的气氛中进行的。

10月1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照例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晚上还举行了焰火晚会。但空军的直升机预先停放在天安门与午门之间，以备情况紧急时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可以迅速抵达预定的指挥位置。情报部门和所有远程雷达不间断地进行侦察探测。天安门城楼安置了电台，与情报部门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

国庆节刚过，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分析中苏关系的发展趋势，研究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措施。会上，林彪传达了毛泽东不久前的讲话：“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总理在会上提出了落实的意见。

根据两国总理达成的原则协议，两国政府随后商定，从10月20日起，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中方估计，这次谈判可能对缓和紧张局势达成某些协议，也可能是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的烟幕。毛泽东明确指示，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必须于谈判开始前紧急疏散。^①

1969年10月14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政治局在京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驻京部队机关指战员。接见之后，毛泽东即乘火车南下武汉。出发之前，毛泽东对前来送行的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说：“我先走一步。你们转告林彪同志，他也要尽快离开北京。恩来，你也早点离开中南海，出城进山。我到了武昌就给你打电话。”^②

15日，毛泽东到达武昌。

住在武昌东湖宾馆的毛泽东，每天仍是阅读书报、审批文件和思考问题。与上次有所不同的是，他很少出去散步，也没有会见任何客人——这通常是他在考虑重要问题或准备作出重要决策前的一种习惯。

16日，林彪前往苏州。

17日晚，周恩来与在京政治局成员分批会见一些老同志，向他们宣布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战备疏散的决定。周总理说，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老同志在20号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准备专机或专列。他一再嘱咐这些老同志一定要带夫人去。告诉他们，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疏散工作很快落实。^③

18日（星期六），刚到苏州的林彪向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这个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号令”迅速用电话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引起极大震动。林彪的这个“紧急指

① ②严实：《林彪“一号号令”发出前后》，引自《吉林农业》月刊增刊B，第7~9、10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2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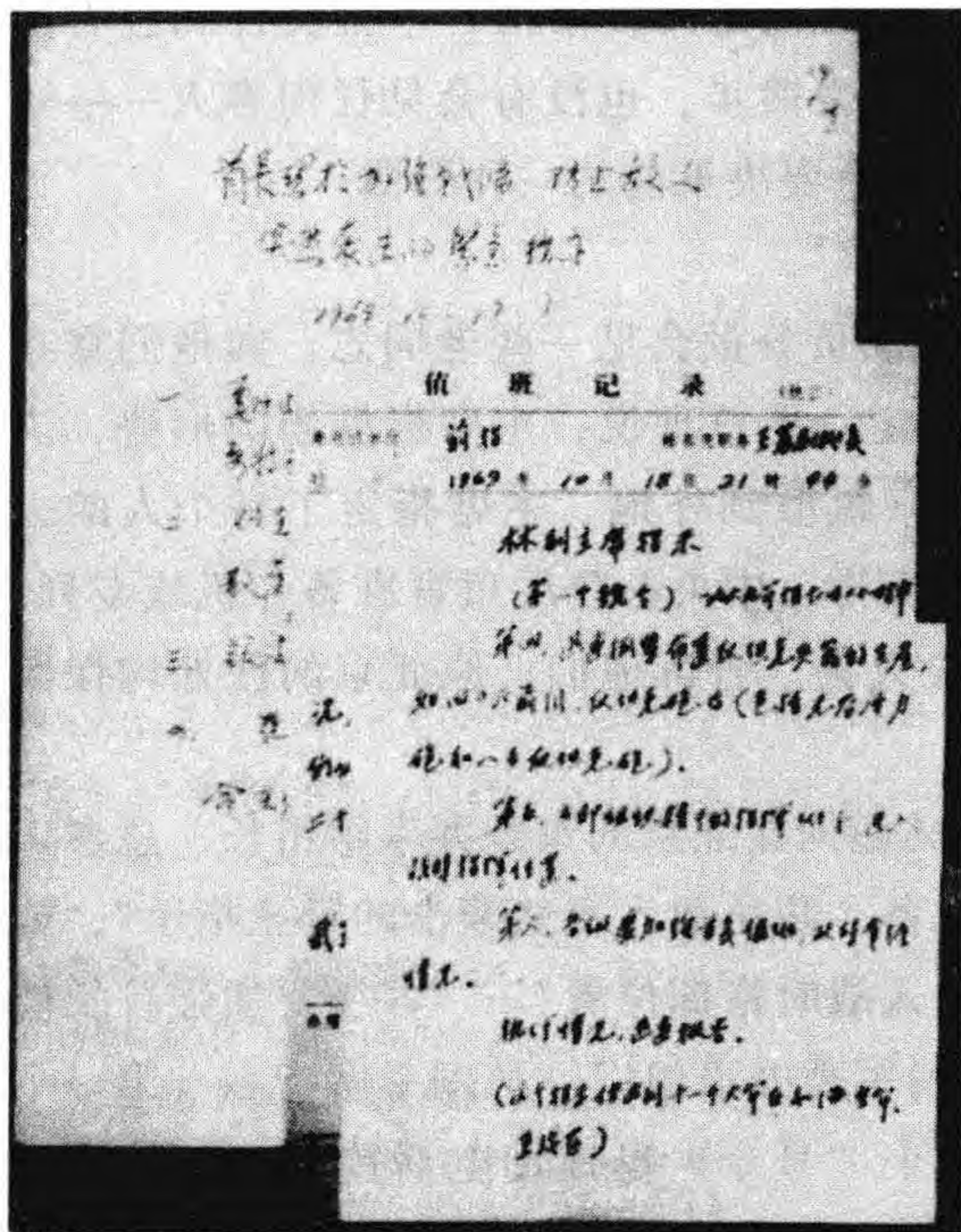
示”，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尽管它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特别是针对苏联军队有可能入侵这种估计作出的。但对这样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林彪竟事先没有报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自行作出这样的紧急指示，并立即向全军各大单位下达，采取行动。命令下达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①

10月19日，毛泽东收到了林彪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即所谓的“第一号号令”。

陪同毛泽东来武汉的汪东兴后来回忆：“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

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②



林彪“第一号号令”影印件。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564、1565 页。

汪东兴告诉警卫部队：“有人要调动军队，想干什么呢？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要求警卫部队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搞破坏。”

毛泽东在武昌，差不多每天都有机要通信员从北京飞来给主席送文件，也把北京备战的情况带过来。诸如北京的大疏散、大搬家，北京的大专院校往外迁，许多住户卖东西，很便宜。警卫部队住在城区的家属也疏散到西山了。北京一片打仗的气氛。我们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感染。当时，毛泽东也体察到了。

一天下午，汪东兴向警卫部队领导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对一些人搞的“一号号令”很生气，说，这是捕风捉影，小题大做。敌人不可能南边也来，北边也打，都向我们打来，他们不会配合得那么好。打仗的准备要有，警惕也是要有的，但不会马上打起来，不要惊慌失措。^①

10月19日晚，周总理召见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等人，询问林彪指示的来历、内容，特别提出为什么要把林彪的指示称为“一号号令”？为什么要把林彪的指示向地方传达，引起不应有的混乱？^②

毛泽东在武汉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有一天，毛泽东知道警卫一中队要和当地机关、警卫部队赛球，也出来看，他发现一中队的青年人总是争强好胜，总想赢人家几分，赢了球总要表现出得意之色。他也听到了战士们的一些议论。于是传话给一中队的干部：凡是北京来的人，都要尊重地方上的同志，尊重他们的首长，也要尊重炊事员、服务员和烧锅炉的工人。他们的工作即使有错误的时候，也不要乱讲。你们这些人到了地方上，人家都是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为你们服务，招待你们。你们这些人到了哪里总是大手大脚的，要注意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粒粮，也不要总想高人一头，比如打篮球吧，老想赢人家。要讲友谊、讲团结，要有风格，要谦虚。^③

毛泽东在武昌期间，听取了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强调要加强三线建设，抓紧修好焦枝铁路，开发江汉油田。毛泽东说：“开发江汉油田对改善我国石油工业的布局，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一旦战争打起来，其战略地位就会充分显示出来，你们要从战争的角度去看待江

① ③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119~120、121页。

② 严实：《林彪“一号号令”发出前后》，引自《吉林农业》月刊增刊B，第14页。

汉油田。军队要介入油田的工作，一定要搞好会战，把油田建设成为战略供给基地。^①

有一次，曾思玉、张体学等晋见主席，再次请求兴建三峡水利工程。毛泽东摆摆手说，你们真有雄心壮志呀！难道你们就不怕原子弹吗？大坝修起来了，战争打起来万一被炸，那么多水泄下来，不但要淹宜昌，顺流而下，连武汉、九江、安庆、南京都要遭殃。现在修三峡工程不现实，条件不具备，不能搞。又说，修这么大的坝，你们敢呀？你曾思玉过去打仗可以，张体学搞过丹江水力发电站，有发言权，但现在修三峡大坝不现实。

毛泽东问：你们还有什么好的方案吗？张体学说，不搞三斗坪高层大坝，我们考虑可先在西陵峡出口葛洲坝建低坝，利用径流发电。这时他们把地图摆出来，照图叙述。毛泽东详细听取汇报，不时询问各方面的情况，笑着点点头说，这还可以，有道理，万一低坝被炸，对下游影响也不大，赞成修建。他又强调指出：在设计和施工中，不要把长江变成“短江”。要做到有利于船舶航行，有利于蓄洪、排洪和发电，有利于鱼类的生殖繁衍。最后说，此事报告周总理，要经过国务院有关部门讨论研究，由中央决定。^②

11月12日，毛泽东去了一趟长沙，当天又返回武汉。在长沙，毛泽东听取了华国锋、黎原关于湖南形势、农业生产、解放干部等情况汇报。

毛泽东对湖南局势的发展表示满意，指出：前年来时还是急风暴雨，去年上半年也是高潮，现在看来形势很好。以后可能还会出点什么事，但大局不会有变化了。毛泽东说：“一个单位分成两派已经三年了，要联合起来，要教育团结多数，大多数人是好的。干部解放后可以调换一个地方工作；即使对敌人也要区别对待。抓人多了不好处理。”

毛泽东说，大寨好，好就好在自力更生。不要去那么多人到大寨参观，人去多了成灾。你们自己搞自己的大寨嘛！华国锋汇报了湖南省农业学大寨的情况，湖南省委已经树立了几个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毛泽东很高兴。他说，你们南有新田，北有安乡，路子走对了，就是要各地搞自己的大寨。

毛泽东说，机关人太多，不好办事，中央、省、地、县四级机关人多了，要精简人员，转变作风。

毛泽东对省委领导说，希望你们十年建成工业省。

^{① ②}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毛泽东在湖北》第43、45页。

华国锋汇报了湖南煤炭生产情况。毛泽东听后很高兴，再次强调要“扭转北煤南运”，发展湖南煤炭工业；赞成湖南建设湘澧盐矿。^①

谈话后，毛泽东离开长沙又回到武昌。一直住到1970年4月11日。

毛泽东这次在武汉的时间很长，但保密性很强。没有公开的社会活动，见诸文字的材料比较少。我们只能根据《周恩来年谱1949~1976》等有关资料将毛泽东在此期间收文和批注文件的情况综合起来，可见一斑。

10月29日，总理在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有关四川问题的汇报。30日，总理就政治局会议情况函报毛泽东、林彪，提出：“目前四川问题，中央非过问不可了”，“从九大后，四川掀起‘反复旧’运动，其性质与山东、贵州、湖北类似”，“‘反复旧’矛头虽也是对着军队，工代会也要超越于革委会之上，但四川究竟有四川特点，一切表现在派性和武斗上面”。又说，现已有必要先约四川党、政、军有关负责人“来京商谈”，“达到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然后再扩大商谈范围”。毛泽东于31日批示：同意。^②

11月1日，汪东兴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拟任命王良恩、张耀祠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11月1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送去中苏边界谈判重申中方建议内容的讲话稿。内容主要有：一、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是谈判的基础。二、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是维持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保证。三、中苏边界谈判必须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另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与中国驻巴大使联系，转达了尼克松、基辛格想同中国接触的信息。^③

12月4日，周总理就10月27日，美驻港总领事马丁致函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探询2月16日两名美国人乘游艇越入珠海附近海域被中方拘留的下落、健康及释放事。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处理意见致信毛泽东、林彪：经过政治局在京同志商议，拟同意外交部在17日或稍后释放两名美国人的意见。毛泽东批示：照办。^④

12月6日，周总理就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第四次全会将毛泽东视察湖南

①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五十次回湖南》第408~410页。

② ③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31、334、336~337页。

时的一些谈话作为会议文件事告王良恩：“请你拟一通知，再次重申严禁私编私印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巡视谈话……”12月25日，周总理写给毛泽东、林彪的报告再次重申了这些精神，并送上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通知及华国锋、黎原、杨大易关于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检查报告、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清查和处理非法印刷品情况的报告。毛泽东批示：“照办。”^①

12月12日，周总理书面报告毛泽东，11日政治局会议，讨论研究由于苏方代表回国，中苏边界谈判暂告休会以及备战、明年生产计划、三线建设和内蒙古、四川等问题。

同一天，周总理将外交部转来我驻波兰大使接见美国驻波大使的情况报告毛泽东。总理意见，拟搁一下看看各方反应，再定如何回答。毛泽东批示：照办。^②

12月16日，周总理在中共中央关于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全面军管的决定（草案）修改稿中提出：由于目前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不能适应形势需要，领导之间思想不统一，决定成立以黄振堂（北京军区副政委）、杜文达（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九人“前线指挥所”党的领导小组，实行对内蒙古的一元化领导。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文件。

12月25日，周总理将12月24日政治局讨论四川问题的情况报告毛泽东、林彪。同日，中央发出了解决四川问题的批示。改组了四川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造反派刘结挺、张西挺被解除了省革委副主任职务。

12月29日，周总理将28日政治局讨论内蒙古问题的情况报告毛泽东、林彪。

同日，周总理将美国驻法国、瑞典使馆工作人员要求见我大使、代办事报告毛泽东。周恩来意见：只收、只听，暂不答复，待对我有利于接触时，才给回答。中美华沙会谈，拟在一月初答复，“定在二月二十日恢复会谈”。毛泽东批示：同意。^③

12月31日，周恩来将军委办事组当日报来的《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纪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37~37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第73页。

②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38、341页。

要》送毛泽东。毛泽东批示：照办。^①

1970年1月1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汇报内蒙古、四川两地派性斗争情况。同日，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研究解决办法。

1月22日，总理致信毛泽东、林彪，汇报了昨天政治局会议商讨江青送来的，于会泳等按江青意思提出的，筹办北京、上海两处“五七”艺术学校的建议及提出由江青担任“五七”艺校名誉校长，谢富治任荣誉政委事。毛泽东阅后批示：“江青不必任名誉校长”。^②

1月25日，康生将北师大校长陈垣的一封信转报毛泽东。陈垣原来的秘书和服务员在“文革”中回校参加运动。陈垣的生活无人照顾，经与学校商量，已将他的秘书和服务员派回陈垣处，陈垣来信感谢党中央对他的关怀。陈垣要将他的书籍及四万元稿费献给党。康生报：政治局会议交换了意见，这种精神加以鼓励，书籍文献暂由他自己保管为好。关于他的稿费，拟说服他自己保留，以照顾生活。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要争取这样的知识分子。”^③

1月27日，周恩来就尼泊尔国王邀请中国领导人赴尼参加比兰德拉王太子婚礼事致信毛泽东、林彪等，提出拟派郭沫若为特使前往致贺，同时还就访朝等问题提出初步计划安排。毛泽东批示：“可以照总理设想作出访安排；但究应如何安排，请中央酌定。”^④

1月30日，周总理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讨论修改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批示：“照办。”^⑤

2月1日，周总理将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批示：“照办。”^⑥

2月4日，毛泽东在康生1月30日来信，请示可否将主席1941年批判王明投降主义的讲话大纲印发政治局各同志事批示：“此件可以照你的意见办理。其中颂圣写成烦圣，请改正。”主席1941年原话有：“不知迫蒋

①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42、34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4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第75页。

③ ⑤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第76、77、80页。

只知颂圣，提不出任务”；“不作阶级分析，全无列宁精神”，“群众原则，又妥协又斗争原则”。^①

2月5日，周总理将中央组织部业务组《关于当前各地整党建党情况报告》送毛泽东、林彪阅。鉴于一些单位“吐故纳新”政策偏宽、偏严，与康生联名附信建议召开有部分省、自治区、参加的整党建党座谈会，纠正偏向，统一政策。毛泽东阅批：“照办。”^②

2月9日，毛泽东将中央调查部一干部写信反映驻该部军代表工作中有受极左思潮影响的事，批转周总理、康生查处。

2月11日，周总理与康生联名将昨日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加强对外出外人员的审查和政治思想工作的通知》报毛泽东、林彪，提出：我方出国人员是能与亚非国家当地人民一样生活、同甘共苦的，为防骄傲和松懈，仍以经常注意为好。2月15日，经毛泽东批准，《通知》发出。

2月12日，周总理将政治局讨论修改的外交部给驻波兰代办雷阳电稿和参加第136次华沙会谈中方代表发言稿报毛泽东、林彪。其中谈话中对美方上次提出到北京来直接讨论，我方发言这次用“考虑”显得太轻，故改为“接待”较“欢迎”为轻，较“考虑”就落实了一些。毛泽东批示：“照办。”^③

2月19日，周总理将谢富治、温玉成、吴德18日关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批极左思潮和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不力的报告转报毛泽东。毛泽东圈阅了此件。

2月22日，周总理将昨日政治局讨论驻守湖南某军调动及由华国锋代理湖南省革委主任事报毛泽东、林彪。毛泽东表示同意。

3月7日，周总理将政治局当天讨论周恩来访朝事报毛泽东、林彪。

3月8日，毛泽东派汪东兴回京，向周恩来传达了他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同日，周总理将铁道部军管会《关于湘黔铁路方案比选情况的报告请示》报送毛泽东、林彪等。认为：“贵阳接轨方案”较“遵义接轨方案”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第78~79、81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48页。

好。毛泽东批示：“照总理意见办。”^①

3月11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联名向毛泽东、林彪报告昨日政治局讨论设立国务院文化组问题。毛泽东批示：“同意。”^②

3月14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报昨日政治局讨论通过由他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名额和选举的决定》及名额分配的两个协商方案。提出：代表中非党员不应少于40%，爱国人士不应少于100人，洛甫、稼祥等均需要安排。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央的部署。”^③

3月17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报告昨日政治局讨论通过第一次修改宪法工作小组起草的《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及第二项附件。（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来京协商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负责人名单）毛泽东批示：“同意第一项所提修改问题的意见。同时请各地方提修改意见。附件留阅。”^④

3月20日，周总理将昨日政治局商讨柬埔寨问题和会议决定协助西哈努克在京活动（接见中外记者、散发书面声明）同时准备中国驻金边使馆被砸、华侨被捕事报毛泽东。毛泽东批示：“照办。”^⑤

3月21日，接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报来的尼克松口信：“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如果北京同意的话。这样一条渠道的存在，将不会被白宫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们可以保证完全的自由决断。”周恩来批：“尼克松想采取对巴黎谈判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⑥

3月24日，周恩来就推迟中美北京会谈事致信毛泽东、林彪，提出将会谈日期推迟至4月中旬。毛泽东批示：“可略推迟几天，以四月十五日为好，请总理酌定。”^⑦

同日，周恩来就访朝事致信毛泽东、林彪，确定访朝日期为4月5日至7日。同时提出：“国内人少事多，此次出访不拟多带人，要简化外交礼仪，以便多多交换意见。”毛泽东批示：“同意。”^⑧

3月25日，周总理将3月17日至20日政治局召开的为四届人大作准备的工作会议的情况书面报毛泽东、林彪。

① ② ③ ④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第84、82、83、85、86页。

⑤ ⑥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56、357页。

3月25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联名将昨日政治局通过的两件事：1.《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2.审查批准上海等17个省、市、自治区报送的省级革委会成员名单报毛泽东、林彪。对清查“五一六”组织的通知，毛泽东批示：“照办。”^①

3月25日，周总理就柬埔寨问题和印度支那局势致信毛泽东、林彪，告知西哈努克提出柬、越、老印支三国四方发表反美联合宣言。待各方准备好后，借广州或南宁供他们召开“三国四方会议”。毛泽东批示：“照办。”^②

3月27日，周恩来将经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中央对新疆革委会、新疆军区《关于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进一步加强战备，保卫边疆的报告》的批示稿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后发出。批示决定由龙书金、萧思明、赛福鼎、王恩茂等14人组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龙书金任组长，萧思明、赛福鼎任副组长。

4月2日，毛泽东向斯特朗敬献花圈，花圈上写着：“献给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③

4月3日，毛泽东对《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一文做了修改并批示：

“此文写得较好，已看过，另一篇待看。用这一篇似乎就够了。可用两报一刊的名义。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東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有用的话，不至于引起反感的话，保留了几段，并未全删。以上请酌。”^④

同日，周恩来就访朝期间会谈方针请示报告毛泽东、林彪。毛泽东同意所提基调，并建议作个别处的修改。

4月11日毛泽东离开武昌。

晚上21时，专列到达长沙。

当晚，毛泽东接见了华国锋、卜占亚。

这天晚上，林彪从苏州让秘书打电话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提出：关于国

① ③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第87、89、90~9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58页。

家主席问题，“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副主席可设可不设。林表示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电话记录同时传给中央政治局。^①

12日，政治局讨论林彪关于要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的意见，多数同志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讨论意见报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②

毛泽东问：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么就让董老（董必武）当吧！^③

13日，毛泽东接见了黎原、卜占亚、华国锋，谈到国际形势和战备问题。

中午11时，毛泽东离开长沙赴杭州。

4月14日，专列抵达杭州。毛泽东在杭州住了11天。

17日，周总理在中央和全军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上说，政治局、毛泽东、林彪决定：由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纪登奎、李德生等管组织工作。

20日，周恩来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准备情况报告毛泽东。23日，毛泽东批准于24日夜间发射。

22日，周恩来就柬埔寨、老挝、越南“三国四方”会议筹备情况及其代表赴广州开会的日程等报告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

24日，“五一”快到，毛泽东离杭返京。

当天，专列途经上海。

25日，专列途经苏州。

与毛泽东一同去苏州的有张春桥、马天水、王维国。毛泽东去前对张春桥说，林彪在苏州，你们怎么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张春桥向毛泽东说明：他是保密的。

毛泽东到苏州后，林彪和叶群到他的专列上去了。毛泽东问林彪：“你的身体怎么样？”林彪说：“我去年到井冈山去了一次，井冈山上很适应。”毛泽东说：“你要在外面走走。”林彪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6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第94页。

③ 夏远生、马娜：《毛泽东的三湘情结》下，第599页。

了。”并将一盒录有卫星上播放的《东方红》乐曲的录音带送给毛泽东。(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上天的时间是1970年4月24日,卫星上装有播放《东方红》乐曲的设备。)

毛泽东还问:你们在苏州作过调查研究没有?叶群插话说,作了。调查过一个粮店。

毛泽东又问马天水:你们现在怎么样?马天水吹嘘说,准备自己造飞机。毛泽东说,我不看到自己的飞机起飞不相信。要看重事实。毛泽东还问张春桥:李富春这个人怎么样?张春桥不好回答。毛泽东走的时候,林彪站在那里,毕恭毕敬向毛泽东敬礼,看着火车离站而去。^①

26日11时50分,专列途经济南。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了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袁升平的工作汇报。毛泽东指出:搞老、中、青领导班子好,完全搞青年班子不好,但也不能轻视年轻人。^②

13时10分,专列离开济南北上。

27日,毛泽东回到北京。

① 张聂尔:《中国1971——风云“九一三”》第221~222页。

② 山东省档案馆编:《毛泽东与山东》第610~611页。

五十六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突发事件

1970年7月10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修改宪法、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的指示。根据计划，8月21日至28日召开九届二中全会，9月15日至24日召开四届人大会议。

7月17日至2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修改宪法问题。毛泽东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22日会议结束。

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视察。

据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回忆：

毛主席要乘火车去南方视察。到底去哪里？领导上并没有向我们交底。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外出准备工作的进行。说起准备来，人，还是那些人；事，也还是那些事，只是根据当前的形势在警卫部署上更突出了如何应付可能发生突然情况方面的考虑。因为我们知道，尽管报纸上天天说“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以及“大联合”、“三结合”等这些举动，加上中央一再提倡，各省的革命委员会也相继成立，实现了“祖国山河一片红”了，可是，实际上，社会秩序并不平静。后来在外出沿途所见，不少地方仍然很混乱，甚至还在动枪开炮，弥漫着武斗的硝烟。

毛主席乘坐的专列沿京广线南下，经石家庄、郑州到达武汉，在那里住了几天，又乘车继续南行，到达湖南省会长沙又住了几天。不论走到哪里，只要车一停下来，毛主席便立即找当地的党、政、军领导汇报情况，或者开会谈话，重点仍然是九大之后怎么样，怎么办？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也是毛主席进行的一种调查研究，是为即将召开的庐山会议

做准备的。^①

专列途经石家庄，毛泽东找当地的党、政、军领导汇报情况。

专列途经郑州，毛泽东找当地的党、政、军领导汇报情况。

7月23日，专列到武汉，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几天。找当地的党、政、军领导汇报情况，谈话。

据陈长江回忆：

本来，这次出来，在武汉、在长沙，这些地方都是游泳的好地方，天气又很热，下水游泳在当时当地来说，那是再好不过的休息活动了。可是因为忙，十几天来，毛主席一次也没有下过水。^②

25日，毛泽东离开武汉到了长沙，又住了几天。找当地的党、政、军领导汇报情况，谈话。

27日，毛泽东离开长沙到了杭州。找当地的党、政、军领导汇报情况，谈话。

这一天，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中央“两报一刊”准备发表的一篇社论。跟林彪关系已非同一般的陈伯达同江青的“智囊”张春桥就社论稿上的一处提法产生分歧：陈伯达主张将原稿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语中的“毛主席和”四个字去掉，而张春桥则坚持不改，双方争执不下。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这件事“要请示主席”。

28日，毛泽东到上海。

当天，周恩来将“八一”社论稿送毛泽东审定。并附信报告了讨论修改的情况。

7月29日，周恩来陪外宾飞到上海。

当天，毛泽东在上海分别会见了扬·约尼查上将率领的罗马尼亚军事代表团全体成员和以总参谋长吴振宇大将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

关于“八一”社论稿，据汪东兴回忆：当时，我陪毛主席住在杭州，毛主席的眼睛患了白内障，视力模糊。周总理就把会议争论情况写了封信给我，要我转报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听我念了信后，要我代他画圈后退回去。

^① ^②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125、126页。

我觉得难办。考虑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就要到上海接见外宾，所以我没有圈回去，把信带在身边了。毛主席、周总理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第一批外宾后，周总理、黄永胜都问我那个报告毛主席圈阅了没有，我说你们去问毛主席。当时，毛主席正点燃一支烟在抽，对着我说：“怎么搞的？”意思是说你为什么没有把信圈回去。我说：“这样大的事，我不敢圈。两种意见，您到底赞成哪一种？”毛主席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毛主席说完后，我下楼从皮包里拿出信来，当着周总理、黄永胜的面，按照毛主席的意思作了圈阅，但还是让我删去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恢复过去提法，给他们了。^①

当天晚上，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杭州。

8月11日，周恩来陪外宾飞杭州。

下午，毛泽东在杭州分别会见了鲁巴伊主席率领的南也门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和刚果（布）客人。

12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尼迈里主席率领的苏丹民主共和国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

下午，周恩来飞回北京。

8月18日下午2时，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杭州去江西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

19日下午，专列到达南昌。

据陈长江回忆：毛主席准备在这里停留一下，然后再上庐山。汪东兴让我带十几个人先行，上庐山为毛主席打前站。我们在南昌火车站一下车，一股难挡的热浪迎面扑来，如烤如炙，炎热非常，真是名不虚传的四大火炉之一呀！毛主席穿着一件白汗衫，也满脸都是汗水，不时用一方小手帕擦着。他知道我要上庐山打前站，便对我说：“长江，我们到了庐山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游泳”^②

当天下午，毛泽东办完事上庐山。

据陈长江回忆：

毛主席真是说到做到，连为他安排的住处也没有去，就直接来到了庐

^①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22页。

^②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126页。

山水库，他上山的第一件事果然是游泳。毛主席在车上换了衣服，到达水库边，还是按老习惯，先做下水前的准备活动，就要下水了。

“主席，水太凉了。”我上前向毛主席报告说，“山下很热，山上很凉，温差太大了，简直相差一个季节。”

“水凉？那怕什么！”毛主席说着就迫不及待地伸腿弯腰，做起了下水的准备，并以和蔼的口吻说，“凉点，游起来舒服……”

毛主席下水，我们几个紧紧跟随在他的前后左右。

这一游，毛主席一口气游了半个多小时。太阳快要落山了，天也黑下来了，他游泳的兴致还很高，不想上来。他说，在水里很舒服。确实，这十几天来，所经过的武汉、长沙、南昌几个城市都是有名的“火炉子”，所经受的闷热与煎熬，带来的种种疲劳和不适，这么一游，便一扫而光，令他振奋不已。^①

毛泽东这次到庐山住在脂红路175号。工作和休息在芦林一号。

8月19日、20日、21日，毛泽东一直在自己的住地看书和休息。

20日前后，林彪、康生、陈伯达、周恩来等陆续到达庐山。

21日，周恩来写信向毛泽东、林彪报告：“全会议程，原定为：修改宪法、讨论计划和战备工作。”并且报告了这三项工作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

当天，叶群交代秘书给林彪起草讲话稿，说：“有人否定天才，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反对首长。”

林彪一伙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秘密活动，坚持天才论，坚持设国家主席，散布有人反对毛主席，据后来的交代材料反映：他们的斗争矛头是张春桥。

陈励耘说：“二中全会开会前夕，我和南萍、熊应堂一起上了庐山。在此之前，有个重要插曲：空五军宣传处长徐曙，应江腾蛟之邀，到北京写文章。徐带了个江腾蛟的口信回来：‘二中全会要召开了，林副主席可能有个重要讲话，请陈政委注意一下。’又说：张春桥是反林副主席的，这次可能要点这个事情。”

“上了庐山以后，林立果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来得还挺神秘：劈头就说：‘我是军委办事组秘书，姓肖，肖秘书，住在空军疗养院。’我

^①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130页。

一听声音，愣了，分明是林立果嘛。接下去就问：‘你在山上同那个姓张的接触过没有？’我说：‘没有。’他又说：‘你不要接触了，这个人有问题。明天上午林副主席在大会上有个讲话，你注意听吧。’接了这个电话，我只管一个人纳闷：林副主席同张春桥到底闹什么矛盾，因为知道南萍同张春桥比较好，我就没有敢把林立果的电话告诉他。”^①

8月22日下午2时，在庐山芦林一号毛泽东的办公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量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和日程等。会上谈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到会的几名常委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毛泽东听了很不满意。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最后，他严厉地告诫道：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对林彪、叶群为在庐山会议上作“大的斗争”所进行的暗中策划，毛泽东、周恩来等仍一无所知。^②

汪东兴回忆：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出席了会议。我列席这次会议，并作记录。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和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九届二中全会原定有两项议程：一、讨论和修改将要在四届全国人大提出的新宪法草案；二、讨论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建议增加一项内容，即谈一谈当时的形势。毛主席说：“除了讨论修改宪法、计划问题外，还应该加个形势问题。据我所知，大家有兴趣的问题是形势问题。”

“宪法修改草案可以发给大家看。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还是形势问题。”

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毛主席的建议，并提议由毛主席讲形势问题。

毛主席说：“我主持会议，由总理讲形势吧，修改宪法问题由康生讲。”

康生推辞。毛泽东让总理、康生“两个人去商量解决”。

周总理接着谈计划问题。他说：“自今年开了计划会议后，收效较快。五个月以来，全国有一定的生产效率，地方上的积极性大了。”

^① 张聂尔：《中国1971——风云“九一三”》第23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71页。

毛主席说：“原来这个下放（指中央把管理经济、管理企业的部分权力及财权、物权、投资权下放给地方）讲是讲了，但是他们（指地方）没有摸到下放的底，交代不那么清楚，这次计划会议解决了。”

周总理接着说：“各省、市、自治区不仅仅是农业有了生气，有了发展；而且现在看起来工业形势也好。今年的计划完成的情况和原来预计的差不多，虽然‘文革’的头两年有一点下降。”周总理是说1970年全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基本上达到了“三五”计划的原定指标。

毛主席说：“解放以后，统一了全国，出了个南粮北调、北煤南运的问题。解放以前，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不知道。不晓得蒋介石统治的时候，煤要不要南运？粮呢，要不要北运？看来，要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南方找到了很多煤矿，北方粮食也逐步自给了。”

周总理说：“人民生活确实是改善了。这种形势，主要是靠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泽东思想传播了，生产和经验也就传播了。”

康生接着说：“哪里的毛主席思想深入了，哪里的工作、生产一定就好了。规律完全是这样的。”

毛主席听了摇摇手，表示不赞成这种说法。毛主席说：“看我们是依靠谁的问题了。有的人依靠专家治厂。工业这方面，我看要依靠专家、科学家，甚至洋专家，除这之外，也还要依靠工人。”

林彪跟着说：“主要是调动全国亿万人民的积极性。”

陈伯达也说：“我到下边看了一下，形势很好。群众积极性很高，干劲也很大，连中学生都自办工厂。”

谈完经济问题，常委们又议论政治问题。

周总理提出开党代会的问题。大家进行了议论。

毛主席又问：“整党，各个地方不是早都开始了吗？这个‘吐故’吐得怎么样呀？大概吐得不多吧？对蒋南翔这样的人留下来好。”

周总理回答说：“现在挂起来的较多。”

康生补充说：“我说‘挂故’多。”〔1968年毛泽东就整党问题讲过要“吐故纳新”。“挂故”是指当时要“处理”的党员干部被“挂”（搁置）起来。〕

毛主席说：“你们讲挂起来的，我看吐得也不少了，还是要以教育为主。”

毛主席认为会议讨论得差不多了，就说：“今天把大会的议程定下来了。会就开到这里吧！”^①

这次常委会上，毛泽东和林彪都表示在开幕会上不作发言，主要由周恩来一个人讲。

晚上8时，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的安排的讨论意见。

据汪东兴回忆：周总理在传达中，还介绍了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情况。他说有些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比“文革”初期有所下降。这时，江青打断周总理的话，说农业生产没有下降。周总理说，我讲的是工业。当周总理谈到解决南粮北调、北煤南运问题时，康生插话说，日本侵华时，南北交通中断了，南粮北调、北煤南运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我们还不知道。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把常委会讨论的情况讲完后，让我作了补充。^②

8月23日，会议开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礼堂的小会议室集合。毛泽东问周恩来和康生：“你们谁先讲啊？”毛泽东刚说完这句话，林彪突然说：“我要讲点意见。”林彪提出要讲话后，周总理、康生说：“那好吧，你先讲。”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常委会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林彪并没有说这个问题。毛泽东看了看林彪，说：“你们三人讲吧！”^③

下午3时，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

毛泽东在主席台中间坐定后，在会场趋于平静的时候，庄严地宣布全会开幕，并宣布了到会的正式成员和列席人员的数字，以及请假人数等情况。

接着，周恩来宣布了这次会议的两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三）战备问题。并说，出席这次会议的，都有这三项内容的材料，请大家先看材料，然后分组进行讨论，还宣布了小组的划分等事项。

周恩来宣布后，毛泽东问主席台上的其他几个常委：“现在还是请哪一位讲呀？”这时，林彪拿出一份讲稿，在会上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

① 熊华源、安建设编：《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第16~18页。

② ③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35、36页。



1970年8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
(摄影/杜修贤)

话，主要是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条。”

“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他又着重地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林彪发表的这篇显然有充分准备的讲话，事前并没有正式打过招呼。至于他要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都不清楚。林彪这种反常的举动，说明他在全会上发表这篇讲话是事前经过精心设计的。

林彪讲完已经4点半了。毛泽东对周恩来、康生说：“你们讲吧！”语气中流露出一不悦的情绪。

周恩来见此情况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接着，康生讲了话。他说：“刚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宣布了我们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的最好的接班人讲了毛主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运动中间的伟大历史地位，

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且提出：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到底怎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康生的讲话，等于给林彪的讲话作了一个“注解”，向与会者进一步点明了林彪所强调的主题，支持了林彪。康生讲完后，已近烦躁的毛泽东立即宣布：“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①

散会后，毛泽东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②

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召集人会议，安排会议各组分别讨论宪法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在会上提出：林副主席的讲话很重要，要很好学习，要求再播放他的讲话录音，大家附和了。总理只好根据



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主席台。（摄影/杜修贤）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572~1573 页。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 36~38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573 页。

大家的意见，决定24日上午会议代表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下午讨论林彪的讲话。

林彪得知吴法宪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提议”后，非常高兴。他派叶群和在山上的儿子林立果当面表扬吴法宪，称他这次“又立了大功”。这天夜里，根据林彪、叶群在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同吴法宪商量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材料，还准备了一段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些事情，全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私下进行的。^①

8月24日上午8时，除毛泽东、林彪之外，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人员在庐山礼堂开大会，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会议由汪东兴主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参加了。录音播放了两遍，11时半散会。

在播放录音的过程中，有人提议将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大家，到会的人都鼓掌，表示支持。周总理要我去请示毛主席。散会后，汪东兴报告毛泽东了。毛泽东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毛泽东还嘱咐说，讲话稿要由林彪审定后发。汪东兴将毛泽东的指示立即用电话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说：“你抓紧办理，先印出清样，送常委审阅。”汪东兴让王良恩去林彪处取讲话稿，他没有拿来，25日又去拿，还是没有拿来。^②

上午散会时，陈伯达在礼堂门口塞给汪东兴一份材料，对汪东兴说：“这份材料请打印五份。”汪东兴问：“你是要发给常委吗？”陈伯达说：“是。”汪东兴见要打印的材料是几条语录。考虑常委看完后，可能要发给政治局委员，就交代会议秘书处打印20份。

这份材料后来分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当时留在北京）。但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却不送给李德生。

这天上午，叶群同吴法宪等商定采取统一行动：各组讨论时，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要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天才”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强烈煽动要“揪人”。

下午，各组讨论林彪的讲话。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573~1574页。

②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39页。

作分别在各组带头发言。他们在同一时间，引用同样的语录，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统一口径，大肆煽动。

下午3点钟，陈伯达到华北组参加讨论。他到会场时，有一位同志正在发言。主持人打断了这位同志的发言，请陈伯达先讲。陈伯达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他在插话中还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

当时汪东兴也参加华北组的讨论。陈伯达讲的一口福建话，别人听不懂，能听懂同志替他作翻译。他讲到“欢喜得跳起来了”时，还动手动脚地比画着。

叶群在中南组发言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写的《再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接着，他念了毛主席、林彪以及马、恩、列、斯

有关天才的语录)。大家听听这些语录,怎么能说没有天才呢?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李作鹏在中南组发言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

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说:“对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黄永胜那时虽然留在北京,但他也准备好了与他们一样内容的书面发言稿。

陈伯达在华北组煽动性的发言,使不明真相的人都激动起来。陈伯达讲完后,其他一些同志纷纷发言表态,都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节,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汪东兴在会上也发了言。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还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当时,汪东兴的情绪也比较激动,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①

经代表们再三追问,陈伯达暗示此人是张春桥。^②据说许世友提出:就叫张春桥在他管辖的江苏农村劳动!张春桥在众怒面前吓得发抖。^③

晚上,各组的发言情况汇总反映上来了。汪东兴一看,有几个人在发言中已经引用了陈伯达要求印发给常委的语录。汪东兴马上打电话把这个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并且请示说陈伯达要打印的语录还没有发,怎么办。周总理在电话中说:这个语录不能发,封存吧。汪东兴马上将陈伯达

①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41~44页。

② ③ 张聂尔:《中国1971——风云“九一三”》第237、238页。

提供的打印语录的原稿和已印刷出来的 20 份语录全部封存了。^①

8 月 25 日上午，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也发到各组。

简报上写有这样的话：大家“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还说，大家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一时间，全会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各组的发言都集中到要“查明”、“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的问题上。在中南组，叶群声泪俱下地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话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也拿着“天才”语录，在西南、西北等组的会上作煽动性发言。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尽管这些活动打的旗号是要突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但它反映出来的问题极端严重：显然在背后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瞒着毛泽东和多数常委，在党的中央全会上采取地下活动、突然袭击的方式，在各组同时发难，改变全会的原定议程，狂热地煽动揪人。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是毛泽东绝对无法容忍的。^②

中午，江青带着惊恐不安的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从华北组的简报上，毛泽东已敏锐地察觉到会议中出现的严重不正常现象。听了汇报后，他更感到必须下大决心了。^③

毛泽东找汪东兴谈话。

汪东兴回忆：这天吃中午饭时，毛主席叫人通知我去，我赶紧吃完饭就去了。

①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 45 页。

②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574~1575 页。

毛主席问我：“看到六号简报了吗？”

我说：“刚看到。”我是在来的路上才看到的。

毛主席说：“他们（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毛主席接着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我说：“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欢喜得跳起来，我很气愤。”

毛主席严肃地说：“那就让他们去高兴吧！”

我说：“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大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我还拿群众的意见作辩解。

毛主席严厉地说：“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

听了毛主席的这些话，我当时非常难受，感到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和信任。^①

下午2时，毛泽东要汪东兴马上通知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员3时到牯岭毛泽东办公处开会。汪东兴通知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其他政治局委员由中央办公厅负责通知。

毛泽东先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单独谈话。随后，向到会的人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正在气头上的他还发出警告：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作出检查。^②

会前，毛泽东在院子里时，许世友来了。毛泽东与他握手时说：“你看，我这个手凉不凉？”

许世友说：“凉。”

①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45~4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76页。

毛泽东说：“你们让我多活几年多好啊！还让我当主席呀？”^①

毛泽东宣布的三条还有一种说法：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的讲话；第二，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②

晚上，周总理主持各大组召集人的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

8月26日，各组传达关于暂停开小组会的决定。

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开始收回有他们发言的记录稿，已经写成的简报稿子也不让送了。叶群私自跑到简报组，撕毁了她在中南组发言的记录。邱会作也要回记录，剪去了他发言的那部分内容。迟上庐山的黄永胜，见“形势”不妙，也销毁了他事先准备的发言稿。这些情况由各小组反映上来后，汪东兴报告了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笑着说：“何必当初呢！当初那么积极，那么勇敢，争着发言。今天又何必着急往回收呢！”

汪东兴认识到自己犯错误了，考虑写检查报告。周恩来也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你争取第一个检查吧。^③

26日至30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毛泽东还亲自找林彪谈话，批评他事前不商量，违背会议议程的做法。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

在这期间，毛泽东每天工作达十二三个小时，有时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返回住所。^④

张耀祠回忆：“夜间，庐山就像罩着蚊帐，浓雾滚滚，伸手难见五指，能见度很低，看不见路。主席要我多找几个马灯做路灯。可有马灯还是看不见路，只好找两个干部手提着马灯，在车头两侧行进，车速不能开快，只能徐徐前进。”^⑤

陈长江回忆：这几天，毛主席操心党内这场斗争，他睡不着觉，吃不

① ③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47页。

② 熊华源、安建设编：《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第3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76页。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134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76页。

好饭，常以出来散步恢复精神，在大门里值班的我，也常在这个时候陪毛主席走一走。

有一次，毛主席边走边对我说：“有好几年不写文章了，现在不写不行了，要写文章反击。”还听到毛主席自言自语地说“……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当时，不知主席讲的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讲的是谁，当然也不能去问。但毛主席的习惯我是知道的，写文章他总是喜欢自己动手，从来不靠别人。未写成之前，总有个酝酿的过程，此间如果与你相遇了，可能与你说起文章中的某些观点和某些词句，甚至还想听一听你的反映，尽管你可能对这样的问题一无所知。

这一次，毛主席也是这样，他边走边说，念叨着一些我不懂的话，说明一篇新作的构思尚未完成，因而连散步也缺乏兴致了。他这次出来散步，前后也不过十来分钟，就回到他的办公室去了。

毛主席办公室的灯一直亮着，直到很晚很晚的时候。根据汪东兴的意见和庐山的实际情况、地理环境，我们设想了可能发生问题的几种情况，搞了相应的应付突然情况的方案，其中也有对付最严重情况的准备，组织干部战士演练。

这次庐山会议斗争很激烈。林彪一伙尽管机关算尽，可是在会上并没有得到什么，而是在200多位中央委员的面前，露出了马脚，引起了人们的警觉。毛主席也显得坦然多了，有时下午还抽空到庐山水库去游泳，这大概是毛主席在那一段时间里最好的休息了。

那一段时间，毛主席差不多每天中午都到水库边新建的那幢房子里去办公、开会或找人谈话。因工作太多，常常干到凌晨两三点钟才回住处。

庐山这个地方，晚间不是大风，就是大雨，要不就是大雾。那雾，又密又浓，真是大雾迷漫，云海茫茫，上看不见星斗，下看不见脚面。庐山的路面很窄，车子稍微开偏了就有掉下深谷的危险。毛主席深夜回住处，乘坐汽车走这段路，并不比牛车快多少，驾车的司机也总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即使把最大的灯都打开，仍然看不了多远，司机感到很不好办，只好硬着头皮冒着风险往前开。

做警卫工作，不仅要防止敌特的阴谋破坏，还要防止包括车祸在内的各种事故带来的危害。为了确保行车安全，我们就想了个土办法：就是用煤油

灯为汽车引路。我们的做法是从管理部门借了一盏普通的防风煤油灯，每逢雨、雾夜行车时，我就穿一件雨衣走在汽车前，手提一盏油灯在前引路。

浓浓的夜雾中的煤油灯，发出红红的光亮。红光，有较强的穿透能力，在十几米之外就能看得清楚，尽管在夜雾之中。司机看着红灯开车，既可照路，又使人随时警觉。

这样行车，当然谈不上什么快速了。这样慢的速度在山路上行车，后顾之忧就显得突出了。我便派出三个人编为一个小组，跟在车后，以防不测。在汽车里的毛主席看到这情景，笑着说：“这办法不错，提着红灯引路，我们这也是‘红灯记’嘛。”

在车上的几位听见了，无不哈哈地笑起来。那个时候，京剧《红灯记》风靡全国，无人不晓。^①

这五天里，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大家分头看文件、修改宪法，还安排了游庐山、看电影和看戏。

8月26日至27日，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要吴法宪作检讨。吴法宪很紧张，于8月28日晚上偷偷报告了林彪。林彪不仅没让吴法宪收敛，反而鼓动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叶群还几次打电话安抚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②

27日，汪东兴写好了第一份书面检查，检讨了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做法、言论是“我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也违反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我的内心极感沉痛”，并表示要“接受这次教训，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提高觉悟，坚决执行毛主席在九大提出的方针——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看过他的书面检讨后，说这个检讨书可以发到全会上。汪东兴还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在华北组讨论会上做了一次口头检查，内容和书面检讨的差不多。汪东兴的检讨书，经周总理批阅修改后印发了。^③

关于庐山会议期间那段混乱情况，吴德回忆：

①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134~135、137~138页。

② ③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48~49页。

8月24日下午，华北组开第一次小组会，讨论林彪讲话。这个会我没有参加。林彪办公室通知让几个省、市分别整理出一份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的材料，要求限时送到，于是，我和黄作珍，还有我们带到庐山去工作的市委办公厅主任陈一夫，一起凑材料。

8月24日下午的华北组讨论会，陈伯达迫不及待首先发言，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非常重要，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闪烁其词地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并且说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做国家主席了，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了。这个讲话很有煽动性。汪东兴跟着讲了话，主要的意思是设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他也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当时，陈伯达讲话，大家还有疑惑，汪东兴一讲就不同了，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别人更多的是相信他的讲话。散会后，吴忠告诉我发言的情况，他说陈伯达、汪东兴讲了话，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我急忙问，是谁反对毛主席。吴忠说，他们没有点名，不知道是谁。这时，大家已经议论纷纷了。

晚上，我和李雪峰在会场碰到了汪东兴，我问汪东兴：有人反对毛主席，是什么人。汪东兴说：“有人。枪杆子、笔杆子。”

我问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也不清楚。我更不明白这是指什么人了。

晚上11点多钟时，我和李雪峰、解学恭吃晚餐，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在华北组的简报组，他参加了整理简报的工作，他把整理好的简报稿子拿来送审。简报的内容就是陈伯达和汪东兴的讲话内容。解学恭拿着稿子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我没有参加会，发言的具体情况也不了解，我对李雪峰说，印发简报你们签字就行了，我就不签字了。

李雪峰说，简报是本着有文必录的原则整理的，签字付印是照例工作，你就签个字吧。

这样，我也就在要付印的简报稿子上签了个“吴”字。我们签完字后，简报就送中央办公厅了，很快印好就发了。这个简报就是华北组的第二号简报，全会的第六号简报。

8月25日上午，华北组继续开会。经过一夜的沸沸扬扬，人们的发言都集中到了所谓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上。部队同志的发言更激动更气愤。连陈毅同志也说，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

当时，北京组的聂元梓又显示出了“造反派”的能量，极其活跃，到处串联，她找了河北的同志、找了军队后勤部门的同志，一直串联到了吴忠。她对吴忠说有人反对毛主席，要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吴忠问她是谁反对毛主席，聂元梓也不说具体人。吴忠对聂元梓其人是有警惕的，他说他不清楚情况，也不清楚是什么人反对毛主席，表示不愿意与聂元梓谈这样的问题。吴忠随即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说聂元梓在串联。

这时，一些工人中选出来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也找我说，别人都表态了，他们也要发言表态。我对这些同志说，这个态你们怎么表呢？假如问题涉及中央的负责人，按照党的原则，应该先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就在庐山啊。

这时，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分别在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了言，到处点火，气氛相当紧张。我还发现王洪文和上海组的人在到处探听消息。

当日，我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是我和陈一夫同志商量后由他起草的。信的内容是反映聂元梓在到处串联，揪所谓反对毛主席的人，会议有些不正常。我把这些情况报告周总理后，还请示周总理以后的会议怎样开下去。

当日下午，华北组继续开会。李雪峰接到通知，到毛主席处开会去了，华北组的会议改由我主持。河北省四名劳动模范出身的候补中委先后发言，对新宪法不设国家主席问题提出质疑，认为宪法起草小组和委员会有问题，点了康生的名字。他们的发言，口径完全一致。

他们讲完后不久，李雪峰就回来了。李雪峰告诉我，会议立刻停止。我问他为什么要停止，李雪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详情以后再谈。李雪峰当场宣布会议停止。

在散会回来的路上，我又问李雪峰出了什么事情，会议为什么停止了。

李雪峰说，毛主席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批评了天才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是毛主席提出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的。

我对李雪峰说，毛主席早就讲过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他打过招呼。你们河北为什么还有四位同志发言反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他们点名批判宪法起草委员会，是怎么回事？

李雪峰说，这是中央全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什么意见，可以自由发言。

当天晚上，我正在看电影，周总理派人找到我，要我去谈话。周总理

说，我已把你的信在政治局传阅了。周总理指示我回去以后，组织代表中的工人同志开个会，批评聂元梓，解决她串联的问题。我向周总理汇报了河北省几位同志发言批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情况。周总理说，可能是关于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的问题，在纪念列宁诞辰百周年发表的社论上，毛主席删去了这个内容。我已经要北京查一下档案。对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在会场上对他们进行反驳？

我说，我不了解情况，不好发言。

周总理说，不是很好讲的吗？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任是毛主席嘛！副主任是林彪嘛！你们反对宪法起草委员会，不是反对毛主席吗？你为什么不讲？

周总理批评了我。我向周总理提出小组会如何开下去的问题，周总理说，照原计划继续开。

我从周总理处回来，就开了批评聂元梓的会。会上批评了聂元梓的非组织活动。我们把批评聂元梓会议的情况，手写了一份情况简报，报送给周总理。周总理批示政治局传阅了。

我记得林彪还在简报上画了圈。后来出现了林彪问题，我才意识到我们写的这个简报有多大风险。

这时听到他们说反对毛主席的是张春桥，也是对着江青、康生等人的。

停止小组会后，政治局作了一个决定，要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检讨，还决定收回六号简报。

开检讨会时，周恩来、康生主持，各大组组长参加了。我不是组长，但周总理通知让我听他们检讨。陈伯达是第一个检讨的，吴法宪、李作鹏等也检讨了。陈伯达等人的检讨很不像样子。

汪东兴找李雪峰和我谈过一次，他说是毛主席让他找华北组的几个组长谈一谈的，他犯了错误，毛主席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这个意见还是他传达的，但在这次会上，他又提出了与毛主席相反的意见。汪东兴还在华北组检讨过一次。

汪东兴讲话的内容与陈伯达讲话的思想有所不同，他是听了陈伯达的讲话说有人反对毛主席，一时愤激地发言，是被人利用了。后来调查，也没有发现他参与林彪集团的活动。^①

^①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48~50页。

8月31日，毛泽东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一大段批示：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在这个批语的抄清件上，毛泽东加上一个标题：《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已看出庐山会议这场风波同林彪有密切关系。但林彪是“文化

大革命”以来的“副统帅”，又是九大党章刚规定的“接班人”，对林的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而且这场风波的幕后情况还有待进一步弄清，这不是几天内能做到的。因此，他把批评集中地指向陈伯达一人，而对林彪仍不去触动，而采取保护的态度。在《我的一点意见》的手稿上，最初在讲到陈伯达搞的“天才语录”时曾有一句：“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应为九条），如获至宝。”但文件印发全会前，他又删去了这句话，并把修改件给林彪看。^①

9月1日，毛泽东在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作自我批评、检查。会上，他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作检查，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开会，听取他们的检查。

毛泽东提出由林彪出面，对有关当事人进行批评，实际上也是给林彪等找个下台阶的机会。^②

9月2日，林彪召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开会。汪东兴也参加了。毛泽东让汪东兴参加这个会有两个目的：一是了解情况；二是汪东兴也要接受批评、受教育。

会议开始，林彪说：“今天，找你们开个会。你们在会上为什么要在同一个时间发言，为什么都引用了同样的语录。你们要坦白，要交代。”

林彪讲完后，到会的人都不发言，有的翻材料，有的喝水。过了一段时间，林彪又说：“嗯，为什么没有人发言？”这时，汪东兴发言，批判了陈伯达。汪东兴指出，华北组的讨论就是陈伯达放炮后搞乱的。林彪听了，表情很尴尬。汪东兴发言后，其他一些人七嘴八舌地讲了一些。会议很快就散了。

散会后，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毛泽东哈哈大笑，问会还开不开？汪东兴说，林彪打了个招呼，说再开会就通知，不通知就不去了。^③

3日，林彪又开了一次会，没有通知汪东兴参加。直到九届二中全会散了，也没有通知汪东兴去参加他们的会。毛泽东知道后说：“不要你了。说明你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④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577、1579 页。

③ ④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 51、52 页。

9月2日以后，各小组就开始集中批判陈伯达。在华北组，汪东兴按毛泽东的指示作了检讨以后就请假了，没有再去参加会议。

4日，毛泽东找林彪谈话。

5日上午，毛泽东找陈伯达谈话。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及康生谈了如何结束会议等问题。

6日上午11时，周恩来约集各组正、副组长，传达毛泽东指示的主要精神：“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拥军爱民，读几本书，各作自我批评，严守党纪军纪。”^①

直到庐山会议结束，林彪以及吴法宪等并没有打算真正认识和揭露问题，更没有作出像样的检讨。他们只是在应付毛泽东。据吴法宪后来说：“我们在叶群家开了会。叶群定了原则，要检讨，主要是我，但是第一不涉及林彪，第二不涉及黄永胜，一定要把林、黄保下来。”

情况显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弄清。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先结束全会。

9月6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要林彪主持闭幕会议。这时，主席台上已没有陈伯达。全会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并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闭幕会上，周恩来、康生发言后，毛泽东分别就党的路线教育、高级干部学习和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讲话。

毛泽东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



1970年9月6日，周恩来、康生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
(摄影/杜修贤)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580页。

出什么‘第三版’（指陈伯达编辑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所收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作的序言）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

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

谈到庐山会议上出现的这场风波时，他情绪有些激动地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主持会议的林彪最后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是团结的会，还是个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①

陈长江回忆：

二中全会闭幕的这一天，会场主席台上发生了令我惊讶不已的变化：主席台上的中央只放着一个座位，旁边是一个主持人的座位。周恩来宣布开会后，毛主席坐到了中间那个位子上，周恩来在旁边主持人那个座位上坐了。其余的三位常委：林彪、陈伯达、康生的位子去掉了，他们都坐在台下和其他人一样的位子上去了。

闭幕式上，周恩来宣布对陈伯达隔离审查。几项讨论的议程均已通过，散会后怎样贯彻，也都做了布置。

这次会议的后半段，是我记忆中掌声最少的会议。人们对鼓掌显得谨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580~1581 页。

慎多了。只有在毛主席讲话，周恩来宣布开会和闭幕的时候才有。

这次会议之后，毛主席对林彪的希望、寄托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但他还想再看一看，还想争取他，不致使他走得太远。毛主席只是让周恩来主持党的日常工作，并抓军委办事组的事情。^①

9月7日，林彪、叶群下庐山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九江机场送他们。在叶群导演下还在一起照了集体相。实际上是表示他们的团伙要抱得更紧。林彪走后，黄永胜等人也很快离开了庐山。

8日，各省、大军区的负责人都走了。

9日上午，周恩来、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走了。

下午2时，毛泽东接见了为全会服务的会务人员。因为下雨，安排在庐山礼堂接见。后来雨停了，就改在室外，用夹道欢送的形式接见。照完相后，毛泽东下了庐山。

当日，毛泽东到南昌。

9月10日，毛泽东离开南昌去长沙。

晚上11点，专列到长沙。停在大托铺支线休息。华国锋、卜占亚、杨大易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和往常一样，毛泽东主要询问的还是有关湖南建设方面的事情，毛泽东再次提出：你们湖南什么时候可以建成工业省？



长沙大托铺专列停车支线。

^①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138~140页。

毛泽东在专列上住了两天。^①

13日，毛泽东离开长沙去武汉。他对前来送行的华国锋讲：庐山的事还没有完，你们要警惕上坏人的当！^②

在去武昌的路上，毛泽东问汪东兴在想什么？

汪东兴说：“在想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

毛泽东说：“这好嘛！”

汪东兴说：“在山上开会，忙于会务，没有时间想自己的问题。现在有空闲时间了，可以好好地理理自己的思想了。”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态度比较满意。说：“这样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的心是好心。”^③

专列到达武汉，毛泽东住东湖宾馆梅岭一号。安顿好毛泽东后，汪东兴开始写检查。

9月14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曾思玉、刘丰谈话。

毛泽东问曾思玉、刘丰：这次庐山会议有什么教训？

曾思玉回答：受到一次深刻的路线斗争教育。

毛泽东说，庐山这个鬼地方，这次会又未开好，陈伯达这个自称小小老百姓，实则是大大的阴谋家，他在华北小组上乱放一通，召集人又不把关，在华北组六号简报登载下发之后，就发难了。在三天小组会上，有些人煽风点火，起哄放炮，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毛泽东说，什么设国家主席，什么天才？你把我放到油锅里去炸，我还是不当国家主席！要当国家主席，让陈伯达他们去当！

毛泽东说，六号简报问题，我回去还要追究。他们搞突然袭击、搞阴谋诡计，可见他们心里有鬼，而不敢公开活动。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怎么是天才？

①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19~20页。

② 夏远生、马娜：《毛泽东的三湘情结》下，第382、599~600页。

③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59页。

毛泽东问：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

曾思玉回答：干扰了毛主席伟大战略步骤。

毛泽东说，我就不相信，地球会停止转动。后来《我的一点意见》拿出来，同志们看到后，就不起哄了。你们要多读马列的书，用唯物论和辩证法去分析认识问题，要跟党、跟路线，不要跟人，不要受骗上当。^①

毛泽东同刘丰谈话时刘丰的态度不明朗。1971年毛泽东再次南巡同刘丰谈话，刘丰承认：去年主席从庐山回北京路过武汉时，同我谈话以后，我心情很沉重。

15日晚上，汪东兴的第二次检查写好，呈送毛泽东。

毛泽东批示：“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在第一页信纸的左右空白处又写道：“陈案另是一个问题，应弄清楚。”^②

9月16日10点30分，毛泽东让吴旭君通知汪东兴去谈话。这次谈话一直谈到了11点50分。

汪东兴回忆：

毛主席说：“你写的信我看过了，信中对问题的认识很好，接受教训。我看有些同志还不通，上了当，还不通？现在不通，慢慢总要通嘛！有些同志自己不懂马列主义，自己都没有看过马列主义这一方面的书，发言时又要引用。我看还是要进行教育，还是要250多人中指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30多本太多，可在30本书内选些章节出来。此事请总理、康老办。我还可以提选一些。不读马列主义怎么行呢？不行的。结果就被陈伯达摆弄了。”

在谈到军委办事组时，毛主席说：“我们军委办事组内有几位同志也上当了。发言时，一个口径，用一样的语录，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据说他要写信给我，叶群和他们不让写。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

在谈到陈伯达的问题时，毛主席说：“我们的任务是对付帝、修、反。而陈伯达不管帝、修、反。我写了一份七百字的意见，给陈看时，他马上说他与苏修无关系。我又不是问他这事，他急着声明这个问题。”

^① 章重：《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第488~490页。

^②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60~62页。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六号简报时，毛主席说：“六号简报要抓紧核实，你怀疑陈伯达看过、改过，应找会议主持同志，还有王良恩同志和记录印发的人。为什么不经你看过，发出最早最快？由总理、康生和你一起查实为好。要他们不要再上陈伯达的当了，有错误就改正。”

毛主席一面抽着烟，不时地呷口茶，一面和我慢慢地谈着。

他问我：“你说他们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你清不清楚？”

我摇了摇头，说：“我不清楚。”

毛主席接着说：“你跟我出来了，他们在北京是否在陈伯达处商量过？”

我又摇了摇头，说：“不清楚。”

毛主席若有所思地说：“谁知陈伯达住在何处有何活动？谁能知道？陈伯达案另办，与你们好人犯错误不同。”

毛主席说：“我在简报上看到，皮定均同志在发言中说，怀疑他们都在24日下午发言，是统一部署的。”

毛主席还要我找曾思玉单独谈一下，征求一下他有什么看法。

在谈话中，毛主席提出要先回北京。

他说：“你先回去，让总理和康生召集会议，把你给我的信给他们看，传达我对你的信的批示及我今天谈话的内容，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

毛主席还说：“你这封信可以启发他们，让他们也可以写或找我来谈。”

出于对毛主席安全的考虑，我说：“我的意见，我们还是一起回北京。我的那封信可以叫通讯员先带回去。”

但是，毛主席还是坚持要我乘送文件来的飞机先回北京。他说：“早一天回去，让他们早一点觉悟也好嘛。”

这样，我只好准备第二天早上先飞回北京去了。^①

当天下午，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找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聊了两个小时，一起吃了晚饭。

谈起庐山会议，曾思玉说：“当时我是一盆糍糊，弄不清楚。”

^①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62~65页。

汪东兴问：“现在你还是一盆糨糊？”

曾思玉说：“开始我脑子是一盆糨糊，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后，通过学习，慢慢地了解了。”

汪东兴说：“庐山会议上我也犯了错误。”

曾思玉说：“中南组也是紧张的，说有人要推翻毛主席，打倒毛主席，有人要夺毛主席的权。叶群发言就是这样讲的，她还说毛主席是天才没有错。”

汪东兴讲了自己的看法：“毛主席的天才是从实际中学的，是靠看书学习，天才不完全是先天的，天才主要是后天的。我们过去认识不清，现在才有所认识。”

曾思玉说：“那几个副词，我也是同意的。毛主席在九大报告中把它去掉了，我未听进去，总觉得这是毛主席的谦虚。”

汪东兴和曾思玉相互交换了一些认识。^①

晚饭后，汪东兴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已经休息了。

晚上12时，吃过夜餐后，汪东兴上床休息。

17日凌晨4时，吴旭君来敲汪东兴的门，从门缝塞进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主席讲，你不要走了，一齐走。”

当日，毛泽东离开武汉回北京。

9月19日，专列途经石家庄。毛泽东在石家庄接见了李雪峰、刘子厚。

当天中午陈先瑞接到李雪峰的电话，让陈先瑞和郑维山下午5点到丰台火车站专线停车处，毛泽东要接见。

在石家庄，汪东兴将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武昌同曾思玉谈话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汪东兴说，曾思玉是老实人，他的态度是好的，有什么谈什么，只是水平与我差不多，我想曾思玉慢慢会通的。毛泽东听后“嗯”了一声，没有说什么。^②

专列途经丰台。因为郑维山当时不在，毛泽东在专列上同陈先瑞、吴德谈了话。

郑维山当时在军区内蒙古前线指挥部，赶不来，陈先瑞和吴德一起到达丰台车站。

① ②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65~66页。

毛泽东一开始就问：庐山开会你们传达了没有？

陈先瑞向毛泽东汇报了军区分片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和部队学习公报的情况。毛泽东肯定了北京军区分片传达的做法。接着询问部队情况。陈先瑞汇报了部队的思想、战备、训练等情况。

毛泽东说：“庐山开会，有人反对现在修改的宪法，这是康生、春桥他们搞的，是按我的意思写的。天才问题，关于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九大新党章起草时和这次修改宪法，康生等同志几次写上，三个副词我都勾掉了。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我提的。陈伯达明明白白知道这件事，而他却说这是反对我的。”“要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三十本多了，可选读一些，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不要以为马、恩、列宁是外国的，就不读了。”^①

据吴德回忆：

9月，毛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我被通知同纪登奎、陈先瑞、吴忠到丰台车站去，等候毛主席与我们谈话。

我们到丰台时，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到达，毛主席在火车上与我们谈了话，汪东兴也参加了。整个谈话内容，总的意思基本上是《我的一点意见》上的内容。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点：一点是说共产党要搞唯物论，不能搞唯心论；另一点是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

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了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事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毛主席的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②

当天，毛泽东回到北京。

^①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50~5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82~1583页和其他材料。

五十七 为解决林彪问题南下打招呼

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对全国工作的安排，仍按原定部署进行。8月中旬，他提议在“十一”后召开已因庐山会议风波而推迟了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此以前举行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抓紧进行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

经过一年来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毛泽东从大量揭发出来的事实以及种种迹象中，对庐山会议那场风波背后的真相看得越来越清楚了。8月15日，年近八旬的毛泽东再次乘专列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市巡视。他决定去南方一些地区边调查、边“吹风”，把话说得比过去更明白，来统一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从8月中旬到9月中旬的20多天里，毛泽东先后抵达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浙江和上海的主要领导人谈话。他到处都谈中国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谈庐山会议的问题。许多话都讲得很直率。^①

1971年8月15日13点，毛泽东离开北京，找地方党、政、军领导谈话。据当时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回忆：

1971年8月中旬的一天，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局长汪东兴，中央办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593~1594页。

公厅副主任兼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把我找去，向我布置了毛主席外出南方期间我们随行的警卫任务，要我们迅速做好准备。

他们特别强调指出，由于去年庐山会议，问题并没有解决，现在情况更趋复杂。有些地方还在真枪实弹地武斗，铁路沿线的治安也不好，随行分队要有随时投入战斗的充分准备。并交代了这次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以及对这些情况的处置原则和方法，还有注意事项等等。

张耀祠还用他那特有的江西普通话说：“这次不是新任务，你们也不是第一次外出，但这一次确有许多新情况，可能遇到许多麻烦、困难和危险，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一点也不能大意……”

在此期间，有一天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院里散步，我习惯地跟在他的身后，和他走在了一起。

毛主席情绪深沉地对我说：“军队闹得厉害，有的不听指挥，要进行改组。”

当时的我，并不了解全局深层的情况，就我所知，我们警卫部队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因而很不理解。在毛主席面前，我一向有什么说什么，也没有什么顾虑。我说：“主席，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战士，没有一个不听你指挥的。”

毛主席说：“你不了解情况，不知道啊！”

毛主席没有进一步给我讲有哪些情况，有什么原因。我呢，自然是他讲到哪里，就听到哪里，不好再往下细问了。

想来两位主任所以把这次外出随卫任务讲得那么严重，自然和这些情况有关。因此，我们准备外出的动员、组织工作，做得十分仔细，非常认真。

毛主席一向不摆架子，不讲排场，外出从不要他人送行，包括中央领导人在内。这次，也不例外，仍是老规矩，没有任何人为他送行，他一上车，列车就启动开行。^①

专列途经石家庄检修加水，15分钟后继续开行。

21时15分，专列到邯郸停车休息。

8月16日8时，专列离开邯郸继续南下。

专列途经郑州，停车15分钟。按毛泽东的通知，刘建勋、王新登上专

^①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142~144页。

列，随毛泽东到武汉参加谈话。

根据毛泽东行前的交代，8月16日，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周恩来在汇报结束时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决定“十一”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在准备工作正在逐步就绪。

当日，毛泽东抵达武汉，专列停在武汉王家墩机场。当时武汉天气炎热。毛泽东在专列上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谈话，汪东兴参加。

谈完话，毛泽东换乘汽车，沿武汉大街，经龟山、蛇山，过长江大桥，住进东湖宾馆梅岭一号。

8月17日，毛泽东找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还有刘丰和汪东兴谈话。

谈话开始时，毛泽东问刘丰有关湖北、河南的情况。

刘丰汇报说，湖北、河南的情况不错，人心比较稳定。毛泽东听后感到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

毛泽东严肃地说，笼统地这样说也可以。要细想起来，这样说是应付差事。在你们这里，有些地方还在动，有些地方没有动。有些地方的意见是不少的。

毛泽东的话锋一转，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接着说：“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历五十年来，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

接着，毛泽东回顾了党的历史和党内路线斗争。讲了历史，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说：“去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

在座的都检讨自己犯了错误。

毛泽东说，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就

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泽东说，什么“天才的”，我不是天才，读六年孔夫子，读七年资本家的洋学堂，我到25岁那一年，正是1918年开始读马列主义。

毛泽东说：“搞突然袭击的一些情况，至今也还不清楚。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

毛泽东说，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也可能救不过来。有了错误就要改，如汪东兴同志，分别几次在七千多人的面前，讲他自己的错误，他接触最广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团，七千多人的单位，这怕什么呢？他不怕。

毛泽东在这里举出汪东兴检讨的例子，是要说服那些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毛泽东接着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

那时，毛泽东是主张彭德怀管军委工作的。

毛泽东接着又说，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

毛泽东对刘丰说：“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军下边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他们调不动军队干坏事。”听你的？开几十人的会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听说连总参二部部长这一级的人都还不知道，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军区、省军区常委要研究一下。暂时不忙，待提中央讨论后定。

毛泽东还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当时有人回答说，黄永胜那里早就不是了。后来了解这个回答的情况是假的，实际上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当时还在当黄永胜办公室的主任。

毛泽东强调说，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

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只有两个文件，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我口述，别人记录的，最后还是经过我自己修改印发的。其中一个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毛泽东讲完了庐山会议各方面问题后，继续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毛泽东说：“我和林彪同志谈过一次话，一个问题是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当，如‘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马克思、列宁呢？还有恩格斯呢，斯大林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还有‘一句顶一万句’，这句话是不对的。通常一句只能顶一句，有时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另一个问题，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同志等。这次谈话后，至今还未有什么反应。”

最后，毛泽东说，今天就这样吧。你们四位，明天、后天讨论一下。^①

另有材料说：

8月17日，毛泽东与刘建勋、王新谈话，汪东兴在座。毛泽东听了河南情况的汇报，向刘建勋、王新讲了庐山会议以来的斗争。毛泽东在谈到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时，说选几个年轻的。突然，毛泽东问道：“有人和我说，纪登奎在河南犯了什么错误？这个人怎么样？”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刘建勋、王新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停了几十秒钟，才回答说，纪登奎同志在河南表现很好。要说犯有错误的话，就是有一段时间在河南支持“反复旧”，跟山东的王效禹一样，有“反复旧”各种思想倾向。

^①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88~97页。

毛泽东听后沉思良久，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在座的人说：纪登奎这个人接班，今后还要再看一段。^①

当天，毛泽东让汪东兴通知已调中央工作，仍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到武汉，毛泽东要找他谈话。

18日、19日刘建勋、王新、刘丰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讨论毛泽东的谈话，汪东兴参加。

21日，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了刘建勋、王新、刘丰讨论的情况。

毛泽东说：“你不讲，人家也记得。早晚要讲，捂是捂不住的，这是害人害己。”又说，“如果不是他（林彪）交代叫听她（叶群）的，为什么四个人（黄、吴、李、邱）都要经过她呢？为什么讲话稿不请示我呢？检讨为什么要请示？这个问题要解决。”^②

8月18日至24日，一周内毛泽东未同任何负责人谈话。

25日，华国锋乘飞机赶到武昌。

晚上，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汪东兴参加。

毛泽东看到华国锋胸前戴着毛泽东像章，说：“你还戴着？看见就讨厌，不要戴了。”

毛泽东问华国锋：你来了，你们现在忙什么？

华国锋回答说：我刚到国务院，着手了解工农业生产的情况。

华国锋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泽东严肃地说：我看“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两个司令部的问题。”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当然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毛泽东对华国锋简要叙述了党的历史，他说，中国也怪，中国党没有分裂。陈独秀81个人组织“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转为托派。有个刘仁静，他见过托洛茨基，此人比我年龄小，现住北京。罗章龙另立中央，没有成功。此人现在湖北当教授，是浏阳人，现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是犯路线错误。王明搞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全

① 河南党史研究室副处长贺明洲的文章，见《当代民声》杂志1998~1999年连载（六）。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95页。

党夺权四年之久，召开了两次中央全会，即第四次、第五次全会。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推翻了王明的领导，张闻天负总责，实际上张闻天当召集人，我管事。正式管事是遵义后十年，1945年5月七大才当选主席。出了两本书，《两条路线斗争》、《六大以来》，他们才解除武装。张国焘在长征路上，自立中央，也没有搞成。高、饶想夺权，没有夺成。有人说三年灾害是我搞的，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后来北戴河会议，讲了形势、阶级、矛盾才好转了。

毛泽东接着说，我批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座谈会的纪要，在中央的批语中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不加怕各大军区马虎过去。

毛泽东继续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已通过的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当主席。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我把天才划掉，我提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一中、一师七年是读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到马列主义。

毛泽东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六号简报时说，这个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这是我个人认为。将来党中央还要讨论。

毛泽东接着对华国锋说，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连李德生也不发。”他们几位是井冈山山头一方面军的。一次当着他们的面，我说李德生你好蠢呀，不是一个山头的，宝贝如何能给你呢？会上念的称天才的语录，事先也没有谈过，也不知是哪本书、哪一页的，是说假话嘛。

在讲到解决九届二中全会出现的问题的措施时，毛泽东说，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看到三十八军的报告很高兴，当即批了。把二十四军、二十一军、三十八军整得厉害，特别是把三十八军整得苦。还批了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文件和刘子厚的检讨等文件，这是打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脚。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他们没有插进来。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少，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毛泽东还说，路线要搞正，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以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汪东兴同志他管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团七千多人的范围，他分几次在一千多人中讲了自己犯的错误。犯错误愿意改正就好。

最后，毛泽东对华国锋说，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还是几个原则。三个办法，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①

在武汉谈完话，毛泽东准备由武昌转移到湖南长沙。他让汪东兴通知广东、广西两省（区）和广州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立即到湖南长沙来。并要华国锋和汪东兴先到湖南长沙做好有关准备工作。

8月27日上午9时，汪东兴和华国锋飞往长沙，落实毛主席的住宿安排等问题。

据湖南省军区政委卜占亚回忆：

汪东兴和华国锋于27日上午乘专机先期到湖南，主要做以下几件事。

第一，对毛泽东的警卫工作和食宿作布置和检查。

第二，大体安排一下毛泽东在长沙期间的活动日程。

第三，概略地讲了毛泽东在武汉找负责人谈话的精神。

第四，汪东兴讲了毛泽东的两个特点：

一是主席经常深思熟虑。他在房子里非常安静的情况下思考问题时，最不喜欢别人打扰他。江青经常打扰主席，主席很不高兴。而汪按照主席意图，较好地阻止了江青对主席的干扰，得到了主席的肯定：“汪东兴就是有办法。能阻止江青来见我。”

二是主席在生活中也体现了他一贯实事求是的作风，没有半点虚情假意。比如迎送问题，党内同事因事到主席家或专门去看望主席，一般他都是不迎送的；只有党外人士或者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主席才略作迎送。其实，主席也十分讨厌对他那种劳民伤财的大轰大嗡的迎送。这次也希望你们按主席规定的办。

^①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97~100页。

第五，汪东兴十分自然而诚恳地讲到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也犯了错误的事。他说，我曾亲自听毛主席四次讲了他不当国家主席的事。但是，在庐山会议上我一时不知道陈伯达他们的真实目的，当在华北组听说有人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时，我出于对毛主席热爱的真实感情，便第四个发言，也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上了他们的当。这不是糊涂吗？

第六，毛泽东这次离京及其后的一切活动和谈话都属绝对机密。大家要遵守纪律，绝对保密。

这六件事，无疑件件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认为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尤其重要，这是示意我们：

（一）主席这次南巡将涉及十分重大、十分突出的问题。

（二）主席思考的或将要谈的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重大问题，我们千万不能干扰他，而要认真领会，紧跟主席，好好贯彻，切实执行。

（三）要注意适应主席的工作和生活特点，按照主席的要求做。比如主席到达和离开长沙时，出于感情和礼节，丁盛、刘兴元、韦国清也主动提出迎接和送别，但主席没有同意，我们也遵照主席的意见办了，只有华国锋和我（即卜占亚）参加了迎送。^①

这一天，从早到晚，长沙市的各主要路口增加了公安人员执勤，交警指挥，疏导车辆，维护交通秩序，都比平常更加严格，一招一式更加规范。红旗、吉姆、吉斯等高级小轿车来往于省委—机场—火车站之间。敏感的公安交警人员虽从领受“任务”中知道将有中央领导莅临，但绝大多数不晓得是毛主席南巡到达长沙。一时间，长沙这座古城又突然增添了几份庄严、神圣，而又神秘的气氛。

8月27日，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兴元，广西区委第一书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先后抵达长沙。

下午2时，毛泽东离开武汉，出发前，刘丰到毛泽东的住处看望毛主席，毛泽东同他进行了第二次谈话。

毛泽东问刘丰怎么样？刘丰回答说，这几天我想得比较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也犯了错误，起了哄，干扰了主席。去年主席从庐山回北京路过武汉时，同我谈了话以后，我心情很沉重。

^①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174~176页。

毛泽东对刘丰说，你沉重什么？问题不在你。问题在北京。毛泽东叮嘱他这次在武昌的谈话，不要告诉别人。

毛泽东问：方铭同志什么病？方铭当时是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刘丰没有回答。

毛泽东又再次向刘丰谈到党内的路线斗争，点明了陈伯达也是反党阴谋集团的人。

毛泽东总括说，我们党50年，几次分裂，都没有分裂了。

刘丰接着毛泽东的话说，有主席领导，有主席思想，解放军也是分裂不了的。请主席放心。

谈到军队，毛泽东说，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

刘丰插话说，主席还是管的。

毛泽东说，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

毛泽东很快又把话题转回到九届二中全会问题上。他说，又是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人犯错误，他们想搞我的山头。四方面军的同志，从张国焘事件后，比较谨慎一点了。

毛泽东再次讲到九届二中全会后采取的措施时说，我的办法是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在庐山，五天时间我写了七百字，打了这样一块石头。以后批了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把三十八军整得那样苦。还批了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刘子厚同志的检查。

毛泽东谈到解放军的问题时说，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郑维山能指挥解放军？华北八个军，就有五个军反对他们。天津的六十六军就不听他们的嘛！他们要把那几个坏人塞进天津市，六十六军就反对嘛！就是那三个军，还有军长、政委，师长、政委，团长、政委，会听他们的吗？

毛泽东谈到掺沙子的办法，说：李先念这个人，比较正派，比较好。我要李先念同志也参加军委办事组，考虑再增加一些人，掺沙子。是不是其他军区也参加些人。

刘丰在中央苏区时是五军团的人，五军团是由宁都起义的部队改编成的。毛泽东向刘丰问了五军团的情况后说，季振同，我同周恩来讲了几次，这个人不应该杀。赵博生、董振堂这两个人也不错。

毛泽东接着说，我七老八十了。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团结，不要搞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党的方针是允许改正错误的。如某些同志，我们还是信任的。

毛泽东讲到这里，再次向刘丰谈起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他们在庐山不是一天半，而是三天。

毛泽东又说，我讲的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有时一句顶一句，有时连半句也顶不了，顶个屁！他们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们才是天才，陈伯达才是天才。

毛泽东对刘丰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毛泽东很生气地说，他们要捂住。总参二部部长都不知道。怕要开两百来人的会议（来解决）。

毛泽东还对刘丰讲到他不赞成老婆当秘书、当办公室主任的问题，对一些负责人向林彪请示问题时要经过叶群这类事很不高兴。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为《国际歌》，列宁在欧仁·鲍狄埃逝世 25 周年时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100 年了！《国际歌》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

毛泽东问刘丰看到过新印的《国际歌》歌词没有，刘丰说他没有看到。

毛泽东叫张玉凤去拿。张玉凤说印的歌词和材料都已装箱上车了。毛泽东说，到火车上再给他。刘丰问毛主席：翻印一些下发，可不可以？

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

随后，刘丰等人送毛泽东到车站上车。刘丰扶毛主席坐下后，张玉凤拿来《国际歌》歌词。毛泽东要张玉凤、吴旭君唱。毛泽东同刘丰也跟着一起唱。唱一段，毛泽东讲解一段，还讲解了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的文章。

毛泽东说，究竟是英雄创造世界，还是奴隶们创造世界？

我是历来主张奴隶们创造世界的。毛泽东还说，《国际歌》就是讲要团结，讲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团结。

唱完《国际歌》后，毛泽东又与刘丰等人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毛泽东对刘丰动感情地说，是呀！你看，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呀？

毛泽东这时带头唱《国际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都是非同寻常的。^①

陈长江回忆：毛主席在武汉开了几次会，找人谈话。会后，汪东兴把我们随行警卫分队的干部战士召集起来，传达主席指示。汪东兴传达完，要我们认真学习讨论，领会精神实质。提高警惕，做好警卫工作，要随时有打仗的准备。^②

下午2时半，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由武汉开出南下。

这次与已往不同的是，乘车随毛主席南下的还有武汉军区负责人刘丰等三四个人，他们就坐在毛主席专列的会客室里。到了长沙，刘丰等与我们分手了。

下午9时，专列到达长沙。华国锋、汪东兴、卜占亚到车站迎接毛泽东。毛泽东没有立即下车。待华国锋、汪东兴、卜占亚进到专列车厢后，毛泽东同他们在专列上谈了话，汪东兴也参加。

卜占亚当时是湖南省军区的政委，毛泽东对他不太熟悉。

谈话开始时，毛泽东先问了卜占亚的简历。然后又问汪东兴是否向刘兴元、丁盛、华国锋、韦国清传达了他前几次的谈话内容，毛泽东说他明天要找他们谈话。

毛泽东接着对华国锋、卜占亚又谈起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他说，中国党有几次要分裂，没有分裂成。

毛泽东还谈了民主党派问题。之后，又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并带着他们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唱完歌后，毛泽东说，你们不光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做。你们找几本《国际歌》看看，《国际歌》里边什么都有了。你们明天就把《国际歌》念一念，议一议，谈一谈。不要每一句都搞对照，找目前最需要的要求去做。我们唱了50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几次分裂活动。这次不做结论，也是分裂行动了。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

①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01~105页。

②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145~146页。

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到了共产主义，斗争的性质可能有变化，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但是那个时候文化水平高了，犯错误的人觉悟比较快，能及时认识改正。对犯错误的人，不管他怎么样，不要杀人。搞斗、批、改，也要搞得温和一些。

毛泽东表扬汪东兴在中南海的工作中正确地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他说，他的办法好，凡是骂过他的，他都用了。

毛泽东接着说，我这个人不大着急。在井冈山的时候，不是听说他们要把我开除党籍吗？我想你开除我的党籍，我也不着急，开除就开除吧！后来，他们说我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党代表了，叫我当师长。在闽西的时候把我下放了。我想下放就下放。你下放我，我就做群众工作嘛。开除我的党籍，有的同志想不通，要报告中央。我给他们说，开除党籍就开除嘛，还报告中央干什么。在湘赣边区一本油印的小册子上，我看到他们讲为什么要开除我的党籍。原因是说我讲了一句错话，叫作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

毛泽东讲到这里时，专列上的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毛泽东叫吴旭君、张玉凤来，一起唱这首歌。当唱到三大纪律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时，毛泽东说：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

毛泽东风趣地说，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

唱过三大纪律的第二、第三条时，毛泽东说，这两条问题不大。当唱到八项注意的第一条“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时，毛泽东说，这一条也很重要，对待群众是不能耍骄傲，特别是我们的高级干部。我批示的济南军区的那个报告上说了：“把自己看成一朵花，把别人看成豆腐渣”。你带部队，你当过排长、连长，如果传到你的村里去，就了不得了。特别是当了营长，更不得了啦。我们说话要和气，不要耍骄傲。

唱到“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第三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时，毛泽东说：这两条问题都不太大。好像现在还有这个习惯。

唱到第五条“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时，毛泽东说，这条问题大。当了班长、排长、连长，不得了啦。听说还有骂人的，甚至有打人的。听说不是有人把连长打死了吗？这就是和打人、骂人，教育不

妥有很大关系嘛？我们讲要遵守纪律，一定要有自觉性。

毛泽东又讲到部队的教育和练兵问题。他说，过去我们部队里搞军事训练、制式教练。从单兵教练、排教练、连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的军队成了“文化”的军队了。

毛泽东接着谈到在军队开展的“三好”运动。他说，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你在那里搞什么所谓“超天才”。有人说我是天才。我只读了六年土学堂，七年洋学堂，我算什么天才呢？青年人，哪有那么多天才呢？青年人有个脾气，我批示的济南军区报告上说“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是豆腐渣”。对这个问题老年人、中年人也得注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完后，毛泽东要求我们把最后一句“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重唱一遍。

重新唱完后，毛泽东说，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这样我们多好呀！特别是第一条，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要做到步调一致，经常商量商量，统一思想，这样才能步调一致嘛。还有一条，不要骄傲，就是不要骄傲自满，有军阀作风的一定要坚决克服掉。^①

这次谈话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谈完话，毛泽东一行下了专列。省委接待处司机赵毅雍驾驶黑色吉姆轿车，接毛泽东到省委九所六号楼居住。到达九所六号楼时已是晚上10点30分。

8月28日上午，汪东兴和华国锋受毛泽东委托，先向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传达毛泽东在武汉找负责人谈话的精神，然后座谈。

晚上9时，毛泽东找丁盛、刘兴元谈话，汪东兴和华国锋参加。

29日上午，毛泽东同韦国清谈话，汪东兴参加。

在汪东兴的回忆里，把两次谈话内容并成了一次。

^①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05~113页。

关于毛泽东分别同广东、广西同志谈话，当事人有回忆。加上27日晚上毛泽东在专列上同华国锋、卜占亚的谈话，等于毛泽东分别同湖南、广东、广西的同志谈了话。

关于毛泽东单独和广东同志谈话，陈长江也有回忆：

有一天，毛主席找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谈话，当时我们不解的是还让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参加，当然汪东兴也是参加者之一了。这个小型会议是在毛主席的住处进行的。我把与会的各位迎进去之后，便在门口值班。

毛主席与丁盛等人谈了两个多钟头。谈话结束了，要散会了，我上前把门打开，一股清凉的风迎面扑来。毛主席会客室里装了空调，使在这盛夏时节室温仍能保持在23度左右。这样倒使室内室外的温差，形成强烈的对比。

我一开门，他们几位都站了起来。毛主席与他们一一握手。他们，穿军衣的，行举手礼；穿便装的，也轻轻地点头。

毛主席还是穿着那件毛巾布长袍睡衣。不难看出，他们的交谈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大家情绪很好。

毛主席以叮嘱的口气说：“国锋同志这就穿起军装，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把军区的事管起来。”又转向丁盛和刘兴元说，“你们有事要找他商量。”

“坚决按主席指示办。”丁盛和刘兴元异口同声地表示：“请主席放心”。

华国锋说：“请主席放心，我一定把那里的工作抓起来。”

丁盛和刘兴元两位去了，只见他们情绪很好，很有信心的样子。

华国锋和汪东兴送丁、刘两位至门外之后，他们又折回室内，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华国锋才离去。^①

关于毛泽东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的谈话内容，汪东兴回忆：

毛泽东对刘兴元、丁盛不很熟悉。在谈话开始时，分别问了他们的简历，还问了一些有关部队的情况。毛泽东谈家常式地提问和了解情况之后，开始了正式谈话，这样使刘兴元、丁盛等人不致在他面前太拘束。

毛泽东对刘兴元、丁盛说，韦国清同志，我比较熟悉。你们两位，我

^①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148~149页。

不怎么熟悉。

毛泽东问韦国清：韦拔群和你都姓韦，是不是一家子呀？

韦国清回答说，是五服以外的，不是五服之内的。韦拔群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接受过主席的教育。他回广西开展群众工作带回几本书，就在东兰县办起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泽东说，不能说他向我学习了什么。名义上，我是先生，他是学生，实际上，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要做先生，先要当学生。广西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可惜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我对他很怀念。

毛泽东又说，彭湃是广东海丰县人，家里是个大地主。他在海丰地方工作时，有一次几万群众朝拜观音菩萨，有人问他去不去参加，他说去参加。这样做是对的。他参加朝拜后，就对农民说，观音菩萨靠不住，还得靠自己才行。于是，就拿起了棍棍棒棒闹革命。他这个人善于鼓动，不善于搞组织工作。搞群众工作不怎么扎实，搞得不怎么好，后来牺牲了。他发动群众时，曾经拿自己家里的钱发给农民来搞群众运动。

接着，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到党的历史上的几次路线斗争上来。

毛泽东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50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

毛泽东说，去年庐山会议，“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有组织就是瞒着人，搞得中央常委三个人都不知道，也瞒着政治局，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搞了那么长时间。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的，引起了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

毛泽东对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人强调说，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整三十八军实在是恶劣，对自己的队伍怎么能那个样子的整法。整二十四军、整三十一军、整六十九军、整三十八军，为什么要整？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毛泽东问他们：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样看法？

毛泽东接着说，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炕。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搞勤工俭学的。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讲完党的历史上所发生的路线斗争之后，毛泽东转向韦国清。他表扬韦国清，说，我看你这个人太文了一些。打奠边府的时候，你是坚决主张打的。开头他们不听你的，你很厉害，他们就听了。

韦国清说，我是根据主席的指示办的。

毛泽东问韦国清：你们那个民族（壮族），人口增加了一些吗？得有四五千万人了吧。可以编几十个师。南方几个省能打仗的，第一是广西，第二是广东，第三是湖南，你（指汪东兴）那个省（江西）算第四。

讲到这里，刘兴元汇报了工作情况。

毛泽东听完汇报，说，陈独秀那个人是不讲民主的。今天我听你讲了十分钟，陈独秀办不到，他不听。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他不同意，后来说同意啦。我说，那就请你通知招生吧。我开始招生的名额当中，他说农民比例太大，工人比例太小，不行。其实那时农民四万万人口，工人只有二百万，应该多培养农运干部。不过陈独秀也有个长处，就是不爱财。他穿的衣服倒都是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上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

接着，丁盛向毛主席汇报说，在延安整风中学过两本书，对他帮助很大，后来还参加过七大。

毛泽东听后说，你参加过七大，了不起呀！你们（刘兴元、韦国清、汪东兴）有没有参加呀？

汪东兴回答说，我参加了。我是七大的候补代表。

毛泽东随即谈到要学习理论，讲到延安整风学习的事。他说，延安整风时，提出来要编书。后来叫王首道负责编书，编出来后，不行。改由胡乔木编，这个人有点知识，他收集和研究了那么多的文件，编了两大本，印出来，让大家讨论。通过学习，这才把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

毛泽东转向丁盛问：你打过些什么仗？

丁盛回答说，打过锦州。

毛泽东说，打锦州时，有一个部队把蒋介石的增援部队挡住了，打得好。

讲到打锦州，毛泽东想起一个动人的故事，他兴奋地说，我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面，不摘苹果吃。我就说，我们的部队有希望。

毛泽东接着说，到了北京时，就有人提出要给部队增加军饷，说资本家吃大米、馒头，我们的部队吃酸菜，生活太苦了。增加军饷才能和资本家比。我说我们的军队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为什么要增加军饷呢？提这个意见的人，是代表吃酸菜阶级的人说话的。

毛泽东跟着强调：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的那些语录，李德生同志就有意见。我说李德生这个人好蠢，你不是那个山头的人，别人的山头可以给你呀？好的宝贝怎么会给你呢？

说到这里，毛泽东沉思一会儿，把谈话内容转向“天才论”。他说，《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你们看，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我的一点意见》），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你们都讨论了吗？《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接着丁盛汇报他的战斗经历。

当讲到冀东暴动的情况时，毛泽东说，邓华这个人，跟着别人犯过错误，我对这个人寄予希望。杨勇被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钟赤兵这个人被敌人打掉了一条腿，是在娄山关被打掉的，你们不要歧视他。他是打娄山关负伤的。当时我看见一副担架抬着伤员，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钟赤兵，当团政委。这个人似乎可以到你们广州军区，科委有人歧视他。

毛泽东接着讲学习问题。他说，要认真读书。罗瑞卿当参谋总长的时候，让他和陈伯达商量，搞个读书目录，搞出来了30本书。我看可以。以后又提出来这样说会妨碍学语录，把学理论的事停下来了。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也是有办法的，可以请先生帮。

丁盛继续讲他打锦州的事。谈到将俘虏补充部队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是的。他们也是劳动人民嘛！我们历来有这个政策。打天津，第一个师伤三千，死亡也不过几百人，一下子就补充了四五千。在西藏平叛时，你们打急了，应该抄敌人后面的退路，堵住它，就好消灭它。中印边境作战时，有一个部队从生产的地方拉出来，上前线打仗，并且打得很好。我觉得我们的军队很有希望。

当丁盛讲到他自己参军的时间和在红四军工作的情况，毛泽东笑着对他说，你可不能摆老资格，不要搞宗派啰！

毛泽东又指着刘兴元说，你也要注意。

毛泽东接着说，韦国清，你虽是红七军的，可也编到三军团了。你们几个人都是我这个山头的啊，可要注意！

毛泽东说，你们（指广州军区）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看了，一些问题解决得不算彻底，但还可以。我在中央的批语上加了四个字：“认真研究”，就是要引起大家重视。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也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的说‘超天才’（指吴法宪等吹捧林立果的话）。对二十几岁的人就这么捧，这没有好处，其实是害了他”。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是颠倒了吗？地方没有成立党委以前可以，地方已经有党委了，就不能那样办了。

毛泽东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

事。今天就讲到这里。^①

8月2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座谈讨论毛泽东的讲话，汪东兴参加。

29日清晨，毛泽东视察了长沙市容，了解社会治安和居民生活情况。

当天，汪东兴将座谈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边听汇报，边插话，边交谈。

当汇报到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在座谈会上检讨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所犯的错误时，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是马列主义没有学好。

毛泽东问汪东兴：你对丁盛、刘兴元了解不了解？

汪东兴说，不了解。只是在开会时有点来往，平常没有联系。通电话也是因为有事要办，没有深谈过。这一次他们谈得深一点，摆了摆思想问题。

毛泽东又问：你们知道不知道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汪东兴回答：主要是学习问题。

毛泽东说，对呀。我经常提到这个学习问题。大家在这方面口头上是同意的，但在实际中看法就不统一了。你看，这一次在庐山会议上，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自己又不看马列主义的书，陈伯达搞的那一套就相信了，而且照着念，照着引用。

毛泽东对汪东兴说，你在会上没有念这个语录。汪东兴又讲了庐山会议上陈伯达要我打印称天才语录的事，毛泽东听完后说，这个没事。你是办公厅主任，你不是有意要打印陈伯达搞的语录。他是常委，他要你打印一些东西也是可以的，以后也没有用上。总理让封存起来，你就封存了，没有扩散。这是对的。

毛泽东接着说，你发言被人利用，这是事实。在湖北检讨以后，我对你比较放心了。你没有什么问题。

汪东兴说，我还是有错误。

毛泽东说，当然，你发了言嘛。又说，行政工作、组织工作，你是有一些办法的。你也是爱读书的，马列主义还是要学。我是关心你的。你去党校读了一年，你说你觉得用马列主义联系实际不够。我按你的要求把你

^①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14~124页。

下放了三三年。结果，现在看来，要学好马列主义是不容易的，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你在政治方面运用马列主义要加强，光读马列主义的书还是不够的，还要读点历史，读点经济学，读点小说，读点哲学史。

毛泽东讲完这段话后，为了强调学习历史、学会运用历史知识的重要性，讲了一段三国时期诸葛亮巧用空城计的故事。他说，司马懿这个人，怀疑心很重，诸葛亮没有兵力守城，赵子龙一时又赶不回来，城内空虚，结果诸葛亮就对他用了空城计。空城计的故事，能启迪人具体运用战略战术。

毛泽东接着说，《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这都是文学作品，很重要的，是反映政治性的小说，体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的完美，写得很好，语言也很生动活泼。

毛泽东嘱咐汪东兴把这些话向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人传达，另有机会时向政治局传达。

毛泽东当时还考问汪东兴，要他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毛泽东见很快回答出来，表示满意。

毛泽东又说，《共产党宣言》这一篇文章写得好。那个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时比你年纪小，只有30岁左右。你看人家！

毛泽东说，在党里为人也好，在社会上为人也好，个人为人处事也好，都要以团结为重，要辩证地看人，两点论地看人，变化性地看人。一分为二是辩证的嘛，两点论也是辩证的嘛。

针对汪东兴为人做事过于“认真”，毛泽东说，为人不可太认真了，水至清则无鱼；不看书不懂文学，不做工作不懂事。你干事太认真，这样的话就好比水太清了，鱼就无法生存了。

毛泽东笑汪东兴：我有时说笑话，你也当真，也当做指示吗？

汪东兴说，我不，我区别得开，但我会认真对待您说的话。^①

8月29日下午，湖南、广东、广西负责同志根据毛泽东分别谈话的精神和华国锋、汪东兴传达毛泽东在武汉谈话精神进行座谈。

晚上，毛泽东在华国锋等陪同下观看了湖南电视台临时转播的京剧《沙家浜》等文艺节目。

^①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24~127页。

8月30日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毛泽东在离开长沙去南昌的前夕，针对两天多来进行分别谈话和座谈的情况，发现各地负责同志都认为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解决了，党内、军内都存在着纪律涣散现象等的主要问题，找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华国锋、汪东兴集体谈话。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问大家：“怎么样？你们吹了两天啦！”

在座的人各人简要地汇报了两天中学习讨论主席指示的情况。

听完大家谈过以后，毛泽东针对林彪一伙人的问题发表意见说：“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指批陈整风汇报会。）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指黄、吴、叶、李、邱）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这个问题解决啦，作了总结嘛，其实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接着毛泽东谈了党的状况和党的历史问题。毛泽东又说：“全党人多，我们党有二千多万人，坏人不过是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呢，叫做‘吐故纳新’。还要挂起来一点，不过不多了，清理和挂起来的，就算百分之三。党内还有落后的分子，或者比较而言的。这些问题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才能做结论。因为现在不打仗，没有陈独秀。那个时候是天天打仗，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形势，很快就表现出来了。陈独秀他们81个人跑出去了，发表了声明。八七会议前，采取南昌暴动的政策是对的，南昌暴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后来是路线上犯了错误，但是取得了经验也是好的。城市不那么搞了，靠外援靠不住的，还得靠自己。没有兵怎么办？靠发动群众，还有俘虏兵嘛，他们也是群众。因为他们是国民党抓兵抓来的。我们把他们俘虏过来，就是把他们从敌人那里分裂出来。”

毛泽东再一次提出：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样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借鉴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呢？当然现在你们还不能向战士们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啦。

毛泽东又说，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么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三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

毛泽东接着谈到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的问题：如果你们有理，你可以坚持，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刮了呢？为什么要收得那样快呢？各大组组长都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说要收回简报。你们的组长是谁呀？

在座的几个同志讲，我们中南组的召集人是曾思玉。

毛泽东说，总而言之，将来要把简报发给大家看。大家评论，是革命的，是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不要受群众落后议论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包括你们在内。不然的话，为什么被人家一股台风一卷，就把你们卷进去了。

毛泽东说，军队历来就是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谁有道理听谁的。我历来就没有什么意见的，我的意见都是下边来的，下边是供应站。陈伯达给我几条语录，三十八军给了我一个报告，汪东兴那个自我检查，济南军区的反骄破满的报告，刘子厚也给了我一点材料。我有什么东西呀？我是向他们学的，然后我就打石头。

毛泽东说，我看今后你们也应该这样。你们有什么学问呢？我不清楚。无非是找工人、农民开上两个会，然后总结一下。有些人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

毛泽东接着说，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一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

谈到这里，毛泽东指着刘兴元问：你会写文章吗？

刘兴元说：不会。

毛泽东指着丁盛：你呢？

丁盛说：文盲。主席的书还可以看得懂，外国的书看不懂。

毛泽东说，那怎么办啊？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我看《参考资料》可以多印一点，看的人多一点。如果有人不看，由他们去。

毛泽东回过头来又谈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说：“这一次比前九次（指毛泽东所称中共党史上的九次路线斗争）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没有作个人结论，是要保护林副主席。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那一一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给你们通气了没有？

大家回答说：没有。

毛泽东说，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1300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

毛泽东讲到这里，看了汪东兴一眼。汪东兴补充一句：我一共做了三次检查。

毛泽东接着说，少数人说汪东兴下不了台了，但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其中包括我的护士长、服务员、护士都说好。

那时，毛泽东对汪东兴的情况是做了调查的。他曾经问他身边的服务人员：汪东兴怎么样了？他还抓不抓我这里的工作了？我看他每天还到这里来呀。

服务人员报告毛泽东说，汪主任他一方面检讨，另一方面对您这里的工作从来没有放松，还是同以前一样。对我们也一样，该办的事还在办。

毛泽东望着刘兴元说，我看你这个人比较爽快，说话不那么吞吞吐吐。

刘兴元回答：我有急躁粗暴的毛病。

毛泽东说，我这个人也急，要改。军人搞惯了，就是急。急不好。战士才不管你呢。对战士管得要合理，要有理，就是合乎事实，讲道理。你们听了我一吹，又是什么英明伟大呀，又是英明领导呀，又是很多都是

新东西呀，没听说过呀！

讲到这里，毛泽东转眼看了看大家。

韦国清接上话头说，我们听了很受教育。

毛泽东笑着说，看，你又来这一套了吧。

毛泽东专门向大家讲了他的谈话与在北京召开的 99 人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谈的有所不同，他说：“我说的这些超过九十九人会议总理那个总结的，不过是作个人意见提出来。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不太好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吧？可是一说不行又慌了手脚。起先有那么大的勇敢，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你看才几天嘛。翻来覆去的，说明他们空虚恐慌。既然有理为什么要收回呢？”

毛泽东说，我们的高级干部不成熟。那次庐山会议也不过是二百几十个人，我本人也是二百几十个人中间的一个，还有一些高级干部。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中央委员，卜占亚他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华国锋同志，你满脑子的农业，当然，你也讲了农业路线问题，可是光有你的农业也不够，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

在谈到当时各地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过去，积代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北京开得有点缺点。首先是总参谋部召开的那个积代会，他讲“大树特树”，别人一句也不能讲。听说他那里有一个护士，说了一句不赞成的话，他们就不饶她。“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后来，据杨成武同志讲：受到毛泽东批评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那篇文章，是总参政治部组织人写的，陈伯达与中央文革小组叫署上杨成武的名字。杨成武说这篇文章他没有看，那时他正陪毛主席巡视南方。

毛泽东接着说，后来，国防科委开的积代会也不好。国防科委开积代会，有人还打电报祝贺，其实这是造声势，找一班人拥护自己。

毛泽东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那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毛泽东是说在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中，真正从井冈山下来的只有黄永胜一个人。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不是，他们是在瑞金以后参加革命的。真正跟毛泽东在井冈山的，只有黄永胜。

毛泽东说，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7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的井冈山。

毛泽东说，现在南方干部比较少了，高高在上了，稀稀拉拉了。北方干部多起来了，我很高兴，但是不要翘尾巴。总的来说，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这也没有关系。

毛泽东特地嘱咐说：“不要公开地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只是说现在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想我们的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高级干部应该弄清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其实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小小老百姓”啊！“小小老百姓”是谁呢？河北人都知道。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大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毛泽东接着说，方法就是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陈伯达这个“小小的老百姓”，他搞挑拨离间，他的话也不讲完。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我们党是有纪律的。庐山这场斗争，还没有听到外国人说什么，华北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后来他们又开了三个月的会，可是没有发现外国人说什么。总而言之，无论干部、战士，全国党员有两千多万，讲百分之三的话，稍微大了一点吧？（这时大家插话说：百分之三大了一些，吐故纳新只有百分之一左右，包括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现在我希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的报告。

讲到这里，毛泽东看了看桌子上的表，说，今天我要走了，我这一路

都要谈下去。

韦国清又表示：主席的谈话，对我们教育很大。

毛泽东说，又是英明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吧。99人的会议，已经刚讲了吧。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人们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定。斯大林不是盖棺论定了吗？没有论定。

毛泽东接着谈起中苏关系，他说，在朝鲜打仗时，两国关系比较好一些。《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雅尔塔协议是两种不同的问题。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内部争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容许第三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国籍，怎么办？他们答不出来。还有他们不许我们夺取政权，联共党始终是反对的，有电报还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给我们党来电报，说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

毛泽东针对这个问题说，如果说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可以，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族，就是讲人嘛，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我是顶了他们的。我们党内也有相当的人当时不想夺取政权，也不讲夺取政权。

毛泽东再三说，我讲党的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苏联形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我们党分裂的基础是有的，特别是王明的那一次。

在座的有人问毛泽东：对高岗、饶漱石，苏联是不是拉了他们一下？

毛泽东说，拉是拉了他们一下。又说：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过去张国焘搞分裂，把共产党的武装对立起来，但没有搞成。

在结束这次谈话时，毛泽东鼓励大家：很有希望。还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起来。^①

8月31日下午，毛泽东决定去南昌。当天上午10点多钟，专列准备好了。12点半，毛泽东在汪东兴的陪同下乘坐北京带来的吉斯小轿车，由他

^①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28页。

的司机老张驾驶，到长沙市东郊的大托铺机场专列停车处。华国锋、卜占亚去送行。临别，华国锋问毛泽东：“主席，我回到北京，别人问我，我怎么回答？”

毛泽东说：“你只跟总理一个人谈。”^①

专列不到下午1点离开了长沙。

汪东兴送走毛泽东后，又回到住地，把文件等东西收拾好，然后就去吃中午饭。下午1点半钟，汪东兴坐的飞机起飞了，到南昌是2点钟。

毛泽东分别谈话和集体谈话后，华国锋、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卜占亚感到毛泽东的谈话全都是涉及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问题，应该及时整理出来。

9月1日上午，为了便于保密，华国锋、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卜占亚一起到韶山滴水洞，在不让秘书及其他工作人员参加的情况下，用三天时间，将毛泽东的先后谈话进行汇集整理。由卜占亚执笔，大家修改，最后由卜占亚亲自将材料刻印五份。据华国锋、汪东兴、卜占亚回忆：1972年，中央以12号文件下发的《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纪要》就是在这个材料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整理完材料后，华国锋回到北京，于9月8日前先后两次单独向周总理详细汇报了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内容。

毛泽东在长沙的情况陈长江回忆：毛主席在长沙，不断找人开会、谈话、交代任务，甚为忙碌。根据毛主席谈话情况和工作安排，警卫干部进行了几次研究，总的印象是情况严峻，我们要随时提高警惕，加强责任心，无论是值班员，还是哨兵，都要做好应急准备，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能拉得出，顶得住，确保毛主席的安全。^②

毛泽东喜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尤其喜欢到江河里游泳。可是，这次南巡在湖南，又是处于素有“秋老虎”之称的炎热日子里，他却无暇顾及，把游泳置于一边了。

毛泽东在湖南时，已经要汪东兴通知许世友和韩先楚到南昌谈话。汪东兴到南昌后，又用飞机把许世友从南京接来，韩先楚坐福州军区的飞机

^①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42页。

^②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150页。

由福州到南昌。

许世友、韩先楚是下午5点钟左右先后抵达南昌的。他们到了以后，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向他们和江西的程世清一共三个人传达了毛泽东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汪东兴是以提纲的方式传达的，重复的内容只讲一遍。传达从下午5点半开始，到7点半结束，共传达了两个小时。

晚上9时，毛泽东抵达了南昌。汪东兴等一起到专列停车处去接毛泽东。

专列停好后，他们上了车。毛泽东在车上与他们谈了几句。毛泽东说，车既然停好了，许世友也刚来不久，那就干脆到住地去谈吧。他们送毛泽东到住地，安顿下来。

晚上10时，毛泽东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开始了在南昌的第一次谈话。

毛泽东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几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毛泽东对许世友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

许世友赶紧说，伪中央没有他，有陈昌浩等人。

毛泽东听许世友说到陈昌浩等人时，摆了摆手，表示他没有问许世友这些，不希望许世友讲下去。其实，张国焘搞的伪中央的名单，中央早就知道了。

毛泽东接着说，陈独秀搞分裂，有81个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头一名是陈独秀，第二名是彭述之，第三名就是刘仁静。他们还发表了文告。

毛泽东接着又谈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问程世清：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

程世清赶忙对毛泽东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

毛泽东又问许世友：许世友同志啊！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

许世友马上回答毛泽东：我与上海的关系比较好是“文化大革命”开

始后，张春桥一直是保我的，一直是为我说话的，并且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覆盖。

毛泽东说，覆盖不对。不应该覆盖嘛，让人家去看嘛，有什么关系呢？

许世友说，我与王洪文的关系也比较好。

毛泽东对许世友说，你这个许世友呀，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

毛泽东说过“刀下留人”的话后，许世友紧张了，他有些怕了。他说，哎哟，我和浙江南萍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

毛泽东说，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没有责任呀？那样搞武斗，南萍有责任，但是都是南萍的责任吗？

毛泽东转向韩先楚问：你是湖北人吧？

韩先楚回答说：我是湖北人。

毛泽东说，湖北的人我认识得很多，也可以说是不少吧。有个李求实是湖北人，有项英是湖北人，有黄富生，有施洋，有董必武，还有恽代英，这些都是我们党的名人嘛。这些都是湖北佬。

韩先楚只是笑，没有说话。

毛泽东兴奋地说，湖北出人才呀！

毛泽东接着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

毛泽东接着说，南昌起义后，由于在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与敌人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最后余部又被迫返回到江西、湖南一带。

毛泽东又说南昌起义以后，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想依靠外国人。朱德同志当时到了桂东地区，他有一个同学、朋友，姓范，叫范石生，关系不错，搞到一起，范送了他一点枪、钱、衣。

毛泽东再次说，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毛泽东说，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长征时，同我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军、三十军，这两个军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他们当时把枪丢给干部团的学生，我还是要他们把枪带上，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张国焘有命令嘛。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当时不能帮忙，军队不能帮忙，都拿着枪啊。张国焘打电报让他们回去，他们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许世友都是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后来还是回去了。

毛泽东对许世友等人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嘛。

毛泽东谈的这些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在座的几位司令员当时都掌握着军队，并且有的是四方面军的人。全党要团结，不要搞分裂。毛泽东是希望，并且提醒他们注意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这时许世友转换了话题。他对毛泽东说，主席呀，有“五一六”分子怎么办呀？

毛泽东说，怎么又谈到“五一六”啦？

许世友说，“五一六”在南京相当厉害。文凤来是“五一六”分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

毛泽东问许世友：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

许世友回答不出来。

毛泽东说，这件事，你们要查清楚，不忙作结论。

接着，毛泽东问许世友：你们南京军区不是有一个有名的王、林、鲍吗？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是造反派吗？

毛泽东是指除了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王必成当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当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鲍先志当时任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之外，还有一些干部，难道他们都是造反派。

许世友说，他们都是造杜平的反。

毛泽东反问许世友：他们为什么不造你的反？

许世友回答：不。他们不造我的反。

毛泽东对许世友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

最后，毛泽东又提出了学习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个口号，叫作工业

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要加一条，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这是毛泽东在南昌的第一次谈话，大约谈了一个半小时。毛泽东谈完后，时间已到夜间零点。毛泽东要汪东兴组织许世友他们座谈一下。^①

9月1日，毛泽东休息。这天下午，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了座谈。汪东兴参加。下午给毛泽东检查身体，发现体温升高了，38度多。他患了感冒，晚上卧床休息。

2日早上8时，毛泽东起了床。他问汪东兴：我们要走了，怎么办？

汪东兴反问：您看呢？

毛泽东说，还是见他们一下吧。

汪东兴马上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来。可是怎么也找不着他们。汪东兴想这可糟糕了。找了半个小时，才知道他们打猎去了。汪东兴马上派人把他们喊了回来。

毛泽东这一次与他们见面谈话的时间不长，比较简单。

毛泽东对他们说，今天我要走了，汪东兴同志向你们传达的我在路上谈话的情况，你们也谈了谈。你们昨天座谈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

韩先楚先发言。他说，我在座谈会上说，要听毛主席的。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

许世友请示毛主席：主席，您到浙江找不找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许世友提问毛主席的是不是要解决他与南萍闹矛盾的问题。毛泽东不准备解决这个问题，便说，不谈这个问题。到浙江不谈这个问题啦！

许世友问毛泽东：我回去吗？

毛泽东说，你回南京去吧。下午我也走了。这次谈话，连寒暄、握手的时间在内，40分钟就结束了。^②

2日，程世清单独向毛泽东做了一次汇报。程世清听了毛泽东谈了庐山会议的问题，联系到自己知道的一点情况，向毛泽东谈了三点：

一、7月间，空军周宇驰两次跑到南昌活动，行动鬼祟，运来一辆水陆两用的汽车，要江西帮他仿造。7月底，周宇驰用飞机把汽车运走了，不知干什么用。

^{① ②}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43~148、149~150页。

二、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带我去见了叶群，她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

三、林立衡来南昌时曾同他妻子谈了林彪、叶群一些问题，她要我不需要同林彪一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

听了程世清谈的情况，毛泽东略有所思，没有讲一句话。

程世清所谈的一些情况，经查证属实。应当说听了程世清反映的这些情况后，毛泽东进一步提高了警惕，采取了一些防范性措施。^①

吃完中午饭，专列离开南昌去杭州。

毛泽东在南昌的情况，陈长江回忆：

8月31日，毛主席乘坐的专列，离开长沙，调头东向，朝江西省省会南昌开进。

在南昌，毛主席住在市郊一个山坡上的一栋别墅式建筑内，距市区约有十余里。这里没有都市特有的喧嚣、繁忙，也没有“文革”特有的“炮轰”、“打倒”那一类口号，显得十分安静。记得，毛主席在1962年那次巡视南方时，曾在这里住过。

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颇得毛主席的赞许。这一天，许司令员来了。他穿着白汗衫，军装裤，还是穿一双用麻绳、布条编织的透气的凉鞋。有趣的是，在鞋面上，还缀着一个红穗穗，倒是满有些地方的、民族的特色。这种鞋，即便是偏僻的农村也很少见人穿了，却颇得这位大军区司令员的青睐。这次来见毛主席，他穿的也是这种鞋，这几乎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个性化穿戴了。许司令员与毛主席谈了许久，毛主席送他出来了。临别，主席忽然问他：“现在还打猎不打了？”

“打。”许世友问答。

毛主席哈哈地笑着，与他握手送别。

果然，第二天早上，我见许司令又扛着猎枪，到机场附近那片草滩里打兔子去了。当时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正在江西南昌附近的进贤县“五七干校”劳动，已很有些时日了。她锻炼得怎么样？毛主席一直很关心，常向了解情况的人问起她在那里的表现。当时我们想，毛主席一定会把她找来见一见，谈一谈的。因为她是毛主席子女中最小的一个，一直生活在他身边，深得

^① 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毛泽东》第156~157页。

主席的宠爱。南昌距这所“五七干校”仅有50余公里，乘汽车也就是一个钟头的路程。何况，李讷来劳动，也是在一个非常情况下发生的。

“文革”之初，李讷大学刚毕业，她像许多青年学生那样，天真烂漫，朝气蓬勃，对革命、对前途，充满了种种美好憧憬。其后，她成了中央文革办事组成员，经常出头露面处理一些问题。她的化名肖力，不时出现在报刊上。之后，她当了《解放军报》的副总编，不久，又成了北京市委副书记。在当时，据一些知情人讲，论能力，论素质，她确实不比许多同龄人差。

这个情况，不知怎么搞的，毛主席知道了，很生气，认为这样做很不妥，一定要让她下去劳动锻炼。因此，就让她到了这个“五七干校”劳动。

可是，毛主席要处理的党和国家的事情很多，见一见李讷的事，一直排不上日程。直到我们离开南昌，毛主席也没有见她。^①

从南昌到杭州，专列走了近13个小时。毛泽东在车上一直休息。

9月3日零点，专列抵达杭州，在笕桥机场专用线停放。毛泽东在车上找南萍、熊应堂、陈励耘和汪东兴一起谈了话。当时，南萍任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熊应堂任省军区司令员，陈励耘任空五军政委。这次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开始谈话时，毛泽东问南萍：你们省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南萍主要汇报了浙江天旱与抗旱的情况。

毛泽东听后说，天不帮噢！

毛泽东很快把话题扯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上。他问南萍、陈励耘：庐山会议你们有什么错，听说吴法宪找你们谈了，他搞的那一套，说不是有八个人嘛？

毛泽东看着陈励耘，又问：其中有你一个，还有上海的那个王什么（指王维国），还有福建的那个叫什么？是不是就是那几个人。你们空军就八个中央委员嘛？

陈励耘听了立即紧张起来，慌忙解释：在庐山，吴法宪找我布置空中警戒时，阴一句，阳一句。这个人说话不算数的。

毛泽东听后顺着说，是啊，说话不准确！

^①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150~152页。

接着陈励耘又说，上山前都不知道他们这些事。

毛泽东说，噢，上山前你不知道。空军有，海军有没有？他们是不是内部有通知呀？

陈励耘望着毛泽东发怔，未作回答。

毛泽东回过来谈九届二中全会六号简报的实质，把问题点得很透。他说：“那个简报，影响最坏，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他们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我看他们是恐惧。”

在座的人听了都没作声。毛泽东接着谈如何正确对待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错误的人的问题。他明确地说：“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他们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你们是受骗、受蒙蔽。对犯错误的，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比如说，我当班长，你们三个都是兵，我总是那么凶，抓着你们辫子不放，那么行吗？

毛泽东这些话，显然带有开导的意思。但是陈励耘继续掩饰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不了解情况，跟着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看了陈励耘一眼，接过他的话题说，要搞唯物论，不要搞唯心论。

接下去，毛泽东继续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说，庐山乱了三天，实际一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到现在一年了。“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

毛泽东所说林彪打电话、写信的情况是这样的：九届二中全会前，林彪曾经有两次想要打电话、写信给毛主席，但是都被叶群和黄永胜阻止了。

毛泽东继续说，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毛泽东进一步谈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他说，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

毛泽东说的“三个副词”，就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经常在文件上写的“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话。在九大党章草案中也曾经提到过“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在修改时被毛泽东圈掉了。

1970年8月13日宪法工作小组会上和8月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草案表述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句子中加上三个副词，为此他与康生、张春桥发生激烈争论。

根据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和会后发生的问题，毛泽东再一次向在座的同志强调：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搞山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要求大家：要学习列宁为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撰写的那篇文章。列宁讲，唱《国际歌》走到哪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朋友。大家要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国际歌》歌词中讲“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这就是强调讲团结嘛！学马克思主义就要讲团结，没有讲分裂的！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首先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一条即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对人要和气，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搞军阀作风。其他的也还有点问题，比如不打人、骂人，不调戏妇女，但在军队中问题不大。

毛泽东说，我没有同你们讲过路线问题，过去见面，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无非是同南京的关系的事，谁知后边还有一个庐山会议。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

毛泽东接下去说，听话要分析，不要听小道的话，不要尽听，人家一吹就听了，受蒙蔽了，不了解情况。所以要调查研究，听话要分析。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讲到他对“天才”提法和“伟大”提法的一贯的态度，他说：“八届十一中全会，有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需要嘛！九大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最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立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四个伟大，我就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汪东兴回忆：本来，称颂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曾多次表示不赞成。我记得可能是1968年

的一个重要节日的一篇社论，提了这“四个伟大”，毛泽东要我拿着社论的稿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把它们划掉。去之前，汪东兴问毛主席：四个伟大全删掉，不留一个？

毛泽东想了想：那就留下一个吧。

汪东兴又问毛主席留下哪一个。

毛泽东说，我是当过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

这样，汪东兴就去钓鱼台，传达毛主席的意思，要陈伯达他们圈掉了除“伟大导师”外的“三个伟大”。

毛泽东还谈到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他说，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都搞不清楚。你们要学习马、列的书。现在学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

最后毛泽东又谈到军队问题，他说，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毛泽东接着谈及北京军区的情况。毛泽东说，除了他们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二十一军、六十九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二十一军政委、军长，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地离开北京军区。对六十六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这次谈话中，汪东兴还问浙江舟山的武斗问题。

毛泽东问南萍：舟山还武斗不武斗啊？

南萍回答说现在不武斗了，但群众组织中派性还很强，政策还不够落实，最后地区会议开得比较好。

毛泽东说，舟山主要是中级、上级的问题。有些问题，你们也支持了

一下。

汪东兴说，这里讲到的“中级、上级”，我理解是指省里、大军区或更上一级。当时，对舟山的问题，许世友和南萍就谈不到一起，叶群也坐飞机去舟山调解过，好像总参谋部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也去过，都没有解决问题。

毛泽东再一次表示：对林要保。同时，毛泽东又批判林的讲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谈话快结束时，毛泽东又提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

最后，毛泽东说，今天谈到这里。有些在别的地方谈的，请汪东兴同志再同你们谈谈。^①

谈完话，毛泽东下车到了汪庄。

陈长江回忆：

杭州，是毛主席常来的地方。毛主席每在杭州小住，对浙江省委、省公安厅的同志不仅很尊重，很爱护，也很有好感。如今，那些他熟悉的干部都靠边儿了。

在汪庄住下之后，我还是老习惯，布置完警戒，便由近及远地查看周围环境。

这地方，我不是第一次来，地形、布置等没有多少明显的变化。但是，接触到的工作人员，如服务员、厨师等，都感到熟面孔少了，新人多了。这些新人，无论男女，个个年轻精干，显得训练有素，一问才知道是为这次任务特别挑选来的。后来，又发现我们的外围警卫工作也有了变化。过去我们来浙江，警卫都由当地公安机关具体部署和实施。这一次，省公安机关的那些老熟人不见了，外围警卫系统由陈励耘负责。他是空五军的政委，实际掌握省的军队和治安大权，整个杭州的警备大权，都是陈励耘管着，而毛主席对这个陈励耘不知为什么很厌恶。尽管出面接待毛主席的还有好几位，但真正说话算数的，是他一个人。^②

①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50~157页。

②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154页。

9月4日至5日，汪东兴向南萍等人转达毛泽东南巡路上前几次谈话的内容。座谈了一次，对过一次笔记。

4日至9日，毛泽东又不再同各地负责人谈话。

3日至8日，毛泽东每夜都通过电视屏幕，审看浙江的文艺演出。在审看中，作了关于越剧改革及其他一切剧种改革的指示，作了关于要团结老艺人的指示。毛主席还号召：大家不要忘了老传统，要唱《国际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主席对两首革命歌曲还作了精辟的阐释，指出：《国际歌》主要讲了团结战斗，实现英特纳雄耐尔；《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重要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和态度要和好这两条。毛主席指示的第二天，省市文艺工作者联合演唱了这两首歌曲。毛主席看了演出，表示极大的欣慰，赞许说：“行动很快啊！”^①

5日开始，有人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报告林彪一伙。

当日，广州军区向军一级干部传达毛泽东的讲话。深夜，广州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密报在北京的于新野，于新野作了15页记录。

6日，刘丰将毛泽东南巡讲话告诉了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作鹏听后立即产生三个想法：一、庐山会议的事还没有完；二、“纲”上得比庐山会议时更高；三、矛头似乎指向了林彪。当日中午11时，李作鹏陪朝鲜军事代表团返回北京。回京后，他给黄永胜打了个电话，请他下午早点到，有要事相告。下午5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将与朝鲜军事代表团举行最后一次会谈。黄永胜、李作鹏都不到4时就到了，李作鹏向黄永胜讲了他所听到的一切。邱会作发现李作鹏、黄永胜密谈，一再追问，李作鹏说，不能告诉你，讲了会吓死你！邱会作一听更好奇，他说，你们没吓死我为什么就会吓死呢？小看人！非要李作鹏告诉他。李作鹏只好答应告诉他，并要他保证绝对不能告诉北戴河的林彪。邱会作听后觉得问题严重，但他还是遵守诺言，没有告诉林彪。可黄永胜却连夜打电话告诉了叶群。黄永胜在审判时说，他给叶群通报情况，促成林彪下决心谋害毛主席。^②

① 《怀念毛泽东同志》编写组：《怀念毛泽东同志》第235~236页。

② 张聂尔：《中国1971—风云“九一三”》第280~286页。

据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知情人说，当林立果得到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后，对他的心腹说：不干不行了，现在不是讨论问题的时候，要动手干了！他们开始了密室里的策划。

9月7日林彪一伙开始了行动。

当天，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这天一大早，林立衡、张宁、张清霖，一同从北京乘林彪专机去北戴河。午饭后，林立果将姐姐林立衡叫去。姐弟俩谈了一下午。林立衡回来后情绪很不好，将自己和张清霖封闭在屋里不见人。

下午，周宇驰驾直升机从北戴河回北京。到江腾蛟家，说：“现在看起来要对我们下手了。”“我看还是先下手为强。他正在杭州，很快回北京过国庆，路过上海时可以动手。”^①

8日，林彪在北戴河下达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当日上午，张宁由叶群带领去见林彪。下午，叶群、林立果、张宁一起乘坐尼克松送给林彪的凯迪拉克沿海滨公路转了一大圈。车上，叶群问林立果：“你准备得怎么样啦？”林立果答：“已准备就绪了。”后来，林立果曾同张宁独处了一会儿，林立果非常激动地对张宁讲：“万一……万一出了什么事，你什么也不要讲，我走以后，周围关系很复杂，你一定要谨慎叶主任问你我们谈什么，你什么都不要告诉她。注意休息，养好身子，我三四天后回来。”

晚上9时40分，林立果带手令乘飞机到达北京。下飞机后给负责专机的原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看林彪手令，并要胡萍立即准备两架飞机。

晚上11时30分，林立果、周宇驰在西郊机场工字房秘密据点同江腾蛟、李伟信策划谋杀毛泽东的办法，林立果称：“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和四〇火箭筒打B-52的火车；二是用一百毫米口径的改装高炮，平射火车；三是让王维国乘B-52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林立果还说：“这次要论功行赏。首长讲过，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这一天，叶群同黄永胜、吴法宪多次通电话。

林立果9月8日派于新野乘飞机到上海，晚上赶到杭州，向陈励耘传

^①张聂尔：《中国1971——风云“九一三”》第286~287页。

达、布置、研究要在杭州、上海、南京谋害毛泽东的任务。于新野要陈励耘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轰炸毛泽东的专列，由陈励耘负责装炸弹。并答应派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鲁珉执行轰炸任务。

9月8日，毛泽东察觉和了解到林彪一伙进行阴谋活动的部分新的情况。

晚上，毛泽东在杭州的住所，看男女合演的越剧《半篮花生》的电视转播，毛泽东称赞说：“这个戏有戏，一家人都很可爱。说明农民能够学哲学，也学得好。”“越剧味道出来了，越剧风格出来了。”^①

午夜，刚吃过夜餐，毛泽东突然通知，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铁路专运在线的专列，趁夜转移。

汪东兴回忆：

9月8日晚上，毛主席又得到新的消息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毛主席当机立断，采取措施对付林彪一伙的阴谋，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

我问毛主席，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是转到上海。我还建议，也可以转向绍兴，即转向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

毛主席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当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有个手令，也没掌握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根据了解到的种种情况，思想上、行动上已有了充分准备。

我从毛主席住地出来，马上就打电话找当时负责毛主席在杭州警卫工作的陈励耘。接电话的是陈励耘的秘书。他接到电话后，马上就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说：“陈政委有事，您有什么事请跟我讲。”

我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

秘书说：“能。”

我就说：“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

^① 《怀念毛泽东同志》编写组：《怀念毛泽东同志》第231~233页。

我得到这个情况后，就找张耀祠交代：“赶快去找专列乘务组同志将火车马上开走。”

当时天气太热，我还要求在专列转移到新的停车地点后，给毛主席的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棚子，以便防晒。张耀祠很快就落实了。

这些情况，我都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这么办。并说这个办法好。毛主席的专列9日凌晨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①

陈长江回忆毛泽东在杭州的情况：

毛主席这次在杭州，随着时间的延续，他的情绪越来越不安，不知他发现了什么，还是怎么了，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见毛主席这样，连我们也觉得不安，尽管并不理解这是为什么。事后我才从汪东兴的回忆中了解到：毛主席在汪庄的工作人员中，有人将陈励耘布置的向他汇报毛主席活动情况的特殊任务，报告了毛主席。在杭州的一位与毛主席交往甚多、友情很深的领导干部，托人给毛主席捎去口信说，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停在笕桥机场支线上的毛主席专列“碍事”，妨碍他人走路，暗示毛主席“请速离开”。毛主席起初听到，还有些纳闷：这会妨碍谁呀？

有天上午，毛主席出来散步，依然是小商、小吴陪着。

当时，我正在给集合在礼堂门前一棵高大榕树下的部队讲形势，讲注意事项，讲得最多的还是那个最为重要的话题：提高警惕，确保安全。

在队列中的干部战士，都身着便服，在别的场合见到他们，你决不会以为他们是解放军；但现今是集体活动，每人坐一个小马扎，成排成列，整整齐齐，尽管天气很热，他们仍然服装整齐，聚精会神地在那里听我讲话。

这时，毛主席来到我们队前。大家热烈鼓掌，欢迎毛主席的到来。

我上前向毛主席说：“主席，我们正在学习，讲你说的那个‘三要三不要’。我讲得不好，请主席给大家讲一讲吧。”

毛主席向大家摆了摆手，表示不讲了。却亲切地说：“长江，你指挥大家唱《国际歌》吧！”

我这个人，不擅长文艺。我们的部队虽然歌声不断，那都由文艺骨干们或指挥，或领唱，我从来也没有指挥大家唱过歌。我还是想让骨干们出

^①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84~185页。

来指挥，他们比我行，尤其是在毛主席面前。

不知什么时候赶来的汪东兴对我说：“毛主席说了，你又是队长，不指挥唱还行！”

我便硬着头皮指挥大家唱《国际歌》。说来也有趣，开始指挥还有些紧张，生怕指挥错了，唱不好。可是唱起来了，大家越唱越来劲，我们四五十个人唱歌，比一个一百多人的连队唱得还要响。这首《国际歌》，我们一连唱了两遍。

毛主席见我们唱完了，很高兴。他说：“唱得不错，再唱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我又指挥大家唱起来了。这一回唱得更起劲了。

唱完了，我说：“主席，你还有什么指示？”

毛主席亲切地向大家挥了挥手说：“你们的歌唱得很响。不仅要会唱，还要照着去做，一切行动听指挥嘛。”

队列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毛主席再次向大家挥手，表示要走了。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热烈地鼓掌。

也就是在这几天，汪东兴找我们几个干部开会说，前几天给你们讲“三要三不要”，那是有所指的，有人要分裂党，有人不听指挥。现在情况比较复杂。他最后说：“你们要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搞破坏。”

我很想知道，是谁在分裂党，是谁不听指挥，又有谁来搞破坏，好心中有数，以有利于防范。然而，长期以来做警卫工作养成的习惯，深知此时此刻不宜提出任何问题，重要的是做好应变准备。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我们这次来杭州，的确与往日有很大不同。

有一次，陈励耘来毛主席住处看望，毛主席对他表现出异常的反感，毫不客气地当面问他：“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有你陈励耘，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广州的顾同舟，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把个陈励耘弄得狼狈不堪，支支吾吾。

这次外出，毛主席活动的范围较广，接触的人也相当的多，其中，有不少人还是林彪那一伙的。是毛主席长期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使他随时保持异常的警觉，还是他们，包括那个陈励耘在内，过分嚣张，露出了马脚。总之，越到后来，毛主席了解到可疑的情况也就越多，越觉得问题严

重，对他们也就更加不信任了。^①

9月9日，林彪一伙的活动。

当日凌晨，在空军学院，林立果向刘沛丰、刘世英、程洪珍说：“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我们要誓死捍卫。你们要全力以赴，一个人顶几个人、十几个人。他接着给他们传阅了林彪手令。

下午，在北戴河，林彪提议全家照相。

同时，在北京，林立果等人在西郊机场工字房密谋。江腾蛟提出如果毛主席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就炸附近油库。又说，可以在硕放炸铁路桥。

这天，叶群和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加强联系，通话多次。

在南方，于新野到上海和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研究在上海谋害毛泽东的计划。他们认为，在上海动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对他们更有利。于新野坐飞机回北京前，王维国同他一起看过一次地形，他们决定就在上海谋害毛主席。

下午，于新野飞回北京，向林立果作汇报。

林立果马上将谋害毛主席活动的进展情况报告给了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和周宇驰对江腾蛟说，北线由王飞指挥，南线由你指挥，你要赶快回南方去。^②

他们准备采用多种办法来谋害毛主席。

第一种办法：如果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就由负责南线指挥的江腾蛟指挥炸专用线旁边飞机场的油库，或者向油库纵火。据王维国交代，他们安排由王维国以救火的名义带着“教导队”冲上火车，趁混乱的时候，先把汪东兴杀死，然后杀害或绑架毛主席。

第二种办法：是准备在第一种办法失败后采用的。就是在毛主席的专列通过硕放铁路桥时炸桥和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然后他们再宣布是坏人搞的。硕放桥在苏州到无锡之间，他们已经到那里看了地形，连炸药怎么安放都测量和设计好了。

第三种办法：如果炸硕放桥不成，就用火焰喷射器在路上打火车。周

^①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154~156页。

^②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92页。

宇驰讲，火焰喷射器可以烧透几寸厚的钢板。朝火车喷射，很快就会车毁人亡。王维国、周宇驰等人也到铁路沿线看过地形了。他们准备从外地调火焰喷射器部队。由于我们行动提前，这个部队没有来得及调来。

第四种办法：是要陈励耘在杭州用改装的伊尔-10 飞机轰炸毛主席的专列，由陈励耘负责在飞机上装炸弹。据陈励耘后来供述：于新野找他布置任务时，他曾提出杭州没有可靠飞行员，于新野答应回去向领导上汇报，派一个飞行员来。他们准备派谁呢？派鲁珉。鲁珉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部长。陈励耘说：“那就好，那就干！”陈励耘还说，用飞机轰炸专列的办法是可靠的。9月9日，于新野在上海对王维国说：“我们这次出动飞机炸，除飞机上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用来扫射从火车上跑下来的人。”

当于新野同王维国一起策划时，王维国又提出，如果毛主席下车住在顾家花园怎么办？于新野说，他看了地形，如果毛主席住在顾家花园，可以把王维国的“教导队”带上去，在住地附近埋伏好，用机枪把前后堵死，先把警卫部队消灭，再冲进去。王维国还向于新野表态说：“首长（指林彪）的命令，我一定执行。”

在布置“南线”行动的同时，林立果等还研究了“北线”计划，攻击目标是中南海和钓鱼台，准备“消灭”的对象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等，也有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北线由空军副参谋长王飞指挥，王飞等人把钓鱼台、中南海的地形都看了。他们打算用坦克冲中南海，用导弹打中南海，说来说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案。^①

9月10日林彪一伙的活动。

当日，周宇驰等人从空军司令部搞来我国三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作导航用的我国周围各国广播电台频率和时间表，港澳航线图、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图、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华东、中南几个省一、二、三级机场资料。

林彪知道搞政变的行动已经全面展开了，他有带兵的经验，怕单靠“联合舰队”这几个人没有把握，他要亲自指挥一个大“舰队”，他通过叶群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调动起来了。那几天，他们的电

^① 熊华源、安建设编：《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第41页。

话联系十分频繁，常常两三部电话机同时讲话，一讲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据调查：黄永胜同叶群通话五次。其中两次通话时间竟长达90分钟和135分钟。同日，林彪给黄永胜写信说。“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他们称毛泽东为“B-52”。当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问“B-52”的情况时，吴法宪向她报告了毛泽东在杭州同陈励耘等人谈话内容。

下午，叶群给王飞打过一个“抽鞭子的电话”，问“童女斩蛇”演得怎么样。

同时，在上海的王维国得知杭州方面的电话，毛泽东出发来上海，他一面赶紧密报在北京的林立果：“王维国因病住院了”，意即毛泽东已来上海。一面赶到专列停车处见主席，并参加了主席的接见。他一夜不归，到11日才回家。

9月10日中午，毛泽东决定离开杭州。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又陆续得知有关叶群、林立果等的一些可疑情况，使他更加警觉起来。

毛泽东对汪东兴说：“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汪东兴说“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

毛主席问：“为什么呀？”

汪东兴说：“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保卫。”

毛主席又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

汪东兴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

毛主席考虑了汪东兴的建议，接着又问汪东兴：“你的意见是……”

汪东兴说：“您看，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

汪东兴刚说到这里，毛主席打断汪东兴的话说：“还有一个，就是空五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

汪东兴回答说：“马上就通知他。”^①

下午2时30分，毛泽东同南萍、熊应堂、白宗善及陈励耘谈话，汪东兴参加。

^①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85~186页。

毛泽东同白宗善握手时，问：你白宗善为什么不来看我？

白宗善当时任空五军军长，毛泽东对他很熟悉。

陈励耘慌忙接口说，他那天在值班。

握过手，毛泽东首先对他们讲了一个寓意深长的故事。他说，齐国和鲁国打仗，我是帮齐国，还是帮鲁国呢？鲁国小，人少，但团结得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结果把齐国打败了。

这意思是讲大家要搞好团结，不要分裂，否则革命事业要失败。

毛泽东接着说，听汪东兴同志说，你们批陈整风搞了两次，搞得还可以嘛，还不错。汪东兴同你们谈了一次，座谈了一次，对庐山会议认识深了些，学《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办了。

毛泽东再次向他们谈到我们党历史上的路线斗争问题。毛主席带着警示的口气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到后来走麦城失败。当然，那时没有反骄破满啦。我找黄永胜他们谈了话，东兴也参加了，当面批评了黄。黄永胜不会不摇鹅毛扇子吧！他一字不提林彪。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首先把汪东兴的书面检查批给黄永胜他们看，想启发他们。但黄永胜等人觉得只要有林彪在，就可以掩盖、保护他们，于是顶着，不承认有什么错误。毛泽东同黄永胜等人谈话，他们都闭口不讲林彪的问题。

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对在座的人说，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内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这次汪东兴同志不是沾了个边儿嘛！

汪东兴当时插话，说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

毛泽东问：你们谁参加过“七战七捷”（1946年7月13日至8月31日，华中野战军在粟裕司令员、谭震林政治委员的指挥下，连续进行了七次战斗，作战45天，歼灭国民党军六个旅又五个交通警察大队，共5.3万余人，通称“七战七捷”）呀？

陈励耘说他参加过。

毛泽东不信，说，我看不见得吧！你那时当什么官呀？

陈励耘回答：当过副主任、主任、副政委。

毛泽东在这里问解放战争初期的苏中地区的“七战七捷”，是为进一步谈干部问题。他讲到“七战七捷”的指挥员之一就是谭震林，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至1952年就在浙江当省委书记。

毛泽东随后又谈到陈毅同志。他说，陈毅打仗，有个好处，还能听听其他人的话。打孟良崮，他南边听粟裕的，北边听许世友的。

在谈到北京军区时，毛泽东说，北京军区队伍多，有几个军，还有炮兵、工程兵，装甲兵也多。他们整这个军、那个军。“陈伯达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

这时参加谈话的几个人都说，毛泽东到各地谈话，是造革命的舆论，是完全可以的。

毛泽东表示同意大家的说法，又说，陈伯达搞的是反革命游说，我搞的不同。

毛泽东虽然同许世友讲过，到浙江不谈他与南萍的矛盾，但为了搞好团结，还是谈到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说，你们和南京的关系，我说了两年，还没有解决。我这边也讲，那边也讲。给你们讲的都可以公开讲，少数人可以讲，多数人也可以讲。你们同许世友同志不要针锋相对。对他也说不服，对你们也说不服，这主要由我负责。

毛泽东问南萍：南京开会你们去不去？我同许世友在江西谈过两次，这次还要谈。

南萍说，我们没有听主席的话。今后按许司令的指示办。

毛泽东说：那也不对。错了的也执行吗？许世友同志是可以交朋友的，有时还可抓住他的主要问题，把道理说清楚，他还是可以交朋友的。你们空军受不受许的指挥啊？

南萍等人答复：受他的指挥，听的。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表示这样做好。

毛泽东又说，国民党不能打仗，日本比它厉害，开始可几个军打他一个军或一个师。打仗没有什么，就是“集中兵力”四个字。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颇难。

最后，毛泽东说，把我的像到处挂，我已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这样做了。“万岁”，英文翻译为LongLive，是“长寿”的意思，对年轻人可喊，

对年纪大的就不要喊了。

毛泽东说：“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将不行。上海王洪文这个同志你们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这个同志怎么样？”^①

谈话结束，毛泽东突然通知离开杭州。

汪东兴回忆：

南萍等人被请来以后，毛主席在自己休息的房间里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在他们谈话的时候，我就布置专列做开车的准备。毛主席同他们谈了半个小时。谈完后，我请他们到我的房间里休息。

我回到毛主席那里，请示说：“到上海后停在哪里？”

毛主席说：“停在上海郊外虹桥机场专用线，顾家花园就不进去了。”

我说：“上海那边的通知，是不是通知王洪文？”

毛主席说：“是。这个电话由你们打。”

当时，陈励耘在我的房子里，我就只好在毛主席那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

13点40分，专列由绍兴返回，14点50分抵达杭州站。

在离开杭州去上海的时候，我们没有通知其他人送，陈励耘却来了。陈励耘到车站后，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里有鬼，当时神情很不自然。

他跟我握手时问我：“车开后，要不要打电话通知上海？”

我说：“你打电话给王洪文或者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以后我了解，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②

下午4点，毛泽东离开杭州去上海。

陈长江回忆：

9月10日这一天，就像往日一般，大家该做什么做什么，没有任何特别的安排。这天上午，我们与驻地警卫营举行篮球友谊赛。尽管我们去的

^①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58~16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98页。

^②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87~188页。

人不多、警卫任务也比较重，打篮球也还是很有实力的。加之，李指导员，商副队长等干部也上场参与争夺，更增加了信心。两阵对垒，一攻一防，笛声阵阵，掌声不断，我方频频得分。记分牌上显示，我们领先不少。

临终场还有几分钟了，对方叫了暂停，在场上李指导员提醒大家说：“莫忘了，不能赢。”大家点头会意。

当终场笛声鸣响之后，计分牌上显示，两队得分相当，我队以两分之差居次。场内外响起热烈的掌声。我们那些上场的队员，个个像水洗过的一样，浑身是汗，衣衫尽湿。

中午饭吃的是面条，热天吃面条，犹如火上浇油，战士们个个汗流浹背，刚刚换上的衣裤转眼之间就湿淋淋的了。这有什么办法？无非就是湿了就换，换下来再洗。

中午刚过，毛主席忽然告诉说：“现在把火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往哪里走？没有说，只是交代说，“不要告诉陈励耘他们，也不要他们送行。”

不管去哪里？都需要我们立即进行准备，做到随时可以行动，军人要有这样的素质，尤其是我们这支队伍。可是，大家刚洗的衣服，还在外面晾着没有干，有的还往下滴水呢。有位战士向我提出：“怎么办？”

我告诉他们，用雨衣把湿衣服包起来全部带走。我们的警卫部队很快进入登车状态，所带的东西，包括厨房的炊具在内，都已装进车内，一切都在不声不响、有条不紊之中完成了。考虑到复杂的情况和我们并不明了真正敌人是谁？在哪里？为应付发生的意外，我安排前卫车和后卫车分队人员提前进入车站，因为前卫车需提前几分钟开行，后卫车，要控制车站进出口和登车地点。留下30余人随我跟主席一起行动。一经布置，很快均已就位，做好了开行的准备。

毛主席乘一辆小轿车，由汪东兴陪着，我和张耀祠副主任乘一辆小车在前开路，警卫战士乘一辆面包车紧随其后。

由于毛主席是突然行动，我们又提前控制登车地点，因而从出发到登车都很顺利。

当日晚18点10分，毛泽东抵达上海。

毛泽东没有下车，在专列上同马天水、王洪文、王维国、汪东兴谈话。晚上就在专列上休息。

在杭州动身前，汪东兴把毛泽东就要到上海的事打电话告诉了王洪文，还叫他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毛泽东要找他们谈话。王洪文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

专列到达上海，停到靠飞机场的支线上。汪东兴立即下车去接许世友和王洪文。汪东兴下车后只见到了王洪文，就问他许世友来了没有。王洪文说许世友还没有来，并问了我路上怎么样等问题。

汪东兴引王洪文到车厢里见毛泽东。毛泽东问王洪文：东兴同志打电话给你，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

王洪文回答：电话我打了，南京说他可能下乡了正在设法同他联系。

毛泽东与王洪文聊了几句，就说，等许世友来了一起谈。

王洪文随即下车了，汪东兴去部署、检查警卫情况，他再去住处打电话找许世友。

据张耀祠回忆：

下午6时许，列车停下来，毛泽东没有下车，把上海市的党、政、军领导找到火车上来谈话。参加谈话的有马天水、王洪文、王维国，汪东兴参加了谈话。毛泽东与他们谈了约一个多小时。^①

汪东兴回忆：

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掌握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沉着地待机而动。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我们不能再在杭州住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我们行动快，使得陈励耘、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10日15点35分，我们从杭州发车，18点10分就到了上海。这次随毛主席外出，我带着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人，前卫、本务列车都上了部队。专列一到上海，我就把当地的警卫部队全部撤到外围去了。在毛主席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人。离我们的专列150米远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专列跑都跑不掉，所以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②

陈长江回忆：

此次外出，最使人担心、情况最为复杂的是上海这一站了。

① 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毛泽东》第148页。

②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93页。

当日下午，我们的专列顺利驶抵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专运站。

往常，毛主席每到这里都要下去住几天，这已是20多年来的习惯了。因此，我们按惯例做了毛主席下车的准备。

列车停下来了，毛主席却没有下车，而是立即把上海市的党、政、军领导找到火车上来，或开会，或谈话。

我们在火车上吃晚饭，并安排过夜。汪东兴在晚上八九点钟时，把我们几个找到一起，包括秘书、卫士在内。只见他拿着个小本子，一页一页地翻着，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与上海领导人的谈话内容。那些要点有：

毛主席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指的是南京军区部队）；第二地方要谨慎（指的是上海市革委会）。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抓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

汪东兴要求我们，严密部署列车周围警戒，重点部位要加设双哨，干部要加强值班。

根据汪东兴的要求，我们一下加了五六个哨，还增设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巡逻哨，并让佩带了冲锋枪。

高秘书晚上给南京打电话，要许世友第二天到上海来。^①

毛泽东一直等到11日的上午10点钟，许世友才来。毛泽东马上开始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这一次谈得很简要，一个原因是毛泽东等得太久了，另一个原因是与许世友在南昌已经谈过话了。这次的谈话，汪东兴只作了简要的记录。

毛泽东问许世友：许世友，你下乡啦，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

许世友回答：我去看农场了，看大别山附近的军垦农场去了。

毛泽东说，去那么远呀。

许世友说，坐吉普车去的。

毛泽东批评许世友说，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

^①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158~159页。

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

许世友感到毛泽东批评得对，内疚地说，真对不起。我想主席还会在杭州住几天的，然后才能到我这里。我昨天夜里12点多钟才回到南京的，先休息了一下，就没有打电话到上海。

许世友接着汇报说，今年农业可能会大丰收。军垦农场也不错，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

毛泽东说，那好嘛！你去看看农业也好嘛。

许世友接着说，军队的情绪很好。军队里比较稳定，乱哄哄的情况也过去了。我带着那些造反派去游过苏北。

毛泽东问：是不是都是支持你的那一派？

许世友说，我把两派都带上了。

毛泽东再次给许世友打招呼：不能把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讲了，要“高抬贵手”。

许世友说，不会，我正在做他们的工作。

毛泽东说：那好！

王洪文这时说了一句话：许司令，毛主席等你快15个小时了。

毛泽东马上打断王洪文的话：不要这样，不要紧嘛。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许世友下乡去了，不在家，不是故意不来的。

毛泽东缓和了一下气氛说，这段时间我们也休息了一下。接着又说，不要提了，我们还是谈正事。

毛泽东回到谈话的主题上来，他说，对庐山会议你们想得如何呀？是不是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是不是都解决了呀？

毛泽东问了几个问题之后说，我认为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对有些问题还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而且耐心地等待嘛。

毛泽东这样说的意思是希望在等待的过程中，犯错误的人自己应该争取主动认识检查所犯的错误。

毛泽东接着说，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犯了错误，也不认识，也不去想办法认识，在那里顶着，这个不好，可能不仅会使错误不

能被认识出来，而且会加深的，甚至把错误当作包袱的。犯错误的包袱，常常是越背越重，这个不好。要把这个包袱甩掉，轻装上阵，那样人就会觉得舒服了。不然总是背着沉重的包袱，你不甩开，那怎么会好受呢？

许世友诚恳地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毛泽东问他：我有什么指示呀？

许世友说，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点意见》。

毛泽东说，那个不是在后头吗？是你们犯了错误后，我想了五天才写的。你们是什么时候讲的，是24、25、26三天嘛！

许世友坚定地回答：这个指示我拥护，我就是按您的意见办的。

毛泽东说，不见得吧，我那个意见你学了没有？我那个意见上说，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你讲一讲，我听听！

许世友当时哈哈地笑了。

毛泽东对许世友说，你不是说执行我的指示吗？我要你们学习，你们又不动。人家要搞那个论“天才”，找了几条称“天才”的语录，你找到了吗？

王洪文看许世友没有讲什么，就开始向毛泽东汇报。他说，上海的五六位中委和革委会的主任和副主任，针对庐山会议出现的问题座谈了一次。

毛泽东问：你们座谈了一些什么呀？

王洪文说，突出的是讨论了林彪的讲话。当时我们心里就嘀咕。

毛泽东问：你们嘀咕什么呀？人家是副主席讲话呀。

王洪文说，他是副主席讲话，但当时我们都很少发言。

毛泽东问道：那你们不是也都听了吗？你不是也听了录音嘛！那时你们华东、上海就一个拥护的字都没有说呀？

王洪文回答：有。那个时候不拥护也不好。这次我们座谈时，也讲了一些意见，但有的人在庐山会议上没有发挥。当时庐山会议上，就是安排要讨论的，我们华东组除了林彪的一帮人抢着发言外，我们也发了言，我也讲了几句。事后，听说林彪讲话是中央常委同意他讲的，特别是论“天才”的语录也以为是中央搞的。

毛泽东问：谁说这个论“天才”的语录是中央搞的呀？当时我们发了语录没有呀？哪一个文件上说发了语录呀？哪一个文件上写有这几条语录呀？

“天才”的语录是林彪一伙人内部搞的，别人都没有看过。因此，毛泽

东不同意王洪文对语录的看法。

王洪文接着说，六号简报，我们一看到就火了。

毛泽东问：你为什么一看到就火了呢？

王洪文说，简报里有一些话有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在北京讨论宪法时有争论，而且争论得很厉害。当时有人提议设国家主席，有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主席的意见，可是他们不听，还要坚持他们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毛泽东问王洪文：那你对简报的性质有什么看法？

王洪文说，这个简报是有错误的，是错误的简报。当时我们几个人到主席那里谈过了。

实际上，对简报问题的意见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那里讲的，王洪文没有去。

毛泽东说，这个简报现在还没有做结论，这个结论将来由中央来做。我认为是反革命简报，起码如你讲的是有错误的简报。为什么有错误的简报要在这个时候发呢？为什么有的同志发了言，登简报，又不先让本人看呢？

毛泽东接着说，听了你们的意见，六号简报是错误的，是有人捣鬼，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是搞分裂。我讲话一句顶一万句？在这个问题上，我看连一句也不顶。不是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是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再一次把林彪一伙人的问题的实质点透彻了。

毛泽东讲完这些后，对许世友、王洪文又讲了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

谈到11点多钟，毛泽东说，我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你们都去。

汪东兴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空四军第一政委的王维国脸红脖子粗地站在车门口等着。王洪文把他拉上车来，与毛泽东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毛泽东对王维国很冷淡，连话都没有讲。王维国就同他们一起走了。^①

^①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62~168页。

13时12分毛泽东离开上海。

汪东兴下车送走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等人后，马上回到车上去见毛泽东。

毛泽东问：“他们走了没有？”

汪东兴说：“走了。”

毛泽东马上说：“我们走，你立即发前卫车。”

汪东兴说：“不通知他们了吧？”

毛泽东说：“不通知。谁都不通知。”

王洪文陪许世友等人吃饭时，接到飞机场保卫人员打去的电话，报告说毛泽东的专列在12点半钟就开走了。王洪文把此事告诉了许世友。

许世友吃完饭后，于3点多钟乘他原来至上海的飞机赶回南京，在南京站迎接。

离开上海后，毛泽东亲自指挥专列运行，打破了沿途大站停车检查车辆、上水等常规，提速运行，有的区段最快时时速达到100公里。乘务员全员顶岗，加强巡视。

9月11日林彪一伙的活动。

当日，王维国知道毛泽东今天要接见上海三军、市委负责人，但许世友赶到上海，要登专列的时候，他被挡在车下，没能登上专列。他一直守候在专列附近。他们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很快离开上海，当时只想着打探消息，等待下手的时机。

当天下午，林立果、江腾蛟、周宇驰到西郊机场据点，安排在上海动手。晚上8时继续开会，把鲁珉也叫去参加。林立果说，现在要进攻了，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他让与会的人看了林彪的手令。要江腾蛟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毛泽东，不成就由鲁珉炸硕放铁路桥，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要关光烈把火焰喷射连调到上海。但开会中间，王维国打来电话，说毛泽东“今天在上海停了一天，现在已经过了上海”。林立果回来说：“情况有变化。刚才讲的全部作废，就当没讲过。你们回去什么也不能说，这话要传出去，不但我们要杀头，老婆孩子都要杀头的！”

李伟信在羁押中这样写：我发现他们开会的房门打开着，走到门口一看，鲁珉不知何时已走，里边还有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四人。室内气氛异样，刚才那种嚣张气焰已为神色茫然所代替，众人目光呆滞，

低头不语。原来毛泽东已北上返京，企图谋害毛主席的阴谋破产了。林（立果）流着泪说，“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首长”连生命都交给我了，我拿什么去见“首长”。沉默了一阵，周宇驰歇斯底里地说，现在难过也没有用，也没有其他办法，只有等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我驾直升飞机去撞天安门。^①

18点35分，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到南京，停车15分。

陈长江回忆：

晚6时许，到达南京下关车站。车一停，我见许司令员已在车站迎候了。

这时，正是大家吃晚饭的时间。我进了主席的房间，见他仍在聚精会神地看文件。

我说：“主席，许司令员在下边，他说要来看一看你。”

毛主席说：“上午见过了，也都谈了，不见了，请他回去休息吧。”

我下车把毛主席的这个意见告诉许司令员，他很高兴地应允了。但是，他没有走，一直等在那里。

我们的专列在南京站完成加煤加水和检修任务之后，仅用了15分钟，便又启动了。只见许司令员还在那里，向列车挥手告别。^②

21点45分，专列在蚌埠停车5分钟。

12日零点10分，专列在徐州停车10分钟。

2点45分钟，专列经过兖州，没有停车。

凌晨5点，专列到济南，停车50分钟。张耀祠下车接杨得志，杨得志外出了不在济南。

陈长江回忆：

毛主席原打算在济南火车站见杨得志司令员，便让高秘书提前告诉了他们。车一停我们便下去迎接，在站台上方知杨司令员到泰州检查工作去了，要五六个小时之后才能赶回来，来了一位副司令员在站台上，看有什么要办的事。

我上车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毛主席。

^① 张聂尔：《中国1971——风云“九一三”》第289、302页。熊华源、安建设编：《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第102页。

^②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160页。

毛主席说：“副司令就不见了，不久在北京开会时再见。请他们回去吧。”并交代：“立即发车。”

早上7点40分，专列在德州停车20分钟。

中午11点15分，专列到天津西，停车15分钟。

毛泽东让打电话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北京丰台车站支线开会。

下午13点10分，专列驶抵丰台。

毛泽东在专列上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谈话，一直谈到下午3点多钟。汪东兴参加了谈话。

毛泽东先问李德生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李德生谈了阿劳动党对我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态度和意见。

听完李德生的汇报，毛泽东说，他们是左派，我们是右派。那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比较“左”，他们认为我们和帝国主义来往，我们是右了。

毛泽东说，怕美帝从亚洲撤出来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要我们把美帝拖住。他们只有两亿人口，经不起伤亡嘛，所以他们要撤军。撤军，不一定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美国撤军后，不一定会对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增加压力。美国在侵越战争期间，投入50多万军队，死亡也不少。越南是属于热带地区的国家，美军对环境不适应，越南人又运用了游击战术，打败了美帝国主义。

关于阿尔巴尼亚，那时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还比较好。当时曾经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来形容这种关系。“文化大革命”中，曾用毛泽东的名义发过一个电报，称他们是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那个电报的内容，当时毛泽东不知道。他知道后说，阿尔巴尼亚怎么成了明灯呢？它各方面都不行，工业、农业生产都不好，中央的领导人也不团结，他们是极左的。

当时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问题的看法是心中有数。

接着，毛泽东谈他要谈的主要问题。他还是从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讲起。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什么是纲？你们会打鱼吗？纲就是串鱼网的那根绳子，目就是鱼

网上面的一个个眼，你们讲的那个目，三天也讲不完。我今天是讲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毛泽东又讲了党的历史。

毛泽东说，从1931年到1934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我们党50年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几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给分裂了的。

毛泽东谈了党的历史上有人多次搞分裂，但都未把党分裂成。他接着说：“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了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那个文章，找了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五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毛泽东说，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要批评，做好了工作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犯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但发声明是容易的，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问题在于是不是实践他的声明，改正错误。这些人最没有勇气，收场那么快。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是三天。为什么那股妖风，只刮三天就不刮了，你有理为什么收回？说明他们空虚。我是哪里有石头抓起来就打，在庐山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是一块石头，济南军区三破三立的报告也是一块石头，三十八军的报告是一块大石头。以后又有刘子厚的检讨，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根本不批陈，我加了批语，这也是甩石头。

谈到这里，毛泽东对李德生说，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你向他们要，一连说三次：“你的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

毛泽东接着说，进城以后，我很少抓军队工作，管军队工作的，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实际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三任参谋总长罗瑞卿不大听他的。以后是杨成武、黄永胜。

毛泽东提到黄永胜时说，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不怎么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

毛泽东又对着汪东兴说，他沾了一点边儿，在一千多人的会议上作了几次检讨。

汪东兴补充说，正式地做检讨是三次。

毛泽东说到汪东兴在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做检讨时说：只有七千兵，连婆娘、娃娃都算上，他也没有倒呀！你把心里话说出来，倒不了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说这次汪东兴下不了台了，但是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五个人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承认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检讨里面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否改好。

这几位大将的检讨，均非出于自愿，是毛泽东要汪东兴以他的名义，一个一个地催着他们把检讨书交来的。毛泽东在他们每个人的检讨书上都写有批语，特别是对叶群的检讨书批语最多。

毛泽东说他们的检讨吞吞吐吐，是因为他们在检讨中回避了很多问题，特别是实质性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就怀疑他们能否改好了。

毛泽东接着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要掺沙子才行。李先念同志过去也是搞军队打仗的嘛，可参加军委办事组，以后还要从各大军区调一些人来参加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北京军区也要从各军调一些人，把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华北会议派了李德生、纪登奎同志到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我的办法就是打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毛泽东问在座的同志：陈伯达算不算一次路线？

纪登奎回答：算！

毛泽东说：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

毛泽东接着强调：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泽东批评林彪不讲三要三不要的原则。

毛泽东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①

吴德回忆：

毛主席在谈话中说庐山会议的六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我一听毛主席这样说，就赶紧检讨。我说，主席，我还在六号简报印发前签了名字。六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我犯了政治错误。

毛主席挥着手说，没你的事，吴德有德。

毛主席随后的谈话好像是说这是个反革命集团或是个反革命的行动这样一类的话，因为紧张，没有听得很准。这时，吴忠说，主席，可能有坏人吧？

毛主席说，你讲得对，吴忠有忠。

毛主席还询问了北京市批陈整风的情况，我们简要地汇报了一下。

毛主席反复地说，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是坐火车回北京的。我们坐汽车回北京，下车时，纪登奎禁不住跟我说，这个问题大了！我们都感到很紧张。

从丰台回来后，我到吴忠家谈了很长时间。我和吴忠交换了意见。我们讨论了对毛主席提出的第十次路线斗争应该怎样认识等问题，还考虑是否把毛主席说的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传达一下。我提出虽然毛主席没有点林彪的名字，但提陈伯达后边是谁已经很明白了，这样，是不是需要将毛主席的谈话先给市委常委或者市委书记们吹吹风，以免将来问题出来了，大家没有思想准备。但是，怎么传达呢？毛主席终究没有点林彪的名字啊！

我们两人商量到后半夜1点多钟，也没有考虑好怎么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我说，今天恐怕议不出来妥善办法了，明天再说吧。

^①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69~175页。

回到家，我就吃了安眠药休息了。可躺下不久，3点多钟，电话突然响起来，是周总理通知我立即到人民大会堂。

李德生回忆：

我们在丰台火车站专列上见到了毛主席。汪东兴同志也在座。毛主席长途南巡归来虽然一路疲劳，而且思虑着同林彪一伙斗争的大事，但他精神很好，和往常一样，谈话十分幽默。毛主席对着我说：“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你向他们要，一连说三次‘你们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毛主席指的是他们不发“天才论”语录给我的事。我在一次会上提起过，毛主席当时就说：“你向他们要呀！”他一直记得这件事。毛主席又说：“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这句话已等于点林彪了。最后毛主席要我去执行一项任务：从三十八军调一个师来南口。当时毛主席不但十分警惕，而且已作了具体部署，对林彪一伙可能搞武装政变的最坏的情况都估计到了。离开毛主席，我立即部署了三十八军一个师的调动。^①

下午4时05分，毛泽东在北京站下车，回中南海。汪东兴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总理感到诧异，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汪东兴说：“计划改了。”还说电话上不好细说，以后当面汇报。

还有一种说法：9月12日专列安全到达北京丰台的黄土坡车站。毛泽东同前来迎接的周总理会谈后，乘汽车回到北京。

毛泽东回到北京，林彪一伙加害毛泽东的企图破产。林彪决定立即转移广州，宣布另立中央。上午，林立果在北京同北戴河通了电话。下午，林立果把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王飞、李伟信等召到空军学院据点，策划南逃。林立果说：“情况紧张，我立即转移。由周宇驰同你们谈谈。”周宇驰说：“情况紧张，（毛）要动手了。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广州，要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明天到广州谈话。到那里以后，首长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中央，进行割据，形成南北朝形势。提出条件，和平谈判。”“和苏联等国建立外交关系，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

^① 熊华源、安建设编：《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第8~9页。

会后，王飞拟定了南逃人员名单。有人从仓库取来 30 支五九式手枪、2000 发子弹，两支冲锋枪、200 发冲锋枪子弹。

下午 4 点半，周宇驰在西郊机场找到胡萍，要他再准备（已有 256 号三叉戟和 703 号伊尔-18）六架飞机 13 日去广州：254 号三叉戟、902 号伊尔-18、024 号安-24、两架“云雀”直升机、231 号安-12，为林彪准备的飞机一共八架。

晚上 8 时许，林立果乘 256 号三叉戟飞机回到北戴河。^①

9 月 12 日夜，由于毛泽东提前回到北京，由于林立衡向中央报告了林彪要动作和山海关机场有架三叉戟飞机，暴露了林彪的意图，促使他偕叶群、林立果外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① 张聂尔：《中国 1971——风云“九一三”》第 290 页。

五十八 赴南方休养

1974年春天，毛泽东的视力逐步下降，看东西开始模糊起来，看书写字读文件很吃力。六七月份，毛泽东的视力进一步下降，看东西更模糊了，精神和身体都得不到安宁和休息。经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后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第二次为毛泽东专门成立医疗组，成员包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护理等方面专家。这个医疗组存在的时间持续了两年多，直到毛泽东去世。毛泽东不得不听从医护人员的劝告，决定到外地养病。

1974年7月中旬，身患多种疾病的毛泽东准备赴南方休养。他预感这次外出时间不会短，觉得需要在行前向政治局作出一些重要交代。

7月17日凌晨3点，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地开会。才做过手术不久的周恩来也从医院赶来参加会。

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用严肃的口吻批评江青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

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又说，“你也是难改呢。”他指着江青向在场的政治局成员表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指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由于江青常以毛泽东代言人的姿态出现，不少人弄不清她所说的话是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毛泽东在会上两次郑重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并且话说得那样重，点出了“四人小宗派”的问题。这是很不寻常的举动。但他还留有余地。在主要是批评的同时，毛泽东在会上也说了“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会议一直开到中午。^①

晚上，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离开北京。

21时45分，专列途经邯郸，停车休息。

7月18日早晨6时，专列继续南下。

毛泽东此次南下，目的是养病，所以一路上没有像往常那样找沿途各地党政军领导上车开会或谈话。除了添煤、加水、检修和停车休息外，几乎未做停留。

下午，专列抵达武汉。毛泽东住东湖宾馆梅岭一号。

这里依然是曲径通幽，花木扶疏，山青水秀，鸟语花香。可是在毛泽东的视觉里，已没有往日的光彩和感觉了，而是白茫茫的一片，看书看文件非常模糊、吃力。毛泽东把这情况告诉了秘书，却又不让秘书请医生治疗，也不让告诉任何人，自己硬拖着。开始也并没有意识到得的是白内障。只听毛泽东说，书房里沙发后那看书的落地台灯不怎么亮，工作人员周福明马上请人做了一个有三个灯口的落地灯，这样看书的灯泡为300瓦。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又嫌灯不亮，看起书来费劲。索性加做了一个三个灯口的落地灯。后来，毛泽东又提出不行，又加了一个落地灯，这时看书看文件的亮度为900瓦。

7月下旬，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把吕正操、杨成武等放出来，让他们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名单见报。

“八一”建军节过后，毛泽东提议召开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他说：“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要给人家机会。”^②

8月，毛泽东针对当时的形势和正在筹备的四届人大指示：“无产阶级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693~1694、1697页。

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①

同月，秘书将毛泽东眼睛的情况报告了汪东兴。汪东兴从北京、上海、成都调来了眼科专家与武汉的眼科专家一起为毛泽东会诊。经检查，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这个结果，除了身边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毛泽东不让告诉任何人，政治局委员中也只有周恩来等少数几个人知道。

这种病是黑眼珠的瞳孔位出现白色的反光，使晶状体变混浊，两眼都有，双目几近失明。毛泽东的眼病确诊后，从医学上看，没有快速见效的治疗方法。因为这种病要经过几个阶段：初发期，膨胀期，成熟期。得了这种病只能等待，成熟了才能采取手术措施。这意味着毛泽东要因此度过几百个日日夜夜。

开始时，毛泽东尚能强打精神用放大镜，在强灯光下看报、读书、欣赏字画、批阅文件。后来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了。已完全不能读书看报批文件了，也看不清他熟悉的人的面庞，甚至迎面走来的人，也看不清楚。这时，他每天仍然要处理党和国家大事，仍要阅文批文，而他又不能做这项工作了。从这时开始，只能由秘书、工作人员为他读文件，读来信，读报纸。念过的文件要处理，需要写批语，也要由他口述，由别人记下整理再读给他听，一字一句一个标点，也不能马虎，有时他还要以微弱的视力再看一遍，才放心。因此，要写成一个批语，要反复多次，才能完成。有许多重要报告，重要来信要作批示，如8月22日他签发了与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祝贺罗马尼亚解放30周年的电报。27日，又对外交部关于美议员访华团成员问题的请示报告和9月27日对陈丕显来信的批示。以前，毛泽东多次说过，他的秘书只是收收发发，起草文字从不要别人捉刀代劳，都是自己动手。白天干不完晚上干。可是现在，已力不从心了，由不得自己了。由他口授，秘书代批批语的办法很不方便，效率也不高。但毛泽东很坚强，从未表现出痛苦、悲观的情绪，尽量不使病痛感染别人。

毛泽东在武汉期间虽然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但仍然坚持工作和频繁的外交活动。

在这段日子里，毛泽东要处理大量的全国党、政、军要务，决定党和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697页。

国家的大事，因而全国和全世界的各种信息源源不断地汇集到东湖之滨来：国务院科教组等决定在学校实行开门办学；我国国产万吨轮“风庆”轮首次远航欧洲胜利归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5周年的活动；筹备四届人大以及国家机构人事安排酝酿的情况；中国与巴西、马来西亚、特立尼达、多巴哥、委内瑞拉、尼日尔、冈比亚等国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日理万机，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对后来的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有两件事，一是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二是要求全国“安定团结”。

在武汉期间，年迈体弱、视力不清的毛泽东仍应对方要求接待了五批外宾。他同这些外宾谈论国际形势，说：“我看这个世界不安宁。”“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对欧洲来的朋友，我总是劝他们要准备打仗。如果不做准备，将来要吃亏。现在讲和平，我听得一些人讲，是要争取时间。”当外宾谈到发生战争就将是世界大灾难时，毛泽东说：“灾难是要来的，但是也不是那么可怕。现在设想可怕得很，我看真要打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可怕。因为战争的目的是要占领别人的土地和人民，如果把人民都打死了，那也就没有人民了。会打一些军事目标或者小城市。美国对日本打了两个（指投原子弹），一个广岛，一个长崎。它决不打大城市，比如东京就不打，大阪也不打。”他又说，“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人怕蚊子，大国怕小国呢。”^①

外宾要见毛主席，多由邓小平、李先念等陪同，从北京直飞武汉参加会见。这提供了毛泽东同邓小平等见面的机会。外事活动后，他常常要与邓小平等交谈，了解情况，作出指示。

身患眼疾的毛泽东在武汉仍然坚持着读书生活。看书困难，他就观赏字画，请人读辞赋。

在静静的东湖客舍，毛泽东以巨大的毅力，承受着视力下降的巨大痛苦，每天观赏把玩着从北京故宫博物院借来的古代名人字画。有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卷》、唐朝阎立本的《步辇图》、韩滉的《五牛图》、明朝吴伟的《长江万里画卷》、清代长篇巨制《康熙南巡图》等稀世名画，有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东晋名书画家王询的《伯

^① 刘继增、毛磊、袁继成主编：《毛泽东在湖北》第22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694~1695页。

远帖》、唐柳公权的《蒙诏帖》、黄庭坚的《诸上座帖》、米芾的《多景楼帖》、元代赵孟俯的《胆巴碑》等名人墨迹。毛泽东用放大镜观赏着历代那些雅拙或雄健秀美的碑帖书法，那些神秘或者灿烂或淡雅的绘画名品和历代文人墨客的题记、题跋铃印等等。毛泽东一遍一遍摩挲，陶醉在灿烂的民族文化的书画艺术中。毛泽东在患眼病，视力极其模糊的情况下，坚持看了20多天，看完了30多箱古代名字画后，又原封不动地退回了故宫博物院。

除了读字画，毛泽东又请人读辞赋。在东湖客舍毛泽东常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医务人员为他朗读古典辞赋，读的多得有魏晋和南北朝的赋。

8月20日，毛泽东对李先念说：“现在是要团结、稳定。批林批孔联在一块，我看许多人对孔夫子不大懂呢。”谈到周恩来的健康时，他说：“他的身体，我是替他担心的。”^①

27日，毛泽东对外交部关于美议员访华团成员问题请示报告作了批示：“都可以来，多做工作，表示欢迎。”^②



1974年9月4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会见多哥总统。（摄影/杜修贤）

9月4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了多哥共和国总统埃亚德马和夫人及随行人员。邓小平参加了接见。接见后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毛泽东问：四届人大“今年能开吗？”邓小平说：“主要是人事问题。”毛泽东对邓小平说：“贺龙要恢复名誉。”^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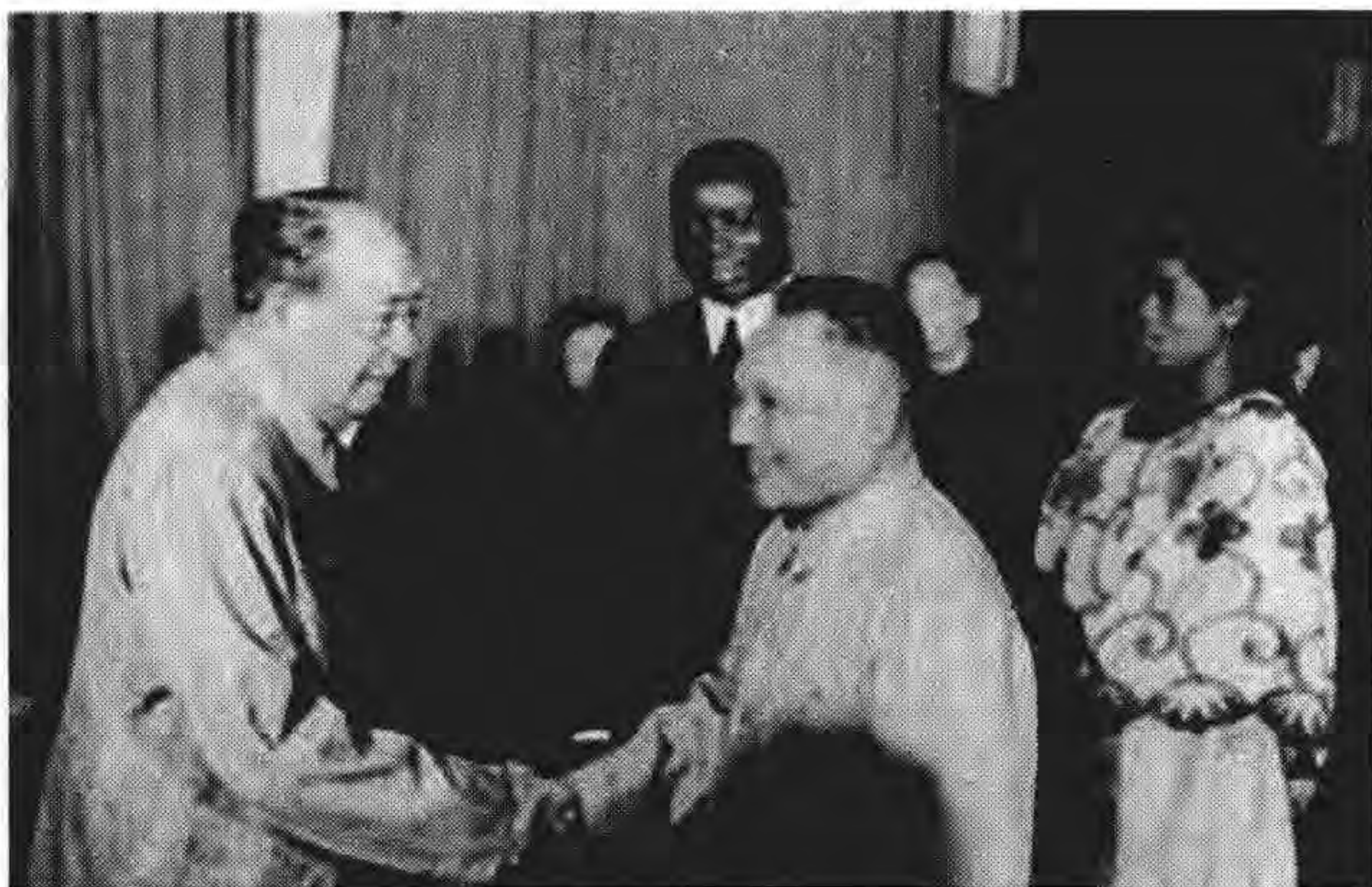
9月9日晚，毛泽东会见了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联邦军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戈翁将军和夫人等尼日利亚贵宾。李先念参加了接见。

①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695、1694、169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第403页。

9月17日，毛泽东在陈丕显来信上批示：“此人如何处理，请政治局一议，为盼！”又批：“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①

19日上午，毛泽东会见了毛里塔尼亚共和国总统达达赫和夫人及其一行。邓小平参加了接见。



1974年9月4日，会见多哥总统时毛泽东与邓小平握手。
(摄影/杜修贤)

27日，毛泽东会见了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别代表、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以及马科斯的儿子小斐迪南·马科斯。

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将参加国庆招待会见报的名单报送毛泽东，其中包括近几年没有露过面、第一次见报的老干部40多人，如胡乔木、孔原、伍修权、宋任穷、欧阳钦、林铁、孙起孟、屈武、马文瑞、张劲夫、李昌、李一氓、江一真、杨秀峰、孙大光、蒋南翔、萧向荣、刘少文、傅秋涛、王辉球、陈鹤桥、傅崇碧、薛明、范瑾等。当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念这份长达两千多人的名单稿时，毛泽东又想起一些人，如萧华、侯宝林等，提出应把这些人的名字加到名单里去。还询问商震是否已列入名单。以后，他又想到需要加上刘志坚。^②

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10月4日，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给毛泽东报告说：“十月三日晚政治局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问题，主要是讨论了是否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如主席同意年内（或春节前）召开四届人大，政治局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拟以此为中心全力准备。”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当天下午，他就要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第40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698~1699页。



1974年10月6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会见加蓬总统。
(摄影/杜修贤)

要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这个意见。王洪文没有立即向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却在当晚先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进行了通报。过了好几天才通知中央政治局和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①

10月6日，毛泽东会见了加蓬共和国总统、政府首脑邦戈和夫人一行。邓小平参加了接见。

11日，毛泽东似乎已预感到在四届人大问题上将发生一场风波。在离开武汉前夕，他圈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在这个文件里，传达了他在武汉期间所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话。后来，他又谈道：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毛泽东这些言论，隐含着打算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思。

10月12日晚，毛泽东离开武汉去长沙。

13日清晨，专列停靠在长沙火车站。

毛泽东最后一次回湖南，专列不再停在南郊大托铺机场的专用线上，而是停在城中的火车站，给了人们一个不寻常的信号：毛泽东老了？毛泽东病了？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699~1670页。

从武汉到长沙有 300 多公里路程。一路没有休息的毛泽东显得疲倦，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费力地走下专列，同前来迎候的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边握手边说：“我这一次到这里，是来养病休息的。”不谈工作，你们搞你们的事去，我不影响你们。

去宾馆途中，经过湘江岸边。已是垂暮之年的毛泽东示意停车，面对滔滔北去的江水，凝望秋色依然的山麓，沉入对往事的回忆。

这次，毛泽东又住省委九所六号楼。刚下汽车，他就认出了三年前见过的服务员郭国群、曾彩谋，念着她们的名字握手寒暄：“小郭、小曾，你们还在这里。”

为保证毛泽东在长沙的安全和休养，中央办公厅和湖南省委都作了详细安排。省委成立了警卫工作指挥领导小组。省委主持工作的第二书记张平化任总指挥，省委书记李振军和省公安厅厅长高文礼负责具体工作。

省委九所六号楼，是毛泽东爱住的地方。六号楼，其实是一座平房，位于绿树成荫的陈家山下，南面是省委接待处，北面通烈士公园，东面是省委大院，清新、幽静，透着生机活力。原毛泽东秘书张玉凤曾对笔者介绍说，九所后面的陈家山种了很多橘子树，结满金黄的蜜橘。毛主席喜欢在橘林中散步，晒太阳，有时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警告工作人员，不要打橘子的鬼主意。他对湖南省委大院的植树绿化很满意，又清新空气，又生产水果。

毛泽东这次来长沙，中央没有委托他什么工作。实际上，自他住下以后，每天都有一架飞机往返于北京长沙之间，送来文件，然后又带走他批阅的文件。

他说到长沙来“养病休息”，但他每天休息的时间很少，从夜幕降临到天明，仍然通宵达旦孜孜不倦地工作。时而批阅文件，时而翻翻带来的书籍，累了就闭目养神。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下午，他有时在房间工作，有时在台阶上，坐在圈椅里，一边晒太阳，一边听工作人员念文件、书信和报纸。在眼睛几乎失明的情况下，他用“听文件”的方式，继续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大事，倾听着国际上的风云波涛。

毛泽东在听汪东兴读《新民主主义论》时，引发了一段对党史的回顾，他说，我在湖南先建立青年团组织，接着建立党组织，1921 年到上海参加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打了六年“工”，还帮助国民党做了不少事。那

时我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还没有弄清楚。1927年，我们吃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亏，这时才认真深入研究中国问题，做了很多调查研究。从1927年到1940年，经过13年的研究和实践，才写出《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读《新民主主义论》要理解其基本观点。比如，中国革命虽然是民主革命，但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否则难以取得革命胜利；既然是搞民主革命，革命就要分阶段进行，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革命阶级专政；还有，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离开当时的实际条件。

毛泽东在长沙的生活，除了在党和国家人事安排上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以外，剩下的时间，是在养病休息中度过。他在重病之中，仍然给予湖南省工作和湖南人民以关怀，使省委负责同志和接待工作人员都深为感动。

毛泽东的饮食习惯仍保留家乡特点，也十分朴素节俭。他喜欢吃芋头、萝卜菜、烧红薯、玉米、土豆饼、菌子、肉泥、鲢鱼尾、火焙鱼等。由于保健医生的严格要求，他很少吃辣椒。

毛泽东此时牙已不太好，饭菜都要求做得烂。厨师们炖、蒸、煮，精心地将菜肴做得更适合他的口味。接待处厨师石荫祥说，有一次做水鱼给主席吃，我先把它蒸烂，把骨头去掉，然后用碗盛着连汤一起放到烧红的铁板上去烤，等汤汁黏了，再端下来送给主席吃。主席说这样好吃，以后就照这样搞。

石师傅还介绍说，主席要吃饭时，我们手脚都很快，一般在半小时之内就可以将饭菜做好，送上去。主席工作很忙、很累，我们要是稍微延误一下，主席就可能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业余时间，毛泽东喜欢看湘剧、花鼓戏、京剧的传统剧目。可是这些剧目在“文革”中除“四旧”给除掉多年，剧团都不敢演了。省委就组织湖南各地方剧团重排演出，通过电视转播，在九所播放给毛泽东看。看什么节目，由省委接待部门列出节目单，请毛泽东阅后亲自圈定，类似“点戏”。湖南文艺界和电视台就组织演出和播放。电视转播的传统戏曲《刘海砍樵》、《讨学钱》、《苏三起解》、《哭碑林》，都是毛泽东点看的剧目。由于是电视转播，湖南周围的邻近省区偶尔也能在电视中收到，于是纷纷打电话向湖南方面询问，为什么在电视中播放这种“封资修”节目，为什么搞“复旧”，是不是上头有什么新精神？湖南省委又不方便说明真实情况，只好搪塞，说是传统戏曲，古为中用，批判吸收。实际上，这种电视

转播也利于党的文艺政策的松动和调整。

后来，已调国务院工作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了解到毛泽东看电视转播节目的情况后，特地从北京调来一部电视转播车，直接向毛泽东的住所六号楼播放节目。这样，既方便了毛泽东的业余文娱生活，也避免了再造成外界影响的问题。毛泽东又看到湖南地方戏传统剧目和熟悉的演员的表演，很高兴，说：“虽观旧剧，如阅新篇。”

毛泽东 81 岁高龄，不但年老体衰，而且国家政治生活上也有些壮志未酬之事缠绕着他，国事政务他原本事必躬亲，如今也托付给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去处理，这对于一生奋斗不息的毛泽东来说是一种难言难诉的痛苦和折磨。在这样的晚年和苦痛的心境中，毛泽东布置有关专家和工作人员排印注释了许多古代文学作品，供他读，供他听，并准录了一些古诗词的曲子唱片，以取代“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歌功颂德的新歌，使毛泽东郁闷的心态得以舒展，疲乏的精神得到安慰。

在故乡长沙长期休养，换了一种政治环境和自然环境，他身心得到清静和休息，心平气和多了，但读、听古代作品的大字本，社会、时事、历史的时常勾动，仍能激起他的感慨。

在长沙休养期间，毛泽东的思维似乎格外清晰，他能够静下心来想许多问题。比如在四届人大代表的选举问题上，毛泽东亲自提名加上了一批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不可能中选的人物。中国一代青年的榜样董加耕，“文革”中遭到冲击，下放到家乡干农活，无人问津。可是毛泽东想起了这位他接见过并同桌吃过饭的、读了几年书，“在农村有这么多文化可办点事”的年轻人。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具体查问了董加耕的下落，补选其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上京开会，议事参政。^①

10月14日，毛泽东刚到长沙，就发生江青等策划的“长沙告状”事件。江青从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国产“风庆轮”的报道，立刻写下大段批语，向国务院及其所属交通部门提出质问，称：“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王洪文、张春桥、姚

^① 夏远生、马娜：《毛泽东的三湘情结》下，第629、631~632、636~637、651页。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202页。

文元、康生等都表示“完全同意”。他们借题发挥，想通过“风庆轮事件”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人。其背景，是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对江青的蓄意挑衅，周恩来、邓小平不予理睬。在江青要求政治局成员传阅的批件上，周恩来、邓小平没有作一个字的表态。这使得江青等十分难堪。

10月15日清晨，毛泽东回到湖南的第三天。按生活惯例，毛泽东一般通宵工作，上午休息。可是一大早，他忽然心动，踱出卧房，径直朝六号楼前的空坪走去。紧跟慢跑上来的秘书问他上哪儿？他脱口说，到橘子洲头看看。

服务员曾彩谋回忆：

毛主席突然要去橘子洲，我们一阵忙，都不知道老人家大清早去橘子洲干什么？一辆拉起浅色窗帘的轿车，悄无声息地驶出九所，驶出省委后门，上了林荫大道迎宾路。轿车缓缓驶向清水塘、小吴门、老火车站、五一广场、湘江，都是他年轻时熟悉的地方。

轿车驶上湘江大桥。服务员告诉毛泽东，湘江大桥只用一年时间就修好了。去年，省委领导曾把湘江大桥的照片拿给毛泽东看，说有多宽多大，毛泽东却说，什么湘江大桥，应该叫湘江小桥才对。今天亲眼看了湘江大桥，他感到够大了。

轿车在橘子洲水陆寺遗址停下来。毛泽东很想下车走走，但是天气很凉，工作人员极力劝阻。他只能拉开窗帘，透过车窗，近观他魂牵梦绕的湘江水、橘子洲，远眺那若隐若现的过去熟悉的地方，河西的岳麓山，河东的第一师范。在橘子洲头已经建起一块高大的诗碑，镌刻着毛泽东手书的《沁园春·长沙》。

81岁高龄的毛泽东，困坐车中，意会当年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一种若有所失又有所思的神情。许久，他说了一声：“回吧！”^①

16日晚，毛泽东在观看湖南电视台的现场直播文艺节目以后，对省委领导同志说：希望把彩色电视发展起来，让更多的人看到电视。^②

毛泽东在长沙，多次圈定观看湖南电视台转播文艺节目。

时任省委文教书记的李振军回忆说，毛主席在湖南时，如听说某某老革命家去世，就点名要看电视转播的戏曲《哭碑林》，表达对老战友的哀

^{① ②} 夏远生、马娜：《毛泽东的三湘情结》下，第630、640页。

思。湖南的电视转播工作，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并说，湖南也可以搞个电视台嘛。省委一鼓作气，把湖南电视台和潇湘电影制片厂搞起来，把湘潭大学也恢复了，省委派我兼校长。^①

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利用所谓“风庆轮事件”，刁难主持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江青在会上指责进口船只是“崇洋媚外”，要批“洋奴哲学”，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并逼邓小平当场表态。邓小平认为应该调查清楚，严正地抵制了江青。江青等人胡搅蛮缠，政治局会议无法进行。邓小平拂袖而去。张春桥煽动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这件事就发生在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后十多天，格外引人注目。^②

当晚，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17号楼密谋。因为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偕夫人将于翌日抵京访问中国，邓小平副总理将陪同他们飞往长沙拜会毛泽东。江青等人意识到这是一个关键而急迫的时刻，如果能赶到邓小平之前向毛泽东提供不利于周恩来、邓小平的材料，先入为主，迫使毛泽东改变10月4日的电话意见，就可能阻挠周恩来、邓小平出任国务院总理、第一副总理。于是，江青等人商定派王洪文赶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趁机告状。^③

18日清晨，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工作中和其他工作中碰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在筹备四届人大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内部有争论，这些争论也未公开化，但在别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矛盾已经表面化。”“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取主席的指示。因为书面一时谈不清楚。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信的最后又说，“附江青同志的三份材料。”毛泽东一看，早已明白是怎么回事，十分不满。^④

当日上午，王洪文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飞赴长沙。

下午2时，毛泽东在住所接见了飞来长沙的王洪文。

王洪文一见到毛泽东，便称这次是“冒着危险来的”。他按照同江青等商量好的口径，诬告北京现在大有1970年庐山会议的“味道”。他还说，

① 夏远生、马娜：《毛泽东的三湘情结》下，第641页。

②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02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04页。

周总理虽然有病，但还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频繁来往，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听王洪文讲完后，毛泽东立刻严厉地批评道：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①

毛泽东加重语气强调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总理、委员长、前面的一二三届人大都由我定，其他人选由总理定。

晚上，碰了壁的王洪文返回北京。

当天，江青去钓鱼台10号楼，召见即将随邓小平陪外宾去长沙的中央候补委员、外交部部长助理唐闻生和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要她们在毛泽东面前再奏周恩来、邓小平一本。唐闻生、王海容当时根据毛泽东的安排，可以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很受毛泽东的信任。晚上，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又联袂出马，再次对唐闻生、王海容二人详细论说，指责国务院领导“崇洋媚外”，造成国内财政收支和对外贸易中出现逆差；诬蔑邓小平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的抵制是又一次“二月逆流”。^②

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哈特林首相和夫人等丹麦贵宾。唐闻生、王海容随邓小平陪同丹麦贵宾到长沙。会见结束后，毛泽东特意单独喊住要出房间的邓小平，问北京最近有什么事，邓小平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北京没有什么事。毛泽东便没有多谈。而王海容、唐闻生则单独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这几天发生的情况，并表示了对江青等人做法的不满。

毛泽东听后很生气，对江青的为所欲为感到愤慨，他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情，而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他赞成邓小平敢于针锋相对地顶江青。毛泽东让王海容、唐闻生向中央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跟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他说，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毛泽东建议：“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毛泽东说，“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样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二把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04页。

^② 夏远生、马娜：《毛泽东的三湘情结》下，第653~654页。

手)再考虑。总之,方针要团结,要安定。”^①

毛泽东决意要委邓小平以重任和屡屡批评江青等人的信息传回北京以后,使重病中的周恩来深受鼓舞。

10月20日至1975年1月16日,邓小平四次陪同外国客人飞到长沙,会见毛泽东。当时为了保密,外宾乘坐的飞机往往在天上盘旋几圈,谁也不知道是降落在长沙。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放映的《新闻简报》,一般有车队驶进北京新华门的镜头,给人的印象是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外宾。邓小平先后陪同丹麦首相哈特林、也门主席鲁巴伊、扎伊尔总统蒙博托、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来长沙会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多次会见了邓小平并进行了交谈。

22日,毛泽东就干好秘书工作和工作人员谈话。毛泽东说,其实做我的秘书也难也不难。不难的是,我不需要你们写东西,只管收收发发。难的是要守纪律。做秘书,可以看中央给我的文档,而汪东兴、张耀祠他们不能看,包括我的家人也不能看。还有,不要以为当了我的秘书就可以指挥一切了。不要得意忘形,要知道自己为谁工作,代表谁办事。还有,做秘书工作要谦虚谨慎,要多学习,每天除了收发文件,还要看材料,特别要看新华社编的那两大本《参考数据》和《参考消息》。通过这个窗口,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坚持下去,就能看出些问题了。^②

10月底至11月,北京中医院名老中医赵炳南教授和他的高徒袁兆庄医生,按照中央保健局的安排,前来长沙为毛泽东医治皮肤病。毛泽东披着蓝条睡衣走出卧房来到客厅,露出患病部位对赵医生打趣道:“你看,我是体无完肤,请郎中医治。”毛泽东因为常年重病,卧床时间久,得了全身皮肤搔痒症。这种病很顽固,又十分痛苦,痒起来深夜也难以入睡,这对于81岁的老人来说是一种烦恼和折磨。赵医生决定采用中西医药结合诊治的办法,内服中药调理,外敷中药膏,同时配合使用一些西药。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毛泽东的皮肤病得到抑制,基本痊愈。毛泽东对赵医生的医德、医术十分赞赏,笑着说,你这个郎中是几品官啊?赵医生也很幽默地回答:清朝以前讲几品官儿,现在不讲这个了,我是为人民服务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704~1705页。

^② 夏远生、马娜:《毛泽东的三湘情结》下,第632页。

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连声说很好，很好！^①

11月，湖南编排的《园丁之歌》，被江青定性为毒草，《人民日报》在头版批判，国务院文化组也发通知要组织批判。湖南省委有意在毛泽东调看文艺节目时，把《园丁之歌》列入节目单中，毛泽东对现代戏也很有兴趣，便圈定要看。省委马上组织专场放映这部影片。毛泽东是坐在六号楼客厅里，在沙发上同服务员一道观看《园丁之歌》电影的。也许对演员左大玢还有印象，也许对剧的内容很感兴趣，毛泽东看得很仔细，也看得很开心，随着剧情的进展，精彩之处，他甚至带头鼓掌，连声称好。身边工作人员告诉他这是遭受批判的“毒草”片，毛泽东大为不解，追问为什么受批判？错在哪里呀？服务人员也讲不出到底哪儿有毒，毛泽东便问其他工作人员，为什么批判？你们讲讲看，有什么问题？工作人员都说报纸上在批判，到底错在哪里，看不出来。毛泽东微微一笑，讲出自己的观感说：“我看是出好戏。”说完，他继续观看，也继续微笑，继续拍巴掌。

江青知道毛泽东为《园丁之歌》说好话，极为恼火，说这是政治谣言，要追查，并归咎于湖南省委领导同志。湖南省委的两位书记面对江青的淫威，仍然坚持说，主席看了这出戏，主席说是好戏。省委是按主席的指示办事。^②

11月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有关四届人大准备工作情况，表示：坚决执行毛泽东10月20日的指示，“人事名单估计11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的人选”；“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当天，毛泽东在信上批：“已阅。同意。”^③

当天，毛泽东会见了威科斯总理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贵宾。主管财政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陪同外宾来长沙，会见结束后，毛泽东让李先念留下谈话。

李先念向毛泽东如实汇报了全国工交战线和国家财政方面的情况：国

① ② 经夏远生、马娜：《毛泽东的三湘情结》下，第643~644、638~639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05~1706页。

民经济状况不佳，生产下降，财政收入减少。在汇报中毛泽东指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李先念也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他讲到：“小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

毛泽东说：“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

李先念说：“我们坚决不动摇地执行主席要安定、团结的方针。”

“开一个会，问题就完全解决，不可能。”毛泽东说，“王母娘娘就不听呢！”

李先念说：“她的帽子公司多一点。”

毛泽东说：“钢铁公司厉害呢，又开帽子店。她这个人，别人心里不高兴她。”“非跟好多人闹翻不可。她是目中无人。”“此人的话不能全信。”“我三年来只请她吃了一顿饭，现在又是四年了，一顿饭都没有请吃。总之，我在政治局交代了，政治局都知道，清楚了。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要搞。”^①

12日，毛泽东会见了鲁巴伊主席等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贵宾。会见后毛泽东同邓小平谈了话。

毛泽东问起10月17日邓小平愤然退场那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

毛泽东：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主席也知道了。

毛泽东：好！

邓小平：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泽东：我赞成你！

邓小平：她（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泽东：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指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都不高兴。

邓小平：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这个好。

邓小平：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706页。

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泽东：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啰。^①

11月12日，江青亲自写信给毛泽东，提出自己的组阁名单，指名要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培养。

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毛泽东的这些批语，由于眼睛看不清楚，写得歪歪斜斜，有些字还重叠在一起，难以辨认，但他是十分郑重地对待的。^②

14日，毛泽东在九所接见完成了治疗任务的北京来的内科、外科医生，说，见见你们，你们回去好，参加临床实验，不要脱离临床，这是正确的，你们的工作是好的，帮了我很大的忙，成绩是九分，缺点是一分（边说边用无名指示意），不足就不说了。^③

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在路线斗争起伏时我主动的做过一些工作。”“今后当小心谨慎，不能为党为主席闯祸。当然，需要斗争需要牺牲时，我要有精神准备。”

第二天，毛泽东在她的信上批道：“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至嘱。”^④

当天，毛泽东就布置了新排大字本《后汉书·李固传》和《后汉书·黄琼传》的注释任务。《黄琼传》中：“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李固传》中“表曲者景必邪，源溥者流必繁”都是毛泽东用来告诫江青的。^⑤

11月至12月，由于毛泽东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二把手还在“再考虑”中，江青又托唐闻生、王海容再去长沙时向毛泽东转告她的意见：由

①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694、1706~1707、1708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708 页。夏远生、马娜：《毛泽东的三湘情结》下，第 656 页。

③ ⑤ 夏远生、马娜：《毛泽东的三湘情结》下，第 643、658 页。

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毛泽东听后立即揭露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毛泽东托人转告周恩来：在已经拟定的人大常委会的主要领导人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可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安排由周恩来主持商定。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江青等人不但不能“组阁”，也不能担任党中央和全国人大的主要领导人。^①

这些日子里，毛泽东的健康状况继续下降，“步履蹒跚，行动艰难，他那两腿和双脚浮肿得像发面馒头，没有人搀扶就走不了路”。虽然疾病缠身，毛泽东仍想到湘江中流击水。湖南省委认真考虑了毛泽东的要求，但鉴于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先安排他在湖南省体育馆的游泳馆游泳，由省体委主任张德隆负责接待。

11月19日下午，毛泽东去湖南省体育馆的游泳馆游泳，游了30分钟。

起先，毛泽东的这一活动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后来，他的这一活动被半公开。他的身边工作人员，包括省委接待处的服务人员，都能随他一



1974年，81岁的毛泽东在长沙游泳馆游泳。

起去游泳馆游泳，在一旁为他助兴。有一次，接待处专门为毛泽东做饭的石荫祥师傅也去了。石荫祥说，毛泽东在游泳池里，自己上下梯子，不用人搀扶，游泳时，时而仰泳，时而侧泳，还踩踩水，游得很高兴。当时游泳馆没有加温设备，青年人冬天游泳都打哆嗦。毛泽东在11月至12月的寒冷天气里，兴致勃勃地多次到省游泳馆游泳。他还邀从北京来给他看病的老中医赵炳南下水一游，赵医生连连说怕水，毛泽东激励他，说只有水怕人，没有人怕水。在游泳馆游了几次，毛泽东不过瘾了，提出要到湘江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708~1709页。

中去游泳。当然，省里是不会给他安排的，陪他在长沙养病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也不敢答应。

能够到游泳馆游泳，对年迈体弱的毛泽东来说，已经是难得的体育运动了，游泳使他感到精神振奋，些许找到青春华年的感觉。

11月20日，毛泽东对外交部《关于与基辛格会谈方案的请示》作了批示：“叶帅已多次见基，我应邀请美国防部长来访。请酌。”^①

当日下午，毛泽东再次到省体育馆游泳馆游了45分钟。

12月3日下午，毛泽东到省体育馆游泳馆游了30分钟。

12月4日下午，毛泽东到省体育馆游泳馆游了35分钟。

12月5日下午，毛泽东到省体育馆游泳馆游了35分钟。

5日这天，毛泽东慢慢地划着水，显得很疲劳，动作也有些勉强，轻轻地对陪同他游泳的警卫队长陈长江说：“长江，我浑身没劲，手和腿也发软，看来，游泳也困难了。”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使陈长江感到震惊。这成为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游泳。

17日，毛泽东会见了蒙博托总统等扎伊尔贵宾。接见后，毛泽东同邓小平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邓小平说：“四届人大正在搞名单，20日可以完成，准备先送给主席看了以后，总理和洪文来一下。”

毛泽东说：“可以。”

谈到《政府工作报告》时，邓小平说：“工业十年来增加了一点九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点几，这个数目还可以。”

谈到对外合作和贸易时，邓小平说：“当然，我们什么也不搞，也可以发展，但是速度慢些。现在国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范围，都是取长补短，包括美国。”“以后国际环境可能还能争取到五年，主要是美国不敢打，铺得很开，苏联很集中。”“我们要利用这五年时间，不能耽误。”“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有稳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够发号施令，大家都听，当然要发得对。这么大的国家，都靠中央不行。”“现在下边议论，大家不安，大家感到乱哄哄的。比如，搞科研的绝大多数没有做什么事，不是说群众不要求工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第406页。

作，是没办法。旷工不是个别的，少数的，而是相当大量，但这并不等于工人群众对现状满意。”

毛泽东说：“要先念、余秋里、你合作。”

邓小平说：“这个不成问题。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我看。主席讲，八年了。这里面包括怎样帮助省委树立威信。”

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①

12月21日，毛泽东对反映刘景范情况的来信作了批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于追究。”“送汪主任酌办。”^②

12月23日，周恩来、王洪文，专程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并商定若干重大事项。王洪文避开周恩来先行单飞长沙。周恩来另乘一架飞机相继抵达长沙。毛泽东当天就接见了周恩来、王洪文。

周恩来：知道你眼睛不好，身体怎么样？

毛泽东：身体还可以，眼睛也没有事，只等它成熟了。又说，你身体不好，还让你到我这里来，又是坐飞机来。

周恩来：我有些事，还得请示你，我不来，怕有些事说不清，我也不放心。

毛主席指着沙发，让总理坐下，说：来，慢慢谈。

周恩来转达了中央各同志对毛泽东的关切和祝愿。

毛泽东当时身体状况不佳，病情时有反复，所以他对周恩来说，明年一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我吃饭、睡觉还好，游了五次泳。就是讲话、肺、腿。毛泽东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腿。毛泽东身边茶几上放着准备好的纸笔，代言用的，说着说着他就会用红蓝铅笔写一两个字，以帮助自己表达意思。毛泽东风趣地用湖南方言说，脑壳好，肚子好，就是腿不行了。

周恩来听后，立即蹲下身撩起毛泽东的裤脚，用手按按他的下肢问：有没有浮肿啊？

毛泽东问总理：你的病怎么样？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709~1710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卷，第 412 页。

周恩来简要地报告了病情，说：不要紧，开四届人大没有问题。

毛泽东知道周恩来是在硬挺着。他对周恩来说，老了，人老百病生。明年一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以后，你安心养病吧。你可以到外边走一走，像汉口、长沙。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吧！

对王洪文，毛泽东则比较冷淡。

据有关记录，这一天毛泽东就以不容置辩的口气对王洪文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

毛泽东说，这次你们来，谈两个问题，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

这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王洪文谈的是人事安排。

关于邓小平，毛泽东说，他政治思想强。（毛泽东指指脑袋，然后又指指王洪文）Politics（政治）比他强！王洪文听不懂 Politics 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说，他没有邓小平强，边说边在纸上写了一个“强”字。

周恩来汇报到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插话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说着，又在纸上写下“人材难”几个字，周恩来领会了，讲出“人材难得”这个词，毛泽东便把笔搁下了。

毛泽东又强调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关于副总理人选，当周恩来念到：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毛泽东插话：说了一个“陈”字，即陈锡联。

当谈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时，毛泽东说到邓颖超，周恩来解释后，毛泽东没有再提意见。他还嘱咐“问候郭老”（指郭沫若）。^①

12月24日，毛泽东再次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多住几天。你们两位在这里，让邓小平在北京管事。”

周恩来说，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作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又提出，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他问周恩来：“江青

^①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226~227页。夏远生、马娜：《毛泽东的三湘情结》下，第660~66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11、1712页。

为什么反对邓小平出国？”又告诉周恩来，“她说张春桥恐怕有点才干。”

周恩来讲到设想的总政治部主任的三个人选时，毛泽东笑着说：“罗荣桓。”罗荣桓早已去世了！毛泽东这样说无非是表示总政治部主任现在还没有合乎理想的人选。^①

12月25日，毛泽东又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

在这次谈话中，王洪文又一次透露了他们一伙要权的野心。毛泽东当即严厉批评了他。

毛泽东说：“‘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这个概念，并且是向政治局正式提出来的。

1973年底，王洪文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在中央读书班作过一个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报告，在湖南广为传发，造成极坏的影响。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到长沙后，负责省公安厅工作的高文礼向他反映湖南传发王洪文的这个报告，周恩来让人找来审看后，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对王洪文进行非组织行动，在中央读书班作这样的报告，进行了严肃批评。

“文革”开始以后，江青深为掌握不了“枪杆子”而不安，提出造反派要武装。借机对民兵进行改造。各地纷纷成立了民兵指挥部，成为帮派活动的基础。10月18日，王洪文来长沙，还曾向毛泽东推荐上海在“文攻武卫”基础上建立民兵指挥部的“新经验”。他还指责湖南的民兵工作搞得不好，要湖南派人去上海学习。在他的鼓动下，一些帮派人物活跃起来，造反夺权，要成立民兵指挥部。他们纠集一些人来长沙，窜到省委聚众闹事，扬言要占领省委大院。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省委采取措施，首先加强了对与省委仅一墙之隔的九所的警卫力量。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当着王洪文的面向毛泽东汇报了上述情况。毛泽东说：“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对湖南造反派在组织“民兵指挥部”，准备冲击省委机关，毛泽东责令在全国解散这类组织，以稳定大局。

毛泽东在谈话中，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重申了1971年视察南方在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11页。

长沙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责令王洪文几个人“都要作自我批评”。特别是对王洪文几番替江青、张春桥代言，毛泽东非常不悦，当面批评说，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给我！

王洪文惶恐地连连点头称是。当王洪文走出毛泽东住室时，他的秘书廖祖康发觉王洪文变得闷闷不乐，双眉紧皱。

在长沙，王洪文受到毛泽东毫不客气的严厉批评，不得不按毛泽东的责令写了一夜检讨。回北京后他把检讨锁在抽屉中，抱着侥幸心理希冀毛泽东不再追问此事，以便就此过关。谁料想后来身败名裂时竟被专案人员搜出来，成为他的一份绝妙的自供状。^①

12月25日，周恩来此次来长沙，原定三天。按预定行程，周恩来去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言犹未尽，挽留周恩来再在长沙住三日。周恩来从毛泽东住处出来后，高兴地对工作人员讲：好了好了，毛主席批准我再住三天。^②

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工作人员早早地将毛泽东的住所认真地打扫了一番。并采来毛泽东喜爱的蜡梅和白茶花，点缀在客厅里，茶几上还摆上毛泽东家乡特产：一盘灯芯糕，一盘交切糖，一盘寸金糖，一盘麻花条。远道而来商议四届人大事宜的周恩来，和盛情的湖南省委工作人员，悄悄地为毛泽东过在湖南的这个生日。

这天，毛泽东走出卧室，走到会客厅，看到案上摆了自己喜爱的蜡梅和白茶花，便会心地一笑。他显得愉快，慢慢走过去，从花瓶里取出一枝蜡梅，闻了闻，然后又轻轻地插回原处。工作人员请他品尝家乡的点心，他拈起一根灯芯糕送到嘴里，吃了一筷子长寿面，抿了一口芙蓉酒，然后指着酒瓶，要大家喝完，不要浪费了。朝鲜金日成首相送的苹果、葡萄，菲律宾马科斯总统送的芒果，他都赠送给工作人员一饱口福。

中饭，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照多年来的规矩，吃面条，叫长寿面，以表达他们的衷心祝愿。他们也给毛泽东送去一碗面。据说，工作人员为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711、1715~1716页。夏远生、马娜：《毛泽东的三湘情结》下，第662页。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231~232页。

②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230页。

了庆贺毛主席生日，特意挑选了一瓶湖南出产的白酒“仿茅台”请毛泽东品尝，毛泽东拿起装酒的白瓷瓶看了一眼，浅浅地尝了一口酒，说这酒很好，是取白沙古井的水酿造成的酒，质量和味道都不错，叫“仿茅台”不好，叫“白沙液”好了！于是，这种长沙酒厂新出品的白酒便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取名为“白沙液”。

26日下午，周恩来把湖南省公安厅厅长高文礼找到自己的住处，对他说，毛主席生日到了，我请大家吃餐饭，一起高兴高兴，不叫为主席祝寿。你去通知省委负责同志，安排一下。傍晚，张平化等省委负责人、湖南省委接待处的工作人员，应邀来到周恩来在蓉园的住处聚餐，为毛泽东祝寿。一共开了两桌。周恩来平时生活十分俭朴，用餐从不超过四菜一汤，为了表示给毛泽东祝寿的意思，他破例请厨房多加了几个菜。按照周恩来的交代，这两桌酒菜由他掏钱。席间，周恩来不时和省委同志谈工作，并鼓励工作人员，要他们照顾好毛主席的生活，让主席休养好，保证主席的健康。周恩来抱病饮了新命名的白沙液酒，举杯说：“同志们，为主席的健康长寿干杯！”^①

26日，毛泽东打发王洪文参观韶山，晚上，约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直到次日凌晨。这也是相处近半个世纪的这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深谈。

长谈的全部内容已无人知晓。据周恩来说，谈话涉及两个方面：“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

两位老战友商议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对中央各主要负责人的优缺点作了认真的分析和议论。最后商定了四届人大人事安排。

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毛泽东再次强调：“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重申了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

毛泽东还就在全中国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作了三点重要部署：

一是制止武斗、反对派性，加强对民兵武装的统一领导；

二是解放干部，在四届人大以后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受监护的干部问题，把他们解放出来；

^① 夏远生、马娜：《毛泽东的三湘情结》下，第644~646页。

三是释放战犯，把“国民党那些战犯放出来”。

关于江青，毛泽东说：“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政府（组阁）。”江青的工作是看资料，研究国际国内问题，然后提出意见。对江青当然可以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第十一次路线错误”攻击周恩来就不对了。周恩来建议，这一条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在政治局就不提了。毛泽东表示同意。

关于批林批孔，毛泽东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他说，批林容易批孔难。世界上的事，说起来难，做起来并不难。现在四书五经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早打倒了，关云长是武圣也早打倒了。他表示：“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提出江青应该作自我批评，要王洪文写出书面检查。

周恩来说，在一二月份，江青下达那些指示，开了那样的大会，我们也有责任，政治局没有认真讨论，所以主席离京前约政治局同志谈话时，我说过有些事是我们“怂”起来的。

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说，越讲缓和越备战，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而是强调备战紧张，各国人民对此事要有所准备。要弄清苏联对我试探的真正意图。他问周恩来，如果勃列日涅夫要来谈，应该怎样？周恩来说，如果他真想来谈，可以考虑，但我们不能去请他。毛泽东表示同意。

毛泽东说，要把十届二中全会开好，把四届人大开好。不要受他们“四人帮”的干扰，也不要安排他们做什么，他们闹他们的，你做你的。

在周恩来后来整理并由中共中央印发的谈话要点中，毛泽东对“理论问题”主要讲了以下看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

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这篇谈话,后来被称为“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在党中央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前,毛泽东对周恩来整理的谈话稿作过个别文字修改,并送全体政治局成员传阅。^①

12月27日,周恩来、王洪文再次见毛泽东。

临别时,王洪文又提出江青的任职问题。他对毛泽东说:“现在政治局里没有分工的不多了。登奎有国务院,还管组织部、中联部。文元管出版、宣传。春桥管党务、五卷。只有江青同志没有分工了。”毛泽东冷淡地回答:“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读《参考》(指新华社编印的《参考数据》),两本。我也是啊。”谈话到此结束。^②

当天,周恩来回到北京,亲自整理出毛泽东的谈话要点,分别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关于毛泽东对江青和“四人帮”的批评,周恩来在常委会上正式传达,还在会前先对江青本人谈了。

12月30日,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指示的第二天,江青写信给毛泽东说:“昨天晚上政治局开了会。会上由总理、洪文同志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和对我的批评。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和批评。”“我希望人大之后离开北京,更希望能看到毛主席。我低温很久了,脑力有突变的危险——一切都遗忘。”^③

1975年1月1日,长沙天色阴沉,寒风伴着小雨。为了使毛泽东在除旧迎新的这一天能过得愉快,工作人员对六号楼作了一点小小的布置。他们在门上贴上“爆竹一声除旧岁,梅花万点迎新春”的大红对联,为新春佳节增添一分喜庆的色彩。然后,他们破例为毛泽东燃放了一挂浏阳鞭炮。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714~1715页。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235~236页。夏远生、马娜:《毛泽东的三湘情结》下,第665页。

②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711、1712页。

周福明回忆说，放不完的鞭炮烟花，他们带回北京去，后来又为毛泽东放过一次。

长沙的天气不好，放鞭炮时毛泽东不便出户观看，工作人员便打开门窗，让他就坐在客厅里向外观看。

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每天早、晚总是由人搀扶着沿门前草坪散步。虽然已是步履维艰，但他仍习惯地边踱步、边吸烟、边沉思。思绪集中时，便停住脚步，一言不发地静静地想事情。这时，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再讲话，以免打断他的思路。时而他还要求坐车巡行长沙市内。但对视力微弱、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已只能以心去感受这块熟悉的土地了。

1月4日，毛泽东在江青12月30日来信上批示：“江青：不要来看我。有病文件可以少看。我已印两部文学史（指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两册），暇时可以一阅。”^①

当天，李德生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请求免除他的党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当天，毛泽东即在信上批示：“德生同志，同意你的意见。至于错误，改了就好。”^②

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③

7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要钱，信却写给机要秘书张玉凤。毛泽东对江青要钱这件事斥之为“为自己准备后路”，不屑一顾。^④

8日至10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9日，周恩来打电话到长沙，请示毛泽东还有什么话要向二中全会讲，并表示“自己打算在二中全会结束时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劝总理不要讲，并指示二中全会闭会时由总理传达主席的指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全会闭幕时，周恩来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还是安定

①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712、1716 页。

② 夏远生、马娜：《毛泽东的三湘情结》下，第 671 页。

④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 240~241 页。

团结为好”的意见。^①

当天，毛泽东会见了明托夫总理等马耳他贵宾。

1月13日至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时间持续五年之久，中间几经波折，实在来之不易。这次会议取得两方面的重要成果：

一是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1964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报告》，是毛泽东委托邓小平代重病中的周恩来主持起草，最后经毛泽东、周恩来审阅定稿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排除“四人帮”的种种干扰，要求把“四个现代化”作为重点来写，以便与三届人大的提法相衔接。这也是整个《报告》的精髓。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所在。

二是产生了以朱德为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为副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一大批富有治国经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四届人大闭幕以后，周恩来在他先后召集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宣布：“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他还向与会人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的评价。^②

16日，毛主席会见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和夫人等贵宾。邓小平以新的身份陪同外宾到长沙，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并委以重任。

四届人大开过不久，江青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对几乎所有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都骂了一遍。她还要王海容、唐闻生两人向毛泽东报告她的看法。毛泽东得知后，对王海容、唐闻生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王海容、唐闻生问：“你呢？”毛泽东说：“不在她眼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716~1717页。

里。”他接着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①

1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毛主席已圈阅”的《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禁止在派性活动的地方成立“民兵指挥部”之类的机构。重申党对武装力量和民兵组织的集中统一领导，使王洪文等人妄图进一步强化“第二武装”、利用民兵力量向党中央讨价还价的梦想未能得逞。

1月23日，在大局既定、大势已去之下，江青不顾毛泽东月初“不要来看我”的批示，出于内心膨胀不止的野心所驱使，硬着头皮独自飞往长沙。

江青住进湖南省委蓉园二号楼，虽与毛泽东所住的九所只隔一个省委大院，近在咫尺，却如远距天涯。江青找不到什么高明的理由去见毛泽东，只好是以探病的名义，带来了一些毛泽东喜欢吃的玉米、小米、花生和水果，待了两天才到九所六号楼毛泽东住处去。一见毛泽东，她便谎称是来看主席的，带来了自己种的花生请主席尝尝，说想去主席的家乡韶山看一看。毛泽东洞晓她的真实来意，看不惯她的虚伪做作，表示：“对你的意见，我已写信告诉你了。”接着，重复了过去批评她的话：“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斥问之后，不再理会。江青在长沙待了五天，终于不敢向毛泽东亮出心中的真实想法，只好悻悻地返回北京，徒劳往返一趟。^②

25日，邓小平在总参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

26日，叶剑英写信到长沙，向毛泽东建议新组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增补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等为常委。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央发出1975年3号文件，建立健全了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进一步加强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为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提供了有力保障。

当天，毛泽东应工作人员的要求，同大家分别照相留念。毛泽东由秘书和服务人员搀扶着，来到六号楼前的坪里，毛泽东首先招呼一直在他身边工作的郭国群、曾彩谋，接待处负责人肖根如，以及张玉凤一起照了合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17页。

^②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24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18页。夏远生、马娜：《毛泽东的三湘情结》下，第669页。

影。然后，毛泽东又和全体工作人员一起合影。

在长沙，毛泽东基本上过得较舒畅，加上工作人员的悉心照料，他体重比来时略有增加。但有时也很烦闷。陪他在长沙休养的汪东兴后来谈到这段日子时说，那时候，大事既多又乱，准备四届人大，配备领导班子，接待外宾，“四人帮”向党、向主席伸手要权。主席原是去休养，治疗白内障，期望身体康复后再去动手术，可是“四人帮”还去干扰他。在这些岁月里，主席心情是很沉重的。

毛泽东心中，此时还牵挂着周恩来。为筹备和召开四届人大，日理万机、过度操劳，周恩来的病情恶化了。有关他的病情报告不时送到长沙。毛泽东总是要机要秘书马上念给他听。听时，他默默无语，心中为老战友担忧、难过。2月2日，机要秘书给躺在床上的毛泽东念周恩来的病情报告，说周恩来每日便血。毛泽东听完后，非常伤感，费力地一字一句地对机要秘书说：“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情况怎样了。”机要秘书马上按他的意思给总理值班室打了电话，询问了周恩来的病情和饮食起居情况，并转述了毛泽东的亲切问候。这时，毛泽东才稍微安心，在病榻上吟诵着张元干的《贺新郎》词：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①

2月2日，毛泽东在长沙批准周恩来关于国务院正副总理分工问题的意见，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宣布了毛泽东批准的这一国务院副总理分工方案，并再次传达了毛泽东在长沙对邓小平的高度评价。周恩来对国务院几位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等14位同志说，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12位。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②

2月3日（春节前八天），清晨一觉醒来，毛泽东突然决定离开长沙。

理由很简单，他不愿使繁忙工作了114天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住在长沙而过不好这个春节。

^① 龚固忠、唐振南、夏远生主编：《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242页。夏远生、马娜：《毛泽东的三湘情结》下，第672~673页。

^② 夏远生、马娜：《毛泽东的三湘情结》下，第675页。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本想再去离这里不远的家乡韶山看看，拜访一下父老乡亲，到父母墓前再祭扫一次。韶山有关部门也已做好接待准备。但出于健康的原因，毛泽东没有能够如愿。他临走时对大家说：“我在长沙住了一百多天，你们已经很辛苦了。‘客散主人安’。我走后，你们好好过个春节吧！”^①

3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离开长沙，一路东进，到达江西省会南昌。他在这里停留了三天。

2月5日，毛泽东离开南昌去杭州。

这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的通知。这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的。根据这个通知，新的中央军委常委会成员是：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原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叶剑英，担任新的军委常委会主持人。^②

6日晨，专列到达杭州，毛泽东住汪庄招待所。

当年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回忆：

2月4日，中央办公厅的保密电话打到了浙江省委，毛泽东将从湖南乘专列抵达杭州。

这年，毛主席已82岁高龄，且重病在身，但仍风尘仆仆到浙江视察。当时，毛主席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眼急需治疗，可毛主席只同意治疗一只眼睛，用另一只眼睛继续看书、读报、批阅文件。

这次毛主席从湖南到杭州来，金华是必经之地，当时，浙江派性斗争又掀起狂澜。金华地区武斗频繁，愈演愈烈，已不是一般的舞枪弄棍。造反派动用了步枪、机枪、手枪、手榴弹，还有掷弹筒。每天乒乒乓乓，枪声爆炸声不断。接到中办通知后，省委向金华造反派下了死命令：2月6日将有重要“外宾”专列途经金华，无论哪派有人开一枪，都要拿派头头是问！然而，“文革”以来天下大乱，党中央的命令造反派尚且看对不对“口味”，往往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更何况连续被冲击被批判的省委的指示。

6日晨，毛主席的专列徐徐驶进艮山门车站。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718页。夏远生、马娜：《毛泽东的三湘情结》下，第67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721页。

谭启龙和我走进专列车厢，原本坐在沙发上的毛主席，身体向前一倾，搁在沙发扶手上的双臂一用力，没人搀扶自己站起身。从他利落的动作上看，很难想象面前是位 82 岁的老人。

毛主席先握住我的手问：“你们不是挨打了吗？”

我心里一阵惊讶：几天前才发生的事，毛主席也知道了？不知为什么谭启龙没吭声，我便接口说，主要是我们工作没做好。

那是几天前，省委在杭州饭店召开全省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会议期间，造反派竟聚众闹事，冲进会场，在混乱中将省委书记谭启龙、铁瑛强行绑架。他们两人挨了不少拳脚，省委开会的杭州饭店也被造反派占领了。幸好警卫部队及时赶到，才把人从造反派手中夺过来，但杭州饭店被造反派占领了，干部会议只能易地召开。在“造反有理”的氛围之中，干部除了作自我批评还有什么理可言？

落座后，恐怕因为熟悉谭启龙，毛主席面带微笑地先问我：“铁瑛同志，你是哪里人哪？”

“河南人，南乐县的。”

“在哪里读书的？”

“在保定二师。”

“哦，保定二师，那个学校，好学校。”毛主席明显带有赞赏的口吻，“谈谈省里情况吧！”

于是，我们就汇报了省里的生产情况：批林批孔，批唯生产力论，省里许多工厂停工，如杭州钢铁厂，1973 年时生产形势很好，还炼出特等钢，批林批孔以后，造反派说：多生产几吨钢铁算什么？苏联钢多，不还是修正主义？农村也受武斗影响，江南鱼米乡，都吃北方省运来的地瓜干、玉米面……

毛主席脸上表情凝重，他没插话，只是听着，思索着，有的地方点点头。前后谈了 20 多分钟。直至我们再三请主席下车去宾馆休息，他老人家才停止询问。

毛主席毕竟已是八旬老人，身材又魁梧，下火车已不太方便，由工作人员搀扶着，费了点劲，才下到站台上。汽车送毛主席穿过市区向西湖的南岸汪庄驰去。

毛主席住在汪庄一号楼。此次杭州之行，他主要是医治眼疾，前后在

杭州住了两个月零五天。省委分工我负责毛主席在杭州期间的警卫和安全，所以，白天我去省委开会、工作，晚上住进汪庄六号楼。

这次，到了杭州的毛主席，户外活动减少了。显然，他的手脚不那么方便了。

就是在这样的身体情况下，毛主席仍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工作、看书，还委派中央办公厅的汪东兴、张耀祠把谭启龙和我找去，听取浙江省的工作汇报。^①

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发表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2月10日，毛泽东同浙江省委书记铁瑛谈话。

铁瑛回忆：

2月10日，我乘车赶往汪庄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要找我谈话，了解浙江的情况。

是如实汇报批林批孔运动遗留下来的成堆问题的真实情况，还是追随当时的政治气候报喜不报忧？我没有犹豫，毅然选择了前者。尽管自1974年以来，我被大小会批斗了数十次，批我否定“文化大革命”，请隐士、举逸民，宣传唯生产力论等等，纲越上越高，造反派甚至想把我划到林彪死党之列。那时我已年近花甲，被批斗一年多，不知人瘦，只觉原先量体裁制的衣裤变得晃晃荡荡。可是，我从不愿昧着良心说假话，更不愿把责任推给下面。我当时心中有一个信念是从没动摇过的。

我把省里存在的、最令人担心的问题一一汇报了，最严重的是造反派在各地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拔干部，甚至出现了本人尚且不是党员，却已当介绍人，发展了七八名党员的荒唐事。

“还有这种事？这种做法不对，应该纠正。”毛泽东感到愕然，继而又摆了摆头。

讲到造反派冲进省县以上干部会议，抓人又占据杭州饭店时，他显然非常气愤，当即叫来汪东兴，说：“去打一个电话给王洪文：浙江调动一个团，把造反派从杭州饭店赶出去。”很快，中办领导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对我的评价，并作出了果断决定。经过考虑，毛泽东同意了浙江省委对当前

^① 浙江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与浙江》第45~46页。

局势的看法，并批准采取措施，制止该省造反派的胡作非为。此一举，对杭州市起了稳定作用，无法无天的派头头的嚣张气焰受挫，渴望安定团结的广大市民群众无不拍手叫好。^①

这时的毛泽东，不仅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登山，就连出门散步也很困难。日渐严重的衰老和疾病，使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越来越不“自由”了。

毛泽东在杭州汪庄住了两个多月，主要是检查和诊断病情。虽然经过前段时间的休养，他的身体并不比在武汉、长沙时好多少：除了双目白内障、说话含混不清外，两腿还时常疼痛，脚也肿得很厉害，行动更加不便。医生建议他尽可能少看书、多运动，因不能外出行走就在室内适当做一些活动。为了诊治毛泽东的眼病，有关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提出多种治疗方案，努力阻止和减缓白内障的发展。眼科专家们一致主张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看书和批阅文件了。毛泽东却只同意先治右眼，留出病状较轻的左眼坚持阅读和工作。

春节放假，眼科专家唐由之还在家里休假。警卫局的同志专门到他家里请他做好准备，第二天乘飞机出去执行任务。在飞机上，唐由之根据太阳的方向，断定飞机在往南飞。飞机即将降落时，他看到雷峰塔的旧址。作为杭州人的他，知道他执行任务的地方是杭州，可是到杭州来做什么呢？

这时飞机上有人对他们几位医学专家说，这次来是给毛主席看病，毛主席第二天要接见大家。大家一听，简直惊呆了，个个顿时激动万分。

第二天，唐由之跟着汪东兴到西湖畔的一幢别墅里，看见一个老人坐在沙发里，头发花白，眼睛没有什么神采，穿着一件旧浴衣，浴衣上打着补丁。他还在迷惑：难道这就是毛主席吗？外面不是一直说他老人家身体非常健康吗？

他不禁想起 1974 年底的几次专家组织的会诊，那时他们专家们得到的只是病历，根本不知道病人是谁。唐由之当时断定，这个病人一定是个很不一般的人物。果然，他的判断没有错，这个病人就是毛泽东。

毛主席当时已经 82 岁了，还是努力要从沙发里站起来迎接大家。那一天毛主席正患感冒，唐由之忙抢步上前说：“不敢当！不敢当！”但毛主席还是执意站起来与大家一一握手。毛主席同张晓楼大夫握手时，诙谐地说：

^① 毛岸青、邵华主编，李林达著：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情满西湖》第 270~271 页。

“看来你的楼盖不大了，永远是小楼。”大家都笑了，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于是专家们开始为毛主席检查，诊断为白内障。

“我一直有一种预感，这回的任务要落在我头上了。”唐由之回忆说，“果然如此，一想起这次任务的重大，我一个星期都睡不踏实。后来汪东兴叫我去上海准备医疗器械。”

唐由之发现毛主席的房间里除了彩电，其他物品全是国货，连腕上的手表都是一块老“上海”牌。于是，他准备的医疗器械也全是国货。

准备好医疗器械，毛主席已经回北京了。^①

22日，《人民日报》登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33条“语录”。这是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录编辑的。

2月27日，毛泽东指示对在押的战争罪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

他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指在押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他特别交代：“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②

2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召开会议，听取回京医生对毛泽东的眼部、部分脑干神经系统和心肺系统进行分别检查后提出的治疗方案的汇报，表示“完全赞成主席先治眼病的决定”，“政治局常委当负主要责任处理此事”。^③

2月底至4月中旬，现存档案中没有一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或写有批语的文件。这种状况在以往是罕见的，可以看出这段时间内他的健康状况很差。就在这时，控制着全国舆论宣传工具的“四人帮”，借宣传“学习理论”的名义，掀起了一阵声势很大的反对“经验主义”的浪潮。

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大谈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在讲话中，张春桥没有一个字提到克服派性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719、1720页。顾保孜文，杜修贤摄影：《红镜头中的毛泽东》第274~275页。

②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722、1720~1721页。

问题，反而指责 1972 年前后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要接受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影射攻击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姚文元在同一天发表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也强调“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毫无根据地谎称：“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

张春桥、姚文元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提出批判“经验主义”，攻击的矛头明显地对着周恩来。在 40 年代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被批评“犯经验主义错误”。那以后，周恩来抱着严于律己的态度，在这方面作过多次自我批评。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张春桥、姚文元在此时打出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号，他们的用心不言自明。

3 月 5 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各地因派性发作，武斗不断，造反派阻拦火车，中断运输，破坏列车和铁路设施，造成铁路运输秩序混乱、许多地方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主要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经过邓小平同王震、谷牧、万里多次商议，中央起草了这个《决定》，提出加强管理、制止派性、实行纪律的五项整顿措施，以确保铁路运输安全正点，完成生产任务。邓小平在《决定》中增写：“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①

3 月 8 日，毛泽东又批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按照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和把人放出来的意见，中央起草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提出：对于各类审查对象，均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均予以释放，并妥善安置。

纪登奎回忆道：“这个报告，当时由我、华国锋、吴德签名，汪东兴是我们代签的，请总理审定。吴庆彤（当时任国务院办公厅负责人）来电话传达：总理已审查同意。

3 月 6 日，总理硬撑着出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个报告，报主席。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723 页。

3月7日，汪东兴从京外来电话：毛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还要看全部名单。当天，北京将全部名单和审查什么问题，汇齐送去。

3月8日，主席在报告和名单上批了同意，直接退中办办理。这样，就放了原来关押着的350人。据此，“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几百名干部几乎全都解除监禁，许多人被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疗。^①

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所提出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293名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

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纪登奎回忆说：“到了1975年初，主席叫释放国民党战犯，先解决外部，后解决党内积案。在这个问题上，总理很积极。主席还批评专案工作人员：‘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把战犯释放后，党内外呼声强烈：战犯都放了，那些老干部革命一辈子，应该释放。主席在杭州，来电话催，能不能快点办？是叫汪东兴打的，我记录的有两次。总理也催。那时受审查的干部还有二三百人，每人一大堆材料，要短期内结束，就是看材料也来不及。负责这件工作的是我、华国锋、吴德，我牵头。总理那时住在三〇五医院。我们向总理汇报，同总理一块商量。总理想了半天，说：‘先放人，后做结论。’‘凡只有口供、没有证据的，就相信本人交代好了。’‘主席批了二十几个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凡是和主席批示相类似的，一律按主席的意见办，不要再请示了。’这些意见，别人不好说什么，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做到这样。痛痛快快地解决，条件还不成熟。”^②

3月20日，周恩来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经过研究，政治局负责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小组成员（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同意医疗组关于在近期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案。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信，详细说明自己几年来病情发展的过程，并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由于知道毛泽东目前身体情况不佳，周恩来还另写了一封信嘱咐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关于病情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1723~1724、1722~1723页。

过了几天，张玉凤从杭州毛泽东住地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说：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①

一个多月里，在南方的毛泽东已多次接到周恩来的病情报告，他自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以前，几位功绩卓著的老革命家相继谢世，他们中有：张云逸（1974年11月19日），彭德怀（11月29日），滕代远（12月1日）和李富春（1975年1月9日）。此后不久，又传来董必武在京病逝（4月2日）的噩耗。对于年迈多病的毛泽东来说，这些消息增添了他更多的忧虑。用他不久后的话讲，他感到党和国家面临着“领导危机”。他常吟诵或听读一些中国古典诗词，大多是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们的咏唱，它们或激昂豪放，或悲怆凄婉。这些诗词，成为毛泽东用来排解内心复杂而又难以言状的情感的一种寄托。有时候，他也向身边工作人员介绍诗人的情况和历史背景，并详细讲解作品的内容。^②

3月21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写道：“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

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宣称“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被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后沉默了几个月的江青也到处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江青把反“经验主义”问题正式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就此问题进行“交锋”，但受到邓小平的抵制。

4月2日，董必武同志逝世。毛泽东参加了董必武同志治丧委员会。

5日午夜，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毛泽东平静地表示他知道了。以后几个月里，他同来华的外国客人谈话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这位“蒋委员长”，并表示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③

4月7日，首都隆重举行董必武同志追悼大会，毛泽东送了花圈。

4月13日，因准备会见来华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毛泽东决定启程返京。

多年来，毛泽东与金日成之间有着特殊的友谊和交往。前不久，毛泽

① ②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727、1728、1720 页。

东过81岁生日，金日成特地送来贺寿礼物——朝鲜苹果。当毛泽东得知他也患有眼病时，立即派出国内眼科专家赴朝为金日成看病，并亲自审阅有关诊治情况的电报。^①

13日晚8时，毛泽东离开杭州返京。

当晚8时许，在工作人员搀扶下，毛泽东缓缓走出西湖汪庄一号楼，登车前往火车站。这时，住地的一些工作人员列队站在楼厅内外，送他离去。见到走路已十分困难的毛泽东，一些前来送别的人泣不成声。毛泽东用疲惫的目光环顾一遍众人，无力地点点头，算是向大家告别。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告别他的“第二故乡”——杭州。

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回忆：

4月13日晚上，我们省委正开会，突然接到中办领导同志的电话：主席今晚要走，谭启龙、铁瑛两位书记快来！

我们急忙向警卫处要车（那时警卫制度甚严，只有警卫处的车才准进汪庄），心急如火，足足等了40分钟汽车才到。我们立刻赶到汪庄，中办领导同志迎过来：你们怎么才来，毛主席想跟你们再谈一谈，现在来不及了，赶快去吧。我们赶到火车站时，火车已经启动，隔着玻璃窗，毛主席看见了我们，他神情安祥地向我们挥了挥手。^②

14日，毛泽东结束了他九个月的南方之行，回到北京。

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稍事休息，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了金日成。

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毫无拘束的交谈。毛泽东向金日成讲了自己和周恩来的病情，介绍并称赞在场的邓小平。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北京的最近情况，特别讲到江青等大批所谓“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表示，他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明确赞同邓小平的意见。^③

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转送的一份报告上作了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他又指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

①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29、1730页。

② 浙江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与浙江》第48页。



毛泽东白内障手术复明后与身边医务人员合影。（摄影/杜修贤）

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最后，毛泽东要求将这个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一议”。他这里批评的“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其实“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显然是针对江青的。^①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730 页。

附 录

毛泽东离京巡视行程表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三次离京

1. 赴苏联及回国途中在国内的巡视活动（1949年12月6日~1950年3月4日）

1949年12月6日21时离京

12月9日凌晨1时30分满洲里—苏联

1950年2月26日下午至晚上满洲里

2月27日10时海拉尔

2月27日下午2时30分至2月28日上午8时30分哈尔滨

2月28日长春

2月28日至3月3日沈阳

3月4日山海关

3月4日唐山

3月4日天津

3月4日抵京

2. 毛岸英牺牲后，到在石家庄短暂休息（1951年3月2日~4月27日）

1951年3月2日深夜离京

3月2日夜因大雪，在保定机场附近停车休息

3月3日至4月27日石家庄

4月27日抵京

3. 为处理刘青山、张子善问题到天津（1951年12月27日~12月29日）

1951年12月27日离京

12月27日至29日天津—12月29日抵京

第二章 集中精力谋划国家建设

4. 视察黄河中下游，探询治理黄河（1952年10月25日~11月3日）

1952年10月25日晚离京

10月25日至26日天津

10月26日晚至28日9时济南
 10月28日曲阜
 10月28日下午至29日17时徐州
 10月29日19时兰封（今兰考）
 10月30日15时至10月31日早6时开封
 10月31日10时郑州黄河大桥
 10月31日上午至11月1日上午新乡
 11月1日汤阴
 11月1日10时至14时安阳
 11月1日14时至15时邯郸—定县
 11月1日晚至11月2日保定
 11月3日1时抵京

5. 春节外出，探询长江治理（1953年2月15日~2月26日）

1953年2月15日6时（大年初二）离京—保定—石家庄
 2月15日9时邢台
 2月15日至16日郑州；16日许昌；16日驻马店；16日18时信阳
 2月16日23时30分至2月19日11时30分武汉；19日晚黄石
 2月19日晚至20日16时九江
 2月20日晚至21日中午安庆
 2月21日晚芜湖
 2月22日凌晨1时至24日南京
 2月24日16时浦口
 2月25日徐州；25日济南
 2月25日至26日天津
 2月26日抵京

第三章 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十四次离京

6. 去杭州起草宪法（1953年12月24日~1954年3月17日）

1953年12月24日15时离京
 12月25日零时25分至25日6时30分德州西宿营
 25日10时济南
 12月25日24时至26日9时30分蚌埠支线宿营；26日南京

12月26日24时至27日19时20分上海

12月27日24时至1954年3月14日杭州

1954年3月14日至3月15日无锡

3月17日抵京

7. 视察官厅水库 (1954年4月11日)

1954年4月11日7时西直门车站; 11日10时30分青龙桥

4月11日15时至17时官厅水库; 11日22时30分抵京

8. 到天津、唐山、秦皇岛探讨工商业改造 (1954年4月19日~4月23日)

1954年4月19日22时离京

4月20日1时至13时天津

4月20日19时30分山海关 (宿车上)

4月21日晨山海关; 4月21日12时30分秦皇岛

4月21日晚至4月22日8时北戴河—(到朱角庄支线宿营)

4月22日15时唐山; 4月22日晚到天津新港宿营

4月23日天津; 4月23日22时抵京

9. 1954年夏天在北戴河 (1954年7月26日晨~8月20日晚)

1954年7月26日凌晨离京

7月26日至8月20日晚北戴河; 8月20日晚抵京

10. 赴广州研究“一五”计划 (1954年10月31日~11月28日)

1954年10月31日3时30分离京

11月1日凌晨1时55分汉口; 11月1日7时10分离开武昌

11月2日12时30分岳阳

11月3日12时30分韶关 (停车四小时)

11月3日19时至11月24日广州

11月25日株洲; 11月25日12时至19时长沙

11月25日夜至26日晚武汉; 11月27日晨至28日晨郑州

11月28日抵京

11. 对农村情况初次调查 (1955年1月3日~1月6日)

1955年1月3日0时离京—保定

1月3日18时至1月4日6时30分郑州—商丘

1月4日15时至19时30分徐州

1月4日夜至5日在济南机场支线宿营

1月5日15时济南；1月5日22时至1月6日18时天津

1月6日20时20分抵京

12. 对合作化问题再度调查（1955年4月6日~4月19日）

1955年4月6日12时10分离京—石家庄

4月8日至10日武汉；4月10日20时至17日杭州

4月18日上海—济南

4月19日晚抵京

13. 对农村合作化运动第三次调查（1955年6月8日~6月23日）

1955年6月8日离京

6月10日至6月18日19时50分杭州

6月19日南昌；6月19日22时至20日午夜长沙

6月21日凌晨4时武昌；6月22日上午10时郑州

6月23日邯郸；6月23日保定

6月23日19时抵京

14. 1955年夏天在北戴河（1955年8月7日~9月5日）

1955年8月7日离京

8月7日至9月5日北戴河；9月5日抵京

15. 在北戴河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955年9月14日~9月25日）

1955年9月14日离京

9月14日至9月25日北戴河；9月25日抵京

16. 主持起草《工商业改造决议》，商讨农业发展规划

（1955年11月1日~11月20日）

1955年11月1日21时25分离京；11月1日23时50分天津（停1小时）

11月2日6时58分德州（停1小时）

11月2日10时43分至21时55分济南

11月2日23时56分泰安

11月3日1时54分兖州；11月3日6时45分徐州（停1小时）

11月3日9时40分符离集；11月3日11时45分蚌埠

11月4日1时45分滁州；11月4日3时浦口

11月4日7时21分镇江；11月4日10时54分无锡

11月4日12时47分苏州；4日16时25分至11月5日上海

11月5日14时45分松江；11月5日17时至18日杭州

11月18日上海；11月20日天津；11月20日抵京

17. 征询《农业十七条》意见，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

(1955年12月22日~1956年1月12日)

1955年12月22日凌晨2时离京

12月22日保定；12月22日邢台

12月22日邯郸；12月22日郑州

12月23日武汉；12月23日至24日晚长沙

12月24日南昌

12月25日杭州；12月25日上海

12月26日至31日杭州

1956年1月1日上海

1月1日至1月9日杭州；1月9日晚至11日早晨上海

1月11日上午南京；1月12日天津

1月12日21时15分抵京

18. 到广州扩大调查 (1956年5月3日~6月4日)

1956年5月3日乘飞机离京；5月3日到广州

5月30日6时飞长沙；5月30日到长沙；5月31日到武汉

6月4日13时飞北京；6月4日17时抵京

19. 1956年夏天在北戴河 (1956年7月23日~8月20日)

1956年7月23日离京

7月23日至8月20日北戴河

8月20日抵京

第四章 宣讲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组织反右派斗争

20. 宣讲“百花齐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1957年3月17日~4月7日)

1957年3月17日上午10时乘火车离京

3月17日中午至晚上天津

3月18日凌晨到济南；3月18日24时改乘飞机去徐州

3月19日凌晨到徐州

3月19日早饭后乘飞机去南京；3月19日到南京

3月20日飞上海；3月20日到上海

3月21日21时10分杭州；3月21日到杭州

4月7日飞北京；4月7日抵京

21. 组织反右派斗争（1957年7月1日~8月11日）

1957年7月1日上午5时50分从北京起飞

7月1日9时30分到杭州

7月6日下午飞上海；7月6日下午到上海

7月9日飞南京；7月9日到南京

7月12日上午6时30分飞青岛；12日8时30分到青岛

8月11日飞北京；8月11日抵京

22. 1957年夏天在北戴河（1957年8月18日~8月28日）

1957年8月18日离京

8月18日至28日北戴河

8月28日抵京

23. 为开好八届三中全会调查研究（1957年9月3日~9月18日）

1957年9月3日离京；9月3日石家庄

9月4日邯郸；9月4日到郑州

9月5日改飞机去武汉；9月5日到武汉

9月7日飞长沙；9月7日到长沙

9月9日飞南昌；9月9日到南昌

9月10日飞杭州；9月10日到杭州

9月17日飞上海；9月17日到上海

9月18日飞北京；9月18日抵京

第五章 为争取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七次离京

24. 召开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1957年12月8日~1958年1月26日）

1957年12月8日13时乘飞机离京；12月8日下午到济南

12月9日中午飞南京；12月9日到南京

12月9日飞杭州；12月9日到杭州

1958年1月5日飞长沙；1月5日到长沙

1月6日飞南宁；1月6日到南宁

1月23日飞广州；1月23日到广州

1月26日飞北京；1月26日抵京

25. 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间隙到济南调查 (1958年2月5日~2月6日)

1958年2月5日上午8时乘飞机离京

2月5日10时至2月6日下午济南

2月6日下午抵京

26. 视察东北工业基地 (1958年2月12日~2月14日)

1958年2月12日傍晚飞沈阳

2月13日抚顺; 2月13日沈阳; 2月13日下午飞长春

2月14日下午飞北京; 2月14日抵京

27. 召开成都、武汉、广州会议 (1958年3月4日~4月30日)

1958年3月4日乘飞机离京; 3月4日西安

3月4日至27日成都

3月27日经资阳、内江、隆昌

3月28日1时50分抵重庆; 28日1时50分至29日6时重庆

3月29日6时15分至4月1日2时乘船东进

4月2日2时到武汉

4月12日飞长沙; 4月12日到长沙

4月13日飞广州; 4月13日到广州

5月1日飞武汉; 5月1日至5月2日武汉

5月2日抵京

28. 视察河北、河南、山东农村 (1958年8月4日~8月13日)

1958年8月4日离京

8月4日16时至19时河北徐水; 8月4日晚至5日定县

8月5日安国; 8月5日21时至8月6日新乡

8月6日晚郑州; 8月6日晚许昌

8月7日7时30分襄城

8月7日13时至14时长葛—郑州—兰考东坝头

8月8日15时20分至17时商丘

8月8日18时35分至19时砀山; 8月8日徐州

8月9日1时兖州; 9日3时泰安; 9日济南

8月10日至13日天津

8月13日丰台; 13日23时抵京

29. 召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 (1958 年 8 月 16 日~9 月 3 日)

1958 年 8 月 16 日 12 时 50 分乘飞机离京

8 月 16 日 14 时至 9 月 3 日北戴河

9 月 3 日抵京

30. 巡视大炼钢铁 (1958 年 9 月 10 日~9 月 29 日)

1958 年 9 月 10 日上午 8 时飞离北京; 10 日上午 11 时 40 分到武汉

9 月 15 日上午 10 时乘汽车去鄂城; 9 月 15 日鄂城

9 月 15 日 10 时 45 分大冶; 9 月 15 日 13 时黄石

9 月 16 日安庆; 9 月 16 日至 9 月 19 日合肥

9 月 19 日至 9 月 20 日芜湖; 9 月 20 日马鞍山

9 月 20 日至 21 日南京; 9 月 21 日上海

9 月 21 日至 27 日杭州; 9 月 27 日至 28 日上海

9 月 28 日晚天津; 9 月 29 日抵京

第六章 发现和纠正“大跃进”的错误

31. 视察天津发现问题 (1958 年 10 月 13 日~10 月 17 日)

1958 年 10 月 13 日离京

10 月 14 日至 17 日天津; 10 月 17 日 18 时抵京

32. 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1958 年 10 月 31 日~12 月 30 日)

1958 年 10 月 31 日晚离京

10 月 31 日保定; 10 月 31 日石家庄

11 月 1 日 4 时 20 分至 17 时 40 分邯郸; 11 月 1 日晚新乡

11 月 2 日至 13 日下午郑州

11 月 13 日 17 时遂平; 11 月 13 日信阳

11 月 14 日 14 时孝感; 11 月 15 日 1 时到武汉

12 月 12 日改飞机去长沙; 12 月 12 日到长沙

12 月 13 日飞广州; 12 月 13 日到广州

12 月 26 日改火车去长沙; 12 月 26 日到长沙

12 月 26 日至 28 日武汉

12 月 29 日郑州; 29 日 22 时 20 分至 30 日 14 时 15 分邯郸

12 月 30 日抵京

33. 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 (1959年2月23日~4月14日)

1959年2月23日离京; 2月23日晚天津

2月24日晚至25日济南

2月26日10时至3月10日郑州

3月11日至3月19日武昌

3月19日至20日长沙; 3月20日江西

3月21日至24日杭州; 3月24日17时30分至4月5日上海

4月5日至12日杭州; 4月12日上海—南京

4月13日济南

4月14日天津; 4月14日抵京

34. 回韶山、召开第一次庐山会议 (1959年6月20日~8月27日)

1959年6月20日24时30分离京

6月21日邯郸; 6月21日至22日郑州

6月22日湖北广水; 6月22日至24日5时武汉

6月24日至25日下午长沙

6月25日下午至27日15时韶山

6月27日晚至28日午后长沙

6月29日1时至30日武汉

7月1日九江; 7月1日至8月20日庐山

8月20日九江—上饶; 8月20日南昌

8月21日中午浙江金华; 8月21日20时诸暨

8月21日23时至22日18时萧山

8月22日18时乘汽车去杭州

8月22日19时至25日杭州

8月25日上海; 8月25日南京; 8月25日晚徐州

8月26日凌晨济南; 8月26日至27日天津

8月27日抵京

第七章 庐山会议后的调研

35. 视察密云水库 (1959年9月9日~9月10日)

1959年9月9日离京—密云水库

9月10日晚抵京

36. 视察河北、山东、河南农村 (1959年9月18日~9月25日)

1959年9月18日离京

9月18日至19日天津; 9月20日至21日济南

9月22日徐州; 9月22日至23日郑州

9月23日18时至9月24日13时邯郸 (24日上午磁县成安镇)

9月24日保定; 9月25日抵京

37. 巡视工农业生产, 研究国内国际问题 (1959年10月23日~1960年3月26日)

1959年10月23日离京; 10月23日至24日天津

10月24日至26日济南; 10月26日至27日徐州

10月27日至29日合肥

10月29日乘汽车经浴溪口、马鞍山至南京

10月29日至30日南京; 10月30日18时至31日上海

10月31日至1960年1月4日21时杭州

1960年1月4日晚至18日上海

1月18日至24日杭州; 1月24日江西向塘

1月25日湖南株洲; 1月26日清晨衡阳

1月27日郴州; 1月27日至3月9日广州

3月9日郴州; 3月9日至10日衡阳

3月10日株洲; 3月10日至12日长沙

3月12日至13日江西向塘; 3月13日17时至14日浙江金华

3月14日至15日杭州; 3月15日至16日绍兴

3月16日至17日宁波; 3月17日至19日杭州

3月19日至21日上海; 3月21日至22日徐州

3月22日济南; 3月22日至26日天津

3月26日抵京

38. 巡视各地, 召开北戴河会议 (1960年4月28日~8月17日)

1960年4月28日1时52分离京

4月28日至5月1日21时天津

5月2日2时至5日16时30分济南

5月6日7时15分至11日19时30分郑州

5月12日8时25分至17日21时武汉

5月18日3时至19日15时长沙

5月19日23时30分至20日18时南昌
5月21日1时至10时金华
5月21日18时15分至25日21时杭州
5月25日24时至5月30日1时30分上海
5月30日5时至6月7日20时杭州
6月7日23时30分至6月29日上海
7月2日天津；7月3日9时30分至7月21日北戴河
7月21日至25日北京；7月25日至8月16日20时北戴河
8月17日2时抵京

第八章 倡导调查研究，重新开始纠“左”

39. 组织调查组南下调查（1961年1月25日~5月14日）

1961年1月25日24时离京

1月26日天津；1月27日济南；1月28日蚌埠
1月29日南京；1月29日苏州；1月30日至31日上海
2月1日至9日杭州；2月10日江西向塘
2月11日至12日长沙；2月13日至3月29日广州
3月31日至4月1日长沙；4月1日至4月8日武汉
4月8日至4月18日长沙；4月18日至19日南昌
4月20日至28日杭州；4月28日至5月11日上海
5月12日南京；5月13日傍晚济南
5月14日天津；5月14日抵京

40. 1961年庐山中央工作会议（1961年7月6日~9月27日）

1961年7月6日离京

7月6日至8日天津—济南
7月9日蚌埠；7月10日上海
7月11日至17日杭州；7月17日晚至8月13日江西庐山
8月14日至21日杭州；8月22日至9月17日庐山
9月18日至21日长沙；9月21日至24日晚武昌
9月25日6时45分至22时35分郑州
9月26日4时至26日22时38分邯郸
9月27日抵京

41. 七千人大会前的调查研究 (1961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19 日)
 1961 年 11 月 30 日 24 时离京; 12 月 2 日上海
 12 月 3 日至 8 日杭州; 12 月 8 日至 13 日上海
 12 月 13 日傍晚至 16 日傍晚无锡
 12 月 17 日 15 时至晚上济南; 12 月 18 日至 19 日下午天津
 12 月 19 日晚抵京
42. 七千人大会后到南方视察 (1962 年 2 月 8 日~3 月 26 日)
 1962 年 2 月 8 日晚离京—济南
 2 月 10 日至 23 日下午上海
 2 月 23 日至 28 日杭州; 2 月 28 日南昌
 3 月 1 日至 9 日长沙; 3 月 9 日至 22 日武昌; 3 月 22 日长沙
 3 月 23 日 12 时 14 分至 24 日 15 时 44 分郑州
 3 月 24 日 19 时至 25 日 18 时邯郸; 3 月 26 日抵京
43. 南下召开军事会议, 返京途中拐向天津(1962 年 5 月 2 日~7 月 6 日)
 1962 年 5 月 2 日离京—蚌埠
 5 月 3 日下午至 5 日下午无锡
 5 月 5 日至 30 日下午上海; 5 月 30 日至 6 月 8 日杭州
 6 月 9 日南昌; 6 月 10 日至 18 日长沙
 6 月 18 日至 30 日武汉
 7 月 1 日 5 时 42 分至 23 时 17 分郑州
 7 月 2 日凌晨至 15 时 20 分邯郸
 7 月 3 日零时 29 分至 17 时济南
 7 月 3 日晚至 5 日北戴河 7 月 5 日天津; 7 月 6 日抵京

第九章 逐步转向抓阶级斗争

44. 召开第二次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 (1962 年 7 月 25 日~8 月 24 日)
 1962 年 7 月 25 日离京
 7 月 25 日至 8 月 24 日北戴河; 8 月 24 日晚抵京
45. 到南方视察 (1962 年 12 月 9 日~1963 年 2 月 2 日)
 1962 年 12 月 9 日离京; 12 月 10 日天津
 12 月 11 日济南—蚌埠; 12 月 15 日南京
 12 月 16 日至 1963 年 1 月 3 日上海

1963年1月3日至6日杭州；1月6日至7日上海

1月7日至15日杭州—南昌—株洲

1月15日至20日长沙；1月20日至29日武汉

1月30日2时39分至31日19时15分郑州

1月31日至2月1日19时30分邯郸

2月2日抵京

46. 主持起草“前十条”（1963年4月7日~6月15日）

1963年4月7日晚离京

4月7日至8日天津；4月9日济南

4月11日至13日南京；4月13日至15日上海

4月15日至23日杭州；4月23日至26日上海

4月26日至5月3日杭州；5月3日至6日上海

5月6日至24日杭州—南昌；5月25日长沙

5月26日至6月12日武汉

6月13日郑州；6月13日至14日18时40分邯郸

6月15日抵京

47. 赴中南、华东讨论“后十条”（1963年10月10日~11月12日）

1963年10月10日离京；10月24时至11日17时邯郸

10月11日21时56分至13日13时30分郑州

10月14日至20日武汉；10月20日至26日长沙

10月26日至28日南昌；10月29日杭州

10月29日至11月3日上海；11月3日至10日杭州

11月10日至11日上海；11月12日天津；11月12日抵京

48. 巡视中南、华东，了解“双十条”贯彻情况（1964年3月27日~5月13日）

1964年3月27日晚离京

3月28日1时40分至29日18时30分邯郸

3月30日至4月1日郑州；4月2日至10日武汉

4月11日凌晨至19日长沙；4月19日至22日南昌

4月23日晨至5月2日杭州；5月2日至9日上海

5月10日至11日南京；5月12日上午至18时济南

5月13日天津；5月13日抵京

49. 1964年夏天在北戴河（1964年7月29日~8月20日）

1964年7月29日离京

7月29日至8月20日北戴河；8月20日抵京

50. 视察“四清”运动（1964年9月1日~9月21日）

1964年9月1日离京

9月1日至2日3时邯郸；9月3日至6日武汉

9月7日至8日长沙；9月8日南昌

9月9日至15日杭州；9月15日至18日上海

9月19日南京；9月19日晚至20日下午济南

9月20日晚至21日天津；9月21日抵京

第十章 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

51. 重上井冈山（1965年3月14日~6月22日）

1965年3月14日离京

3月14日18时至15日15时15分邯郸

3月16日至4月29日武汉

4月29日23时至5月21日长沙

5月21日至29日井冈山；5月30日江西樟树

6月1日至16日杭州；6月16日至20日以后上海

6月下旬南京；6月22日抵京

52. 滞留南方（1965年11月11日~1966年7月18日）

1965年11月11日晚离京

11月12日天津；11月13日济南；11月13日至14日徐州

11月15日蚌埠；11月16日至17日南京

11月17日至19日上海；11月19日至22日杭州

11月22日至26日上海；11月26日至12月5日杭州

12月5日至16日上海；12月16日至24日杭州

12月24日至1966年1月5日南昌；1966年1月5日长沙

1966年1月5日至2月19日武汉；2月20日至26日晚长沙

2月27日至3月26日杭州；3月26日至4月1日上海

4月1日至5月3日杭州；5月3日至15日上海

5月15日至6月15日杭州；6月16日南昌

6月16日22时40分至17日16时30分长沙
6月17日下午至28日10时韶山滴水洞
6月28日长沙；6月28日至7月17日武汉
7月17日郑州；7月17日午夜至18日2时邯郸
7月18日抵京

第十一章 动荡年代

53. 平息动荡的一次努力（1967年7月14日~9月23日）

1967年7月14日3时离京—郑州

7月14日21时到武汉；7月21日11时改飞机去上海
7月21日上午至9月16日上海
9月16日杭州（在笕桥619专用线宿营）；9月16日金华
9月17日清晨南昌；9月17日至19日长沙
9月19日至22日凌晨武汉；9月22日9时至11时郑州
9月23日邯郸；9月23日抵京

54. 南下了解九大精神落实情况（1969年5月29日~9月23日）

1969年5月29日离京；5月30日邯郸

5月31日郑州；5月31日至6月26日武汉
6月26日至28日长沙；6月28日至29日南昌
6月29日至9月18日杭州；9月18日至21日上海
9月21日南京；9月21日至22日济南
9月22日至23日天津；9月23日抵京

55. 战备疏散到武汉（1969年10月14日~1970年4月27日）

1969年10月14日离京

10月15日至1970年4月11日武汉
（其中1969年11月12日去长沙）

1970年4月11日21时至13日11时长沙

4月14日至24日杭州；4月24日上海
4月25日苏州；4月26日济南—天津
4月27日抵京

56.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突发事件（1970年7月22日~9月19日）

1970年7月22日离京—郑州

7月23日至24日武汉；7月25日至26日长沙
 7月27日至28日杭州；7月28日至29日上海
 7月29日至8月18日下午杭州；8月19日九江
 8月19日至9月9日下午庐山
 9月10日23时至13日长沙（在列车上住了两天）
 9月13日至17日武汉—郑州；9月19日石家庄
 9月19日丰台；9月19日抵京

57. 为解决林彪问题南下打招呼（1971年8月15日~9月12日）

1971年8月15日13时离京

8月15日21时15分至16日8时邯郸
 8月16日郑州；8月16日至27日武昌
 8月27日21时至31日13时长沙
 8月31日21时至9月2日中午南昌
 9月3日零时至10日15时35分杭州
 9月10日18时至11日12时上海
 9月11日18时35分南京（停15分钟）
 9月11日21时45分蚌埠（停5分钟）
 9月12日零时10分徐州（停10分钟）
 9月12日2时45分兖州（没停）
 9月12日5时济南（停30分钟）
 9月12日7时40分德州（停20分钟）
 9月12日11时15分天津西（停15分钟）
 9月12日13时10分至15时36分丰台
 9月12日16时抵京

58. 赴南方休养（1974年7月17日~1975年4月14日）

1974年7月17日晚离京；7月17日21时45分至18日6时邯郸
 7月18日至10月12日晚武汉
 10月13日5时至1975年2月3日8时长沙（114天）
 1975年2月3日至5日南昌；2月6日至4月13日20时杭州
 4月14日抵京

毛泽东离京巡视时间表

年	出巡序	提要	离京	返京	天	年天
1949年	1	赴苏联	1949年12月6日	1950年3月4日	89	26
1950年					(苏)	63
1951年	2	去石家庄修养	1951年3月2日	1951年4月27日	57	60
	3	去天津	1951年12月27日	1951年12月29日	3	
1952年	4	视察黄河	1952年10月25日	1952年11月3日	10	10
1953年	5	视察长江	1953年2月15日	1953年2月26日	12	20
	6	去杭州起草宪法	1953年12月24日	1954年3月17日	8	
1954年	7	视察官厅水库	1954年4月11日	1954年4月11日	1	137
	8	去秦皇岛、唐山	1954年4月19日	1954年4月23日	5	
	9	去北戴河筹备第一届人大	1954年7月26日	1954年8月20日	26	
	10	去广州研究“一五”计划	1954年11月31日	1954年11月28日	29	
	11	1955年1月南下	1955年1月3日	1955年1月6日	4	
1955年	12	1955年4月南下	1955年4月6日	1955年4月19日	14	106
	13	1955年6月南下	1955年6月8日	1955年6月23日	18	
	14	1955年8月去北戴河	1955年8月7日	1955年9月5日	30	
	15	1955年9月去北戴河编《高潮》	1955年9月14日	1955年9月25日	12	
	16	1955年11月南下起草《工商业改造决议》	1955年11月1日	1955年11月20日	20	
	17	南下征求对农业十七条意见	1955年12月2日	1956年1月12日	10	
1956年	18	提出《十大关系》后的扩大调查	1956年5月3日	1956年6月4日	33	74
	19	1956年在北戴河	1956年7月23日	1956年8月20日	29	
	20	1957年3月到华东宣讲百花齐放	1957年3月17日	1957年4月7日	22	
1957年	21	1957年7、8月组织反右斗争	1957年7月1日	1957年8月11日	42	134
	22	1957年8月去北戴河	1957年8月18日	1957年8月28日	11	
	23	1957年9月去南方调查	1957年9月3日	1957年9月18日	16	
	*	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纪念活动	1957年11月2日	1957年11月20日	19	
	24	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	1957年12月8日	1958年1月26日	24	
1958年	25	乘飞机去济南谈话	1958年2月5日	1958年2月6日	2	203
	26	视察东北工业基地	1958年2月12日	1958年2月14日	3	
	27	组织成都、武汉会议	1958年3月4日	1958年4月30日	58	
	28	1958年8月南下视察农村	1958年8月4日	1958年8月13日	10	
	29	1958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	1958年8月16日	1958年9月3日	19	
	30	巡视大炼钢铁	1958年9月10日	1958年9月29日	19	
	31	1958年10月去天津	1958年10月13日	1958年10月17日	5	
	32	第一次郑州会议和八届六全会	1958年10月31日	1958年12月30日	61	

续表

年	出巡序	提要	离京	返京	天	年天
1959年	33	2月南下和第二次郑州会议	1959年2月23日	1959年4月14日	55	204
	34	回韶山和庐山会议	1959年6月20日	1959年8月27日	69	
	35	视察密云水库	1959年9月9日	1959年9月10日	2	
	36	9月南下视察	1959年9月18日	1959年9月25日	8	
1960年	37	1959年10月至1960年3月南下视察	1959年10月23日	1960年3月26日	70	198
	38	1960年4月南下视察	1960年4月28日	1960年8月17日	86	
1961年	39	组织三个调查组南下调查	1961年1月25日	1961年5月14日	112	214
	40	7月南下和第二次庐山会议	1961年7月6日	1961年9月27日	110	
	41	为开好七千人大会南下	1961年11月31日	1961年12月19日	84	
1962年	42	七千人大会后南下	1962年2月8日	1962年3月26日	20	167
	43	5月南下召开军事会议	1962年5月2日	1962年7月6日	47	
	44	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	1962年7月25日	1962年8月24日	47	
	45	八届十中全会后南下	1962年12月9日	1963年2月2日	31	
1963年	46	2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南下视察	1962年12月9日	1963年2月2日	23	137
	47	征求《后十条》意见南下	1963年4月7日	1963年6月15日	33	
1964年	48	为宣传、贯彻《双十条》南下	1963年10月10日	1963年11月12日	70	92
	49	1964年在北戴河	1964年3月27日	1964年5月13日	34	
	50	《后十条(修正草案)》下发后南下	1964年7月29日	1964年8月20日	48	
1965年	51	3月南下和重出井冈山	1964年9月1日	1964年9月21日	23	152
1966年	52	滞留南方	1964年9月1日	1964年9月21日	21	
			1965年3月14日	1965年6月22日	101	199
1967年	53	7月南下和7月20事件	1965年11月11日	1966年7月18日	72	72
1968年	未离京					
1969年	54	“九大”后南巡	1967年7月14日	1967年9月23日	118	197
	55	战备疏散	1969年5月29日	1969年9月23日	79	
1970年	56	7月南下和九届二中全会	1969年10月14日	1970年4月27日	117	177
	57	1971年为林彪问题打招呼	1970年7月22日	1970年9月19日	60	
1971年			1971年8月15日	1971年9月12日	29	29
1972年	未离京					
1973年	未离京					
1974年	58	1974年至1975年南下休养	1974年7月17日	1975年4月14日	168	168
1975年					104	104
1976年	未离京					
合计						2943

毛泽东离京巡视随行摄影记者

1. 1949年12月毛泽东去苏联，1950年3月返京。出发前，毛泽东向汪东兴交待：“此次出访为秘密行动，对外不宣传，不带记者。”所以，这次出访国内没有派专业摄影师，有些照片是叶子龙照的。毛泽东出发前在车站送行的照片是徐肖冰的作品。

2. 1951年3月至4月毛泽东在石家庄休息。没有摄影记者跟随。

3. 1951年12月毛泽东去天津。是侯波跟随。

4. 1952年10月底至11月初毛泽东考察黄河。侯波跟随。这次出巡还有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张勇随行。

5. 1953年2月毛泽东考察长江。吕厚民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张勇随行。

6. 1953年12月至1954年3月毛泽东去杭州主持起草宪法。侯波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张勇随行。

7. 1954年4月毛泽东视察官厅水库。侯波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徐肖冰随行。

8. 1954年4月毛泽东到天津、唐山、秦皇岛视察。侯波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张勇随行。

9. 1954年7月至8月毛泽东去北戴河。侯波、吕厚民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张勇随行。

10. 1954年10月底至11月底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去广州研究“一五”计划。侯波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张勇随行。

11. 1955年1月毛泽东到郑州、徐州、济南、天津找各地领导调查研究。侯波跟随。

12. 1955年4月毛泽东到武汉、杭州、上海调查研究。侯波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张勇随行。

13. 1955年6月毛泽东到广州、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等地调查研究。侯波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张勇随行。

14. 1955年8月至9月毛泽东去北戴河。侯波和吕厚民随行。

15. 1955年9月毛泽东去北戴河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侯波随行。

16. 1955年11月毛泽东到杭州主持起草《工商业改造决议》，商讨农业发展规划。侯波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张勇随行。

17. 1955年12月底至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南下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在杭州主持起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去和在杭州、上海、侯波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张勇随行。在南京、天津吕厚民随行参加摄影。

18. 1956年5月至6月到广州调查研究和去武汉游长江。侯波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张勇随行。

19. 1956年7月至8月毛泽东去北戴河。侯波随行。

20. 1957年3月至4月毛泽东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宣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侯波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张勇随行。

21. 1957年7月至8月毛泽东到上海、南京、青岛组织反右派斗争。侯波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张勇随行。

22. 1957年8月毛泽东去北戴河。侯波随行。

23. 1957年9月毛泽东到湖北、湖南、广东、浙江、上海等地调查了解整风、反右派、工农业生产与群众情绪。侯波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张勇随行。

24. 1957年12月至1958年1月杭州会议和后来的南宁会议。侯波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张勇随行。

25. 1958年2月5日至6日毛泽东乘专机到济南和当地领导谈话。侯波随行。

26. 1958年2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视察东北工业基地。侯波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舒世俊、灯光赵明随行。

27. 1958年3月至4月成都会议、武汉会议、广州会议。侯波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舒世俊、灯光赵明随行。

28. 1958年8月毛泽东到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农村视察。侯波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舒世俊、灯光赵明随行。在河南新乡七里营河南记者王世龙参加。

29. 1958年8月至9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侯波随行。

30. 1958年9月毛泽东巡视大炼钢铁。侯波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舒世

俊、灯光赵明随行。

31. 1958年10月毛泽东到天津视察。侯波随行。

32. 1958年10月至12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侯波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舒世俊、灯光赵明随行。

33. 1959年2月至4月毛泽东在河北、山东、河南调查及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侯波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舒世俊、灯光赵明随行。

34. 1959年6月至8月毛泽东回韶山和庐山会议。侯波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舒世俊、灯光赵明随行，毛泽东在庐山时吕厚民在江西分社也去了。

35. 1959年9月视察密云水库。侯波随行。

36. 1959年9月毛泽东到河北、山东、河南农村视察。侯波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舒世俊、灯光赵明随行。

37. 1959年10月至1960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上海、广州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侯波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舒世俊、灯光赵明随行。

38. 1960年4月至8月和天津人民共庆“五一”；在济南、郑州接见外宾；去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到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天津是陈娟美随行，“五一”活动吕厚民也参加。在济南、郑州、武汉、长沙、南昌、杭州是陈娟美随行，在郑州期间河南记者魏德忠参加。在上海是陈娟美随行，在上海会议期间侯波到上海。去北戴河是侯波随行，陈娟美没有去。全程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舒世俊、灯光赵明随行。

39. 1961年1月至5月毛泽东组织三个调查组南下调查。3月底以前在杭州、广州、长沙侯波随行。4月1日到武汉，汪东兴打电话叫吕厚民从广州到武汉接替侯波。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舒世俊、灯光赵明随行。

40. 1961年7月至9月毛泽东南下视察和第二次庐山会议。吕厚民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舒世俊、灯光赵明随行。

41. 1961年11月至12月毛泽东到华东视察。吕厚民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舒世俊、灯光赵明随行。

42. 1962年2月至3月毛泽东到各地视察。吕厚民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舒世俊、灯光赵明随行。

43. 1962年2月至7月毛泽东在上海、杭州召开军事会议，6月返京途中从邯郸折向济南、天津。吕厚民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舒世俊、灯光赵明随行。

44. 1962年7月至8月毛泽东去北戴河。吕厚民随行。

45. 1962年12月至1963年2月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吕厚民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舒世俊、灯光赵明随行。

46. 1963年4月至6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前十条》。吕厚民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舒世俊、灯光赵明随行。

47. 1963年10月至11月毛泽东南下中南、华东与两个中央局和有关省委领导讨论《后十条》。吕厚民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舒世俊、灯光赵明随行。

48. 1964年3月至5月毛泽东到中南、华东了解宣传、贯彻《双十条》的情况。钱嗣杰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舒世俊、灯光赵明随行。

49. 1964年7月至8月毛泽东去北戴河钱嗣杰随行。

50. 1964年9月《后十条》下发后毛泽东到南方视察。钱嗣杰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舒世俊、灯光赵明随行。

51. 1965年3月至6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钱嗣杰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舒世俊、灯光赵明随行。

52. 1965年11月至1966年7月毛泽东滞留南方。钱嗣杰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舒世俊、灯光赵明随行。

53.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去武汉和“七二〇”事件。钱嗣杰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舒世俊、灯光赵明随行。

54. 1969年5月至9月毛泽东到南方检查九大精神的贯彻执行情况。钱嗣杰和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舒世俊、灯光赵明随行。

55. 1969年10月至1970年4月战备疏散到武汉。没有摄影记者随行。

56. 1970年7月至9月毛泽东南下调查和九届二中全会。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摄影记者是杜修贤。出巡期间没有摄影记者随行。

57. 1971年8月至9月毛泽东为林彪事南下打招呼。没有摄影记者随行。

58. 1974年7月至1975年4月毛泽东到武汉、长沙、杭州养病。没有摄影记者随行。但接见外宾时随行的摄影记者是杜修贤。

后 记

本书的写作动议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几个朋友的一次谈话。从那时起，我一直为此努力，可以说确实是锲而不舍。古人有句话叫十年磨一剑，完成这本书不是十年，而是二十年、三十年。其间与许多人结下了几十年的友谊。在本书出版之际，不能不想起他们，在这里由衷地表示感谢。

首先要感谢各地党史办的同志们。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冒昧打电话或者找上门，询问和探讨有关毛主席到当地的时间和有关的事情，不但没有被拒绝，甚至得到热情接待或友好回应，和有些同志彼此间建立了密切的交流和沟通。这里最多的是湖南党史办的夏远生同志，他们的《毛泽东回湖南纪实》是我最初研究的基石之一。后来他们完成了《毛泽东五十次回湖南》一书，这完全是他们努力的结果，但与我们多年的探讨也有一些关系。再就是山东档案局的王东溟同志，我们初见时他著有《毛泽东十八次到山东》。后来他们完成了《毛泽东在山东》一书。我的《毛泽东外出和巡视记事》成书后，我们还通过电话，可惜不久，他爱人告诉我，他永远离开了我们。我非常惋惜，深深地怀念他。

其次要感谢的是给了我很大帮助的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如徐肖冰、侯波、吕厚民、钱嗣杰、舒世俊、陈娟美等。特别是徐老和侯老，几十年来给我的帮助和鼓励最多。两位老人给我多次书信，好几次春节还给我寄来明信片。《毛泽东在邯郸》一书，还是两位老人寄给我的。这本书虽小，却是一本真实感人的好书，出自邯郸党史办。通过侯老，我还见到了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和他的夫人韩桂馨同志。可惜徐老没有见到我的书出版就离世了。再就是广东省委老秘书长张根生同志。我给他寄去有关毛主席在广东的资料，希望得到他的核实和帮助。张老将材料又转给

了广东省委，并附信希望作为一件重要工作抓一抓。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同志做了批示，并将任务交给了广东党史办。张老专程接见了，并谈了几个小时。在张老的安排下，我与广东党史办的同志见了面，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些珍贵的材料。我与叶子龙同志的秘书和汪东兴同志的秘书有过一些接触，主要是将我搜集整理的材料请他们帮助核实。《毛泽东外出和巡视记事》完成后，我与弟弟一起见到了汪老，主要转达我父亲对汪老的问候，谈及他们在延安时期的情况，可惜未来得及谈到我的书。

再次要感谢的是空军机关的同志，他们帮我核实了毛泽东专机的有关情况。铁道部门的同志为我提供了毛泽东专列的有关材料。对这些材料的研究，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帮助，提高了本书的准确性、真实性。让我相信，现在的研究成果，已经排除了可能出现遗漏的遗憾。

当然还应该感谢我所阅读的大量书籍、材料的作者，他们的一些材料是本书的基础。本书不是小说，也不是纯文学作品，不存在虚构和编造，而是对所有历史材料分析、研究、综合的结果。

还要感谢为本书出版做了大量工作的杨忠诚同志，如果没有他两年多的坚持和努力，本书的出版，是很难想象的。

最后，我还应该感谢我的爱人刘雁，她不仅给了我理解和支持，还直接帮助我将大量资料录入计算机加以整理。没有这些帮助，我的研究会更困难。我们都是工薪阶层，收入微薄，还要赡养老人和抚育孩子，在这样的条件下，我还要购买大量的书籍或资料，要支撑整个家庭实属不易。我们的家当，大概除了书，就所剩不多了。我的研究，如果没有家里的支持和理解，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而且，这种研究永无止境，也永远不可能完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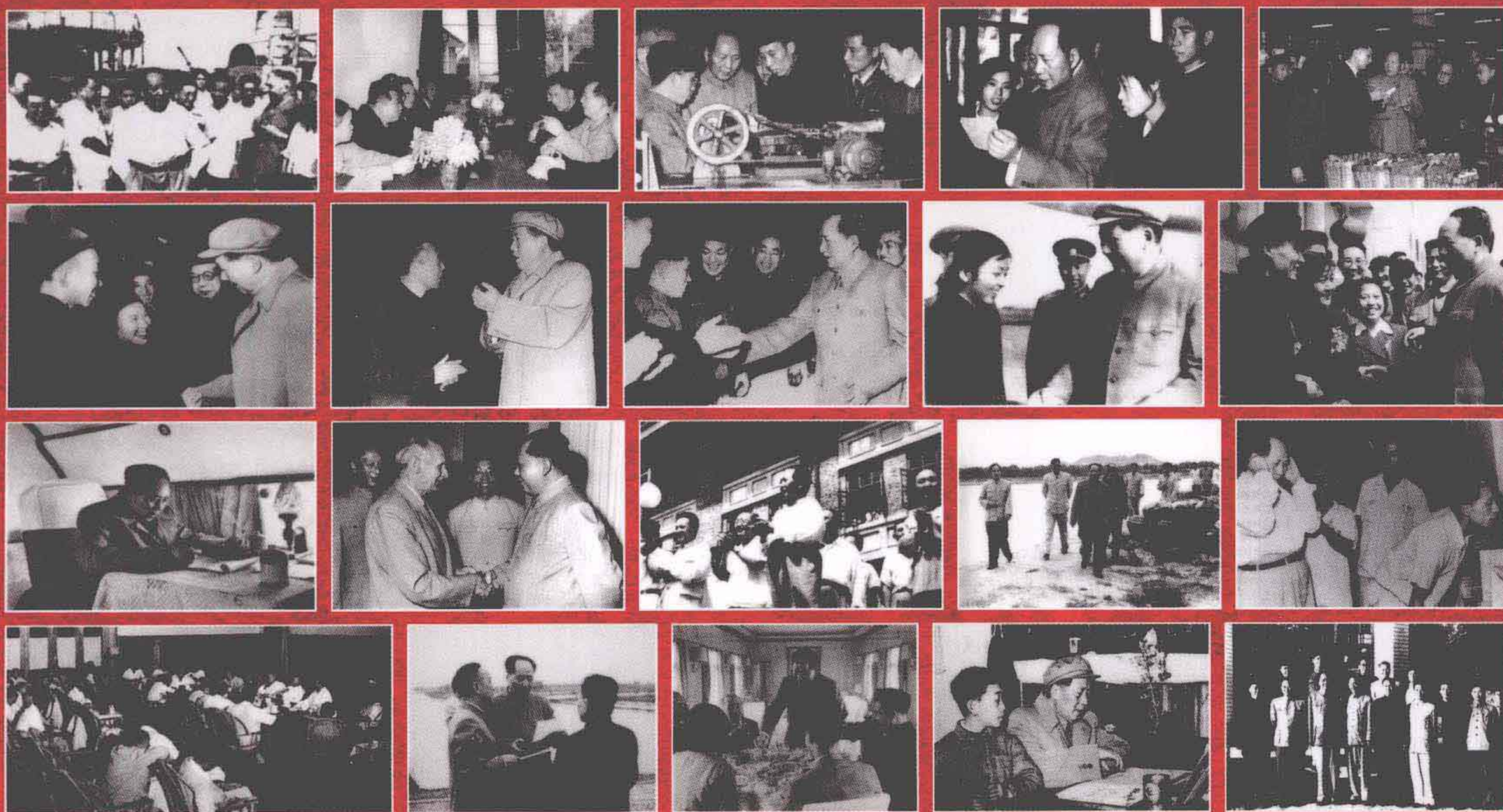
袁小荣

2013年9月11日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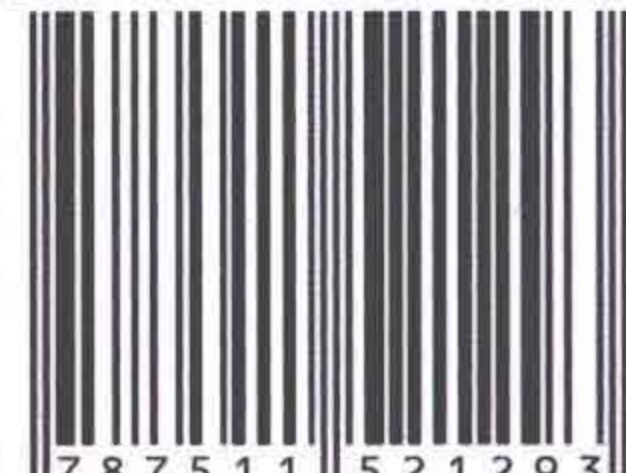
离京巡视纪实

1949—1976



上架建议：领袖人物

ISBN 978-7-5115-2129-3



9 787511 521293 >

定价：168.00元(全三卷)